

何...  
人...  
此...  
八...  
如...  
中...  
也...

...  
...  
...  
...

...  
...  
...

# 晚年毛澤東



春秋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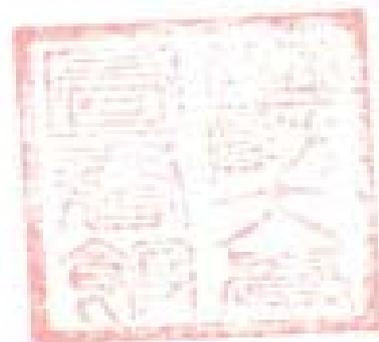
# 晚 年 毛 澤 東

蕭廷中 編

THE LATE YEARS OF  
MAO ZEDONG

春 秋 出 版 社

1989年·北京



## 晚年毛泽东

萧延中 编

---

出版发行：春秋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32开 12.375印张 320千字

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第2次印刷

印 数：5000—70000册

---

ISBN 7-5069-0111-0/D·27

定 价：5.00元

# 序 言

李 锐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他的一生，曾影响甚至主宰过中国之命运；他的一生，不论胜利和失败，贡献和错误，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即立志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终生奋斗目标，未尝一日稍懈。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习惯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曾长期以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因此，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国外已经发表的有关论著数以千计，近年尤注重研究毛泽东的晚年实践及晚期思想。

在毛泽东生前，国内出版过若干种写他的书，其中多数很难说是科学的研究。陈伯达在延安写的几种论著，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曾发生过较大影响。萧三的一本，提供了一些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传记材料。我在50年代初写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曾影响过一代青年，也是政治价值高于学术价值；1980年再版本是增补改写过的，其影响似乎在国外大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时出现了许多宣传毛泽东事迹的印刷品，还出现了几种民间版本的文集和语录。这些更谈不上研究，大抵不过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宣传品罢了。只是在民间版的文集中，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若干不易见到的未经核实的材料。

对毛泽东研究的真正突破，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现在不仅有全国性的组织,还有好些地方组织,出版了多种期刊,专家学者定期集会,有关论著每年几百篇,出现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呈现出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局面。毛泽东本人对历史和党史的研究,从来主张百家争鸣(他曾不赞成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试想一下,如果没有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没有随后理论务虚会的讨论,如果没有《决议》起草期间全国4000人的讨论,能够写出并通过这样好的《决议》吗?《决议》通过之后,八年来,对毛泽东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本书就是近年国内报刊发表的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论文的一个选集(也收入了少量尚未发表的文章),它反映了学术界所达到的新的水平。

在毛泽东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最重要的,而且是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对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期错误思想)的研究。因为,这一位曾经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危难、希望和力量的伟大人物,在他晚年的长时期中,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为他自己造成历史的悲剧。关于毛泽东尤其是他的晚年,国外有许多学者在进行研究(他们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比国内还要早一些)。敌视中国共产党和抱有成见的人的那些简单谴责或恶意诅咒,当然谈不上什么科学的研究。许多严肃的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表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如多次来华的施拉姆教授,他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政治传记《毛泽东》(现已翻译出版),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有的学者在论著中,也常不免带有某些片面性,或强调个人责任,或着眼于高

层权力之争,或从气质、性格等方面探求,或所据资料不够确切而影响立论。不过这些著作都有某些可取之处,能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深入研讨。对比之下,我们确有某种惭愧之感:对于这位伟大人物的研究,难道我们反而落在外国人的后面吗?

值得庆幸的是,关于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的研究,国内近年已有了新的开展。如有的高等学校已为此开设了选修课程;中央党史研究室已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召开了“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大量论文不仅见于党史刊物,也见于其他刊物,还出版了有关的专著。这一情况自同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来自昨天,昨天影响今天。人们认识到必须对历史进行反思,重新认识过去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从中汲取教训,求得借鉴,这样我们才能轻装前进。当前许多新学科、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当代哲学等为人所重,重新学习,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为热点等等,也都有助于这一研究的开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关于毛泽东研究青黄不接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现在已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是这方面的主力军。这本书的作者除开黎澍和李泽厚是著名的老年和中年学者以外,就都较年轻,他们的成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这本集子里的二十几篇论文,把毛泽东晚期思想放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环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上来考察,不但能够看出他是中之非,而且还能看出他非中之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黎澍同记者的对话说:看来是对身后之事不放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所凭借的,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有了这两条,人们就疯狂地“反修”,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起于60年代初的“反修”,是教条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就更是什么都是资产阶级,简直使人坐立不安。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无非是

极端僵化的斯大林教条。为什么产生教条主义？由于愚昧。愚昧来自贫穷。文化水平、理论水平都很低，不知世界之大，只守着这么一点东西。教条主义只有拼命“左”倾，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就是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甚至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实际上搞成愚民政策。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佳土壤，这与中国的小农经济联在一起：有人要人崇拜，有人要去崇拜。个人崇拜的萌芽，就在个人专断，也就是家长制，封建社会派生的人身依附。黎澍认为，个人专断与家长制这一现象，至今还值得注意。李泽厚的文章指出：在毛泽东那里，本来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唯物史观的范畴，逐渐变成了超时代的道德伦理范畴；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超时代的政治内容。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于是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挂帅；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而这种道德主义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中，有其深厚基础。“文化大革命”，便是由新的术语装点，植根于小生产的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沉扬的论文也分析了毛泽东对待社会发展的伦理态度，指出它高扬的，不是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风貌。这种伦理态度，又是同小生产的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道德观难以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在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天国并没有到来，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弊病出现了。可是他却想运用道德的力量来解决这些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制度基础的矛盾。他想用超经济的力量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萧延中认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主导，是人为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想以专断实现民主。毛泽东感到人民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但不愿“继续革命”的官僚阶层（“党内走资派”），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只有他自己率领

“造反有理”的广大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他晚年堕入多层的思维陷阱，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宰性，把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看成单纯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的派生物（“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人际关系上，将“统治”与“管理”相混淆，将复杂、多样的交往关系简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救世主”的“自我”意志，自觉或不自觉地当成全民族力量的发源与中心。“相信群众”实际上只是“相信自己”的代名词，从而走上靠个人专断以实现人民民主的迷途。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同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经济基础与民族心理等密切相关，否则就难以解释他的即兴之语，竟能在亿万人民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毛泽东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有机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郑谦认为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斯大林否认矛盾的存在片面性，但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老强调斗争性，忽视同一性，以致最后把斗争绝对化为否认同一性的斗争性。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直到“文革”时“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形成一种具有完备形态的斗争哲学。石仲泉和王禄林的文章，细致地分析了毛泽东由于误解了马克思的一些提法，而导致实践上的失误。我以为这些意思都很深刻。我曾经参加当年4000人对《决议》草稿的讨论，大家对毛泽东晚年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发表过许多意见和看法，我也对毛泽东伟大的一生（“功劳第一，错误第二”）作过概括性的发言。回想起来，讨论中似乎没有听到过上述这样的议论，有的意思接近，但还没有这样明晰。书中值得重视的好意见还多，好些文章见诸报刊后，在读者中已引起广泛反响，这里就不再列举。当然，不能说，这些文章的内容和论点都很确切，读者可以自己判断。

我很同意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的这一概述：“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毛

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已经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应加上一句：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某些正确的思想，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等等。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同毛泽东思想有严格的区别；但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也不能等同起来。”据我所知，当前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分析；关于“个人崇拜”形成及发展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前后期思想的比较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同马列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晚期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许多中青年学者希望，这种研究需要分门别类作许多专题研究，也要走向整体研究；不要述而不作，要由描述性研究走向高层次的分析；要重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有关理论；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认为，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题目。我们当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之时，要从旧轨道转入新轨道，问题丛生。我们面临世界性的新挑战，我们要解决的新问题多极了。我们的口号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似乎不应当老纠缠旧账，回顾过去，以免分散精力，或者如通常说的，不要影响安定团结。然而破旧立新，两者是紧密相联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

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既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同我们今天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文化背景、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改革的历史负担，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毛泽东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不论是研究他早期、中期或晚期的思想，都应当看作是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们在中国实行改革，不研究中国，不研究当代中国，岂非笑话。在这方面是不应该有什么禁区的——只要它是科学的研究。我们相信，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的开展，必将在指导理论方面，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书编者命我作序，我没有推辞，一则表示我对这一工作的赞同，一则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于是草草翻阅了集子中的一部分文章，记下一点读后感，加上一点我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就算是序。

1988年11月10日

# 目 录

序 言 .....李 锐 ( 1 )

## 第 一 编

毛泽东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误解.....石仲泉 ( 3 )

评《五·一六通知》 ..... 谭宗级 ( 15 )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价 .....王年一 ( 32 )

先驱与滥觞 ..... 郑 谦 ( 40 )

——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30周年

划时代悲剧的剖析与理解 ..... 萧廷中 ( 56 )

——对毛泽东晚年政治哲学思考的若干思考

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 .....牛 军 ( 80 )

## 第 二 编

毛泽东晚年对经济的基本主张及其选择 .....朱嘉明 ( 91 )

《五·七指示》初探 ..... 王禄林 ( 101 )

“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 ..... 席 宣 ( 113 )

艰辛的开拓 ..... 石仲泉 ( 129 )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的探索

乌托邦荒原：“三面红旗”剖析 ..... 胡长水 ( 163 )

### 第三编

- 1949—1976：中国意识形态的反思 .....李泽厚 (183)
- 毛泽东的晚年与“文化大革命” .....沉 扬 (201)
- 空想与理想之间 .....郑 谦 (218)
- 对建国后一种禁欲主义的考察与思考
-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历史考察 .....许建华 (240)
- 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描 .....萧廷中 (253)

### 第四编

- 通向“文化革命”之路 .....黎 澍 戴 晴 (267)
- 关于“文革”产生的文化背景的一场对话
- 昨天与今天 .....王绍光 蔡崇国 程 颖 (276)
- 关于“文革”的谈话
- 毛泽东晚年文化思想散论 .....何 平 朱学勤 (293)
- 毛泽东：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 .....许纪霖 (305)
- 毛泽东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 .....朱学勤 (318)
- 与施拉姆教授的对话
- 毛泽东在1957年 .....戴 晴 (329)
- 晚年毛泽东与中国古典诗词 .....张贻玖 (357)
- 编 后 ..... (376)

# 第一编



# 毛泽东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权利” 概念的误解\*

石 仲 泉

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早提出来的。

1875年春天，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计划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政党。由于爱森纳赫派领导人起草的统一党的纲领草案，在许多地方采纳了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随即写了《对于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通称《哥达纲领批判》），对纲领草案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等含混不清的空话时，谈到了未来社会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原则。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可能有对于消费品的完全公平的分配；对“社会一切成员”在消费品分配方面的“平等的权利”，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各个人（例如老人和小孩）的需要不可能“平等”。就消费资料在各个劳动者中间的分配而言，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通行的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把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

---

\* 此文原标题为《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现在的标题系由本书编者重拟。

原则,叫做资产阶级式的“平等的权利”。他说:“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当时,马克思还没有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开始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明确区分,以后在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通用了),也没有使用按劳分配这个词。但正是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的思想。

马克思为什么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称为“资产阶级权利”呢?是不是他认为这个原则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属性呢,或者具有可能导致资产阶级剥削的任何属性呢?不是的。因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阶级差别,既然这样,他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也就不可能是资产者或其他剥削者的权利。马克思所以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称为“资产阶级权利”,是因为这个原则和资本主义商品的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个原则,它们都体现了交换双方的平等权利。就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来说,一切商品所有者都适用同样的价值尺度,因此他们在价值尺度面前是平等的;就按劳分配来说,在劳动尺度面前,交换的双方也是平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性质改变了,但形式还存在。

当然,等量劳动相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它是商品交换的一般原则,是和商品同时出现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手里,这个原则发展到了顶点,成为普遍的原则,并且把劳动力也作为商品,因而掩盖了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当劳动者把他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时候,在形式上同资本家是平等的交换关系。这个平等的原则虽然只存在于流

通领域(在生产领域内是对于剩余劳动的残酷剥削)，但资产阶级正是用这个原则所体现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平等权利，取代了封建制度中的等级特权，使平等权利成了资产阶级权利的标志。恩格斯说：“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sup>①</sup>这就是资产阶级为什么把自由、平等、博爱当作他们的政治口号的原因。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另一方面，劳动还是交换的对象，还不能和报酬脱离关系，也就是说，劳动者从社会取得的报酬，原则上是同他的劳动成比例的，还不能不保留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上平等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加以比较时，便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体现的平等权利，叫做“资产阶级权利”。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所谓“平等的权利”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局限，从本质上说明了它不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不能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纲领。

马克思还指出，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的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包含着在劳动者中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劳动为共同尺度来分配消费资料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来说则是不平等的权利。它既默认了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也默认了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家庭负担。劳动者体力强弱不同，智力高低不同，赡养人口不同，因而在劳动成果相同、从社会消费资料中领得的份额相同的情况下，这一个劳动者所得到的，事实上就会比另一个劳动者多些或少些，其生活水平就会比另一个劳动者高些或低些。因此，马克思讲，这种“平等的权利”，“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权利，在社会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10页。

主义社会是不可能避免的，也是不可能消除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完全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说的。它既撇开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各不相同的特殊性质，也撇开了它们各自从属的不同的生产关系。如果要用抽象的概念来分析具体事物，就必须回到被撇开了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来；也就是说，如果运用“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抽象概念来分析按劳分配时，就必须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分清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使用“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概念，既没有否认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没有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混为一谈。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在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对于“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理解开始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内容，明确地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同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加以区别。他说：“‘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列宁指出这一点，就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权利，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在劳动力买卖平等的幌子下掩盖着对雇佣工人残酷剥削的权利。这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权利，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与此不同，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则是以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在这里，人们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劳动者的权利只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正比，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利”是对资本主义剥

削制度的否定，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有根本的区别。

另一方面，列宁又不象马克思那样，主要是在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所表现的形式上的平等的意义上来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而比较多地阐述“资产阶级权利”所体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含义。在马克思那里，“资产阶级权利”的特征包含着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两个方面。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侧重于说明它是形式上的平等这一面，因而，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这一点来加以定义，并以此把它同封建特权这样彻头彻尾的、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不平等的权利加以区别。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许多地方使用这个概念时，则主要论述了它是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一方面。例如，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而不能立即消灭按劳分配消费品这一不公平现象，这就表明“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只是部分地取消。就生产资料由个人的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这一点来讲，“资产阶级权利”已不存在；就消费资料实行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来讲，在不同等的人身上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没有取消。在这里，列宁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其侧重点已与马克思的原意不同了。他没有更多地去强调“资产阶级权利”的形式上的平等这一面，而着意突出了“‘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这一面。

列宁还把“资产阶级权利”同国家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论断。他说：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还不够“完全成熟”，没有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人们不可能立即学会不需要任何权利规范而为社会进行劳动，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规范，因而需要国家机构，一方面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另一方面“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

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这就是说，要通过行政手段来强迫人们共同遵守“资产阶级权利”，以便维持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列宁的这个思想，一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国家”继续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使“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本来从纯经济的意义上提出的概念，具有了政治色彩。列宁还根据马克思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权利”的思想，提出了“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概念，并说：“和（半资产阶级的）权利一起，（半资产阶级的）国家也还不能完全消失”<sup>①</sup>。这里的“（半资产阶级的）权利”，无疑是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泛用。这样，就使这个在马克思那里本来有确定含义的概念变为不确定、不清晰，从而，使本来就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变得更加费解。这个变化情况对毛泽东有较大的影响，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解释比列宁离开马克思的原意更远得多了。

毛泽东谈论“资产阶级权利”（他在世时翻译为“资产阶级法权”），始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时。“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讲了不少。从这两段时间比较集中的论述来看，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看法是含混不清的，离开了马克思的原意的客观性，而把它变为可以任意取舍的主观的价值判断或政策措施。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主要表现在：

第一，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例如，毛泽东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

---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第33页。

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1975年底到1976年初的一系列谈话，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认为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跟旧社会差不多。在这里，毛泽东虽然也说了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但是他却忽视了所有制的变化对分配关系性质会发生决定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混同于旧社会的分配制度。这是对“资产阶级权利”最明显的误解。“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这种误解，大肆制造舆论，全盘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声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因素，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

毛泽东始终担心按劳分配带来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产生特权阶层。这是把按劳分配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所体现的正常的的不平等，同在执行过程中对这个原则的破坏所出现的不正常的的不平等情况混淆了。因为按劳分配的本质是反对剥削的，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是防止新的剥削阶级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不仅如此，这个原则的强制性，还有助于把绝大多数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贯彻多劳多得的原则，能够激发广大劳动者积极地创造性地为社会劳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扩大社会财富。因此，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上，真正的按劳分配产生的劳动报酬的差别，是劳动群众在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上的差别。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的普遍提高，这种差别最后逐渐缩小（当然，如马克思所正确指出的，在消费品分配上的人为的“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那只是平均主义者的幻想）。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会造成新的阶级分化，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通过别的渠道产生大量占有他人劳动的不法行

为。譬如，投机诈骗，走私贩私，贪污盗窃，或者依仗权势侵吞集体的或他人的财产而成为暴发户，无一不是对于按劳分配原则的践踏和破坏。这就必须要通过国家采取行政手段来保卫按劳分配原则，堵塞破坏这个原则的各种渠道。

第二，把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是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的。列宁也认为“资产阶级权利”只存在于分配领域之内，即“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权利’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是，毛泽东却把“资产阶级权利”的范围扩大到分配关系以外。1958年，他曾列举过“资产阶级权利”在我们国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除了列举薪金制、工资等级制、计件工资等属于分配关系的以外，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列举了许多。例如，他说：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以不平等态度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在有的讲话中，又把三风五气（三风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指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猫鼠关系（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老爷态度，官僚主义，军衔制，等等，也说成是“资产阶级权利”。这就是说，凡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领域中存在的一切不平等现象甚至一切不合理现象，几乎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权利”。这样，他就误解了马克思所讲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所体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含义，把“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用滥了。

应当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剥削阶级思想和其他旧的传统习俗的影响，这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必须纠正的不良现象。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些现象，并指出它的危害，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但是他把这方面的问题一概地都说成“资产阶级权利”，这就把不同范围和性质的问题混

淆了。

第三，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1958年秋天，毛泽东提出讨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就产生了要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意向。他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有很大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的制度。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一个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因而，一度主张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同年郑州会议前夕，他的思想逐渐有所变化。在10月中旬的一次谈话中，开始提出了“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该采取逐步破的方针”。11月9日，在郑州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又将“资产阶级权利”分为两部分，认为属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的，要坚决破除，天天破除；对于工资制，要适当的保留，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11月23日，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也说对于“资产阶级权利”要有分析，应破者破，有用者要保护，使一部分有用的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要“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在这里，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分析，比最初企图全面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思想虽然有了改变，但是把“资产阶级权利”区分为有用的，无用的；一部分保护，一部分破除，显然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这些话表明，他把具有客观确定性的“资产阶级权利”，变成了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的政策措施。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又一再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他在1969年4月13日九大开会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说：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所有制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形“左”实右，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了，但是走



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是管工人阶级。我看所有制没有解决，至少是大部分，不讲全体的话。

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说：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并且指出：领导工厂的党委书记、副书记，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是修正主义路线。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说法，但是，这里所论及的问题，不仅被他视为“资产阶级权利”的重要内容（连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权利”了），而且还把对待这类“资产阶级权利”的态度，看成了区别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划分是不是“走资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他看来，既然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单位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走资派”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等“资产阶级权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存在资本主义的关系，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开展夺权斗争，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所以，他在分析了上述的情况之后，得出结论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1975年初，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的主要内容，也是要批判“资产阶级权利”。尽管他表示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这样的意思，但在他的心目中，“资产阶级权利”仍然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应予消除的弊病，所谓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说法，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因此，在他提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高潮。1976年初，为了“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他又指责老干部们的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等等，不仅把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态度问题看成是由“民主派”转变为“走资派”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再一次地从

批判“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方面，论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毛泽东对接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了严重后果。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错误认识，怎样导致了他在经济上推行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并成为他在政治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想的、理论的根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早就讲过：“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按劳分配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利”（假如我们一定要继续使用这个普通人难以理解、马克思只在《哥达纲领批判》这一篇文章中使用过的概念的话），是和这个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样的分配制度尽管还不是按个人需要来分配消费资料，还没有消灭劳动者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但是它消灭了几千年来人对人的剥削，同以往的私有制社会的分配制度相比较，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深刻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也不应当否定按劳分配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利”。

当然，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把按劳分配原则当成革命的最终目标，也不是要放弃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我们共产党人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而不是为了换取社会给他个人的报酬。我们所进行的革命工作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党所领导的现阶段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运动。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既是共产主义事业所要求的，也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可缺少的。因为按劳分配原则也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才能深刻理解和正确地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这两

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既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又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按劳分配政策，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选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41—452页）

## 评《五·一六通知》

谭宗级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并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客观事实。但是，毋庸讳言，他在晚年也犯了严重错误，这主要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sup>①</sup>

这些“左”倾错误论点，首先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经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

---

<sup>①</sup>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以后曾被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通知》，是1957年以来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和集中表现，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此，剖析《通知》，对于进一步认清“文化大革命”在理论、方针、政策上的错误，从中汲取教训，是有益的。

1966年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同时，他还提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根据康生传达的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中央书记处于4月12日作出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4月，在上海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组成中央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负责起草《通知》。《通知》先后八次易稿，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于4月24日提交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然后，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正式通过，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到县、团一级党委。一年以后，经毛泽东批准，于1967年5月1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从《通知》的结构来看，它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二是罗织《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逐条进行无限上纲的错误批判，提出一整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方针、政策。三是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通知》涉及的范围很广，问题很多，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些初步的剖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前提和科学依据。“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政策之所以错误，首先就在于它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主观臆断。

1966年5月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17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有10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暂时困难业已克服。党内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人民是团结的，社会是安定的，人民政权是巩固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以上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方面。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国内还存在某些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某些不相适应的方面也需要继续调整。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总之，当时并不存在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而《通知》却无视这一基本形势，错误地把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阶级对抗始终存在的社会，把我国的现实描绘得一团漆黑。

《通知》在第九条里对60年代前期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和基本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

这种概括一笔抹煞了建国十七年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和主流,而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五界和上述报纸、广播等13个方面,所有这些文化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无一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毒草丛生、牛鬼蛇神充塞的黑暗世界,这些论断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60年代初期,我国文化思想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左”倾思潮严重,党内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受到了削弱以至破坏。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9年“反右倾”之后,一方面是心有余悸,另一方面是“宁左勿右”的思想情绪日益滋长,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情况,直到传达毛泽东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和1962年3月周恩来、陈毅在广州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宣布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以后,才有所缓和。

但为时不久,毛泽东便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发出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认为文艺界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已蜕变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文化领域里的“左”倾思潮又发展起来,错误地批判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和学术观点,打击了许多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有的还被说成是服务于某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因而对他们的批判实际上成为政治定罪。到1965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后,特别是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翦伯赞等后,无

限上纲，罗织罪名，这种政治批判愈演愈烈。《通知》下达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被严重混淆。从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三反分子”的帽子满天飞，陷人于罪的棍子到处打，大兴“文字狱”，造成了严重后果。

《通知》不仅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和基本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而且对60年代中期整个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也作了同样错误的估计和判断。最使人惊心动魄的就是《通知》中的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而且《通知》还说，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个别的”，而是“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也就是认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篡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且渗透到党、政、军和文化界的各个领域，遍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照此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是危机四伏，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了。这是一幅对社会主义现实作了多么严重的歪曲的图画。

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估计，所谓“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围，后来毛泽东也说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实际上这样的形势和随之而来的任务并不存在。因此，无怪乎全党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对这场“革命”的发动感到“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了。这场运动根本违反了人民的意愿，当然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 二

《通知》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首先，《通知》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思想认识上、学术观点上的矛盾，同革命和反革命的敌我矛盾之间的界限，提出要用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打倒、清洗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通知》把敌我矛盾的政治问题和人民内部的学术问题完全等同起来，然后又把政治问题视为禁区，不准讨论，不许被批评者申辩。《通知》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论断为依据，来抹煞政治和学术的区别，这是根本不正确的。应当怎样理解“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列宁解释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业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sup>①</sup>

更何况，“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根本就不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据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批判和反对修正主义，但是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4卷第191—192页。

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其结果是“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在学术上有成就的、著名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一律加以批判、打倒。

《通知》认为，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通知》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学术讨论、理论探讨，武断地认定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这不仅完全违背了在学术上必须实行“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必须反对企图用粗暴、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的做法，而且其结果必然是把错综复杂的学术领域里的不同意见简单地归结为两家：不是无产阶级一家，就是资产阶级一家，把“百家争鸣”说成实际上是“两家争鸣”。这就在实际上既取消了肃清封建主义思想遗毒的任务，也忽视了我国当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而且这样一来，就使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都可以被贴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签，于是这个斗争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通知》提出无产阶级学术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方针，这就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历史遗产一贯的理论和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如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批判继承的方针，这是人所共知的。列宁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作过坚决的斗争，批判过所谓要消灭资产阶级文化，否定文化遗产，鼓吹文化虚无主义，想要凭空创造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错

误口号。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化虚无主义，列宁在1920年10月发表了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著名演说，反复强调学习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sup>①</sup>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曾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sup>②</sup>应当说，这些道理都是人们所熟知的。

与此相反，《通知》却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请问怎样消灭呢？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凡是不符合他们帮派口味的，管它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原则，一律斥为“封、资、修”的“黑货”而加以封禁、销毁，对这些作品的作者一律予以打倒，甚至投入监狱，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时之间造成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严重局面。那时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封建法西斯的淫威下，连郭沫若也不得不违心地宣布要把自己的著述统统付之一炬。所谓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方针，说到底，就是毁灭文化的方针。执行这一方针造成的恶果是：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到处盛行；说假话、搞迷信、打砸抢愈演愈烈，造成了一场摧残文化学术的大灾难。

其次，《通知》主张“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1卷第348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社会意识形态。《通知》说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什么是“专政”呢？列宁说得好：“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sup>①</sup>这就是说，专政是一种强制手段，通常是指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在政治斗争中为解决敌我矛盾时所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政治措施。谁对谁实行专政，这只能是政治领域里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把专政手段移用于思想文化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能用批判的武器，不能用武器的批判；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正如毛泽东所说：“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sup>②</sup>因为一定的思想和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只能伴随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才能实现。因此，企图采取专政的手段来强制解决某种思想文化问题，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某种观点、某部作品、某一出戏、某部影片，一旦被认为有问题，常常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和这些作品的作者都当作阶级敌人、革命对象，而对他们实行专政，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以后，“四人帮”变本加厉地提出所谓“在思想领域专政”，“在意识形态专政”，“把文化部办成意识形态里的公安部”，以及张春桥鼓吹所谓“全面专政”论，都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就是把“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论断歪曲引用、任意延伸的结果。“四人帮”肆意抹煞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同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似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切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都是敌我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8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1页。

斗争,都要实行专政,这是他们敌视人民的反革命本性所决定的。

再次,《通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真理的阶级性。“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命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明真理是客观的。客观真理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都无权探索真理,宣传真理,捍卫真理。不论是谁掌握了真理,人们就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即尊重真理,服从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掌握了真理(包括掌握了部分真理)的人,从来都是采取尊重和学习的态度的。这就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尽管有的人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学者,马克思、恩格斯照样吸取他们学说中的合理部分,用来建立和证实自己的理论,并不因人废言。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李嘉图、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的态度,便是明显的例证。马克思主义正是批判地吸取他们学说中的合理部分才创立起来的。同样,列宁并没有因为普列汉诺夫在后期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否定他前期在俄国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这也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毛泽东也多次强调,真理只有一个;不要跟一个人,要跟真理,谁发现了真理,就服从谁,管他是挑大粪的,还是干别的什么的。“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sup>①</sup>这表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无可非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通知》却认为这个观点否认了真理的阶级性,斥之为“资产阶级口号”,但真理有阶级性的说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这就是说,从人们的认识形式来说它虽然是主观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却是客观的。真理是客观的,它包含着不依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观察同一对象会得出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1页。

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但是，认识同一对象的真理只能有一个，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因此，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承认真理有阶级性，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客观性的观点，就会陷入诡辩论和相对主义。《通知》以真理有阶级性的错误论断来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正确观点，恰好证明这一观点是不可驳倒的。

《通知》接着又把在真理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论题一下子改变为完全不同的论题，它问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很明显，这些问题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截然不同的两类问题，这种改换论题的批判当然是很错误的。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便否认了客观真理，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就在客观上助长了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人们在真理面前不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在真理面前象在封建社会一样有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关系，只有某些人或某个人才有权有资格掌握真理，其他的人只有等待这些人的“恩赐”，才能看见真理的光辉。而掌握真理的人，又一定是睿智非凡的伟大天才。这种人的地位越高，真理就越多，地位达到最高峰，他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了，他的话就成了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这种真理化身的人的言论，只能成为信仰的对象，而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别人无权研究，最多只能进行注解阐释。谁如果要探讨、研究这些言论是否正确，就会被认为亵渎神圣，大逆不道，横祸便会从天而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异议，不仅被开除党籍，陷身囹圄，而且竟惨遭杀身之祸。这种理论上的专制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用

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最突出的是《公安六条》中规定的“恶毒攻击”罪，不少冤案都由此而来。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权力真理”观并未绝迹。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同志，实质上还是坚持“权力真理”论。这种观点，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最后，《通知》还割裂“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主张以“破”代“立”。必须全面理解破和立的辩证关系。破，是对旧事物的批判和否定；立，是扶植和支持新事物的产生、成长和发展。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绝不能互相取代，决不能说：“‘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可见破和立是不同的两个范畴，绝不能说，立等于破，可以以立代破；也不能说，破就是立，可以以破代立。我们打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旧的国家机器，还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建立了国营和集体所有的两种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还要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建设和斗争，才能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说“‘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呢？我们干革命，破并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一个被打碎的旧社会的废墟，而是为了在这个废墟上建立新社会，创造新生活。破，是为立扫清道路、创造条件的。立，才是我们革命的目的。破的任务是艰巨的，但立的任务往往更艰苦更困难，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更长的时间，决非一蹴所能成就的。把破当成目的，说破就是一切，这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时期，破无疑是中心任务，那时应当破字当头。但是，当工人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破的任务虽还未完成，但立的任务即建设的任务却日益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成为全国工作的重心。我们党提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是表明我们已把立提到首要地位，

也可以说是立字当头。这是合乎辩证法的，不能说是任何时候都要“破字当头”。老是破，不稳定，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怎么谈得上立、谈得上建设？应当说，没有破是不可能立的。但是没有立，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破；没有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会自行到来。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把它建设好，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彻底破除掉。因此，《二月提纲》说的“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而《通知》却斥之为：“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这样无限上纲，大张挞伐，实际上是割裂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从而为林彪、“四人帮”大搞破的绝对化，推行“破就是一切，破就是立”的“捣乱哲学”大开方便之门。

### 三

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十六条》强调的“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一再论述分清敌我的极端重要性，他着重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sup>①</sup>恰恰在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了敌我，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通知》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和判断，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以致错误地把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视为“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子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号召对他们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直至夺取他们的“领导权”，“清洗这些人”。实际上，是把各级领导干部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统统打倒。

在我们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虽然党内也混进了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但在党内并没有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指什么人，从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二十三条》提出这一概念，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并无确定的标准，完全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因而同样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竟可以昨天是“走资派”而被打倒，今天是革命派又成为结合的对象，明天因不合“造反派”的口味再度被打成“走资派”。这种变幻莫测的政治沉浮，完全要看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的态度如何来判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上自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党支部书记，甚至连炊事班长、汽车班长、生产组长也都成了夺权的对象。因为“走资派”的内涵不清，只要沾一点“权”的边都可以被说成是“当权派”，而“当权派”就可以被打成“走资派”。不仅如此，而且“走资派”这一概念的外延很广，随便可以打出成千上万个“走资派”来。正因为“走资派”是这样一个既不确定又不科学的概念，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便可以利用它来打倒他们想打倒的任何人。林彪、江青之流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能够猖獗一时，大搞“普遍罢官”、“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就是利用了这个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走资派”的“左”倾概念。

总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涵义不明确，“当权派”所指又非常广泛，使用这一概念，便错误地把党内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看成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只能扩大打击面，而被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来作为“打倒一切”的根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

彪、江青一伙滥施淫威，致使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无辜受到诬陷和迫害。如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33 人，除去世的 3 人外，遭受诬陷的达 20 人之多，约占总数的 67%；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 194 人，除有病、去世的 31 人外，遭到诬陷、“靠边站”的 96 人，约占总数的 58.9%。仅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案而死的即达 9804 人之多<sup>①</sup>。实践表明，“走资派”这个概念并不是“科学的抽象”，而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方便手段，我们必须坚决摒弃这个“左”倾错误的概念。

《通知》第九条提出“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结语又要求“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以后，《十六条》又规定要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所谓“反动”，不言而喻，指的当然是政治上的反动，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用语。但其结果，凡是权威的，即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统统被看成就是“反动”的学术权威，都被纳入清洗、打倒之列，甚至我们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战斗几十年、卓有成就的老同志也不能幸免。在林彪、江青一伙肆虐横行的日子里，文化界的大批知名人士横遭迫害，仅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遭受迫害的就达 2600 余人之多<sup>②</sup>。

总之，由于混淆了敌我的界限，就使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以及同情他们的广大群众受到了打击和迫害。

以上从形势估计、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等几个方面，对《通知》作了一些初步的剖析。由此我们应当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就是：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应当经常注意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自觉地揭露和克服自己组织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坚决防止和避免走上脱离人民、压迫人民、蜕化变质的道路，这的确是一项长期的严肃的任务，是一个需要认

---

<sup>①②</sup> 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1980 年 11 月 2 日）。

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大课题，绝不可等闲视之。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符合实际的估量；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这是部分的、小量的）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主要的、大量的），而决不可以主观臆断，夸大敌情，以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必须依靠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而决不可以抛开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必须凭借社会主义法制的手段，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可以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总之，决不可以采用《通知》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这种完全错误的理论、方针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仅仅进行一次，已经使我们深受其害，至今犹有余痛，以后决不能再搞了。这是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牺牲得来的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永志不忘。

恩格斯在 1893 年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过：“没有那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sup>①</sup> 我们党全面地深刻地总结和汲取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纲领，找到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采取了许多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有力措施，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国家出现了安定团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49 页。

结、兴旺发达的生动景象，目前正在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有信心，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一定能够象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用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这场历史的巨大灾难。

（原载《党史通讯》1983年第8期，收入本书时，作者对内容做了个别增补和订正）

#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时对形势的估价

王 年 一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他是从把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都看得非常严重的错误估计出发的。

他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同志致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炮打司令部》（1966年8月5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1969年4月1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等文件和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

（一）毛泽东把意识形态领域和知识分子中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

他在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两次作了关于文艺的批示，认为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正如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sup>①</sup>中所说，“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

<sup>①</sup> 载《红旗》1981年第23期。

远因和近因之一”。1966年初，写出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sup>①</sup>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中共中央1966年4月10日批发这个文件时明确指出它是“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上述观点集中地反映了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文艺界的看法。建国后近17年文艺界成绩的主流被否完了，显然这是毛泽东上述关于文艺批示的“左”的发展。关于教育界，他在1970年12月对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他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及教育界和学术界时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sup>②</sup>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认为多年来牛鬼蛇神塞满了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指出要夺取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中的领导权，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要求。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中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二)更加严重的是，毛泽东认为在党内形成了一个走资本主

---

<sup>①</sup> 中共中央批发的文件原文如此。公开发表时删去了“后的十五年”，在“建国”后加“以”。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二。

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4年12月12日，他在陈正人蹲点报告上所作的批示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对于“走资派”作过一次解释。1967年5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大意）：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是积极赞成并且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那就不那么赞成。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叫走资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他明白地指出，“走资派”指的是一部分老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在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说“走资派”中也有好人以前，“走资派”一律按敌我矛盾对待。后来毛泽东指出，“走资派”就是“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五·一六通知》中，他对情况作了更加不符合实际的估计。他说：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1969年4月28日他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回顾“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形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党内形势的估量。

（三）特别严重的、直接引起“文化大革命”的，是毛泽东估计党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他最早提醒党内要警惕修正主义，是在七千人大会上。1962年9月24日，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了党内反修问题，认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错误地批评了“翻案风”、“单干风”和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没有点名，但是显然主要指的是党内上层，如刘少奇（他主持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重大作用的1962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在会上说了在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措施之类的话，毛泽东对这两次会议实际上都很不满意，又一再批评了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邓小平（他主持了全党全国的甄别平反工作，卓有成效，毛泽东则认为近来平反之风不对）、彭德怀（他于1962年6月、8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申诉，要求平反，这也被认为是“翻案风”）、邓子恢（他主张在农业中实行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习仲勋（他审阅过小说《刘志丹》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等人。所谓“翻案风”、“单干风”和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都属于毛泽东后来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大意）：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省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据我们所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又说：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1965年9、10月间，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说明，他说他感觉到在北京他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因而发

出这样的警告。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他亲自修改定稿的《伟大的历史文件》<sup>①</sup>对《五·一六通知》作了阐明。文章说：“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被广大群众揭露出来了。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未同中央的领导集体商量，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对中央集体持什么看法。毛泽东是伟大导师，他当然不是不知道集体领导的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但他认为他的意见是马列主义的，而中央的一些同志搞了修正主义，所以他要独排众议。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偏差，导致组织原则的背离；而组织原则的背离，就不能及时纠正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偏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不久，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明确指出党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四）1965年底至1966年春，作出了一个灾难性的估计，这就是北京可能发生政变。

据萧华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sup>②</sup>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sup>③</sup>5月18日，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

---

① 载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② 即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

③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二。

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说：林彪这个讲话“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对于上述事实，则从未否认。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

（五）历史早已证明，上述估计完全是凭空臆断，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何以对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从根本上说来，主要是由于毛泽东长期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而过分地相信自己，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党的领导集体，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具体说来，以下若干因素值得注意：

（1）毛泽东事实上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不久就形成了另有一个“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观点。他在1957年7月提出的“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sup>①</sup>的判断，他在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判断，他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的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均属剥削阶级的判断，他在1959年8月16日提出的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的判断（这些判断，党都接受了），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

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上述观点。这个观点，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了急剧的发展，用它来观察形势，必然发生很大的偏差。

(2) 国际反修斗争既有正确的方面，又有失误的方面。对于列宁关于被推翻了的阶级长期存在并企图复辟等观点的误解，从而把阶级斗争提到反修防修的高度，就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个失误。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当然不能正确分析形势。

(3) 毛泽东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他和中央领导集体在若干问题上看法是有分歧的，特别在1962年和1962年以后。他以为他的主张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赞成、反对他的意见就是修正主义。他的意见越是行不通，他越是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党内产生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4) 1965年11月至1966年春主要由毛泽东造成的党中央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又使他自己把形势看得更加严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好后送毛泽东审阅，这时中央并不知道此事，文章发表后，上海方面未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宣部，中宣部未通知各报转载，因而不少报纸未及时转载。许立群问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为什么不打个招呼。毛泽东认为，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sup>①</sup> 吴晗的文章并不反动，姑且不论；他的文章从未要求各报转载，各报也没有转载过。北京不及时转载姚文，毛泽东看得十分严重。照他看来，这还得了，成什么样子了，不是证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了么？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行了！又，在这期间，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毛泽东当

---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二。

时当然认为都是正确的斗争，这更使他误认为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因而下决心要搞“文化大革命”。

由此看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估计的错误，固然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也不能归咎于一人。在形成的过程中，有些错误党中央未能及时认识和纠正。

（选自《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

# 先驱与滥觞

## ——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30周年\*

郑 谦

30年前的1957年，不论是在中国，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在发生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时，在刚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在曾经向国际共运贡献过一整套极富创造性的新民主主义科学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那里，又一个崭新的光辉思想发出了耀眼的光芒。1957年6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发表了。

《正处》是时代的产物，它达到了产生它的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它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却又未能把其中的一些光辉思想贯彻到底；它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基础，但也留下了可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产生、发展的罅漏。

——

为了全面、科学地评价《正处》的意义，应当考察它的理论渊

---

\* 此文原标题为《光辉的思想与历史的局限——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三十周年》，现在的标题系由作者重拟。

源,以及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在本世纪50年代初期所达到的高度。这样才能看出《正处》提供了哪些前人所没有提供的东西。

在19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同农民结成巩固同盟的思想;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不能用剥夺地主资本家的方法剥夺小农,而应用引导改造的办法使小农走上社会化生产道路,与小农结成联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消失而矛盾依然存在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可以看作是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学说最早的理论胚胎。

本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在驳斥托洛茨基的“二次革命论”时谈到,苏联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类是“结合内部的矛盾”(“结合”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基本群众首先是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另一类矛盾是“结合范围以外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富农之间的矛盾”)。斯大林指出,“结合内部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增长,将日益缓和并顺利解决。而结合以外的矛盾,在还没有消灭富农阶级以前,是日益增长并尖锐化的。”<sup>①</sup>

斯大林这些观点,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类矛盾,及其内容、性质和发展方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但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第一,使用“结合内部”、“结合外部”的说法来表述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显然欠严密、准确。第二,斯大林所说的“结合内部的矛盾”,主要指的是工农之间的矛盾,它不足以概括人民内部矛盾的丰富内容。第三,斯大林所说的两种矛盾,是特指过渡时期的。而在过渡时期之后,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是否还存在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页。

这两种矛盾，斯大林没有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实际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在此之后至50年代初，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基本上仍然停留在1936年的水平上。战后出现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这种理论当作“绝对权威”照搬了过去。

但是，在另一方面，苏联作为一个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日益显露出其内在的、固有的一些矛盾。人们开始对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不容置辩的理论发生了动摇，产生了怀疑。斯大林晚年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但却未能解决它们<sup>①</sup>。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共批评了斯大林的许多严重错误。严峻的事实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什么自称是没有矛盾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根据这些事实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时代在呼唤着一种新理论的诞生，而产生这一理论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就是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所面临的历史使命，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研究时所凭借的历史条件。《正处》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应运而生的。

关于《正处》的内容，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认为，它的确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中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矛盾和解决方法等。这些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此处不赘。

《正处》的发表，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57年6

---

<sup>①</sup> 参阅《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

月18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1957年6月28日，英国“一群专家”发表评论文章说：“毛的讲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法国《世界报》6月20日社论指出：“……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正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引起了很大震动，有人反对，有人赞同。例如赫鲁晓夫在《正处》发表后一次对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说，苏联不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甚至说，苏联不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苏联哲学博士斯捷潘年则高度赞扬了《正处》，指出社会主义的统一并不排斥矛盾。哲学博士祖努索夫指出，毛的报告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如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从来就没有人作过这样辩证的全面分析。报告不仅概括了中国的经验，而且概括了苏联的经验。可惜（苏）党的领导人……在会上还是忌谈矛盾。1957年6月22日，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的《大家都来读毛泽东的报告》一文中说：“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中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

从当时东西方对《正处》的这些反应中，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一学说在理论上的重大意义，及其在当时世界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但是，非常令人费解的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在提出“正处”理论之前，一直比较正确地处理了两类矛盾，但恰恰是在提出这个理论之后几个月，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

个总题目之后，就犯了反右派运动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在此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愈演愈烈，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灾难性的内乱。曾经为这一理论的创立、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毛泽东，又很快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违背这个理论的人。应该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

## 二

为了弄清上述种种矛盾现象，必须首先搞清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矛盾与两类矛盾的关系，以及《正处》中对这一关系的处理。

尽管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各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有各种不同的概括、理解和表述，但在以下几点上却基本上是共同的：（1）社会主义社会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支配其他各种矛盾的矛盾；（2）这个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3）这个矛盾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任务、动力密切相关。

那么，主要矛盾与两类矛盾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从两者的内容、性质及其在社会主义矛盾体系中所处地位来看，它们是分别处于不同层次上的矛盾。这个矛盾层次可以表述如下：第一个层次，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二个层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三个层次，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这些矛盾不便以“人民内部矛盾”来直接概括），等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发展的直接动力，及其发展方向。相比较之下，两类矛盾等只是主要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属于主要矛盾。可见，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庞大的矛盾体系中，在首先肯定了基本矛盾以后，只有先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才能谈得上进一步解决包括两类矛盾在内的其他各种矛盾。如果首先把

主要矛盾弄错了，或在主要矛盾问题上含糊糊，那就会连社会性质都分不清，这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矛盾的解决。

两类矛盾的划分，与其他许多矛盾的划分一样，具有相对的意义。从广义上说，在阶级社会里，它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而被统治阶级中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则是其内部矛盾。这里，很典型的可以举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的例子。

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主要矛盾和两类矛盾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不同状况。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两类矛盾中的敌我矛盾。也就是说，主要矛盾与两类矛盾是一个交叉的矛盾体系，能够认清敌我，就已经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掌握了主要矛盾。但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里，这种矛盾交叉的情况不复存在。因为，首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敌我矛盾；其次，它的主要矛盾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民内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满足于“敌我矛盾已成为次要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大量的”一类论断，而对主要矛盾避而不谈，则显然是不够的。而在主要矛盾问题上一旦发生失误，那么，不论你主观上如何强调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重要性，制订出多少有关政策，有多么强烈的愿望，有多么好的干部和作风，都不可能达到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目的。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本已有了明确的表述。虽然提法不甚准确，但其含义还是清楚的，提得也十分及时。毛泽东虽然不太同意“八大”的提法，但他也曾认为其用意是好的，是明确的，即要以主要精力发展生产力。可是，十分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在《正处》的初稿和发表稿中，竟无一处提到社会主义社会或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正处》中提出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

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提到了“向自然开战”，实际上表达了同“八大”相同或相近的思想，但是这些说法显然不能代替主要矛盾这种定义式的概括。在一篇专门以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著作中，竟只字不提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不能不认为是对“八大”的一个退步。《正处》是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丰碑，又是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上失误的滥觞。

在此之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似乎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他也认识到，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将会相应变化，所以他提出“向自然开战”，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主要的、大量的。另一方面，他却没有对相应而来的主要矛盾的变化，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行象对两类矛盾学说那样深入地、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所以，反右派斗争发生以后，他很快就轻易地改变了“八大”的说法。但即使在这时，我们也应该说，他对主要矛盾的看法仍然处于一种矛盾的、动摇的、不稳定的状态中。八届三中全会上及其之后，他一方面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又反复说“重点放在技术革命”，把错误的主要矛盾和正确的主要任务相提并论。特别明显的是，中央和毛泽东以建设总路线取代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

这些都表明，尽管当时党在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上发生了矛盾，但毛泽东和党内大多数同志都未注意到这一理论上的重大失误。而在实际工作中，从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经济建设、技术革命方面的。所以，如果说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马上就完全改变了对主要矛盾的看法，那也是不确切的。

因为《正处》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在此之后在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等问题上的失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1957年以后，每一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升级，都是与对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一

而再、再而三的重申、强调“同步”发展的。这一事实说明，在主要矛盾问题上失误后，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就往往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而《正处》中的许多光辉思想也不能不因此打了许多折扣，或者干脆落空。

### 三

为了弄清《正处》在 1957 年以后的奇特命运，除研究两类矛盾与主要矛盾的相互关系外，还必须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具体特点，以及《正处》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晚期哲学思想的关系。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固然是形而上学。但是，仅仅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指出社会主义存在着两类矛盾，甚至再进一步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如果以为我们的认识可以到此为止，则仍然不能避免形而上学的错误。不继续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两类矛盾等矛盾双方互相联结的特点，即矛盾双方斗争性、同一性的特点，仍然不能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底，仍有重新走上形而上学歧路的危险。

斗争性、同一性反映着事物内在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及其特征。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不同性质的矛盾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起着不同的作用，占有不同的地位。

例如，在资本主义等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一般不存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它们之间矛盾的同一性是建立在根本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的。在这种类型的矛盾中，斗争性显然占有比同一性更为重要的地位。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中，同一性是在非对抗基础上的同一性。因为根本利益的一致，人民内部的不统一、不一致、利益的矛盾是局部的，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而它们之间的统一、同一、利益的一致则是根本的、全局性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就人民内部矛盾中的许多具体内容来看，其同一性就意

意味着矛盾双方的互相吸收、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一定限度和范围内，强化其中一方，也就同时强化了另一方，而削弱了一方，也就削弱了另一方。这与阶级社会中，对立阶级之间一方增强一方削弱的情况截然不同。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同一性、统一性是在一定程度上亦即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这又是与阶级社会中对抗性矛盾根本不同的。

由此可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矛盾双方斗争性和同一性相互关系的特点。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以统一性、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说以统一性为主，并不否认斗争性的绝对性，因为这里讲的是为主为次的问题，而不是绝对、相对的问题。

在《正处》中，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类矛盾及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但却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矛盾中的统一性、同一性、斗争性与对抗性矛盾中的不同。他没有看到矛盾的性质、矛盾中同一性的性质影响，制约着斗争性的地位、形式，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以统一性、同一性为主的矛盾。这就为以后混淆两类矛盾提供了可能性，为以后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两类矛盾学说留下了空子。

其实，即使在当时，党内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早在1951年，刘少奇就曾指出，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与资本家工厂中的阶级对抗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93页）他又进一步指出：“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对这后一种矛盾，党的方针是“利用矛盾的统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来推动和促进这个矛盾的和解和妥协（经过适当的斗争），以达到双方团结一致……”（同上94页）1957年4月，刘少奇

在一个报告中又指出，处理敌我矛盾是强调斗争性，使矛盾紧张起来，使矛盾激化，以至于把矛盾一方压倒、消灭，这是处理敌我矛盾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强调同一性，应该使矛盾缓和，不能故意使它紧张起来，这是对待内部矛盾的方针。可惜的是，看来刘少奇的这些正确思想并未得到重视，没有做为一个重要的部分补充到《正处》中去。

每一种哲学思想都有它产生的时代。毛泽东的哲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这一哲学体系中，比较侧重于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对立性，这是近代中国激烈的长期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社会性质变了，矛盾性质变了，由矛盾性质所决定的矛盾同一性、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也变了。如果这一系列巨大深刻的变化未能在哲学领域里得到及时的反映，如果我们的哲学思维仍然或多或少地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那就必然会在指导思想造成严重的后果。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解放以后，有顺应历史潮流向前发展的一面，也有仍然停留、拘泥于以往社会发展阶段的一面。没有区分以对立、斗争性为主的矛盾和以统一、同一性为主的两种矛盾，没有进一步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是非对抗性的，而且是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便是其主要表现之一。这样，一方面肯定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一方面却又以对抗性矛盾所特有的同一性、斗争性关系来对待它。其结果，往往使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良好愿望落空，直至变为它的对立面。

1936年以后，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强调人民内部的团结、社会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否认矛盾的存在。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但却也存在其合理的因素，因为它强调了统一性、同一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斯大林的片面性，但却又逐渐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更多地强调斗争性，

忽视同一性，以至最后把斗争性绝对化为否认同一性的斗争性。从肯定“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到确认“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和“斗则进，不斗则退”等。这时，毛泽东已经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形成一种具有完备形态的斗争哲学。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还能谈得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

毛泽东的《正处》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一部分，深受这一体系的影响。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注重斗争性的倾向，使他比较容易冲破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束缚，敏锐地发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同是这种倾向，又容易使他忽视同一性、统一性的作用，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非对抗性矛盾中同一性的作用，使他未能把《正处》的光辉思想贯彻到底。

#### 四

几年前，胡乔木曾经谈到，《正处》中关于两类矛盾的论述，较侧重于政治方面，在如何处理经济方面的各种矛盾，以及如何用经济方法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方面则显得不足。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意见。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的中心工作是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经济矛盾，就是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忽视人民内部各种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忽视经济规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试想，推崇一种近似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贬低按劳分配原则的意义，怎么能

正确处理劳动者内部的相互关系，怎么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供给制，把包产到户、集市贸易、个体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对待，怎么能不扩大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怎么能不损害农民的利益？把企业束缚得死死的，不把企业当作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去对待，又怎能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国家、企业、个人利益的正确结合？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轻视发展生产力的深远意义，怎么能不削弱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物质基础？至于轻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关系、价值规律的作用，株守着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更是削弱了党和国家正确处理各种内部矛盾的能力，使许多矛盾因得不到及时的解决而积累下来。而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等所造成的后果，就已经不是简单地没有正确处理内部矛盾，有时甚至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很明显，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也谈不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1957年以后《正处》中许多光辉思想不断被违背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从经济方面考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充分重视经济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大量非对抗性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对政治、思想领域里各种矛盾的深远影响。二是应该重视用经济手段去处理各种内部矛盾。《正处》中，毛泽东对前者有所重视，但对后者注意得就很不够。例如，《正处》中“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就基本上是个政治概念，它是相对于“敌我矛盾”而言的。所以文中认为，正确处理内部矛盾是一个“分清是非”的问题，应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虽然《正处》谈到了“农业合作化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些涉及到经济问题的题目，也谈到要注意从生产、分配等方面处理合作化中的一些矛盾<sup>①</sup>，但这些观点并未展开。而且，对于经济领域里的

<sup>①</sup>参阅《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0等页。

各种矛盾，应该有更科学、确切的概念来表述。它们虽然也有“是非”这样的内容，但更重要的却是经济利益的关系。

1957年以后，《正处》中这些已现端倪的倾向，非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不断发展。思想、政治的作用渐渐被夸大到荒诞的地步，而经济利益、物质力量、经济规律的作用却被一贬再贬，渐渐被畸形的政治斗争挤迫得几无立足之地，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牺牲品。对经济利益、经济规律轻视的结果之一，就是《正处》中的思想越来越不容易实现。

## 五

任何一个理论家、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是其所在社会、时代的产物，反映着时代的特点。毛泽东和《正处》也是这样。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难从《正处》中看到1956年至1957年那个“多事之秋”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人们思想中引起的深刻反响。

1956年至1957年国内外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正处》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如果说，1956年国际共运中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使毛泽东进一步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学说，那么，1957年我国的反右派运动，则使他的这一学说发生了明显的波折和变化。这充分表现在《正处》发表稿中的一些重大修改之中。

与原稿相比，《正处》发表稿有以下一些特点：（1）在理论上更加系统、严密、深入，理论色彩更浓。（2）在一些关键性的、较为敏感的问题上，提得更有分寸、更为谨慎，限制了原稿中一些结论和判断。（3）发表稿中对原稿中一些提法，代之以一些审慎的说法。如原稿中说：“百花齐放里面，包括各种不同的花，也包括一种性质不同的花。百家争鸣，也可以讲唯心论……只要不搞秘密团体。”

发表稿改为：“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4）删去了原稿中对某些人“左”的错误的中肯批评，以及对王蒙和他的小说的热情肯定。（5）删去了对党内不赞成双百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人的批评，增加了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6）在“向自然开战”，“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等问题上讲得比原稿中充分。（7）增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此等等。

总的来说，发表稿虽然在理论上显得更为成熟，但削弱了原稿中对“左”的错误的批评，并增加了某些“左”的萌芽，对一些涉及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提得更为谨慎。

因为反右派运动来得仓促，毛泽东的一些认识变化的速度、幅度都比较大，这些在发表稿中留下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痕迹。例如，发表稿中一方面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方面又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等。理论上的这种矛盾，是当时现实生活中急剧发展着的复杂矛盾的曲折反映。

从两篇稿子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57年2月至6月，短短4个月中，形势的急剧变化引起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相应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的趋势，正表现出“左”的错误的一些端倪、苗头和萌芽。至于这一变化的速度，应该说也是比较快的，虽然它还不太稳定。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正处》就其基本的方面来看是正确的。其中虽有一点“左”的错误，但那仅仅是萌芽。而就是这些萌芽，也大多是在2月以后逐渐形成的。

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1957年他的《正处》和《一九五七年夏

季的形势》两篇文章，后一篇是前一篇的必要补充。这段话对理解他当时思想发展的脉络非常重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是在《正处》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变化写成的，它发展了《正处》中的一些正确思想，也发展了《正处》中一些还只是以萌芽状态存在的“左”的错误。而且，就其发展速度来看，也比2月至6月间为快。这一发展是6月以后更为激烈的反右派运动的产物。

## 六

在人类思想史上，一些伟大的理论、思想，由于其内容的博大、精深，也由于其自身难以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因而包含着后人对它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又由于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上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使这种可能性得以变成现实，导致这种学说产生分化。例如孔学，在两汉之际就已发生分化，产生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死后，他的学说由于其内在的矛盾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霍布斯及法国的启蒙学者发展了他的唯物主义方面，而贝克莱等则发展了他的唯心主义方面，如此等等。《正处》由于其内在的矛盾，更由于1957年以后全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越来越严重的失误，它的主要的、正确的一面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发展，相反，其不足的一面却被不断扩大。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也还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方面，党内大多数同志充分利用《正处》中主要的、正确的一面，抵制、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左”的危害。另一方面，党内在不同程度上、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同志，特别是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则发挥了《正处》中的不足和缺点，把它发展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据。“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社论、文章都千篇一律地说，《正处》最早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

就毛泽东本人来说，他虽然坚持了《正处》中许多正确原则，但基本方面则是越来越向错误方向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他的《正处》理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发展，《正处》中正确的基本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足之处得到补充，而它所包含的那些错误萌芽则被纠正。毛泽东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思想的不断完善，将成为我们在新时期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也将是社会主义事业蓬勃生命力的证明。

（原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作者对内容做了少量增补）

## 划时代悲剧的剖析与理解

### ——对毛泽东晚年政治哲学思考的若干思考\*

萧 廷 中

“死欤？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庄子·天下篇》

毛泽东从隔膜的“天国”回到火热的人间已有数年历史了，然而，理性那不知满足的本性却恰恰要追溯他由人间步入“天国”的数十年历史。也就是说，对这位20世纪震撼中国与世界的“巨大人物”的剖析与研究，只有从对神的崇拜转向对人的考察才有价值，也只有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说，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究具有经久不衰的理论魅力。马克思曾说过：“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sup>①</sup>。一旦当我们自觉而冷静地站起来时，其实并不损害真正伟人的一点毫末，或许反而会领悟到他们那超越时代的洞悉与困苦并不亚于我。因而，我以为，无论褒也好，贬也好，爱也好，憎也好，从情也行，入理也罢，历史都将给毛泽东留下一个别人无法取代的显赫位置。

\* 此文原标题为《关于毛泽东晚年政治哲学的思考》，现在的标题系由作者重拟。

① 《神圣的家族》第104页。

—

毛泽东是兼政治家与思想家双重身份于一身的“巨大人物”（周恩来语），因而，政治哲学是他理论建树中最为重要、最赋特色的部分。依我理解，“政治哲学”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政治意识”、“政治学说”和“政治哲学”三个层次中，它处于最高的层次，具有宏观、抽象的理性思辩特征<sup>①</sup>。政治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不是“是什么”和“怎么样”，而侧重的是“为什么”，其不懈追寻的是那些隐藏于政治现象背后的机制和道理。在西方研究者看来，政治哲学更注重规范的阐发，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伦理和情感色彩<sup>②</sup>，但我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政治哲学”应当是对人及其人的权力关系的阐释与思考。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兴趣和思考重心，愈来愈集中于这个宏观、深刻的层次之上。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甚至可以说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换句话说，在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由奴隶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主人之后，毛泽东并不感到满足，他再一次陷入了对“人民主权”真实内涵的执著沉思，继续探索着实现这一理想境界的现实途径，为此，他贡献了自己最后30年的宝贵时光。在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晚年关于政治哲学的思考，更为直接地显示出了时代巨擘所特有的宏大气度。也更为明显地展现了他个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硕硕风采。

然而，众所周知，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考，无论在理论形式上还是在思维内容上，都具有明显、尖锐、巨大和深刻的矛盾特征。例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真诚高呼“人民万岁”的同时，却对斯

---

<sup>①</sup> 参阅本文作者《政治思想、政治学说一解》一文，载1985年9月30日《政治学信息报》（上海）。

<sup>②</sup> 参阅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9节；詹姆斯·A·古尔德《现代政治思想》；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罗尔斯《正义论》。

诺说目前“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他主观上所期望的，是在更加深刻和广泛的程度上实现人民民主，客观上却用个人独断的固执方式推促这一进程；他反复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首要课题，但实际上却又把党内出现的不同见解，视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他对依仗权势、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恶行表示出极大的憎恶和愤慨，自己却又发动“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所要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人道精神的平等和自由，可所采取的方式和默许的途径却是以“打、砸、抢、斗、压、杀”为特征的现代法西斯主义暴行。……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sup>①</sup>。

这样，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二律背反”的思维迷津。显然，对于这样一个矛盾的现实来说，简单的是非判断和经验的判断都失去了其固有的评估魅力，只有超越就事论事或情感认知的历史描述层次，站在80年代“三个面向”所要求的知识和科学的思考高度上，才能摆脱正谬交错、善恶混沌的悲剧循环圈，从而走向、接近真理的彼岸。

从这样的思考角度出发，一方面，我们不能仅把毛泽东看成孤立、单纯的“个人”或“个体”，因为他晚年的政治哲学思考并不全都归结于他自己的“独创”，而与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制

<sup>①</sup>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以下简称《〈决议〉注释本》。

度设施、民族心理、时代需求等因素密切相关，否则就无从解释，他手挥手毕，一念之语竟能在亿万中国人中产生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讲，应把毛泽东视为时代与民族的人格化身，应当把他晚年的政治哲学思考当作一个丰富、清晰和真实的历史精神的横截面。因之，我们就不能不说，仅仅以个人的好恶、人事纠葛、心理状况、甚至生理机能等个体偶然性因素解释宏观历史动因的种种探究，无疑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难免会重陷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提醒过的“让巨大的结果从微小的原因发出”，用“轶闻奇事”解释历史行为的“常见的笑话”<sup>①</sup>。因此，应该说：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考，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悲剧，是整个民族“自我意识”的哲学投影，是理性与情感交叉十字架上的一束花环，它曾标志着某种普遍思维形态的完整过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能动的思维实体，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考又毕竟不是一部纯粹被动的“社会摄影机”。他活生生的观察、体验和领悟，又具有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内在结构、调整机制和判断准则，简言之，有着一整套价值取向模式和思维逻辑程序，就此点而论，它又不是宏观剖析所能取代的。从“释义学”的角度上看，任何一件思想成果或历史文献都由“表层的语码结构”和“潜在的密码规则”两部分组成。在前者并无意义的语汇，在后者却具有深刻的内涵<sup>②</sup>。在毛泽东

<sup>①</sup>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221页。参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7页；列宁《哲学笔记》（1957年版）第142—143页。

<sup>②</sup> 现代“释义学”（Exegesis）认为，任何一件历史文献都由“表层的语言符号结构”和“潜在的内在密码规则”两部分组成。研究工作者不能仅仅凭借对前者的理解进行判断，更应当着重把握、“破译”“潜在的密码”，这样才能较客观地发现有注释前人的真实动机、思想倾向，等等。例如，文献上的记载，的确是“我是人”，而潜在密码实际上恰恰是在说“我没有被当人看，已失去了做为人应有的地位”。正是出于对“非人”现状表示厌恶、烦感、恐惧与不满，因而才大声疾呼“我是人！”另外，表层上渲染的是“要求民主”，而潜层中反映的正是“缺乏民主”。……因而，在表层上显示出的矛盾现象，或许往往能在潜层中存活着严整的逻辑。这种现象是值得思想史研究工作者重视和注意的问题。

晚年政治哲学思考的体系中，诸如“群众”、“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等等众多的概念、范畴、术语和命题，都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意义，充满了创造精神和时代色彩，与我们从前或目前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这样，对这份历史遗产的研究，就不能停留在对文献的“表层语码结构”的陈述上，而更应着重把握和“破译”那些“潜在的密码规则”，从而在“理解”的基础上，较客观地发现前人的真实思想动机和意识倾向，并在常规思维看来极其矛盾、不可思议的现象中，找出潜在层次中那严整、完美的逻辑程序。也就是说，思想史研究借助的是史料，而思考的则是“人”本身。

综上所述，可以说，毛泽东是“民族大我”和“个体小我”的有机组合。虽然这两个“自我”时而相互冲突，时而合为一体，但就本质而言二者是不可分割，重叠交叉在一起的。因此，正如黑格尔早就强调过的那样，“对思想的王国作哲学的描述”，只有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必然发展”与其“本身的内在活动”结合起来考察，才是思想史研究的“通路”和方法论基础<sup>①</sup>。

## 二

可以说，“人民”或者“群众”在毛泽东的政治和哲学著述中，不仅出现频率相当高，而且是他政治哲学体系中最为核心理论范畴，虽然毛泽东从未就“人民”或“群众”的概念下过明确的科学定义，但确实赋予了这一范畴以最为崇高的神圣地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名言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人民”的详细解释，已尽人皆知。而且他甚至下过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断语：“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我们怀疑这两条原理，那么就什么事情也做不

<sup>①</sup> 参阅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7页。列宁对此表示欣赏，批语“出色！”见列宁《哲学笔记》（1957年版）第63页。

成了”<sup>①</sup>。显然，将“相信群众”置于“相信党”之前，并把它视为除此之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的首要“基本原理”，绝不是语言排列上的粗心或疏忽。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理论核心和基本特征，即关于20世纪中国人民摆脱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走向自由和幸福的学说，这一基本的思想倾向和理想追求，是支配他终其一生探索的内在驱动力，虽然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关注重心和表述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不断变换，但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却始终如一。也就是说，爱护人民、依赖人民、拯救人民，甚至为人民作主，是他永恒的思想灵魂。而这一“思想灵魂”中的最深层的思想内核，又是“人民”自身价值实现的“中介”理论。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多篇论著中阐发过这样一个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人民群众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实际上处于被统治的奴隶地位。只有在异化和畜化的意义上，才能称其为人。由于政治实力的悬殊和理论水平的局限，作为“奴隶的人民”不可能直接、自发地推翻旧有的统治，成为“主人的人民”。他们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与统治者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构成强有力的凝聚优势，以此作为自身价值的代表和“中介”，才能完成由奴隶上升为主人的转变过程。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精华”、“先锋”和“中介”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就是占中国人口80%—90%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他反复强调，近代的中国革命如果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壮烈的人民解放斗争就会重蹈历次农民战争的旧辙，难以避免流产和变质的命运。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开篇就作了精辟的概括：“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

---

<sup>①</sup>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9页。

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sup>①</sup>。毛泽东的上述概括极其重要，其基本意义除了说明“为什么要有革命党”之外，一方面界定了“敌人”的范围，亦即“压迫人民”的是为“敌人”；另一方面界定了这一概括的时间范围，亦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因此，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体系中，上述论断是一个开放的和有限的命题。

同时，毛泽东又对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作了大量论证，十分明确地指出，在本源和本质的意义上，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动力和创造者，共产党则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与自由的阶级工具。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著名的《愚公移山》中，将人民比喻为至高无上的“上帝”，誉为革命之“本”。因此，对于人民来说，共产党不是“异物”，而是“向导”；不是太宰，而是“先锋”；“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sup>②</sup>。他曾屡次告诫：“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sup>③</sup>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它（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并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显著标志之一”<sup>④</sup>。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可以概括为人民主体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76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88页。

③ 《在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演词》，载1940年2月3日《新中华报》。

④ 《毛泽东选集》第995—996页。

一元化理论。党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必须以“人民”为轴心，它的政治功能不能超出人民由“奴隶”上升为“主人”过程中的“中介”范围。

毛泽东上述的“中介”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人民谋求解放的真理，是民族精神的时代精华。但正因如此，它同任何理论体系一样，也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按照毛泽东“中介”理论的逻辑推演，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率领人民打碎了枷锁，赢得了解放，颠倒了被颠倒的政治关系，恢复了国家主体的权力归属，从而开通了人民实现自身价值的现实航道。这样，在崭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体系中，主人们自己选举自己的政府，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时共产党就完成了自己作为“中介”的历史使命，而应以一种新的政治因素在新的环境中发挥新的作用。因之，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理论，无论就“必然发展”的历史趋动而言，还是就“本身的内在活动”而言，都内含着某种具有原则性突破的本质需求。

应该说，毛泽东为此做了工作，对这个“本质需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他严肃地批评过“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小生产狭隘意识，提出了有关国家性质的一系列原则性方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第七节上，专门论证了新国家的政治性质、形式和关系，对于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鲜明、直接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其理论洞察力和敏感性相当深刻。但是，今天冷静、严肃地反思历史，可以说，他在这方面深沉的理论探讨，相对于其宏大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来说是薄弱的。由于解放战争出人预料的迅速胜利，建国任务迫在眉睫，使毛泽东没能在政治哲学的高层次上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独立的理性思考，而是直接继承了列宁在苏维埃初创时期关于党的学说的一系列理论程式，并把它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关系根本变迁之后，无需论证的、当

然的理论逻辑的“大前提”，因而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削弱了对新中国环境中人民、政府、党三者之间政治权力关系理论的再创造和再思考。特别是诸如执政党存在的政治理论依据、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新社会中国家主体的属性、分类、关系、运行等等方面的重大课题，都未直接涉及，更未展开讨论，不能不说留有措施的实证性掩盖理论的论证性的明显痕迹，缺乏政治哲学上高屋建瓴的、宏观的、深层的、完整的和独创性的理论概括与分析。因此，我认为，这种情况（具有历史和理论上的多种成因），造成了毛泽东政治哲学思考中的一个重要的“意识断层”，遗留下一段相当明显的理论空白。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出现这种理论准备相对不足的现象，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党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东方国家所独有的特征，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理论课题。后来出现的铁托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上述“意识断层”的理论反映。探索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当然免不了出现谬误，但探索本身的价值却在于：对执政党的既定现实进行理论上的“追溯论证”已成为新时代的理性需求。就象数学上需要论证“哥德巴赫猜想”这样一个既定的现实一样。

但是，历史规定的命题是无法超越的。人们怎样地跳过去，最终还得怎样地跳回来。1950年访苏期间，毛泽东就敏感地发现了没有解决的问题。他曾意味深长地对卡德尔说过：“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如何自由运用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应的直接可能性”<sup>①</sup>。在间接的意义上，毛泽东也意识到“人民主权”应从概念转化为生活，1952年他曾建议：“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

<sup>①</sup> [南]卡德尔《苏南会议·莫斯科宣言·会见毛泽东》，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2期。

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sup>①</sup>。显然,建国初期,除了恢复工作和建设事业的考虑外,毛泽东再次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问题。在本质上讲,正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成为主人之后,民、政、党三者的政治权力关系,即关于新国家的国家主体性以及主体真实性问题,困扰着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考。

### 三

从整体的宏观角度考察,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关于政治关系的论点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的:其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二是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作风之间的矛盾。即使在当时的认识程度和理解范围里,也可以将二者区分开来,显然,前者是“谁战胜谁”的政治问题;后者则是谁服务于谁的社会问题。这里“社会”的概念具有特殊的含义。一般来说,“社会”是指人们之间通过某种规定的关系和交互行为而形成的群体生存圈。这里借用“社会”一词是试图说明第二种政治关系,即“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性质。因此,我所说的“社会问题”,相当于英语的“Administration”(行政、管理);而“政治问题”则相当于英语的“Rule”(统治、制约)。虽然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都涉及到了国家的主体性质,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属于谁,但是,前者所着重说明的是本质、方向等具有理论色彩的问题;后者则着重解决是关系、体制等具有实践特征的问题。因此,尽管二者确有联系,但在其性质、层次、范围、对象、目标和实施法则等诸多方面又均有不同,不能相互取代或混淆。也就是说,单纯的阶级斗争学说,容纳不了如此丰富的社会现象,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政治强力手段更不是稳定社会、促进发展的治“本”良方。

---

<sup>①</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7页。

本来，中共“八大”已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初步的限定，在国家的法制建设、社会关系和行政原则方面作了大量论证。尽管它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存在着理论和逻辑上的种种欠缺和不足，但其主旨思想是极其明确的，即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第一重要的主题，社会思维模式应从对人的统治和斗争转向对自然的挑战和对物的管理。对此，毛泽东原则上是同意的。认为“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了”<sup>①</sup>。但是仔细分析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这时政治哲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与“八大”决议并不相同。如果说，“八大”侧重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其它各项问题是以此为核心理论展开，也就是说，理论重心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毛泽东则更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只有处理好人的问题，才能促进经济和科学发展的思维程序。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强调和坚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的命题，但对这一命题的解释却反映了他的人学观念：“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sup>②</sup>。这样，理论的前提是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经过逻辑推导，其结论却变成了突出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或许正由于上述值得进一步深入研讨的思维逻辑，这样一种独特的人学思想和主体意识，使他不能系统、完整地看待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其人与自身的多重关系，而不自觉地堕入了意识形态超前论和唯意志论的陷阱。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

其实这并不足怪。如前所述，自从建国初期毛泽东高度重视的就是政治关系问题，就是寻求“人民主权”真实内容的政治哲学问题，因而必然注重“人”的问题及其权力关系的现实结构。在这个问题上，他再一次堕入了矛盾交叉的思维陷阱之中。从“八大”以后毛泽东多篇著作的内容看，他曾试图将“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区分开来，而且明确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们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sup>①</sup>。显然，思考的重心已转到了第二重矛盾上来了。并且围绕着这一主题，反复对“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的“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sup>②</sup>。

当然，上述的严厉态度不能理解为人格上的“义气”和冲动，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的存在”，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sup>③</sup>。不仅承认“这也算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sup>④</sup>。勿庸讳言，毛泽东把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看成社会主义政治关系的重要课题，并不排除在一个有深厚封建主义传统和小生产文化意识的国家中出现政治异化（贵族阶层）的可能性。不仅在理论上无可厚非，而且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9—4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6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460页。

至今仍值得我们时时反省。就他的主观初衷而言，强调国家主体人民性的唯一性原则，关于政府和党仅是这一主体的服务设施的思想，不仅是他晚年政治哲学的精华所在，而且在人类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共产主义思想史上，都具有长久、深远和耐人回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对此全盘否定，不是一种渺小自鄙的民族虚无主义，就是一种虚伪圆滑的政治专制主义。或者说，只有超越了个体感觉的狭隘层次，才能体悟到客观真理的超时代洞见。

但是，任何感情的因素都代替不了冷静的分析。正当毛泽东向传统堕性挥戈批判的时候，却同时产生了理论偏差。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出现过“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sup>①</sup>这样内涵、外延都不十分清晰的概念。在其它一些论著中也出现了某些先前没有过的新思路：“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sup>②</sup>。“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sup>③</sup>。显然，上述这些提法，其偏差不在于他以后始终对官僚主义作风所采取的严肃态度，而在于“政治问题”同“社会问题”发生了重叠，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交叉在一起时，毛泽东混淆了二者。在他看来，阶级斗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3页。

③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32页。

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石（这方面他受列宁思想的影响很大。《列宁全集》是他晚年最常阅读的书籍之一）。但是，如他自己所说，既然旧有的阶级斗争现象已消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也服法了，那么，“斗争”方向何指呢？“专政”的目标又何在呢？在理论命题的对象化过程中，毛泽东就不自觉地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因素，看成了带有全局性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1957年10月，他推翻了“八大”决议，恢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后来又坚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一方面，阶级斗争理论的复盖面越扩越大；另一方面，官僚主义的腐败程度和危害程度也就越来越严重。理论的对象化需求与实践的理论化需求恰好走到了一起，因此，毛泽东本来试图区分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不断重合：从“党内反对派和怀疑派”的提法<sup>①</sup>，到把彭德怀上书看成“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sup>②</sup>；从“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sup>③</sup>，到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sup>④</sup>；从“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定论<sup>⑤</sup>，到发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这是最危险的”的警报<sup>⑥</sup>……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两类矛盾最终又合二为一的时候，他就真切地感觉到党和政权都发生了质变，非搞一场“革命”不可，“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sup>⑦</sup>，以此阻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和修正主义在中国的无限蔓延。最后，毛泽东的全面

---

① 《1958年8月1日信》。

②③④⑦ 《〈决议〉注释本》第334页，349页，356页，365页。

⑤ 《1962年8月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⑥ 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第15页。

逻辑构思终于形成了完整的图象，并沉淀在《五·一六通知》的语言和辞章之中，于是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政治实验。正如他自己概括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sup>①</sup>。

不难看出，在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维中，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条逻辑线索：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已成为主人，但官僚阶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因而，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人民再次沦为“奴隶”。“奴隶们”要想再次成为主人，仍然需要“中介”。在毛泽东潜意识中这个“中介”唯有自己。只有他自己才有足够的胆识、责任和力量，率领着“奴隶们”“踢开党委闹革命”，重新反压迫，“造反有理”，从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主人，在具体的位置上实现抽象的自身价值，由此走向纯正的社会主义彼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1970年才肯定地对斯诺说：“个人崇拜也许是必要的”<sup>②</sup>。

这样，我们可以对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考作一个初步的概括了。大致可以这样说，他晚年曾堕入了多层次的思维陷阱，构成了数重的逻辑怪圈：第一层，他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人为地打破了固有的平衡，唯意志主义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宰性，把社会发展的丰富过程浓缩为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机制的生成实际上被看成了政治运动的派生物和附属品，即所谓“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第二层，他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将“统治”的范畴同“管理”的范畴混淆在一起，机械、片面地

<sup>①</sup> 引自《芙蓉园里尽朝晖》，1968年4月8日《人民日报》。

<sup>②</sup> 《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人民出版社1971年内部版第15页。

将人们多样的交往关系概括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自己的理念中，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并以“革命”的手段，用暴力（或变相暴力）的方式，强行变更那些非正常的社会、政治关系；第三层，他在估价“自我”的过程中，以救世主的姿态和居高临下的俯度鸟瞰世界，将“自我”的意志自觉或不自觉地当成了全民族力量的发源与中心，因而，“相信群众”实际上只是“相信自己”的代名词。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毛泽东晚年宏大的思想就愈走愈狭，宝塔顶上威严屹立的只剩下一个孤独、有限的“自我”，并以此虚构或取代了整个的民族和国家，走上了以个人专断的权力实现人民的广泛民主，从而为改造自然奠定基础这样一条非理性的迷途，深深陷入了他晚年政治哲学思考的悲剧循环圈。

#### 四

仅有逻辑结构的外在描述是远远不够的，理性的光芒只有照射到悲剧结构的内核上，找到初衷走向异化的潜在支配因素，才能理解由价值实现到理性沉沦的辩证法。无疑，在毛泽东晚年的生活环境中，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刺激对其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对此学术界论证不少，此不赘言。但从更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沉积的角度考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本身内含着无法逾越的内在矛盾。简言之，毛泽东晚年政治哲学思考的扭曲，在“思维范式”方面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同化马克思主义的奇妙结合与必然结果。

如前所述，毛泽东晚年政治哲学思考的重要特点是把官僚主义作风同人民群众的矛盾看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政治关系，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他的思想出现了偏差。而支撑着这一思考的“思维范式”，则又是“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对应范畴，即“主人”养活“仆人”，“仆人”向“主人”负责。因而，一旦当他认定“仆人”超越了

“主人”，变成为“主人的主人”的时候，就义不容辞地起而拯救斯民于水火，重新调整政治关系。显然，对社会主义政治关系进行“主”“仆”关系的概括，构成了他晚年政治哲学思考的潜在支配力量。这样，我们就必需对“主”“仆”关系的思维范式本身进行审视和考察。

对社会政治关系作“主”“仆”的哲学概括，起码在 17、特别是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潮时期就明确形成了，是当时第三等级反封建的理性产物，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虽然这一学说从一开始就暴露出了内在矛盾<sup>①</sup>，但诚如马克思所说，这一思维模式的巨大影响却“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sup>②</sup>，甚至可以说已沉淀西方政治文化的理性精神。众所周知，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在《法兰西内战》和其他著作中，多次使用过“社会公仆”的概念，这一方面说明，任何伟人都摆脱不了时代的现存知识结构与通用原则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又将这一概念同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政治关系严格区别开来。例如，马克思的确说过：“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sup>③</sup>。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这里使用的“公仆”概念，已扬弃了被动的意义，并没有人身依附的本来含义，“主人”与“仆人”在人格，即做人的资格上，是相互平等的。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解释，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是“总是能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地纠正”<sup>④</sup>。因为“仆”与“主”仅是职位上的差别，二者是可以互换、互代的，“仆人”不合格即可“随时罢免”，这

---

① 参阅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二十九章；陈维刚《评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读书》1986 年第 12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17 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6 页。

样他就成了“主人”。因此，马克思十分肯定地指出：“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sup>①</sup>。20年后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作序，再次强调了“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sup>②</sup>的巴黎公社原则。可见，他们虽然延用了“公仆”的概念，但在真实的意义上它仅是个形象的比喻，理论所要阐明的则是建立在法制和公意基础上的，“公仆”与“主人”二者同一的一元主体结构。因此，“公仆”的选拔可以通过社会机器的自行筛选和协调，对执政者要求的是才干、智慧、知识等等“硬件”。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系统则与此不同。纵观中国的政治思想史，“重民”思想非常丰富，从先秦到近代，从儒、道到佛、墨，对此都不乏见解。在一定意义上说，与西方黑暗的中世纪神学政治时代相比，它更具有人本主义特征。但“重民”思想毕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范畴。就总体来说，它所强调的是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畜民”、“保民”、“养民”、“逸民”和“惠民”等等。诸如：“民乏心愠也，若防土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国语·楚语下》）；“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政体》）；“凡吏于乎上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柳河东集·送薛存义序》）；“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之何见政不见民也！”（《潜书·明鉴》）。……显而易见，这些论述虽然度繁多，侧重不同，但基本上都围绕着明君、良臣、顺民三者的相互关系转动，并没有突破《尚书》“天惟时求民主”的思维构架，仍然是那句老话：“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去烤白薯”的“青天”意识。就其实质而言，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334页。

“官”与“民”在一般意义上是有严格界限的，不能随时互换，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官”与“民”的二元主体结构<sup>①</sup>。因此，官员的选拔除了等级世袭制之外，开放的程度超不出“伯乐相马”的层次，对官员的要求是道德、良心、廉洁等等“软件”。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重民”观念产生了不少质变，但异中求同，却可以说象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刘师培，甚至孙中山，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虽然理论体系千差万别，阶级立场各有不同，但其学说都是以“民主”的呼唤开始，而却以各种含义上的“专政”告终，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特有奇观。虽然这种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内含着无数的条件和原因（如经济结构、中外关系、社会矛盾、利益冲突等等），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心理结构沉积，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不应否认毛泽东晚年对党群关系提出过不少精当见解，多次提出过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问题，严肃批评过那种“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的“霸王”，“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sup>②</sup>。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忧虑远不止于此，他把这种情况估计得相当严重，认为在新、旧党员中“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

---

① 这里“官”与“民”的二元结构，仅是从政治关系而言的。至于社会关系及其深层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则要复杂得多。“主”“仆”范畴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鲁迅曾反复指出，在中国，“主”与“奴”二者在文化结构上是相通的，“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了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南腔北调集·谚语》）有人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主奴根性”。在“主——奴”之间“形成了可怕的恶性循环，一方面逆来顺受，自甘于屈辱卑贱而不自知；另一方，一朝得势，即以贵凌贱，以强凌弱，加倍压迫自己的同胞。这是失去了‘人’之后的‘普遍沉沦’，在这种劣根性之下，‘人’彻底地消溶尽净，只剩下主人或奴隶，奴隶或主人，但没有真正意义的‘人’。”（刘再复、林岗《论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对国民性的反思——兼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0页。

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sup>①</sup>。于是大讲“党内资产阶级”，并且愈演愈烈。对于这种明显的矛盾现象，有人认为这与斯大林死后的“苏共”二十大有关，与五六年“反右派”有关；有人认为与毛泽东同刘少奇等的个人关系有关；有人认为与毛泽东过于重视身后之事及具体的历史情况有关；还有人更深一步认为同毛泽东承袭列宁的片面理论有关。不错，这些都是原因，但借用毛泽东的话说“外因只有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而，我认为，在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范式方面看，毛泽东潜思维的矛盾恰恰在于：西方近代的民主理想与中国传统“重民”思想的融合与撞击。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社会公仆”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比喻含义，他们的理论实质则是强调“公社”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是他们毕竟又选择了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学派的理论形式，而这一“形式”中又包含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应当说，这一潜在的矛盾并没有被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所认识。毛泽东也是如此。在他的观念中，“社会公仆”的范畴无论理论形式和实质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他不仅把这一具有理想、憧憬因素的范畴理解为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而且由于“主”“仆”概念本身更赋予伦理色彩，因而他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社会政治关系纳入了某种道德模式。这样，一方面，毛泽东相当自信地认为自己坚持的是纯正的“巴黎公社原则”，反复提醒全党“多学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支配其思考的东西恰恰是近代西方理想主义民主理论同中国传统“重民”思想的融合。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显意识上追求的的确是使“人民主权”的范畴由抽象走向具体，

---

<sup>①</sup>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 27 页。

即“人民当家作主”；而在潜意识中实现的却又是“保民”、“惠民”等东西，即“为民作主”。二者又形成撞击。正是在上述“融合”与“撞击”的张力之中，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考陷入了混乱。例如，他曾提倡过学习海瑞精神，其理由是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sup>①</sup>。后来又说：“刘备得了孔明，就是‘如鱼得水’，……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sup>②</sup>。这样，领导者是“仆人”，被领导者成了“主人”，“主人”要听从“仆人”的指挥和调度，理论上出现了矛盾和混乱。从释意学角度出发，我们看到，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sup>③</sup>，而实际上反映的问题都是人民参政程度的不足和人民政治监督的缺乏。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本应由健全法制和完善体制加以解决，从更深的层次看则它的改变有赖于社会结构的更新和经济发展的程度，但毛泽东却一直以为它是一个伦理问题，认为这种状况主要是部分党员和干部“骄傲自满”、“脱离群众”所造成的结果，“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sup>④</sup>。这样，毛泽东就一再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认为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不自觉地又陷入了伦理与政治二者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深渊。由于国家体制的缺陷并不是靠干部的伦理感所能完善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思想反省旧制根本解决，因而毛泽东就愈觉得问题的严重，最终直接把官僚主义现象归纳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

---

① 《〈决议〉注释本》第3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

③ 《革命委员会好》，196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④ 《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批示》，1963年12月13日。

内的反映”，要求意识形态的伦理自觉必须以政治上的批判、斗争为动力，“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sup>①</sup>。显然，“新阶级”政治命题的提出，表明在他的观念中，“官”与“民”又形成了二元主体结构。因而站在人治的立场上，毛泽东依据历史形成的巨大权威力量，感到自己必须“为民作主”，有责任带领被压迫阶级走向第二次解放，代表他们的意愿向新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反复申明：“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sup>②</sup>。“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广大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sup>③</sup>。

毛泽东在自以为代表了人民的意愿，而实际上却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他自以为手中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而实际上却凌驾于人民之上；他自以为尊重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伦理政治的文化深渊；他自以为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而实际上却又倒退到反人道主义的非理性时代。以上种种就是历史悲剧的“陷阱”，正是伟人失足的地方。一言蔽之，在中国现实的文化环境中，用“主”“仆”范畴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关系，极易误入“纲常”政治形态的歧途。因而，它在理论上是非科学的，在实践中是极矛

① 《对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语》，1965年1月19日。

②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讲话》。

③ 《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

盾的，它是困扰我们思考的障碍，它是束缚我们追求的锁链。

## 五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深沉地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sup>①</sup>。如果从最一般的历史哲学的意义上理解，我认为他们所指的是人们创造历史而人们又无法规定历史的内在矛盾，是人们的主观意愿并不与客观结果成正比的规律。毛泽东晚年曾对自己作过精当的概括，认为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孤岛上去了，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第一件事没人反对，第二件事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说，作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历史人物，毛泽东也“出现两次”，第一次以喜剧出现，第二次以悲剧出现。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依据，以其真理性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创造了体系，取得了成功；他又片面夸大了这一学说和理论的历史性，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将“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sup>②</sup>，这种马克思主义中更具永恒性的理论因素，从而，导致了无法弥补的失误。因此，悲剧的历史可以导演喜剧的现实；喜剧的现实也可以导演悲剧的历史。毛泽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悲剧中，导演了气壮山河的喜剧历史，却又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喜剧中，导演了“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然而，也许这就是人们永远无法任意支配和主观趋动的历史辩证法。发展的契机只有那真实可信的实践。

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失足的巨人仍然是伟大的，在人类历史的宏观场景中，他们留下的足迹无论在喜剧还是在悲剧的角度上，都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7卷第593页。

是令人长久寻味的。黑格尔公正地指出：“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的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梧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难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sup>①</sup>。因此，如今，在毛泽东这位“世界历史巨人”逝去十余年的时候，写作此文，不免倍感痛楚、凄怆，似乎寰宇是那样的肃寞，沉寂，……一位毕生主观上不懈追求着与人民合一的人，却在实践的某些方面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反面，给他始终热爱的人民和民族造成深重的苦难；为了这个美好的、善良的初衷，他无视个人的荣辱毁誉，甚至不惜在历史的狂涛中埋葬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我在这个痛苦反思的严肃场合，愿意向这位时代悲剧的承担者深深鞠躬，不仅要象剖析我们的民族一样地剖析他，而且要象理解我们的民族一样地理解他，并且虔诚地奉献上一束纯洁的“小花”——这段他1965年对斯诺所说的话，反映了他超越时空的巨大孤独意识和内心冲突的悲感意识，从而体现了他晚年政治哲学思考中真与善的辩证美感：

“毛泽东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sup>②</sup>

（选自《广州研究》1988年第1期）

<sup>①</sup>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哲学》第483页。

<sup>②</sup> 《斯诺在中国》第297页。

# 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

牛 军

60年代末期,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革。伴随着这场变革,毛泽东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个世界”理论。研究这个理论的困难不仅在于阅读文献的某些限制,而且在于必须认真考察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权力结构的特征,亦即要完整地认识这个理论,必须顾及两个方面:既要研究毛泽东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和设想,以及他本人思维方式的特征,也要注意实践这一理论的是周恩来和一批长期受他领导和培养的中国外交官,他们具有相当务实的特点。本文侧重于研究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动因和思维模式。

## 一、“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过程

1965年,毛泽东把世界形势概括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其含义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分崩离析”;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于3月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结果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两个阵营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在发展,这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应当主要是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由于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对世界的认识在理论上就是支持和领导世界革命,赋予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更加革命的色彩。当时中国内部

的“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地进行，在对外宣传中“世界革命”的调子越拔越高，中国被宣传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世界革命的主要敌人仍是美国，特别是1964年8月的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致使越南战争在1965年“升级”成了世界局势中最危险、最紧张的问题。而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又必须彻底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因此毛泽东使中国外交处于“两个拳头打人”的状况，这同国内的政治运动是一致的。

1968年，由于国际上一系列事件发生，特别是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看来，世界动荡、分化和改组的结果造成了两种可能性：革命与战争。中国同苏联的分歧主要不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了。毛泽东认为，美苏都想统一世界，它们都有力量发动战争，不过也都有困难。根据对战争的态度，毛泽东重新解释了“中间地带”的理论，把西欧和日本称作第二中间地带，亚非拉称作第一中间地带，并认为它们都不愿意打仗。因此他对于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一时难下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认为既不打仗也不革命的状态不会维持很久。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萌芽。当时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估计得更大一些，或者说按他的思维方式，宁可估计得高一些。中共中央在当年夏季发出指示要求加强战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的这一倾向。

1969年3月，中苏爆发了边境冲突。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华沙条约组织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一整套“欧洲缓和”的主张。6月，勃列日涅夫又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8月，中苏在新疆边境地区发生冲突。中苏边境局势紧张和苏联提出“缓和”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一时成了中国共产党决策层极端关注的问题。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外交决策实际上有两个系统在起作用。一是以林彪为首，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大员”紧随其后的军人集团，其中林彪对形势的判断起着决定作用；一是受毛泽东委托召开的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人座谈会，他们由于特殊的地位，以座谈会的形式参与决策。这两个系统对中苏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林彪集团认为，爆发苏联侵华战争的可能性极大。6月间，黄永胜等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sup>①</sup>。至10月，林彪发布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达到了他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的最高峰。

与林彪集团相对照，叶剑英等四人座谈会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在《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中认为，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它在中苏边境挑起争端是为了在欧洲结出果实。鉴于目前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应缓和中美关系，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sup>②</sup>。由于四人小组成员更熟谙外交与国际事务，因此他们的观点相比之下显得更稳健、更成熟。值得注意的是，林彪集团与四人小组在考虑中苏关系问题时，同样都是着眼于中国的国家安全的。

观察1969年3月以后中国炽热的备战气氛，可以推断毛泽东是比较倾向于林彪的估计的。1968年底他就认为，苏联说战争可以避免，表明美苏在准备扩大战争。他要求叶剑英等四人研究国际形势，并不是在珍宝岛事件之后。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要准备打仗<sup>③</sup>。林彪同年10月的战备令

---

① 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1页。

② 参见《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铁竹伟《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③ 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69页。

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有关,他事先固然未向毛泽东请示,但事后也并没有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指责。当年9月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及10月中苏边境问题谈判后,中苏关系略有和缓,事实证明战争的危险性被夸大了。

1970年初,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即革命形势的发展超过了爆发战争的危险性。1970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把这种状况描述为“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整个地球上再也没有一块安定的绿洲了”。毛泽东同年在“五·二〇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没有把1969年中苏关系的紧张与相对缓和仅仅看作是中国的安全问题。

## 二、中美关系解冻与“三个世界”

### 理论的现实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由于其强大的实力地位,实际上控制着西欧多数国家、日本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中国要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改善同第二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建立起制止世界战争的统一战线,除了自身条件外,必须克服中美互相敌视造成的障碍。

新中国诞生后,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美国一直被毛泽东视为世界革命的主要敌人,也是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同时也是中国统一的破坏者。“文化大革命”爆发是毛泽东在中国进行的一场彻底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运动,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唯其如此,才能彻底打倒美帝国主义。因此要转弯必须有契机。这个契机很快出现了,这就是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和珍宝岛事件爆发。

毛泽东确信尼克松在改变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具有认真态度之后，便决心迈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1970年底，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表示愿意在北京接待尼克松。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精神当时一直向下传达到农村大队党支部。这种异乎寻常的行动显然是毛泽东在为转弯子作舆论准备。

考察到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以及中苏关系当时已相对缓和等各种因素，可以断定，毛泽东决定改善中美关系并非仅仅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而是从改变世界格局着眼。中国方面已经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而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了相当灵活的态度。他在同第一次访华的尼克松会谈时说：“这个问题（台湾问题）不重要。国际局势才是重要的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sup>①</sup>基辛格在前此访华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领袖们是要同美国共同实施一个全球性的策略<sup>②</sup>。这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决心打破中美关系的冰冻状态的动机。

由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克服了同西方国家、日本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障碍。中国外交立时出现了新局面，其发展之快，连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也没有预料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解冻为“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即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不仅可以发动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可以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在两个超级大国中又可以孤立和打击最危险的敌人苏联。尼克松访华后，在中国的对外宣传中，苏联开始被看作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世界革命的主要敌人。

---

<sup>①②</sup> 《白宫岁月》，1979年11月内部版第33页。

### 三、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结构的探讨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并说明了中国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将奉行的外交政策。根据邓小平当时的阐述，“三个世界”理论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对世界新结构的认识和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1. 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革命，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主要倾向是革命。毛泽东把这种局势描述为“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所说的革命，就是指“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历史潮流。总之，世界既不是美苏合作主宰的局面，也不是以美苏缓和为中心。

2. 世界的主要矛盾决定了划分世界各个组成部分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传统理论中的国家制度的阶级属性，而是对战争与革命的态度。而各个国家的态度是由其经济发展程度、实力强弱、在国际事务中的状况和国家利益决定的。因此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划分世界结构的标准要素。

3. 以对世界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划分世界结构的标准为基础，将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世界是指苏美两个大国，它们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其中苏联尤为恶劣”。第三世界由亚非拉和其它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组成，它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在企图发动战争和正在进行革命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存在着一股中间力量，即第二世界。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家具有两重性：既保持着殖民主义的某些特点，又不同程度地受到美苏的控制或威胁。它们虽然要维护旧的殖民制度，但更倾向于摆脱

美苏的控制,维护国家的主权。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浸透了毛泽东长期进行国内政治斗争的经验,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模式在国际问题上的再现。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依靠属于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联合具有两重性的第二世界(中间力量),反对苏美。在苏美之间又要利用矛盾,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苏联。对美国则是又团结又斗争。到此为止,唯一没有论述的就是谁来领导这场世界性进军。“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sup>①</sup>。有了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双重属性,加之中国站在反对苏联侵略威胁的最前列,又是第三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具有自己独特的革命和发展道路(中国当时认为这在亚非拉的革命运动中带有普遍适用性并代表了发展方向),从而也就确立了中国在第三世界中要发挥关键作用的地位(如果不是领导作用的话)。因为毛泽东认为中国政治上最先进,受害最深因而最革命,而且最有组织和最有力量。在他划定的这种格局中,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也就不言而喻了。

#### 四、“三个世界”理论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

“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毛泽东看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个过渡阶段结束,世界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已经完成,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也已经确定。这个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为中国外交工作提供的新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将第三世界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苏联是全世界人民和爱好和平力量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

---

<sup>①</sup>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日。

中国必须同时与西方结成统一战线。

在上述三个方面中，对西方国家的重新评价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最积极的变革。由于世界的这个部分几乎包括了所有过去被中国称为“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它们的重新评价必然给中国外交带来巨大的活力和发展余地。由于这些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并不象中国曾经解释的那样简单，帝国主义集团尽管被描述成“分崩离析”，美国仍然可以左右它们的对华政策，所以打破中美关系的冰冻状况成了改善中国与西欧和日本的关系的关键。“三个世界”理论同时解决了这个链条上各个环节的问题，为中国的外交改善和发展同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符合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论依据，使中国外交的变革同国内正在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运动协调起来。一旦坚冰被打破，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个部分相来往时，会产生什么影响，是需要另行探讨的一个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决心使中国向世界开放时，面对他们的一扇重要的大门——西方世界的大门——已经被打开。

以上仅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作了粗浅的描述。这个理论作为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组成部分，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此时思想的特征。它既包含了毛泽东要领导世界革命的宏伟抱负，也是基于对国家安全的谨慎考虑，同时又把国内进行的极端僵化的政治斗争同在国际上实行的灵活的政策巧妙地协调起来。从中国外交发展的脉络观察，当年，正是这个理论指导中国在披着激烈革命色彩的情况下迈出了使世界结构真正发生变化的步伐。



## 第二编



# 毛泽东晚年对经济的基本主张及其选择

朱嘉明

20年前，“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更感兴趣的已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身，而是造成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原因。本文探讨的是经济原因，并兼论其经济后果。

统计资料表明，60年代中期的“文化革命”并非在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的局面下发生的，恰恰相反，是1949年以来最繁荣的局面下发生的。

这样，就要求回答两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一、这种景气状态下的国民经济是如何与这一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呢？二、刚刚过上满足生活的群众，却为什么以那种自己都不曾料想的热情投入到这一运动中呢？

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当时的状态。

事实上，在1963至1965年经济迅速恢复和高速发展、城乡经济一片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依然存在，有些矛盾还在发展。第一，农业并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吃饭问题没有真正解决，穿衣问题也没有最终解决。第二，消费品的生产还是不能适应人民的消费需求。第三，虽然大庆石油的开发改变了中国石油主要依赖进口的情况，但是，

这仅仅是缓和了中国能源短缺的情况。第四，重工业存在着“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倾向。第五，经济发展在不同地区间的不平衡状况，继续存在。第六，随着经济的好转，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特别是以国家工业部为代表的“条条”与地区的“块块”矛盾很快突出。第七，企业提出自主权的要求。第八，劳动者存在着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到文化革命前夕，劳动者提高收入的要求正逐渐普遍化。

1966年夏季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一个交叉路口上：

(一)接受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在中国准备实行经济改革。60年代初以孙冶方为代表的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并初步提出了包括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甚至农村经济组织形式等关于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非常遗憾的是，毛泽东是首先意识到中国经济体制弊端的，并且在1958年做了改革的尝试；但是，到真要进行经济改革历史关头时，他却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

(二)完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吸收中国自己的以及外国的经验。在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中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很快制订了出来，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了起来；在农村，力求坚持被三年困难时期所证明的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在不久之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上述主张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而遭到批判。

(三)“文化革命”，确切地说，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而是“文化革命”。1962年以后，从可以得到的资料看，毛泽东不仅不能接受经济改革的主张，而且对完善计划经济也缺乏兴趣，却愈来愈多地谈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从逻辑上看，当时把经济改革的要求视为修正主义

行为,把改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采用更灵活的经济组织形式视为资本主义之后,同时又不愿意按原来的路子走下去的时候,剩下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似乎也就理所当然了。

## 二

毛泽东选择了“文化革命”,主张政治挂帅,用政治解决经济问题,这是事实。但是,决不能认为,毛泽东对经济发展没有自己的系统看法。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革命”,使他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成为现实。从60年代初到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自给自足问题。“文化革命”前不久,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商品分工的看法。但是从经济科学的观点来看,中国还是一个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国家,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要加强的是商品分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在国际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还要大力发展国际范围内的商品分工。相反地,过分地强调各行各业,个各部门,各个地区的自给自足,无疑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文化革命”中各式各样的“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干校”,几乎都带有强烈的自给自足的倾向,有的就是放大的“小农经济”。到了70年代中后期,“工厂办社会”大膨胀,全社会的专业化协作水平低下,各区域自成体系,正是文化革命中这种倾向的直接后果。

第二,关于产业政策问题。早在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是持赞同态度的。严重的问题在于将这两个口号绝对化,并根据这两个口号形成的产业政策指导中国经济发展,这就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如果中国的农业和工业,都以某一行业,甚至某一产品为中心,必然造成部门之间发展的失调,投资的失调。不仅如此,从60年代开始,毛泽东根据自己

关于国际局势的看法,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大、小“三线”建设。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发展国防工业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那么多的资金投到深山之中,不计经济效益,不考虑军工和民用生产的关系,不注意生产力布局的客观规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中、长期发展,结果造成不应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第三,关于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公有制的地位与作用。在1975年,他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其他经济制度相比,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在对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极度追求的情况下,在“文革”初期,出现了个体经济大规模转向集体所有制,相当一批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的浪潮。到了“文革”的中期,所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在城市工业、服务业中基本消失。这种对更大规模、更纯的公有制追求的浪潮,改变了中国多年存在的以公有制为主的多元所有制构成。这是中国第三产业急剧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在今天,作以上分析,决不是用现代经济学家的思想去苛求毛泽东,只是希望使读者能够明了这样一个关系,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叉口上,毛泽东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背后的经济主张,既是“文化革命”爆发的重要经济原因,又是“文化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特征的肇因。

### 三

20年前,当“文化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如何驾驭这一历史事件很快就成为非常困难的工作。而这种困难与其说表现在政治领域,不如说表现在经济领域。在这一运动开始不久,作为发动者与领导者的毛泽东就发现,仅仅靠几年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不足以支撑这场政治运动的。因此,必须千方百计保证和维持国民经

济的正常运行。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很快就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但是，事与愿违，由于文化革命自身的性质，它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它只能破坏经济的发展。

今天，我们回顾“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可以发现其特征：

第一，经济发展过程的政治化。国民经济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经济的客观要求，去适应某种政治需要；甚至农民种粮食，还是种其他农作物，也成了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和经济行为本身都丧失了其独立性，不同意这种经济政治化就是“唯生产力论”。中外历史上，很难再找到相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济单位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无产阶级专政”落实问题，解决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在“资产阶级手中”的问题。

第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被抑制。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不从古代说起，仅仅从近代以来，好几次要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都受到了破坏和抑制。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在“文化革命”期间，抑制商品经济的原因，则是全国范围内，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区域的所谓“自成体系”彼此分割的倾向，人们追求的目标是，能够解决吃、穿、用等一切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切与商品经济有关的经济杠杆，都受到破坏。在“文化革命”期间，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这种稳定是虚假的，它是以下面的三个代价换来的：其一，牺牲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要求，在城市是冻结工资，在农村，则是农民工分代表的货币量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其二，不断扩大国家在物价补贴上的财政负担；其三，开始是局部的，隐蔽的，到“文化革命”中、后期则成为普遍的、半公开的“走后门”，黑市交易，以物易物。正是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对价格水平内在变化要求的人为抑制，加剧了现在进行价格改革的难度。

第三，技术进步的趋势受到了严重阻碍。“文化革命”使在中

国已经形成加快技术进步步伐的势头骤然停止。在70年代中期，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降到最低点，中国经济走上了只有凭借新的资本、新的劳动力的投入才可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的局面。“文化革命”结束之后，人们常说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恶性循环”，正是在这前后开始的。

第四，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自我封闭”。50年代和60年代初，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事实上是很难做到完全对外开放的。今天，我们应当公正地评论中国当时的对外经济政策。但是，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际环境，首先是国际经济环境迅速的变化，中国走向对外开放，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期间，中国经济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绝对化，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绝对化，不能正确认识参加国际分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使得中国自身技术改进的任务、发展高级技术的任务，都由于“自我封闭”大大地推迟了。

第五，“文化革命”前正在形成的专家和管理人员阶层彻底瓦解。60年代以后的中国，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与企业管理走向正规化、科学化的要求，一个经济专家和管理人员的阶层事实上正在形成。但是，随着“文化革命”的发生，工厂、机关、科研单位受到打击，继而受到“工宣队”的管制，这个尚未成熟的阶层很快瓦解；以至，如果再形成，要由下一代或更后一代人来完成。由于这个阶层无法形成，在中国，工人阶级就无法通过他们的代表，对经济实行科学的组织与管理，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没有稳定的中坚力量。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不仅在市场经济中不存在，就是在其他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也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把上述五个方面的趋势综合在一起考虑，在“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确实脱离了轨道而走上歧途。这场所谓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逐渐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调整政治结构

和政治关系，而对这个脱离轨道的巨大的经济机器却无能为力。到1975年，国民经济形势恶化的不少征兆相继出现，毛泽东在这一年提出，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了解决国民经济所面临的复杂而艰巨的困难，是邓小平再次走向中国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也是邓小平才有能力挽救当时日益恶化的国民经济。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已经从政治上的狂热转到对经济的忧虑，从对切身物质利益的自我牺牲精神转到对实际利益的追求。这一大转变，决定了人民群众成为“文化革命”的反对者。邓小平代表了人民群众的这一要求，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拥护与支持。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毛泽东病逝，“四人帮”垮台，“文化革命”结束。从国民经济的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出，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确已处于全面危机的前夕。这不能不是“四人帮”覆灭的经济背景。

#### 四

如何评价“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经济后果呢？严格地说，这比探求其经济根源更为困难。因为，它的经济后果，也许在10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

评价它的经济后果，主要是从数量方面和非数量方面进行分析。

在数量分析方面，公认的提法是：10年“文化革命”的动乱使中国经济损失了500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收入。但是，至今在海内外，还有人认为，“文化革命”期间，整个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我认为，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在“三五”、“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增长是事实，但是，现在发表的统计资料，不可能全面和正确地反映当时经济状态，因为在“文化革命”期间，国民经济的计划系统，特别是统计系统受到了严重损伤，加之所有生产单位，为了证明

“抓革命”的成就，都要夸大经济增长的数字。因此，当时的统计数字包含着极大的“水份”。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在这10年间千分之25左右的人口增长率，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就更为不好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城市工资事实上处于冻结或半冻结状态，农民的收入提高甚微。也就是说，“三五”、“四五”期间，全国消费水平是1949年以来增长最慢的。对全国消费水平的抑制，使得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比重不断提高。这种在当时国民经济状态下过高的积累率，意味着过高的投入，这本身也刺激了这10年间经济的增长。

现在更应该分析的是非数量性后果，10年“文化革命”所引起的动乱，对经济机体最严重的损害在于破坏了经济结构之间必须的协调关系，使得农业不仅无法支持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且连自身发展都出现了危机；到70年代后期，消费资料的生产空前短缺，特别是诸如录音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类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不能形成起码的规模；能源工业生产不能满足生活和生产消费；交通运输业成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加上工业畸形发展；服务业日趋萎缩。中国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正是为了解决和改变上述局面。特别严重的是，“文化革命”所引起的动乱，使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例如，不讲经济效益，平均主义发展到了极端状态，不仅国营企业躺在国家身上，而且集体企业，甚至农民也躺在国家身上。这都造成中国经济走到了不可能再依照原来的机制运转下去的地步。

在非数量性的后果中，最严重的是，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丧失了本世纪最宝贵的10年，正是在这10年中，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了，而且与某些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也扩大了。要知道，弥补这种损失是多么困难！

“文化革命”结束了近10年。对于这场民族性的灾难，仅仅去

彻底否定它是不够的，每一个经历这一历史事件的人，都应该超脱个人的得与失，对它进行深切的反省。我认为，以下的反省可能是必要和有意义的：

第一，人们缺乏关于经济发展的快慢决定全民族根本利益的认识。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进行了斗争，做了牺牲。而在这期间，在西方国家和日本却在全力进行经济建设。中国没有这样的历史机会，也不懂得怎样进行现代化的经济建设。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一个连接一个，与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相比较，人们更习惯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很大一部分优秀人才，不是卷入到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就是成为某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共产党也没能认识到要把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为首要任务。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中国就不可能产生大批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银行家。在经济开始改革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中国的经济人才是多么的缺乏，就连建立专利制都不知花了多少的努力。

第二，在“文革”结束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缺乏一支代表经济发展、组织社会经济运转的社会力量。在上个世纪末，戊戌变法失败了，洋务运动也失败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时刻，没有产生这样一支社会力量；以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又没有得到相应的历史机会和环境，也不可能成为这样一支社会力量。如果自1949年起，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从工人阶级中是有可能产生一个管理阶层的，但是，各式各样的动荡破坏了这种可能性。

第三，中国人民的经济意识偏于保守。中国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没有经过现代经济中无情的竞争，人们先天地愿意在生存与发展中倾向于生存，在公平与效率中倾向于公平；没有

见过真正的竞争,却害怕竞争;不了解市场的含意,却对市场反感;没有管理的经验,却反对计算成本和追求利润。很多人,包括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包括多多少少有一些经济常识的知识分子,对经济提出的要求存在着惊人的偏见。在历史的某些时刻,偏见也成了一种力量。这在经济改革实施以来,几乎时时发生。农民雇工,有人就要提出反对“剥削”;一部分人或一些地区先富起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有人就要提出反对“两极分化”。这种现象实在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了。

如果说“文化革命”是一列开错方向的列车,它险些把整个中国载到险恶的深渊;那么,从那辆列车下来的乘客,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历史的列车驶向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要加快社会现代化的速度,把损失的时间一分一秒地夺回来,使中国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选自 1986 年 10 月 6 日《世界经济导报》》

## 《五·七指示》初探

王禄林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习惯上称之为《五·七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发表迄今整整20年了。时光在流逝，实践的检验，使我们有可能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认识它的真正含义。通过对这个历史文件的研究，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图，了解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以及毛泽东晚年一再犯“左”倾错误的原因。

### 一、《指示》是毛泽东晚年提出的 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纲领

毛泽东发表《指示》的用意何在？表面看，它是一篇即兴之作，实际上它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产物；形式上看，它是一封个人通信，实际上它是毛泽东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宣言书，它寄托着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在于通过“砸烂旧世界”<sup>①</sup>，达到“建设新世界”<sup>②</sup>。《指示》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纲领。

---

<sup>①②</sup> 这两句话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喊过千遍万遍的口号。

《指示》产生于1966年5月是耐人寻味的。当时，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按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着，《五一六通知》即将通过，一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暴即将发生。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定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要搞成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目的是要摧毁全部现存秩序，即“砸烂旧世界”。那末，“砸烂旧世界”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这是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在部署“文化大革命”时，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指示》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指示》由军队讲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由农副业生产讲到办小工厂、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等，范围涉及各条战线，内容涉及各个方面。而且，它不是讲经济建设的一般方针，而是谈整个社会的总体规划，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然，它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

只要把《指示》同《五一六通知》联系起来思考，就会发现，这两者是互相映照的姊妹篇。一个主旨在“破”，一个主旨在“立”；一个是“砸烂旧世界”的纲领，一个是“建设新世界”的蓝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首先是要批判他心目中的“旧世界”，但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他理想的“新世界”。因此，可以说，《指示》的发表是必然的。假如没有总后勤部的报告，它会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

林彪凭着多年来形成的政治嗅觉，当然明白《指示》不是写给他个人的私人信件，而是写给全党的，寄托着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的纲领性文件，他个人无法实行，也无权处理。因此，他很快转呈中央。中央显然明白《指示》的发表异乎寻常，因此于1966年5月15日全文转发到全党，要求全党有步骤地实行。在转发的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1966年8月1日，正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指示》

的基本精神在《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向全国公布。全国各大小报刊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sup>①</sup>。这个显然得到毛泽东认可的评价，明白地告诉人们，《指示》是毛泽东研究了国内外各种经验的产物，是反修防修，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方案，是一个建设性的纲领。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到处办起“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饲养厂、“五·七”大学、“五·七”中学、“五·七”干校、“五·七”医院等等。没有贴“五·七”标签的单位，也在走“五·七”道路。《指示》确实成了治军、治民、治国的纲领。

## 二、《指示》反映了毛泽东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大论战，说到底，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当时作出结论。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对社会

---

<sup>①</sup>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主义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理想中有一个“最完善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以头脑中的标准看世界，所以认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变修了，认为国内的许多做法是修正主义的。他自以为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一个“左”倾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中。《指示》为我们描述了这个模式的大致轮廓：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sup>①</sup>的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sup>②</sup>的社会。毛泽东就是根据这个共产主义目标来设计社会主义社会的。《指示》要求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要办成大学校。每个大学校都要一业为主，兼营它业。它的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这样，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逐步消失。具体说，《指示》要求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指示》就是这样不厌其详地要求各行各业办成一个全面发展的小社会。

这样全面发展的趋势，将会使社会行业之间的界限逐步消灭。那末，大学校内部有没有专业分工呢？也没有。大学校内部的工、农、学、兵，不是固定的分工，而是每个人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sup>③</sup>，全面发展，以便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

---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③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社论。

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sup>①</sup>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sup>②</sup>。

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它同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越来越广，即使在工、农、学、兵内部，分工也日益在向深层次发展。消灭分工，只能造成工不工、农不农、学不学、兵不兵的状况，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它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全面倒退。“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兵的结果，荒废了学业，造就了新一代的文盲。军队搞军工、军农、军民的结果，使部队素质严重下降。科技人员进“五·七”干校的结果，使专业荒废，我国科技同世界的距离拉大。而且，在兼营各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所以干了大量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蠢事。象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等等，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资财，而且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遗害无穷。这方面的破坏不亚于武斗和“打砸抢”。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设想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并且把这种形式由农村推广到城市，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想把它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大学校”同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反映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在对消灭商业的问题是犹豫不决的。头脑发热时，他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sup>③</sup>的主张；头脑冷静

①②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社论。

③ 见1958年8月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时,他又说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sup>①</sup>。但是,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思索和研究之后,他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从《指示》发表,一直到他逝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过。1975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说出了他对商品、货币、工资制度不能容忍的原因。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sup>②</sup>。

毛泽东想取消商品的主张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有关。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商品交换,没有货币,在分配方面实行直接的产品分配,实行全社会范围的产品调拨。但毛泽东与马克思的设想也有不同之处。他不是以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而是用自然经济来取代商品经济。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sup>③</sup>。消灭商品经济只能导致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sup>④</sup>,实现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接受文化教育,享受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平等,尽快消灭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共产主义社会是三大差别消失的社会。消灭三大差别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必须走历史必由之路。三大差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产生、发展到消失,都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联系。人类在原始社会,并没有三大差别。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农业中分化出工业,乡村中分化出城市,体力劳动者当中分化出脑力劳

---

① 见《政治经济学笔记》。

② 转引自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③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④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动者。这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同样，也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才能最终消灭三大差别。但毛泽东却想在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尽早地消灭三大差别，而且不是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大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似乎就达到了每个人在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乡下厂，补上体力劳动课；没有文化的工农兵送到大学学习；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总之，“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

这个以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在诸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首先，他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发生了误解。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社会分工和三大差别的消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列宁说：“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sup>①</sup>。毛泽东忽视了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个前提，一味寻找如何消灭分工，消灭差别，消灭商品货币的途径，结果就不能不回到没有分工、没有商品的自然经济和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去。这样，他就对列宁认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复杂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回答。其次，他把民主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绝对化。他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创造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成功经验，可以回答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指示》结尾说：“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少年来，很多人已经这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卷第253页。

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有所发展罢了”。毛泽东把局部的作法普及到全局，要把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发展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第三，中国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这是以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得以产生的客观原因。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提不出这样的方案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越急于消灭商品货币、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教训都非常深刻。可见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平均主义来理解社会主义，甚至往往自然而然地用自然经济来理解产品经济。

### 三、《指示》是打开毛泽东晚年 错误之谜的一把钥匙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位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结合的典范。但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左”倾错误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人们探索过各种答案，但均不能令人满意。有人说，毛泽东晚年错误根源于骄傲，一骄出万错。骄傲可以解释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但解释不了全部错误。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可以说是由于骄傲，但发动“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说由于骄傲。有人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少了，单靠听汇报解决问题。这种说法，解释不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性质。说明不了毛泽东为什么只犯“左”倾错误，不犯右倾错误。难道下面汇报的材料都是“左”倾观点？再说，毛泽东凌驾于中央之上的错误，与

他是否调查研究也毫无关系。又有人说，毛泽东晚年犯错误，是权力欲支配的结果，是品质问题。这种说法更为不通。列宁曾经指出，如果仅仅从领袖人物的品质上寻找犯错误的原因，你将犯一千次错误。实际上，毛泽东晚年错误是一个有理论体系的错误，用品质问题根本无法说明。

《指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毛泽东晚年错误之谜的钥匙。它所勾画的那幅“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不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科学答案”，恰恰是毛泽东为什么犯“左”倾错误的科学答案。

毛泽东是一位战略家。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成功，主要在于战略上的正确；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失误，也主要在于战略上的错误。

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不久，毛泽东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他要在中国一穷二白的大地上写上最新最美的文字，画上最新最美的画图。1958年出现的三面红旗，被他视为一生的得意之作。其中的“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将幼儿园，托儿所，公共食堂，红专学校囊括于其中的人民公社，就是他理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从此时起，他头脑里已经大致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指示》是对这一构想所作的系统表述。正是在他所构想的这个“左”倾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支配下，他从50年代末开始，一步一步地在“左”倾道路上前进。虽然他也纠正过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由于他没有放弃“左”倾的社会主义模式，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左”倾错误。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可以用他的“左”倾社会主义模式来说明。

第一，经济建设上一系列过左的方针和政策，直接导源于这个

模式。在农村堵资本主义的路，取消自留地和社员家庭副业，批判包产到户、“工分挂帅”、定额管理；在工业上，批判自负盈亏、“专家治厂”、“奖金挂帅”、“利润挂帅”；商业上，把自由市场当作“黑市”加以取缔，视个体贩运为“投机倒把”；教育上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这些政策和做法，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明明是经济单位，却不能讲经济效益，明明是教育单位，却不能讲教学效果。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但是，站在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的角度观察问题，就感到毫不奇怪。这些政策是那个带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直接产物。

第二，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是在坚持这个“左”倾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打击面一次比一次广，从反右倾斗争，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过火批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又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从“炮打司令部”到“批林批孔运动”，从“评法批儒”到“评《水浒》”，再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每次运动都突然发作，让人莫名其妙。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论述，谈起来令人惊心动魄。什么“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啦，“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啦，“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啦，“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过七八年”就得“再来一次”啦，等等。为什么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看得如此严重？为什么对几十年同甘共苦的战友一个一个不信任了？为什么对自己亲手参加创建的党越来越不满意？这些最复杂的问题，有个最简单的答案，这就是毛泽东头脑中那个“左”倾社会主义模式作怪的结果。“大跃进”期间，全党上下都在按照毛泽东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奋斗，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被视为“右倾”。“大跃进”失败后，党中央改弦更张，放

弃了毛泽东的模式，在实践中寻找新的道路。毛泽东虽然同意纠正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但并没有放弃“大跃进”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就形成了毛泽东同中央集体之间深刻的意见分歧。毛泽东把这看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于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逐步形成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概念，“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概念，“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概念。为了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维护“三面红旗”，批判所谓“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等等。说到底，毛泽东政治思想方面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是在维护他自以为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发展起来的。

第三，组织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甚至以个人领导取代中央的集体领导，这是毛泽东晚年在个人和党的关系上犯的一个重大错误。他不是不懂得集体领导的重要，也不是不懂得“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他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他看来，他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所捍卫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他不惜同过去的战友决裂。因为他当时以“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来对照现实，错误地估计了他与党内一些主要领导人分歧的性质，认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深深地陷入了党变修、国变色的忧虑之中。他感到面临如此严重的形势，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如果再按部就班地执行那一套组织原则，将铸成历史大错。政治原则高于组织原则，这是个常识。如果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正确，那末他的独排众议的行为和胆识，将被历史大书特书，千古传颂。任何人也不会用组织原则来苛求他。问题在于，他不惜一切代价所捍卫的恰恰是“左”倾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结果犯了双重错误。这

是他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晚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物。他主观上要为衷心爱戴着他的中国人民开辟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客观上却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民推向灾难之中。他发动群众砸烂的所谓“旧世界”，恰恰是他历经半生坎坷，亲手创建的社会主义江山。最美好的理想和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就是发生在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身上的悲剧。一方面是“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奇迹”；另一方面是数以千亿计的经济损失，数以万计的被迫害致死的中华儿女的冤魂，数以亿计的受株连的人们的精神创伤。理论和现实，愿望和结果，如此不可调和地对立，又如此不可分割地统一着。这确实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离奇的悲剧题材，即使最天才的作家也幻想不出这样的悲剧来。

（选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

# “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

席 宣

探讨这样一个题目，并不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追求实现平均主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科学论断，党史学界也作了大量研究，应该说已经比较清楚了，至少在宏观考察上可以这样说。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平均主义曾象一支插曲，经常能听到它的声响；又象一个幽灵，到处能感到它的隐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否同它有些关联，对于这个问题至今研究尚少。因此，沿着“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脉络，对平均主义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怪物”作一番考察，可能是有意义的。

## “文化大革命”所反映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是什么，纲领是什么？严格地说，“文化大革命”是没有纲领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份文件，都曾经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但是，仔细看来，这两个文件又都不能被认为是完整意义上的纲领。因为《五·一六通知》只是说要“夺取”什么、“批判”什么、“清洗”什么，而要建立什么，那里边并没有说。《十六条》倒是提出要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但“四新”的实际内涵究竟是什么，“文化大革命”10年中却谁也没有说清楚。革命纲

领导总是要规定所追求的社会目标，连目标都是含混不清的，就至少不能算是完整的纲领。胡绳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一文中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以为，只要靠群众斗争的一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sup>①</sup>我们从有关史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所追求的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明显地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

1966年5月7日（此时“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已经开始），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封信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虽然线条并不很清楚。这种理想社会被称为“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当然，还要做群众工作，批判资产阶级。这是指军队而言的。其它各行各业呢？文件也写到了：工人也是这样，农民也是这样，学生也是这样，“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转述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看来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个大家都一个样的大学校建成了，“三大差别”似乎自然就会消失；人人都似乎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

---

<sup>①</sup> 《红旗》1983年第6期。

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这似乎就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五·七指示》没有谈如何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也没有谈到发展科学技术的途径。对此不应当苛求，因为《五·七指示》只是对军委总后勤部一个报告作批示，并不是全面规划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尽管如此，文件描绘的大家一个样，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理想社会，其轮廓还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这当然不可能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以后实现打破旧的社会分工的那种科学共产主义社会。

《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最高指示”，是“天天读”的重要内容，它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无疑，这种影响也包括平均主义在内。“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口号，制定的许多政策，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大都可以从中找到平均主义的痕迹。工矿企业职工的奖金取消了差别，变为附加工资，大家一个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叫作走“五七道路”，目的是同工人、农民“划等号”。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五七干校”，除了包含因这部分人过去比工农“特殊”而加以惩罚的意思外，为的是按照同一模式“重新教育人”，并且要求他们在吃饭方面自给自足。在农村则是普遍推行“大寨工分制”，并且坚持不懈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以防止某些人“冒尖”而出现“两极分化”，达到大家“拉平”。上述诸端，仅是牵涉千百万人的影响重大的事例，至于在社会生活中曾到处出现的平均主义现象则不胜枚举。

平均主义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实施，必定需要权威的行政力量和严密的组织形式来保证，军事化是最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组织措施。“文化大革命”期间，为进一步贯彻“全

国学解放军”的号召，提出军训、军管等要求，各行各业在不同程度上都实行军事化。各种群众组织几乎都冠以兵团、纵队、战斗队等军队番号；红卫兵是准军队的组织；“五七干校”是按连、排等军队编制组织起来的；高校、中学复课后，则按连、排、班代替原有的年级、班级、小组。“文化大革命”所具有的浓厚的军事化色彩，从另一角度显示了推行平均主义的努力。

在“文化大革命”中，平均主义这个幽灵最为活跃的时候，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那一阵子。在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谈话时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在自己81岁生日时又谈这些话，表明了他的重视程度，反映出他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持批判态度，对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怀着深重忧虑，当然，也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是含混不清的。究其思想内涵，似乎社会主义的根本弊端，就是“不平等”、“不平均”。正是在这一点上，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从事物的外部联系去观察，毛泽东的上述看法不能说没有任何道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说，社会主义社会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这是因为各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弱有强，劳动技能有低有高，各自家庭负担的轻重也不一样，他们之间的实际生活水平就会有差距。马克思指出：“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这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

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接着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说，只有到那时，才能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在分配方面的“这些弊病”。

当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上述原理的基本思想还是清楚的。他并没有提出要马上消除“这些弊病”的任务，而是提出“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意见。这个意见的严重缺陷，是使人容易理解为可以运用专政的强制力量，去消除“这些弊病”，而不是象马克思所说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消除它们。这一缺陷，在当时就产生了影响。

毛泽东的“理论指示”发表后，“四人帮”乘机大加渲染。顿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成了政治生活的主题，平均主义思想到处泛滥。“废除级别问题”、“恢复供给制”等又被强调地提出来了，还在一些单位进行试点。当时，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各种设想和尝试，毛泽东都给予关注。1975年5月22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他认为，国家是按同一价格收购粮谷的，农村社队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产粮的多少。因此，自然条件差，劳动生产率低的社队，产粮少，收入低。他说，这“是属于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它是造成我国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他建议：“实行按自然条件好差程度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的情况，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这种脱离实际近乎幼稚的认识和建议，却由于提出了均贫富的问题，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于5月25日在这封信上批示：“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困户。看看结果再说。”这个批示一发出，国务院当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26名干部，组成三个调查组，到山

西、河北各选三个公社进行调查研究。

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调查组于1975年8月间陆续写出调查报告，对能否根据自然条件好坏和劳动生产率高低，采取不同的粮食收购价格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几份调查报告举出的主要理由是：第一，穷队与富队互相交叉，在有些生产大队里，有穷队也有富队。丰年与欠年，穷富队都有变化。如果穷富队分别定价，同一地区，同一大队，势必出现几种价格，甚至要年年调价，这容易引起混乱。第二，富队之所以富，除了自然条件外，主要是自己的劳动。对富队收购价格低，对穷队收购价格高，富队可能不高兴。当穷队生产有了发展，由穷变富以后，取消对他们产品的高价收购，他们也会不高兴。第三，大多数穷队余粮很少，甚至还要吃返销粮，提高穷队的收购价格，对他们帮助不大。这些调查报告所作的分析表明，企图依靠强制力量，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平均主义办法，以求达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均贫富的目的，是根本行不通的。强制性的、平均主义的办法，实际上是奖懒罚勤，必然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

看来，在农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另辟蹊径。这条路子，被陈永贵找到了。1975年8月14日，陈永贵向毛泽东写了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竭力主张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以解决农村的贫富不均问题。他说，昔阳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全县410个大队都实行了大队核算”，“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是势在必行”。毛泽东于9月3日将这份《建议》批给中央政治局，要求“在政治局讨论一次”。把陈永贵的信件批给政治局讨论这件事本身，实际上就表示了对《建议》的赞赏。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党中央于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纪登奎、吴德主持，中

央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17人参加。会议集中讨论了陈永贵关于短期内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过渡到大队的建议。

座谈会一开始就出现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与会者表示赞成陈永贵的意见,主张“从现在开始,就分期分批过渡”。对于这种急于过渡的“左”倾主张,赵紫阳等同志在多次发言中,表示了反对的态度。赵紫阳说:“我看现在最好不要一下就大量地改变核算单位,这样容易引起波动,也巩固不下来。”他指出:“从现在开始,就分期分批过渡,这个提法值得考虑。”“说是分期分批过渡,有的不甘心落后,怕说右倾,就会一哄而起,实际上没法分期分批。如果真的分期分批搞上几年,搞这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就会等待、观望、动荡。有的就会不搞农田基本建设了,拖拉机也不买了,积累也不搞了,分光吃光。”他说:“我主张搞试点,宁可把准备时间拖长一点。”谭启龙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主席讲过至少三十年不变,已深入人心。如果风一吹下去,搞得不好,对群众有影响。”会上的分歧被写入了会议呈报的《讨论意见》。毛泽东没有就这件事再作批示,陈永贵的意见被搁置了。我国农村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又一次动荡。

### 对平均主义的一点历史考察

平均主义是小生产者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并要求平均享有社会一切财富的一种思想,也是小资产阶级平等观在分配方面的表现。它来源于小生产者本身的经济地位及狭隘眼界,并成为其习惯心理。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小生产的特别广大,平均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追求某种形式的平均主义目标,是历代农民起义所具有的普遍要求。“等贵

贱，均贫富”，曾经是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反封建斗争的有力口号。在我国历史上，把平均主义空想表达得最完整，规划得最详细的，要数太平天国。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的目标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了实现这种美好的理想，还采取了一整套办法，并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付诸实施。但还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前，它的这套办法就行不通了，而且成为其失败的一个原因。当然，《天朝田亩制度》代表了当时广大农民的理想，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这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纲领，在它实施过程中，竟然成为导致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简而言之，《天朝田亩制度》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只是一种空想，在事实上不能代表一种比封建制度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因此，它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太平军曾经推行的一切财产归公的圣库制度，大体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度等，在战争时期，对于动员群众，保证军队作战等方面，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在那样的条件下，也行得通。但把这些经验当作普遍适用的规律，强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推行，则必然引起不可避免的混乱，阻碍生产发展，成为导致太平天国的失败的一个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认识到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小生产者思想习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一直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包括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批评。最广为人知的，是毛泽东1929年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批评。决议指出了“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而在当时“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决议分析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需要加以分析的是，《古田会议决议》要求“红军人员的物质分

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毛泽东后来概括了当时斗争环境的主要特征。他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sup>①</sup>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规定红军和革命队伍的其他成员在物质分配上大体平均，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必要的、正确的。可见，当时反对的是“绝对平均”，提倡的是“大体平均”。在以后党的正式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提法也大都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很少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平均主义。

问题在于，“绝对平均”和“大体平均”之间，很难作出确定的区分，似乎只能找出量的规定性，而不能找出质的规定性。加上在长期革命战争的环境下，大家过惯了大体平均的物质生活，不仅没有感到大体平均的弊端，而且处处感到它对于保证战争需要，维护内部团结的特殊价值。因此，在全国解放前的很长时间，中国共产党在历次整风中，在思想教育中，没有对平均主义或是绝对平均主义进行过集中的检查和批评。

1947年开始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了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在分配土地时，产生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偏向，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毛泽东于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绝对平均主义。他尖锐地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948年7月，党中央还以“新华社信箱”的形式，发表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文，专门解释了毛泽东的上述论断。这篇文章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

---

<sup>①</sup>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期间，党内开展了对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这是比较集中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它表明党中央已经从更高的角度、更广的范围看到了平均主义的危害性。

认识发生了逆转。1951年，由于党中央领导人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批判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思想教育就停止了，并且对于这种批判长时间成为禁忌。甚至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修订《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时，把原有的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字句也删去了。从此，对于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批判，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与此同时，平均主义思想和它的种种表现，则日益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不久，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穷拉平”，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穷过渡”，这些都是平均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

苏共二十大后，更多地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思考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此，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多精力。他坚持退居二战的的目的之一就是从事理论工作，构思中国社会主义大厦的蓝图。毛泽东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他广博的学识、丰富的想象力，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曾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以及后来在1959年至1961年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一系列谈话和批语中，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即使是富有非凡才智的杰出人物，他的认识也不能超越时代所能提供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限制的条件。毛泽东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才刚刚起步，我

们自己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可以借鉴。因此，毛泽东在构思中国社会主义大厦的蓝图时，只能借助于战争年代的经验和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天下为公”的各种设想，以及并非完全准确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预测。在这种历史局限性面前，即使对于象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是能够在社会舞台上随意驰骋的。想象力越丰富，魄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出大错。

毛泽东在1958年以及之后，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富于鼓动性的命题。他认为，我们国家是一穷二白。穷是好的，穷则思变；白则更好，一张白纸好作文章。他提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他提出要破除迷信，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他主张不断革命论，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这种革命的内容和形式是“草鞋无样，边打边像”。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构思社会主义蓝图的思想特征，也是他在一些问题上陷于空想的契机。

毛泽东始终没有完成他所要构造的社会主义大厦的总体设计，他没有留下完整的图纸。我们只能从那时他的一些讲话文字中，看到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一个轮廓。当然，从中也看到了平均主义的色彩。

在那样的社会里，分配应是大体平均的，实行供给制是一种较好的形式，逐步实现吃饭不要钱，穿衣服也不要钱。毛泽东在谈到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生活时，总是充满了美好的怀念。他赞扬供给制，厌恶工资制。他说：我们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针对有些同志对实行供给制持不同意见，毛泽东争辩说：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

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差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他还说：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对于工资制，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厌恶。他说：解放后，统统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要做很多说服工作。他责问道：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来的吗？但是，毛泽东也并不是主张立即废除工资制。他说：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毛泽东是把级别、工资这样一些分配形式视为应当加以逐步废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但是他也说过，“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这反映了毛泽东求实精神的一面，毛泽东的上述想法，显然是来源于过去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其中包含的主观、片面认识，盖源于毛泽东没有组织领导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经验，也没有深刻认识到，战争年代的经验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和平时期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

毛泽东设想的那样的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城市的、乡村的人民公社组成的，这是实现在分配上大体平均所需要的基层组织单位。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他还说：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毛泽东说：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结构的基层单位，它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的部分作用。他认为，对于人民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他指出，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指由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作者）的最好形式，又大又

公,有利于实现两个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显然,毛泽东希望看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千千万万个相对独立的、具体而微的社会群体,由此组成“共产主义大学校”。“大跃进”年代出现的“穷过渡”,看来是同这些设想有关的。

在那样的社会里,实行分配上的平均,是为了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保持人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干部特殊、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等十分不满。他指责说:发薪水都要等级,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他还把“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样一些现象,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他说: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毛泽东对于这些社会弊病的厌恶,更引起了他对战争年代根据地生活的怀念。他说: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他认为,那时的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毛泽东的这些谈话,表现出他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己任的革命家风貌。但是,那些千百年积留下来的社会陋习,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不高的现实生活中,期望通过多少次群众运动的冲击,就能把它扫除干净,这些想法已被实践证明只是一种有害的空想。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所产生的一些断想,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没有继续发展并形成体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那些断想。他认为,一步一步地实现那些断想,就是不断革命。不赞同他的想法的人,在他看来,都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想搞修正主义。毛泽东在逝世前还愤慨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

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认为：“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由此，他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惊人判断。看来，清除在中国实现最“纯洁”、最“完善”的社会主义的障碍，可能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

### 平均主义同社会主义不能相容

从毛泽东在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贯穿着两个追求目标：平均和平等。他不仅把这二者看成是相通的，而且往往看作是一码事。他把地位不平等、待遇不平均，视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本来，从道德伦理观念看，平均和平等是美好的，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向往。但是，期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普遍达到平均和平等，这终究属于不切实际的空想。

平等，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对不同阶级、在不同社会有其不同的内涵。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sup>①</sup>在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消灭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于社会成员提供了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按劳分配原则的确立，使社会主义平等，即机会同等得以实现。当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我国，平等原则和实践之间，还将长期存在差距。这需要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活力，即不断地进行改革，去逐步缩小以至消除这种差距。而如果把平均和平等混同，认为不平均就是不平等，却是“流于荒谬”。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

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表现为人们物质文化生活质的提高、量的丰富、类的多样。而“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sup>①</sup>则反映了生产力的低下,生活资料的匮乏。这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格格不入。斯大林对“穷拉平”作过锋利的针砭。他说:“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sup>②</sup>

平均主义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平均主义会使一些有剥削思想和好逸恶劳的人“合法地”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而使广大劳动者不能实现多劳多得。这种情况,必然挫伤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国家长期贫困。邓小平说得好:“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纠正平均主义的弊端。党中央确定了提倡和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的方针,这从根本上为克服平均主义,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打开了通道。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党中央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帮助他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平均主义的危害。

有趣的是,正是“大跃进”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穷拉平”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却得到西方少数左派学者、作家的赞赏。他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sup>②</sup>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8页。

们怀着一种善良愿望，支持“文化大革命”，认为它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公平的”或是“平等的”社会，因而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许多措施，表示了失望甚至愤懑。显然，这中间存在许多误解。对平均主义的看法各异，由此而追溯到社会公正原则或是平等观的各异，是一个基本的分歧。

由于我国的历史特点，平均主义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更由于吃了几十年“大锅饭”，很多人对平均主义的各种表现已经习以为常，并误认为那就是社会主义。“要穷一起穷，要富一起富”的论调还有相当大的市场。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各项社会改革中，只要触及平均主义这根神经，就会引起一片惊呼，引发各种各样的“红眼病”，这已成为改革的一种阻力。赵紫阳说：“改革是一场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大变革，它对固有模式、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在思想上对此也必然要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sup>①</sup>在改革中，平均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最大的冲击，非此不可能进行有成效的改革。而要彻底克服平均主义，又需要以坚韧不拔的努力坚持改革。从党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揭露平均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将有助于人们在思想上适应改革的要求。

（选自《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

---

<sup>①</sup> 《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 艰辛的开拓

##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石仲泉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sup>①</sup>。

17年前，毛泽东对斯诺讲过的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实际上，毛泽东生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是这样。

曲折的道路，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但是，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难以逾越的，是人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不经历的过程。迄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了S形的弯路，当然弯曲的性质和形式各异，弯曲的程度和纠正的方法不尽相同。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的艰辛探索，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

<sup>①</sup> 见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

的历史过程，大体分这样五个时期。

(一) 1955 年底到 1957 年夏反右派斗争以前是探索的开始时期。

探索任务的提出，首先是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结果。三大改造高潮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蓬勃展开，不仅对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毛泽东多次说，1949 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 1955 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sup>①</sup>。毛泽东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1949 年的胜利在他运筹帷幄之中，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迅猛，进行之顺利，则为他始未料及。三大改造的胜利，意味着中国从此将消灭剥削制度，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为它的实现艰苦卓绝地奋斗了几十年！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和胜利，使中国开始了“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sup>②</sup>的转变。社会主义建设能否象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呢？这是毛泽东在思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一则没有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二则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还放在革命上，这样，包括“一五”计划在内，那些年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sup>③</sup>。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经济工作的错误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许多弊病暴露出来以后，毛泽东把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

① 见 1958 年 2 月 28 日和 7 月 22 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讲话。

② 见 1957 年 3 月 19 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③ 见 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2 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年11月到1956年1月，他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1955年12月他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某些按语，虽然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

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由对农业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工业问题的调查。他连续听取了党中央和国务院30几个部长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他还准备“分别听取各省委、市委、区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也准备以后每年搞一次汇报，找一些工厂作典型研究，“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sup>①</sup>，这些计划没有实现。他还阅读了斯大林1946年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认为苏联从1921年到1940年的20年内，增加了1400万吨钢，中国有苏联经验作借鉴，可以少走弯路，可以比苏联搞得快点，快点。

在经过对农业、工业将近半年的调查与研究后，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的十大关系，在经济关系中最重要就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他提出的工农业并举思想，即是鉴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他在考虑了农业问题之后，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的。《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随即成为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发展了《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他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

---

<sup>①</sup> 见1956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提纲；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辉煌成果。

(二)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到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前是探索的失误时期。

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中断了1955年底开始的探索。毛泽东把主要精力又转到阶级斗争方面。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仅使党对社会主义阶段发展规律的认识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使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脱离了正常轨道。“左”倾思想由指导国家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工作。毛泽东对此以前的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这次失误是从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开始的。1955年底和1956年初，有些部门和地方不顾实际可能，盲目地增加预算投资，扩大基建规模，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困难。周恩来、陈云发现问题后，建议中央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6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传了这个思想。党的八大会议也贯彻了这个精神。这对于保证1957年的经济建设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毛泽东对于提出反冒进是有保留的。在1956年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主张追加基建预算投资，《人民日报》那篇社论，他批示“不看了”。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之后，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给“右派分子”提供了口实。在这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批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等，是“右倾”、“促退”。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搞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这属于政治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在这年3月成都会议上和5月八大二次

会议上,他继续对反冒进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激烈地批评反冒进?他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打仗可以发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群众可以发动得更充分,“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sup>①</sup>。在他看来,冒进是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费。他主张前者,反对后者,甚至提出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sup>②</sup>。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带有浓厚的“左”的色调,8月的北戴河会议把“左”的思想推向了高峰。这次会后,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象两股潮水似地涌向全国。整个国家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经济工作完全乱了套。

历史就是这样地捉弄人。毛泽东从主观上说,是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1958年10月2日,他接见东欧六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世界上就有这么蠢的人,象我和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就不知道以钢为纲。今年我们才知道这一条。你把钢铁搞起来,其他东西都可以跟上来。1959年4月20日,他对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说:现在已经打开一条道路,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建设一年一年地好起来。但是,实践证明,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化这样的探索,既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大跃进”的许多成就是虚幻的,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变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

---

① 1958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② 见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三)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是对探索失误初步纠正的时期。

一方面,毛泽东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的“始作俑者”;另一方面,这两个运动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也是他最早提出纠正的。他提议并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等,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承认从1958年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党内的主要倾向还是‘左’”。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说“中央可以不讲,我个人可以讲,我一讲,我就没有包袱了。”

毛泽东承认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当然只是就具体工作而言,并不认为根本指导思想错了。在他看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动摇的。因而,他对错误的纠正是很不彻底的。正因为这样,当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从指导方针上提出反“左”问题,要求从根本上总结教训时,他认为这是比反冒进更严重的错误,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于是不惜冒犯众怒,挺身而出“反击”,从而中断了反“左”的进程。尽管如次,“大跃进”的教训对毛泽东是深刻的。60年代,他对经济工作的指导,再没有重犯这类错误。

毛泽东在纠正他觉察到的错误的过程中,开始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多次号召各级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他们“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sup>①</sup>。在这次会议上,他亲

<sup>①</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3页。

自和与会同志一起,认真地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武昌会议期间,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因此,他再次要求与会同志读那几本书。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庐山会议开始时,他还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会议的首要内容。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应当好好读书,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下来。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但是在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后,他中断了这个安排。到1959年冬天,才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本人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用了2个月时间对“政治经济学”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讨论,初步地总结了他所认识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了这样长的时间集中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他的许多认识还受着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有许多观点是不正确的,但这次读书毕竟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反思,对于他后来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重要影响。

(四)1961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到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是继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期。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和新的“跃进”运动的开展,使在此之前得到一定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以更猛烈之势重新蔓延开来。“大跃进”三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国民经济出现了极度困难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承认，客观规律，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sup>①</sup>。

为了扭转困难形势，党中央在1960年底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1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尽管当时仍没认识到三年受惩罚，是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但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端正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的问题。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指出：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实事求是年。在随后3月的广州会议上，他再次指出：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以后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

这年春天，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他还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恭谨勤劳地开展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使党的领导作风来一个根本转变。在毛泽东对农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和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推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由党中央主持，分别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这些工作条例草案，尽管存

---

<sup>①</sup> 见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把党的工作重新纳入较为正确的轨道,使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有了重要保证。这些工作条例草案,实际上是我们党所探索到的进行上述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第一批工作“法典”。

经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理论的反思,毛泽东对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苦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他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搞几年慢腾腾的。这对我们有利,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在这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说: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他提出,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就是全党全面总结经验的干部大会。毛泽东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问题。他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在这篇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所得到的基本经验。

(五)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是毛泽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个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探索接近尾声的时期。

八届十中全会是毛泽东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又一个关节

点。他对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认识，使他在这次会后把主要注意力又转到抓阶级斗争上去了。这时期，他主要思考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方向问题。

但是，这不是说，毛泽东对经济工作完全不考虑了。他接受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冲击经济工作的教训，强调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不要干扰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工作。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之后，有的同志认为调整时期已经结束、提出要进行大发展时，他同意陈云等领导人的意见，决定调整时期从1963年起再延长三年，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些正确的决策，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圆满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复苏和走向繁荣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也在思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问题。鉴于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有了飞快发展，毛泽东也强调要学习先进技术。1964年2月，他接见钱学森等科学家说，要搞少数人专门研究防弹道式导弹，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这年10月，他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指出：有可能再有十年，不仅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这年12月，在修改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他还明确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sup>①</sup>

同时，毛泽东也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除了学习先进技术以外，还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

---

<sup>①</sup>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9页。

极性、创造性。还在读《政治经济学》时，他就提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思想，邓小平最近还强调了思想。但毛泽东在应用上却欠妥当。他在听到大庆、大寨艰苦创业的事迹汇报以后，在1964年发出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把这当成是适合中国情况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但是实践证明，除大庆提供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某些先进经验外，其他的经验不够成熟，不太科学，甚至还带有许多“左”的色彩。

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断升级，毛泽东在1966年6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也就基本结束了。

## 二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想的基本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到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思想，作过系统的、深刻的阐述。这些思想是党花了巨大的历史代价换来的，凝聚着全党的心血和智慧，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在内。本文着重就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道路的一些基本正确的重要思想作些介绍和分析。

(一)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创造民主的、安定的政治环境。

毛泽东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注意到了对于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要加以分析，在解决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矛盾时，提出了要划清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区分敌人和自己人，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思想；但是从全社会的范围内，明确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

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思想却是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政治矛盾实际上分为“两类三层”：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人民内部矛盾又分为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两个层次。建国头3年，解决民主革命的重大政治遗留问题（如剿匪、反霸、没收地主土地、镇压反革命），多属于敌我矛盾范围。搞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际上是解决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两个层次。因为在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已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已使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际上是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实践。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一方面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由阶级斗争转向自然斗争的新时期；另一方面也使不具有阶级斗争意义的其他许多矛盾，主要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了。能否正确处理这个层次的矛盾比能否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劳动人民，无论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既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力量，又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直接依靠力量。能否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关系到国家能否稳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同时，苏共二十大以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动乱，也使毛泽东感到，能否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命运的大问题；在历史处于转变的关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这个转变，因此，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理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

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个理论的提出，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主观愿望上，确实希望造成一个民主集中、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方面，他也确实做了很大努力，使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了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形势。但是，由于他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党内不同意见的错误分析，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撇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些在根本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不论，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言，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违背了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受到了巨大损害。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兴旺发达，反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受挫折，走弯路。这条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 （二）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过的但没能坚持实践的又一个重要思想。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已指出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在这年6月，他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张澜的信中，还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sup>①</sup>在提出过渡时期

---

<sup>①</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23页。

总路线的任务后，他在 1955 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后，他在 1956 年 1 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于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他同意八大决议提出的，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也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1958 年 1 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指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在这年 8 月的成都会议上，他补充说：要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南宁会议上只提了技术革命，现在再加上文化革命，就完善了。随后，在 5 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被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任务。这年 12 月，他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还说：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新的革命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在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之后，1959 年 10 月，他接见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还说：过去十年内，革命同建设同时进行，头八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他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抓阶级斗争之后，1963 年 12 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指出：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是提高生产力。

从以上部分论列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要不在理论上。从政治方面看，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第一，实现工作重

点转移的决心不坚定。从上述论列可以看到，他在1956年以后就反复了3次：一是在1957年夏天将反右斗争扩大化，并在这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正确的论断；二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并把这个斗争引向全国，冲击了当时的经济工作；三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抓了一段经济建设的恢复和调整，但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把主要注意力转到抓阶级斗争了，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在建国后，他领导全党的27年间，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的时间就很有有限了。仅此一点，对于一个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严重错误。第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路线不正确。这主要指1958年这一段。这期间，他是全力以赴抓经济工作。在1月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时，他明确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他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各级干部适应这个转变。它的主要内容也是围绕抓经济工作的。但是，由于他不断地对反冒进问题的错误批判，结果自食苦果。他自遵义会议领导全党以来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批掉了。他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我们国家的这一教训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都说明，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对于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还仅仅是走了第一步；能否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不仅在于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且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有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这个思想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它概括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鉴于

有的东欧国家按照苏联模式，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损害了人民利益的教训，1957年4月，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建设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sup>①</sup>。

1958年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使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毛泽东在纠正这个错误的过程中，在庐山会议前期总结教训时，提出了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在这年底到翌年初，他读“政治经济学”时，对这个思想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这就澄清了对“农、轻、重”提法的误解，对“并举”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解释。他还比较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这个比较，具体说明了中国道路的优点和特点。

---

<sup>①</sup> 见1957年4月25日毛泽东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的谈话。

在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是毛泽东对他本人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过去提出的思想的新概括。

毛泽东关于工农业关系的思想，是他探索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思想，至今仍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

（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这是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过程中提出的。他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观点，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加一个‘社会主义’”，以便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他明确地说：“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强调说：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毛泽东的这些观点，虽然是从斯大林那里引发出来的，但比斯大林讲的明确、坚定。

毛泽东还进一步阐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第二次郑州会议

上,他说: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还说: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在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他批评“共产风”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矛盾,一个大问题。”

为了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缓和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提议对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这一级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他还提议,这次郑州会议拟定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要加上价值法则的内容。后来文件中写上了“物资劳动,等价交换”一语<sup>①</sup>。这次会后,他了解到广大农民普遍要求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所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帐目的情况,在3月下旬的上海会议期间,他进一步指出: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于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现在的观点看,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也犯了错误,但是经过这次总结教训后,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基本上坚持了上述观点。1959年底1960年初,他读“政治经济学”时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

---

<sup>①</sup> 这个方针的完整提法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个概括，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的理论总结。

（五）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在毛泽东讲的几大经济关系中，除了工业与农业两个产业是最大的关系外，就是最重要的关系了。这个关系，一方面在经济关系，属于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属于上层建筑范围。鉴于苏联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把地方卡得很死造成的许多弊端，毛泽东认为，象中国这样幅员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利。但是，建国后的经济管理体制，很大部分是因袭苏联的。因此，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工业、财政、商业管理体制实行部分权力下放。

虽然在1958年“大跃进”中，一度权力下放过多，出现过分散主义倾向，但随后迅即得到了纠正。在读《政治经济学》总结教训时，毛泽东认为，中央管得多，统得死，这是我们国家管理体制中的主要倾向，因此，仍然要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他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那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他还把我国同欧洲相比较来强调这个问题，指出：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

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踏踏，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他主张既统一，又分权；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套。1960年3月，他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要把我们这个国家看成“联合国”，一个省就是一个“国”，我们中国是个“联合国”。这以后，中央和地方关系虽然几经调整，但地方的自主权仍较少。因此，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问题写信给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地方自主权。他说：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这里虽然是就一个部门的问题而言的，但提出的分成原则有普遍意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与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相联系，毛泽东还强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这也涉及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关系问题。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他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一长制毫无疑问是不要了，不过形式上的决议案还没有通过。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谓独立自主到如何程度，请你们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应该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随便这么讲，不是很正确的语言，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就是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有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没有一点“独立王国”，那么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的，请大家研究。在这里，毛泽东对一长制的批评，被实践证明是不对

的。但是，暂且撇开这点，他在近 30 年前就提出企业自主权，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来研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把经济工作搞好，毛泽东还在探讨如何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问题。1964年1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托拉斯问题的汇报时，他表示赞同刘少奇关于建立托拉斯企业的设想。他说：目前这样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的人干什么？人要吃饭的，要消耗的，用那么多的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还指出：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打破省、专、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

毛泽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这些意见，虽然还有不妥当、不完善之处，但它说明毛泽东已经在叩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只是他随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堵塞了继续探索改革的道路，而且使国家的整个经济濒于危机。这是一个悲剧。

（六）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

毛泽东在 1957 年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后，就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特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除了依靠生产力本身的几个因素外，还必须使生产关系的变化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生产关系内部，所有制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在不断地变化。因此，他很注重通过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生产的发展。在他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提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与工人建立平等关系；要改革束缚群众积极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生产管理”。根据他的建

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这以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一度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虽然在某些方面有过不切实际的要求和形式主义的缺点等。

毛泽东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对探索道路进行理论反思时,进一步强调了建立平等关系、改善企业管理的问题,强调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他说: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合作。还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有的企业,集体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他对国营企业在解放后十年间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了总结,指出: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对企业的管理,采取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1960年3月,毛泽东在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的批示中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问题后,我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陆续试行这种管理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地肯定了这个制度,并且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以后,它就成为了我国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

这个制度是毛泽东在改革我国沿用的苏联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提出的,自然带有探索的性质。就其体现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个指导思想来说,这个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对于管理现

代化的企业来说,这个制度是不完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的企业管理制度作了许多重大的改变。

(七)实现四个现代化,在50年至100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求索的目标。在1953年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以后,根据毛泽东在修改、审定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的意见,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说法,主要体现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增加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时,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从1964年底1965年初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起,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了我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根本任务。

实现这个任务是项极为艰巨的工程。毛泽东考虑到它的艰巨性,在时间的估计上,曾作过多种设想。例如,在1955年3月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在这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可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56年9月,他在接见参加八大会议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又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须要五十年至一百年的时光。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一度将时间的估计提前了许多。但经过困难时期以后,他不仅回

复到了原来的估计，还认为可能更长一些。1961年9月，他同蒙哥马利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他继续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在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后，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时，为了实现四化任务，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随后，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远景规划的宏伟蓝图。十二大关于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规划，以及随后所讲的关于在建国一百周年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设想，正是根据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同时考虑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上述估计和规划而提出的。

上述七点，只是围绕着经济建设问题所列举的比较正确或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这既不是毛泽东的全部经济思想，也不是说这些思想都是完全正确的。提出这些，只是为了便于说明党的某些探索思想的历史发展，丝毫没有要掩饰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之意。在文中，笔者已多次指出他在探索过程中的一些严重失误，以及他的一些有严重错误的理论观点。后面还将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分析，因此，这里就不再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错误和实践错误集中起来一一论列了。

### 三

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的探索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并继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时期的探索，从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借鉴和沿用建国后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从吸取毛泽东的一些正确探索思想等来说，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探索的继承。但是，若从其真正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变，否定了毛泽东的错误的理论和过去的许多不符合实际的错误政策，改变了不少传统观念，对一些历史经验作了新的概括等方面来看，则不仅对毛泽东的探索思想有重大发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作了重大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丰富的经验。毛泽东生前十分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能象在民主革命阶段一样，对中国的新经验有所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发展。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作了初步总结之后，1958年3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那很危险。这年5月，他还指出：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人。十月革命是列宁做的，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马克思也没有做过。“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1959年底1960年初，他读《政治经济学》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

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在列举俄国党和中国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以后，指出：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到了60年代，毛泽东已入古稀之龄，一方面感到人老体衰、精力不济；另一方面，想总结经验，写出新著作的雄心未灭。1964年3月，他对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毛选”时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老了，精神不够了。这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继续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指《毛选》——引者），我很惭愧，都是些古董了。要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毛泽东本人未能实现他提出的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担当起了这个光荣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是多层次、多侧面的。从宏观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把原来基本正确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向前推进所作的发展。例如，十二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的理论，1986年提出的关于党内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它们不是在否定过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恰恰相反，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把过去的理论向前推进了。前者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后者达到了新的理论深度。

另一类是通过否定过去的许多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而作出的发展。这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突破了以往的传统观念，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而对社会的震动更大，理论意义更为深远。这里着重谈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探索，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的几个重要突破，

也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的某些理论观点的重要发展。

### (一)多种经济成份,即多种所有制形式。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被认为是单一的公有制社会。在1958年刮“共产风”时,还出现了急于由集体与全民两种所有制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倾向,以为越是单一、纯粹,社会主义的“品位”就越高。撇开这种特殊时期的幼稚病不言,根据传统观念,社会主义也只存在全民与集体两种形式的公有制,不允许私有制存在。党的领导人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曾经对这个问题考虑有所放宽。例如,周恩来提出,可以保留小量的私有制作为第三种所有制。陈云提出,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12月同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时也说过: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只搞两年退却就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工人250万,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设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到了1964年1月,他还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

毛泽东等人的这些思想,从现在的眼光看,无疑也是开明的。但是,它主要被当作个别、特殊问题看待,没被当作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来思索;更多地表现了政策观念的灵活性,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后,我们国家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党中央对这种多维的经济结构作了理论概括,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的新概念,认为我们国家现在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具有多种经济成分、即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公有制的国营

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外，还存在着公私合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人经济和私人经济(包括外商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形式。这种多维结构，与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同的。因为在那时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全国占绝对优势；个人经济和私人经济主要不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它的必要补充而存在，而是按其自发趋势在发展。

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概念的提出，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列宁、斯大林提出集体所有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念的首次突破，那么，包括允许私有制存在、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提出，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又一次重要突破。这种突破不是主观随意的。从主观愿望来说，虔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更希望维护传统的观念。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不仅在中国，还有许多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共同地提出了多种所有制问题。实践要求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只有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改变一些与现阶段实际不相符合的固定观念，扩大自己的外延，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对某些传统观念的改变，不仅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恰恰相反，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血液，赋予了强大的活力。

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但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处于分散形式的、规模不大的私营经济带来的问题，不可能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

## (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与提出集体所有制相联系，列宁、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货币，已经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观念。但是，这种突破也受到了当时历史的局限。例如，斯大林认为生产

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作用。就毛泽东来说，一方面，他比斯大林的观点前进了，认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价值规律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他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仍然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框子，把它们同计划经济规律的作用相对立。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他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调节，即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不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内容。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还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营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象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毛泽东的这段话，在政治上，是为他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作辩护；从经济观点看，则反映了他对价值规律作用的认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错误观念才被纠正。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研究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之后，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它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固有的本质属性，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论述。

理论观点上的这一飞跃，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会发生巨大影响;而且为那些原来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现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将另辟蹊径。

### (三)共同富裕与先后富裕。

在全社会范围内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同坚持公有制一样,坚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同把社会主义设想为只是单一的公有制社会,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哪一种更符合实际一样,对共同富裕原则也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即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共同富裕被简单地视为“均富”,即完全平均,同步富裕,反对扩大差别,反对“冒尖”。其实,这是粗俗的平均主义思想,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按照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差别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差别、完全平均的社会,就是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这样。共产党人的主张是承认差别,缩小差别;由承认差别到缩小差别,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共产党人的责任,只能按照客观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努力缩短这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取消这个历史过程。如果不是这样,共同富裕就会成为共同贫穷的代名词。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清醒的。1958年刮“共产风”时,他曾视“吃饭不要钱”、“供给制”等等为共产主义因素。他很憧憬三国时代张鲁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并用来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的平均主义措施作历史论证。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

搞。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在随后武昌会议期间，他对陈寿著《三国志·张鲁传》写过两段批语。一个是流传较广的1958年12月10日批注，讲中国的农民革命斗争是部阶级斗争史，其中也提到张鲁“置义舍”、“吃饭不要钱”等等。但在这之前的12月7日，他还写过一段话，对张鲁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大加赞赏。他写道：这里（指《张鲁传》——引者）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象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民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这段批注，毛泽东当即涂掉了，一方面说明他并不坚持、也没有要大肆宣传这些思想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曾经是他思想的一个兴奋点，作为研究资料（也仅仅如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维轨迹。

当然，毛泽东并不主张回到张鲁时代去。在纠正“共产风”时，他对于“一平二调”是坚决反对的，已如前述。但是，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反对“共产风”；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可太富，甚至认为“穷”（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比富好，对富裕之后存在着忧虑。1956年2月，他听取工业汇报讲到“一穷二白”时，就曾表示过，农民要富，但不可太富。土地国有了，拖拉机、抽水机，大型的应当国家掌握，不能交给农民。1959年底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认为外国评论讲的“穷是跃进的动力”这句话很对，说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讲到劳动报酬时，还说：报酬以不死

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不好；在我国土改以后，农民不敢“冒尖”，以穷为荣，以富为过，这是一个好现象。到了晚年，他的这种思想发展得更加严重。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就其“穷则思变”，要革命、要斗争而言，有其合理因素；但他对穷与富的看法，则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他的这种思想无疑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否定了这种错误观点，批判了平均主义思想，实行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依靠勤劳，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个政策，在实践上使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理论上对传统观念是一个重大突破。

部分先富裕政策（“部分先富”似比“部分富裕”的表述更能表现动态过程，它强调了富裕只是先后之别，而不将部分人的富裕凝固化。因此还是采用“部分先富”的提法。）并不否定共同富裕原则，而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原则所采取的具体步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看，它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体现。按劳分配原则首先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一部分社会成员由于技术高，劳动多，贡献大，取得更多的劳动报酬而先富起来，是这个原则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说，它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波浪式规律，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0 亿人口的大国，全体社会成员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共同富裕，只能经历由点到面、由部分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体质变这样一个不断扩大、逐步提高的过程。在我们国家，由于存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再加上实行正确的政策和其他措施，部分先富政策不会变成血与火的剥削制度赖以复生的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所作的突破,对毛泽东的探索思想所作的发展,这里不一一阐述了。从这里,人们不能不思索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从客观存在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考察社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使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是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飞跃。但是,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还是个实践问题。它不仅要求理论的科学性,还要求实践的科学性。

怎样的社会主义实践才是科学的呢?首先,必须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无疑的。但是,仅仅承认这一条是不够的。无论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都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也就是说,要使社会主义的实践成为科学的实践,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就是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在理论上承认这一点是容易的,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最早提出这个原则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坚持这个原则,先后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这个原则,在主观上也想坚持这个原则,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还由于受了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的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的束缚,没能探索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建设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摒弃了那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观念，才逐步确立了这一条正确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践，再次给人们以非常重要的启示：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有一个从原则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宏观体系、从基本理论原则来说，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但是从微观方面看，它的某些理论原则、观点或结论，并不一定都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正确概括。一切坚持从实际出发，一切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探索的基本经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实践。

（原载《党史研究》1986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作者对一处词语做了删节）

## 乌托邦荒原：“三面红旗”剖析

胡长水

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插遍全国。人们的目标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探索和开辟一条到达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请看，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做了如下描述：

“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要分配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sup>①</sup>

共产主义是那样强烈地感召着人们，人民，也沉浸在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憧憬之中：“总路线是灯塔，共产主义开了花，水利化、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麦克风前来讲话。”<sup>②</sup>

---

①②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10—111页，91页。

这样的前景不可谓不美好。但是，当时人们有没有开辟一条到达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呢？让我们追寻一下当年探索者的足迹。

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是当时考虑的问题之一。中共中央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课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sup>①</sup> 这次会议通过的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力。正如《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的：“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象一根红线，贯彻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sup>②</sup>

强调速度，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是不是把速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如果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地追求高速度，这种高速度只能是一种幻想。失误正是出现在这里。中共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谈到速度时，强调的是中国经济落后，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只有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而恰恰忽略了对客观条件的分析。不仅如此，《人民日报》还在社论中对“条件论”大张挞伐。社论声称：“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sup>③</sup> 把经济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人的“胆”，人的主观意志，这是赤裸裸的唯意志论，唯心论。如果这样的语言仅仅是某些群众所有，人们也许只会一笑了之。而现在居然被中共中央的“喉舌”，最权威的报纸所宣传，说明全国上下已

---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27页。

② 《力争高速度》，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

③ 《年底算帐派输定了》，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笼罩在唯心主义的氛围之中了。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先是农业上的大跃进。小麦、棉花、花生、水稻的高产卫星，一个个“腾空而起”（人民日报语）。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早稻亩产达到了36900多斤，花生亩产达到1万多斤。于是，《人民日报》欢呼：“这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事迹来。”<sup>①</sup>不仅如此，山西洪赵县委还向中央写了个“就实论虚”的报告，提出，小麦亩产究竟可以达到多少？他们以社员的口气说：“我们可以改良小麦的习性，比如使它和谷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八寸到一尺长，每穗结籽500粒，每亩如果是250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斤，再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麦粒象石榴子那样的大，产量就无法计量”。这实在是一种神话。然而，他们称赞道：“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农民，有了这种海阔天空的想象，现加上冲天的干劲，这些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海阔天空的想象加冲天的干劲就等于现实，这真是一种神奇的逻辑。然而，中央却对这个报告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时指出：“山西省洪赵县委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很好，特转发各地参考，希望运用这一方法总结各项作物的经验。原报告可以在报上发表”<sup>②</sup>。结果，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的浮夸风到处泛滥。

继之而起的是全民大办钢铁。因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因此，必须要有一个钢铁生产的“飞跃发展”<sup>③</sup>。于是，1958年8月

---

① 《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② 以上引文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50—54页。

③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把原定的钢铁生产的指标一提再提，“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sup>①</sup>。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乘着农业大跃进的势头，全国上下几千万人一哄而上，掀起全民大办钢铁运动。河南省9月上旬，“每天平均只产铁780吨，而九月十五日的日产量就跳到18693吨”。“河南省创造这个奇迹的主要经验，就是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个有160万人参加的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河北省武安县则组织了12万人的钢铁大军。《人民日报》驳斥那种认为建设具有高度科学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必须要正规化的看法说，我们需要的正规化，“必须是革命的正规化。……通过群众运动来办工业，这就是我们的正规化。”<sup>②</sup>结果，在这种“正规化”群众运动中遍地开花的“土高炉”，炼出的铁却大部分不合格。自然，“1070万吨钢”的指标无法实现。

这种大跃进能使生产力极大地提高，能使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吗？能开辟一条到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吗？事实已经证明，它仅仅是一种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海阔天空般的想象而已。

人民公社产生于大跃进的高潮中。然而，要把广大农民变成一种彻底摆脱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新农民的思想，却是毛泽东这位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共产主义者一直萦绕于怀的。毛泽东多次回忆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sup>③</sup>。“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正是毛泽东寻求

---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② 以上引文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

③ 见《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页。

的彻底解放农民,把农民变成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同月,党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sup>①</sup>。

正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这一思想,全国很快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从七月份开始发展,八月份普遍规划、试办,九月份进入全面高潮,高潮时期前后仅一个多月”<sup>②</sup>。到1958年9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8%。和高级社相比,人民公社的公有化程度的确大大提高。人民公社一般由数十个高级社合并而成,平均每社拥有四五千农户,比高级社扩大近30倍。《红旗》杂志刊登的《楂岬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sup>③</sup>。当时,党中央并没有制定公社章程,于是,党中央主办的《红旗》上的楂岬山公社章程无疑成了人们仿效的榜样。高级社的财产完全无偿转归公社所有,劳动力和产品由公社统一调配,公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共产风”开始在公社内刮了起来。与所有制相联系的当然是分配制度。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形式,而供给制更成了人们向往的“共产主义因素”,成为生活中的“大部

<sup>①②</sup>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72页,184页。

<sup>③</sup> 见《红旗》1958年第7期。

分”。“很多公社,今年(指1958年)已不分现粮,实行以人定粮,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吃饭不要钱。少数社已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全由公社包干供应”<sup>①</sup>。当时实行“共产主义”的典型河北徐水县,甚至实行“全民供给制”。在当时物质匮乏,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这种分配方式只能是一种粗陋的平均主义。但是,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却把它看成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加以肯定。毛泽东多次赞扬这种供给制,说,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他还说,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sup>②</sup>。刘少奇在视察人民公社时对供给制也颇有兴趣。他表示,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不是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积极了,这就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sup>③</sup>。

在毛泽东看来,以至当时的许多共产党人看来,公有制规模的大大提高,吃饭不要钱的分配制度,似乎不但消灭了私有制,而且也消灭了等级制、特权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如此,美好、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快要降临到人间了吗?中共中央的北戴河决议兴奋地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sup>④</sup>。于是,人们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河北徐水县是跑步过渡的典型。山东的范县,也于1958年10月28日在万人大会上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具体规划送到中央,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

---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86页。

② 见《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第26页。

③④ 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65页,72页。

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他还派人前去察看，可见是有兴趣的。其后，毛泽东还表示，即使我们已经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也应当由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不然苏联脸上无光。如果我们先进入怎么办？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sup>①</sup>。然而，人民公社并没有把人民引入天堂，相反，却很快给人民带来了普遍的不满和贫穷。这一点，毛泽东也很快有了觉察。在1959年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地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sup>②</sup>人祸加上天灾，终于导致了三年严酷经济困难。安徽、河南等地，一度出现了严重的饿死人现象。在严重的现实面前，大跃进被迫停止，人民公社被迫调整。

显然，依靠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更不能到达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此外，在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等也十分注意的，就是突出政治挂帅，突出阶级斗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表示：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方法。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这是列宁的方法<sup>③</sup>。于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热潮中，中央“不失

---

① 见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②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41—142页。

③ 见《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6页。

时机”地作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致‘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sup>①</sup>。河南省委总结建立人民公社的经验是：“在建立公社过程中，普遍开展了大鸣大放辩论，……继续深入地揭发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杨珏反对公社，鼓励发展私有的恶果，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鼓足了革命干劲”。他们还认为：“在建立公社过程中，表现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地、富、反、坏趁机造谣破坏”。因此，“要深入地在党内外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sup>②</sup>。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人民公社运动简报》中也总结道：“据各地反映，凡是抓紧了政治挂帅，在处理各项经济问题时，都做到又快、又好、又顺利”。反之，则“纠缠不清”，“影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sup>③</sup>。然而，历史也已经证明，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可以让人三缄其口，可以打倒一些人，但是却并不能使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也不能使那些空想的方案变为现实。

说“三面红旗”是一次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未免让人可叹。站在今天认识的高度去讥笑前人，只能是一种浅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理解当年探索者的艰辛，寻求人类在前进途程中的思维轨迹。

## 二

和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三面红旗”是在完全不同的

---

<sup>①②③</sup>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73—74页,91—92页,85—86页。

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虽然二者都表现为空想，但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很难说它们有多少相同之点。“三面红旗”作为马克思主义问世后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更多地表现了它的特殊性。

“三面红旗”明显地带有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特征。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中共中央号召广大干部学习的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书中系统辑录了革命导师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和设想。河北徐水县这个“共产主义试点”的典型，纯粹是热昏了头的空想试验。然而，当时中央派去试点的人是带着《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应该尊重马恩的思想，问题在于要有正确的态度。众所周知，马恩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而且，他们是依据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规律逻辑地推导出未来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他们自己并没有经过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经历的实践也极其有限，因而他们的某些论述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想的因素，关于商品生产，关于国家政权的消亡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论述。因此，这里的正确态度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囿于某些具体的结论。否则，自以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结果却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三面红旗”就具有这种悲剧性质。经验主义的表现，是把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神圣化，教条地搬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插话说，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信。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又反复指出，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的确，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但那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物质条件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作为维持生存和斗争的必需手段。在和平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作仍然是人们谋生的必要手段，再采用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必然会在群众中滋生消极懒惰的思想作风。战争和建设是不同的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教条地搬用成功的经验，导致的只能是失败。当时，许多地方还模仿人民解放军战争年代的做法，搞什么“组织军事化”等等，毛泽东也积极予以肯定，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sup>①</sup>。然而，这种“三化”带来的却是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大呼隆，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面红旗”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领导者在哲学世界观上表现了一种矛盾性。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观上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三面红旗”无疑也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当“三面红旗”开始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等一方面在总体上仍然坚持“三面红旗”的空想模式，一方面却提出了一些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人民公社的道路，一方面又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

---

<sup>①</sup> 见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基本原理”。“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sup>①</sup>。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的不断革命论和阶段论相结合，这些思想是很精彩的。对于平均主义，毛泽东一方面对它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又对它有所保留，有所批判。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对“平均主义倾向”和“共产风”提出了批评。后来，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又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实事求是年。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他又指出，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以后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对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又说，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人<sup>②</sup>。这些，无不说明当时人们在哲学世界观上的矛盾性。正是这种矛盾性，使得毛泽东等人一方面在总体上仍然坚持“三面红旗”的空想性，一方面又努力地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了这后一个条件，才能最终能走出乌托邦的荒原。

### 三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高高举起的，它深深打上了毛泽东的印记。毛泽东正是希望通过“三面红旗”，建设一个美好纯洁的理想社会。在1958年以后的几年中，毛泽东在频繁举行的中央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阐述他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如何建设

<sup>①</sup>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15页。

<sup>②</sup> 见《党史研究》1987年1期第14页。

这样的社会的主张，其思想是相当丰富的，形成了他晚年理想社会思想的基础轮廓。

毛泽东在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时，是注意遵循马恩和列宁的主张的。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及其后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都明确地把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全体人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三大差别的消灭，国家职能的消亡等，作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然而，透过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尤其是他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许多讲话，可以看到，毛泽东晚年理想社会中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平等观是贯彻毛泽东晚年理想社会思想的一条指导性线索。这种平等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政治上的反对等级制、特权制，经济上的均贫富、平均主义。在毛泽东看来，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表现，社会主义只有实现平等，才是真正消灭了资产阶级，才是共产主义美好纯洁的新天地。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对供给制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对薪金制十分厌恶。他在1958年的时候多次指出，我们有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结果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进城以后，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他发问道：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等级，分将、校、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薪金制、军衔制等于等级制等于资产阶级法权。于是他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要逐步废除薪金制、

军衔制。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并且和走资派理论联系起来。对产品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饭不要钱，他曾持热烈的肯定态度。他驳斥相反的观点说，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100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sup>①</sup>。正因如此，毛泽东对三国时代张鲁政权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十分欣赏，号召人们读《三国志·张鲁传》。三国时代的张鲁，曾在陕西汉中地区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在社会制度上实行某种程度的公有共享，各个基层组织设置“义舍”，“义舍”置“义米义肉”，“行路者量腹取足”，吃饭不要钱。张鲁政权存在近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赞扬说，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由来已久了<sup>②</sup>。虽然不久毛泽东就对平均主义有所保留和批判，但在思想深处，毛泽东一直是留恋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的。到“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工资制是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这种思想，和他大跃进时期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的平等观，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一切剥削压迫，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襟怀。他关于反对等级制，以及50年代初就提出的防止革命队伍中出现一个官僚特权阶层等思想，无疑有着合理的因素，值得共产党人永远铭记思考。然而问题在于，他把社会主义阶段一些必要的差别当成了资产阶级的不平等来加以批判。他所赞赏的平均主义，只能是一种小生产者的平等观。不错，平等，是无产阶级追求的目标。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

<sup>①</sup> 见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sup>②</sup> 见《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7页。

下,平等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要求。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平等,是人们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和分配上的机会平等。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以均贫富为特征的平均主义,只能是一种粗陋的社会主义空想。

如何实现理想社会呢?毛泽东突出强调的是“政治挂帅”。如前所述,毛泽东在领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是注重政治挂帅的。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只有政治挂帅,才能消灭资本主义思想,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谈到22年的平均主义并没有出懒汉时,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在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重申,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法仍然是政治挂帅。正是由于坚持政治挂帅,他在全国大跃进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不忘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不忘在思想上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他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也是他坚持政治挂帅的结果。当他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思想在实践中遭到人们抵制、反对的时候,他认为这些人是在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只有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实现他那伟大的政治目标。“三面红旗”时期,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看的十分严重,但他对阶级斗争一直是念念不忘的。1957年反右派后,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他又从理论上对阶级问题重新作了解释,认为,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又说,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

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作了一场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一场，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可不简单。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sup>①</sup>。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他已把阶级斗争作为政治挂帅的主要内容，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了阶级斗争上，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他对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很赞成，原因也在于此。

应该说，以政治挂帅乃至阶级斗争为方法，实现以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美好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毛泽东晚年理想社会思想的基本轮廓。显然，这是一个空想的模式。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形成毛泽东晚年理想社会思想的因素是什么？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无疑是毛泽东十分注重的。问题是，他在某些问题上囿于了马恩带有空想性的论断，在某些问题上又错误地理解了马恩的论述。这一点前已述及。除此以外，下列三个方面，是在毛泽东晚年理想社会思想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一是毛泽东早年的理想社会蓝图。毛泽东生在中国穷乡僻壤的农村，目睹中国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凄凉和悲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要把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打平的宏伟抱负。当五四前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广泛传播的时候，毛泽东是这一思潮的热烈拥护者。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但是毛泽东等一大批久已渴望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却把它们当成了救时的良方，希望一下子消灭一切强权，实现财产公有，人人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理想社会生活。1918年6月，他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计划在岳麓山下

---

<sup>①</sup>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爱的新村。为选择地点，他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村镇。因朋友中多数不能久在湖南，他亦有北京之行，故“事无成议”。1919年春，他又重新拟就了一个十分详尽周密的在岳麓山附近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将计划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即《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以实现“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然而，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使毛泽东很快放弃了这种企图一步登天的空想方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道路。经28年的年艰苦奋斗，毛泽东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并且开始了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近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毛泽东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人到老年的时候是最容易回忆往事的。青年时代的美好蓝图，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是无暇顾及的，而今正是实践多年夙愿的时候了。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当年毛泽东设想的新村计划和人民公社的蓝图，是很有意思的。在《学生之工作》中，毛泽东描绘道：“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工、农、商、学都有了。这些，和人民公社，和“五·七指示”的规划，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难怪毛泽东1958年到河北、河南农村视察时，对幼儿园、幸福院、食堂、医院都表现了很大的兴趣，每到一地，总是和幸福院的老人们“亲切地握手致意”<sup>①</sup>。

二是对资本主义的盲目、片面的批判态度。这一现象，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中是表现得相当鲜明的。他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

---

<sup>①</sup> 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56页。

的斗争看作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把等级制、工资制都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因而要破除；他认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如此等等。对资本主义这种批判态度，并非毛泽东一人所有，在早期共产党人中是普遍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关。向西方学习，曾经是中国人民的救国方案。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惊醒了中国人民，“工业先进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sup>①</sup>。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文中，对资产阶级作了较为恰如其份的估计。问题在于，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把许多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但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的现象，统统当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力所造成的物质条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毛泽东却片面地赞扬“一穷二白”，甚至认为“富变修”。他对商品生产并不否定，但仍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加以限制”。正是这些错误的理解，导致了政治挂帅中的无限上纲，阶级斗争扩大化。

三是毛泽东的宏伟气魄和浪漫主义的诗人品格。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他善于从全局，从宏观上把握现在，予测未来。当他遵循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时，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一旦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魄力越大，就愈容易陷入空想。他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所谓大乱达到大治，以及后来的七、八年又来一次等等，无不与他的气魄有关。毛泽东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郭沫若曾称他“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sup>②</sup>。“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云横

<sup>①</sup> 《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3页。

<sup>②</sup> 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3期。

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纯粹地把毛泽东这些诗句作为艺术来欣赏，人们不能不为他那极富浪漫色彩的想象而赞叹不已，浮想联翩。然而把这些写于1959年的诗句和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却使人感到，这正是毛泽东正在付诸实践的政治理想。浪漫主义的诗人品格，为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方案更加涂上了一层理想化的色彩。在这里，毛泽东的个性、品格，的确是在他的政治理想中起作用的一个因素。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sup>①</sup>。只不过毛泽东的情感力量更加突出罢了。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有过他辉煌壮丽的时代，也走过了让人扼腕叹息的途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 第三编



# 1949—1976：中国 意识形态的反思

李泽厚

1949年的胜利，使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成为万众信服举世钦佩的社会统治意识和国家指导思想。宣传、阐释、学习毛泽东思想成了近30年来的中国大陆思想的主题。以致有人嘲讽说，只有毛泽东思想，几亿人都都不必思想了。而林彪后来就正是这样要求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49年的胜利，的确带来了一个新中国。一个不再受百年来的各个帝国主义欺压的独立的国家，1949年炮击长江中的英国军舰，50年代出击美国于朝鲜，60年代初又彻底与苏联决裂，确实证明中国已不再可轻侮。1949年的胜利也带来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国，自北京到边境，从黑龙江到西藏，中央的指示令行禁止，级级奉行，畅通无阻；不再是50年来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了。1949年的胜利还带来了一个社会平等的中国，地主、官僚被彻底打倒，工农劳动阶级扬眉吐气，经济收入、财产分配、社会地位、政治待遇甚至在称呼、礼节等等各方面，广大人民空前地相对平等。这些都标志着50年代初“解放”一词带来的社会含义：经济恢复，政治清明，秩序稳定，人民团结，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平显著提高。这是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开国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经由一场荡涤旧社会、打倒剥削者的革命之后带来的新鲜气象的

胜利时期。

可是，这一切并没有继续长久。曾几何时，大体在累积了数年之后，而以1957年为转折点，整个社会就逐渐陷于紧张、痛苦、匮乏、沉默、贫穷以至到最后的“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

这一切又是如何可能的？这与理论有何关系呢？

本来，在抗战中，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基础的中共纲领是明确提出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这个“新民主主义”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它在经济上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适当发展，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政治上“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文化上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总之，不是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sup>①</sup>。

1949年以后党内继续有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主张，但被毛泽东坚决否定了。当时强调向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学习，中国革命于是很快就迈上第二步即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即“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不断地批判“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sup>②</sup>

---

<sup>①</sup>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当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提法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见《毛泽东选集》（单行本）第2卷，1966年版第626、644页。——编者注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

毛泽东本是批判“左”倾错误率领全党取得胜利的；至此，他却不断批判“右倾”，率领全党陷入了严重错误。

反“左”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分析了左倾思想的社会阶级根源及其在革命中的政治、组织、思想上的具体表现而得出的基本符合事实的客观论断；反右则是从主观的革命要求、意志、观念、理想出发，并没有真正具体的材料事实足够证明“右”的存在。

毛泽东说：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要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有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sup>①</sup>

可见，论证主要是建筑在所谓“不断变动”这种抽象的哲学观念之上的，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至少自1953年起，毛泽东就特别重视这种所谓不断的变动、革命和斗争。本来，按毛自己的规划设想，社会主义的农业手工业改造（即农业合作运动）和私营工商业改造（即从公私合营到收归国有）应该与“国家工业化”并行，至早在15年之内完成。但是，不到三年，这种“改造”却提前超额地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则不过刚刚起步。

为什么会这么快？这种历史性的变动（社会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改变等等）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么？当时，哲学界曾发生过“生产关系是否跑到生产力前面”的疑问和讨论，即在如此落后的生产力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

(农业小生产)基础上如何可能有如此高度公有化的生产关系的农业高级生产合作社(以及不久以后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呢?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唯物史观吗?

这在当年没有允许真正展开讨论。答案已经事先拟定:

“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sup>①</sup>

于是在亿万农民和全国农村中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原定1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样“突击”式的完成的。而所谓要同时“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却不但两三年而且15年后也并未在广大农村出现。那么,这个农业合作化的著名高潮以及以后的“坚持”“巩固”又是如何可能的呢?毛泽东说: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和政治的保证。”<sup>②</sup>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3—244页。

毛泽东建国后的确用了很大力量去抓他非常熟悉的农村，他抓的主要是生产关系上的不断革命：即由私有制不断过渡到由低级到高级的公有制。而作为这种“过渡”的动力则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于是，这种“斗争”本身便成了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保证”。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毛不断批判“右倾”和“右倾机会主义”，并掀起群众运动，以此来发动、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实现整个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所谓批判右倾，按毛泽东的规范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基本上构成了1949年后毛泽东所提出所坚持所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的主线。它首先表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以后又扩及整个经济领域，同时更表现在从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到反右派运动到所谓“红”“专”辩论等等意识形态领域中。毛泽东最感兴趣和最关注的是农业和意识形态两大领域<sup>①</sup>，正是在这两大领域内，从建国以来，折腾得最多，最热闹，也最痛苦。毛泽东在这两个领域中所坚持贯彻的便是这种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后毛便把这一“斗争”模式扩及全面工作和几乎所有领域：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sup>②</sup>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

---

<sup>①</sup> “毛似乎是在当代最关心教育的政治领袖”，“毛关于教育的许多观念甚至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有了”。(E. C. Pischel, 见 Pick Wilson 编《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第172页, 151页。)参阅《青年毛泽东》。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sup>①</sup>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sup>②</sup>。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sup>③</sup>

……

《毛泽东选集》第5卷收的是1949年建国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专门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在这方面不很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这种推演又正是从他所熟练运用的军事——政治思维来进行的。毛主要从政治角度来讨论、研究、规范经济,而这亦即是毛在50年代就提出来的“政治挂帅”。毛经常强调的是:

“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sup>④</sup>

所以,不是经济、更不是科技决定思想和政治,而必须是思想、政治“挂帅”去决定、主宰、领导经济、科技以及其他一切。

毛的这种思想的来源,正是1949年前的战争经验。例如: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知道是

---

①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

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月)。

③ 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④ 《工作方法(草案)》(1958年1月)。

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sup>①</sup>

“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sup>②</sup>

.....

由于强调政治挂帅、阶级觉悟，强调“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而“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又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两军对战，于是弥漫在政治、经济而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无论从文艺到哲学，还是从日常生活到思想、情感、灵魂，都日益为这种“两军对战”的模式所规范和统治。例如，哲学上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军对战”；历史上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两军对战”；文艺上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两军对战”；“百家争鸣”实际也是两家<sup>③</sup>.....至今为止，与军事毫无关系的日常生活和书面语言中，便仍然充满了“战役”“战略”“制高点”“突击”“突破口”.....等等军事术语。

但是，为什么 1949 年建国以后就应该立刻向社会主义过渡呢？为什么自此以后就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呢？为什么即使在合作化全面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全面斗争呢？为什么千百年来根深蒂固无孔不入的封建主义，反而不必去斗争了呢？.....

并没有多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客观论述，有的只是这种哲学推演：整个宇宙、世界、社会既然是靠矛盾、斗争来推动和发展，那么地主阶级消灭了，“理所当然”地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两军对战”来作为社会前进的动力，这好象是从毛泽东所理

<sup>①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 63 页，1144 页。

<sup>③</sup>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09 页。

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辩证唯物论所必然推论出来的结论。而且既有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是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后强制进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作为范本，又有在长期军事斗争中所积累的“两军对战”的观念、习惯以至感情，就似乎更证明着上述理论的正确，这正是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理论为人们所接受甚至信服的一些基本原因。

但是，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不少人也写了不少阐述文章，很大部分都说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你看，先改变生产关系（合作化），后发展生产力（机械化）；突出政治以统帅经济；强调思想改造以建造共产主义新人……；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至斯大林所并没有或很少讲过的。

斯大林在苏联工业化时期强调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批判了它，把它倒了过来，强调政治决定一切、群众决定一切。斯大林写了辩证唯物论之后毕竟还写了历史唯物论，尽管把后者只当作前者的演绎和应用，毛泽东只写了前者（如《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脍炙人口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并不就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而恰恰又是“辩证唯物论”的直接的政策运用。从而，毛泽东所注意并强调要改变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便主要不是那些不适应现代生产力（大工业、科学技术）的部分，如小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观念习惯等等。不是向现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所要求的科学、法制、经营管理的合理化、事业化和培养大量知识分子人才的方向前进，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毛泽东以他所熟悉的农业小生产和军事斗争的经验、观念、习惯和理想，强调思想、政治、群众运动、牺牲精神来改变世界。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应该不断地组织作战，不停顿不间断地进行革命，以保持群众不断高昂的革命热情，才能

推动社会前进,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那么,什么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呢?由于没有进行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研究,这种种概念和观念便始终处在非常模糊朦胧的状态中。它无所不包却似是而非。当不断地人为地制造运动,把这种“两军对战”理论模式普及到广大群众和社会生活中去时,便很容易地把一切坏的事物、现象都归入为以“剥削”为基础的所谓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范畴,把一切好的事物、现象都归入以“劳动”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范畴。于是,在这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便变成了“劳动”与“剥削”、“公”与“私”、“善”与“恶”的对立和斗争。本来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唯物史观的范畴便逐渐变成了超时代的道德伦理范畴。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现时代的政治内容。政治变成了道德,道德变成了政治<sup>①</sup>。

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于是便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挂帅,变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认为是它推动着社会的前进、生产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无论是讲革命,讲建设,强调的总是“群众中孕藏着一股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sup>②</sup>，“要具有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向雷锋同志学习”……

如我们所知道,这种道德主义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中是有其深厚的基础的。不仅封建社会本就以伦理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核心,宋明理学的“克己复礼”“正心诚意”曾经

---

<sup>①</sup> “政治挂帅”、“先红后专”等等与中国传统的所谓“内圣”为主、“内学”为本(张之洞:“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启世事”《劝学篇》)的“中体西用”论在实质上有相似处。参阅《漫说“西体中用”》。

<sup>②</sup> 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包含着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和统一的内容在内,这与青年毛泽东以发展身心为道德有思想上的相承处,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处暂略。

是长久的社会统治意识和官方正统哲学，它已成为人们所熟悉所习惯的文化心理；而且更由于新旧中国的交替确乎使人们对经历了残酷战争取得胜利的革命和革命者（“老干部”）在伦理道德上的尊敬。对旧的黑暗社会和生活形态的憎恶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唤起了也培育着人们对革命、对革命道德、对集体主义、对自我牺牲精神的忠诚的热情和极度的信任。于是，个人利益以至个人本身当然包括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平等……不仅都是渺不足道的；并且都作为异己的有害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被清算。真正重要的是集体的、国家的、革命的事业和利益，“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也就是“先公后私”“一心为公”和“舍己从公”。

也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各方面日益加强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行政权力通过共产党组织支配一切和干预一切，从社会生产、分配、消费到私人生活和私人事务（如工作、迁徙、婚姻、恋爱等等）。于是，一切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治，政治的地位、权力、等级成为社会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标准和尺度。于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感到作为社会动力的似乎也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了。这样，共产主义也不再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主要成了某种政治——道德的理想，共产主义新人不再是全面发展个性潜能的人，而成了道德高尚、意识“纯洁”亦即“政治觉悟高”的圣贤。连历史人物也纯以道德作为评价标准（文革前夕关于李秀成的讨论）……等等，等等。

这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距已相当遥远了。“政治挂帅”和道德至上使置根于小生产保护小生产的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披着新装上市。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上，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从文化批判开始的，这“文化批判”又正

是继承着自批《武训传》开头的建国 17 年来一系列名为“文化批判”实际是政治批判而来。“文化大革命”批判得最凶的文艺“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sup>①</sup>）便都是文革以前提出批判的。在经济、哲学、史学领域，也如此。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也是从俞平伯、冯友兰到周谷城，即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一以贯之的。不同在于“文化大革命”公开声称“实质上是场政治大革命”，并且主要矛头指向了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当年同艰苦共患难打下了江山的老干部。但是，这也是与从 1959 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到四清运动整基层干部的路线进程一脉相承的。因为，反右派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都噤若寒蝉，毛的斗争哲学便主要指向党内。

这也有其现实原因。数十年艰苦奋斗的战争环境毕竟过去，和平时期使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利益日渐突出出来，供给制在 50 年代初期为薪金制取代，人皆同志日益被各种等级官衔所规范，战争时期为集中意志反对“极端民主化”而强调命令、集中的习惯，这时演化为封建性的官僚主义和观念、制度上的等级主义、服从主义。“一言堂”“唯上是听”“当官作老爷”日益在时间和空间中蔓延开来，封建主义的影响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包括旧中国的封建官场恶习）在解放初期被冲击后再次迅速地以新的形态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

于是，人民群众充满着不快、不满和愤怒，特别是在敏感的学生群中。“文革”之前就不断有过“学生闹事”，抗议官僚主义，反对各种落后体制。1957 年的“鸣放”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毛泽东是

---

<sup>①</sup> 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看到了这一点的。在“文革”中，他便指出群众有气要发泄。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领导，这个运动之所以能如此迅风疾雨地发动群众自发地搞了起来，人人参加，来势猛烈，毁坏力极强，其重要原因正在这里。

所以，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和成分，但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醉如狂地忠诚地投入这场“革命”这一基本史实，是无法用上述说法来解释的。

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sup>①</sup>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而毛青年时代所具有的意志主义、理想主义的个性，也在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娴熟可以从心所欲的晚年中，充分展露了出来。毛的“造反有理”的观念情感、浪漫的反叛欲求，从少年到晚年都一直存在，也表现在他生活的各方面，只是有时被理智自觉压抑下去（如中年领导民主革命和晚年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需顾及各种客观现实条件），但有时却由于有理论武装（如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等等）而更加突出了。对“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兴趣，使毛从孔夫子到新文化、从党<sup>②</sup>到政

---

① 见章士钊《柳文指要》。

② 外国研究者特别注意毛在“文革”中“摧毁党”的特异作法，并认为毛一直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本文不同意这看法。毛在青年时期确接受过无政府思潮的影响，但似乎主要在于这一思想的反束缚和乌托邦理想社会方面而不在其非组织、反权威方面。

府<sup>①</sup>的各种权威，一律加以批判和否定。“不破不立”，“一分为二”，“斗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毛早年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继续<sup>②</sup>。但从早年起并在中年获得重大成功的重视现实的“经验理性”却越来越被推置一旁，这当然与毛越来越脱离群众和社会生活有关。毛原来制衡得很好的自己的思想构架自1949年以后便开始片面发展，到“文革”达到了顶峰。

例如，民粹主义的理想和革命战争时代军事共产主义的成功，使毛总怀念着供给制，赞赏“大锅饭”，要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希望首先从分配、消费上来实现共产主义。1958年“大跃进”中，所谓“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曾被毛所肯定而普及全国。毛不再真正深入地注意研究现代经济生活的实际。

此外，当然就是上述的道德主义。从大跃进时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到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斗私批修”的道德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民粹主义<sup>③</sup>，构成了毛的晚年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并非突然产生出来的，它们是既有其个人思想的由来已久的根源，又有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

林彪和“四人帮”便在这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作了“得力的助手”，他们在思想上谈不上甚么自己的东西，但他们（特别是林彪）却的确把毛的上述某些思想发挥到了极端，例如为毛泽东所肯定的林彪“四个第一”的思想：

---

接受马列主义后，毛一直是强调纪律、集中，反对“极端民主化”，要求“消灭……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7页）。所以“文革”后期当《人民日报》批评“文革”造成无政府主义，毛大不以为然。

① 如“一月风暴”后成立上海公社，后又改为“革命委员会”，而不再叫“政府”。

② 参阅《青年毛泽东》。

③ 到“文革”后期，某些地方连工人阶级也要下放劳动，去“向贫下中农学习”。

“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此外，如林彪说：

“……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象原子弹爆炸一样，爆发出很大的力量。”

“共产主义就是讲的一个‘公’字，反对一个‘私’字。要破私立公……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这位“林副统帅”（当时全国在形式上编为军队，所有机关单位都以军队建制）所“发展”的，不正是毛泽东许多思想的完全唯心主义化和封建主义化么？

林彪并直接倡导封建形态，把个人崇拜仪式化，如编制“语录”，搞“天天读”，把毛泽东的言论说成“最高指示”和“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这其实也来自军队习惯），以及搞“天才论”，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等。林彪不但在思想上而且也在组织上（如党章居然写上“接班人”名字）企图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建立起子承父业的公开的封建王朝。

但是，重要的是，在林彪摔死事件发生以前，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为甚么对这一切并未感到格格不入而奋起抵抗？为甚么广大群众、干部和学生都默默地接受了林彪搞的这大大套？当然，高压下的沉默并不等于真正的认同，但也确有不少的忠诚的信奉者，甚至在广泛的知识者之中。这就是因为，一则这一套有其传统的社会意识的根基、习惯，如“最高指示”与“圣旨下”连词句上也无多大区别，这与至今包括知识界也仍然接受甚至欣赏“伯乐”、包公、好皇帝属于同一传统意识和心理积淀。二则，这一套也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它们是过去十七年不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延续。把“革命”当作目的本身来歌颂、崇拜和追求，把毛泽东作为偶

像来崇拜，特别是把“老三篇”、“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的道德意义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一切，这是由来已久了。公私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分，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如今这一套以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出现，便似乎成了最新最革命也最中国化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地接受了它，它从而使任何人（人总是有缺点、弱点和错误的，人总是有各种物质生活的要求、意向、愿望和享受的）都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必须深刻检讨，努力忏悔……在张思德、董存瑞、雷锋、王杰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至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烈士面前，你能不自惭形秽、彻底悔过和无条件投降么？你能不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吗？能不为此而接受审查批判忍受痛苦、揭发别人和改造自己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彪总要反复强调“老三篇”、“破私立公”之类的秘密。

这里，与传统不同在于，这一套道德主义和公私义利之分是以阶级斗争为线索来贯串的，从而不再是比较复杂的、以稳定、和谐、互利的和特征的传统的伦常观念，而是以更简化的“革命”的阶级观念来作为标准、尺度，这种公私义利、天理人欲的分辨更具有某种强制性的、公开的、“你死我活”的十分激烈的斗争性质。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心灵中。在革命旗帜下，在道德主义的要求下，人们都不但理知上要认为，而且要求情感上也感到自己确有错误，确需改造，确需勇敢卫护革命，贡献自己。于是不断检讨自己，批判别人，揭发“罪恶”，划清界限，指责、悔恨自己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喜爱或“放松警惕”……于是，有千千万万热情献身的红卫兵，有千千万万真心忏悔的老干部，有千千万万虔诚请罪的知识分子……

这样一种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斗争、检讨的运动就这样发生

了。奇怪吗？也并不奇怪。如前所说，它不但是几十年思想改造和所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自然结果，而且也与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精神不无关联。

林彪“自我爆炸”的事实，“571工程纪要”的公布才从根本上唤醒了人们，这倒的确象一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炸醒了人们的痴迷和恶梦。原来一切都是假的，高举“语录”天天喊“三忠于”、“四无限”<sup>①</sup>的人原来是一群最大的骗子、坏蛋、野心家。什么“破私立公”，什么“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什么“四个第一”，什么“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多么虚伪多么卑鄙多么可笑！政治终于揭开了它自身的丑恶，一切原来化为道德的伪装愈发显示出了这道德本身的虚假。人们确乎被惊醒了，重新用自己的常识和健全的理知来观察、判断、估计现实、生活和历史。以前的一切怀疑、问题、看法、意见一下子便明亮地被证实被想通了。当然，有从一开始甚至从50年代初便有过正确的疑惑和深刻看法的人，但毕竟是极少数，广大干部和群众是通过“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而觉醒的。

“文革”是一个重要而漫长的故事，非本文所能详论。这里只想提出值得注意的两点：

一是这场看来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狂的“革命运动”，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尽管其中有某些类似宗教狂热的成份，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如在激烈派仗中的自我献身，如无端的兽性发泄、疯狂破坏和虐待狂式的酷刑取乐，等等，但其主体却仍然是以普通理知为基础的，即它是以一整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道德理论即关于公私义利、集体个体、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等等为根本依据的。它仍然具有普通理知上的可

---

<sup>①</sup> “三忠于”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是：“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主席。

接受性，它仍然是一种理性的信仰、一种道德的宗教。这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譬如德国的纳粹运动、高扬道德主义的“斗私批修”理论与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不同或貌同实异之处。把二者等同视之，是既忽视了社会土壤的不同，也轻略了传统的本质差异。德国传统精神中的那种盲目冲动的非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是并不相同的，混淆它们无助于清醒地去认识自己。

另一是，正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至少在指导思想）仍在理知的主宰、支配下，所以对情感和人性的扭曲也是通过理知来进行的。正是这样，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苦痛和心理上的无比折磨。它要求人们从理知上去接受、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判断一切”，去“分清敌我”、“划清界限”，要求人们从理知上运用“斗私批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标准来检查自己、反省自己，这样才能做到“六亲不认”“大义灭亲”……于是社会上和传统中原来相当浓厚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人事关系和情感联系，便统统要求用这种阶级斗争的“革命的”道德主义或者说革命的集体主义去破坏和取代<sup>①</sup>。不是非理性的情感迷狂，而是要求一切情感必须经由“理性”批准，必须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而“思想斗争”能容许的唯一的感情是“革命的”“阶级感情”，一切人间的情谊、人际的关怀都必须放在这个新的道德标准下衡量估计、肯定否定。在这种“理性”的主宰摧残下，人们付出了极为高昂的情感代价。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互相凶狠地毫无情面地揭发、批判，虔诚地忠实地穷根究底地交代、检讨……这里面有多少的痛苦、眼泪、血汗和

---

<sup>①</sup> 在原始儒家本有所谓“子为父隐”（《论语》），舜弃天下窃负杀人的父亲而逃（《孟子》），都显示出血缘氏族的伦理本色。自秦汉以后，在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中，则多半“忠”高于“孝”，以国家名义的皇帝命令高于亲属要求，此即所谓忠君爱国的传统道德，这一切都以“革命的”服装在“文革”中上演。这里面尚有些有趣的复杂问题，暂略。

生命！这里面造成了多少的人格分裂、精神创伤和人间惨剧！

当然，还不说那些借“文革”干坏事或思想污浊行为卑劣的人们，因为那是任何社会、时代和动乱时期都有的。尽管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这场“革命”中以及之前之后获得了暴利，但就整个社会和整个运动来说，毕竟居于次要的位置。

居主要位置的广大干部、群众在这场革命中，不但个性而且人性也遭到摧残扭曲，这种摧残扭曲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理性控制主宰下由自己积极参与而造成的。这才是真正的巨大悲剧。

（节选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81—198 页，标题为本书编者所拟）

# 毛泽东的晚年与“文化大革命”

沉 扬

我在《论一九六六年》(载《青年论坛》1986年5月号)中初步地探寻了政治运动在我国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任何一种必然性,首先只是一种可能性,没有主观的及各种偶然的因素,这种可能不会成为现实。因此,仅指出政治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很难叫人满足。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问题上,这些主观的偶然因素是什么呢?

## 一

执政党的政治状况及其基本的战略思想,它的领袖的个人禀赋,是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之一。这里尤其特殊的是,由于晚年的毛泽东那无与伦比的威望,由于他那要将理想付诸实践的顽强意志,由于他的无出其右的政治地位及高超的政治技巧,都使他成为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将他仅仅看作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方面,毛泽东是最重要的主观的历史因素之一。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在1966年勃发,是与毛泽东同志的社会理想及他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直接相关的。

让我们竭尽全力去理解这位非凡的历史人物吧!这真是一个困难无比的事情。不过,在这里,我只是从探寻“文革”发生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晚年,并不想,也不能将这件事做完。

研究问题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把握一条原则，那就是：不能以通常的意义去理解毛泽东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等。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和符号系统。通常的概念或语词，一旦进入这个系统，其意义便有变化——或转移或扩大或缩小。

我们要用直觉与思维的两面刃，去解剖一个异常丰富的，为世界，尤其是中国几千年文化、近现代社会经济的矛盾冲突所建构的先验的精神框架。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在这里，我们并不难看出，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自有他独特的理解。他不自觉地赋予这些语词以独特的意义。在晚年的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路线所要复辟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恢复私有制。他很清楚，已经“资本主义复辟”的苏联、南斯拉夫，私有制并没有多大份量。他几乎没有指责刘少奇恢复私有制。什么是资本主义？从上面我们引述的毛泽东的讲话，不，从“文革”的实践及他主持的对“修正主义”的一系列的批判中，我们不难看到，那“资本主义”，就是利用成本、价格、利

润等经济杠杆，利用物质利益的原则去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模式。他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公有制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的权力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只在与群众对立的少数人手里；人们不讲“政治觉悟”，自私自利。——真是既不平等，又不高尚，与资本主义一样。而资产阶级，其构成当然很多。主要的，在毛泽东的晚年看来，就是党内那些鼓吹，并实行上述“资本主义”那一套的干部，即“走资派”。

那么，在这里，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毛泽东曾大力推行集中了工农、商、学、兵的人民公社，抓了大庆、大寨这两个典型，并在《五·七指示》中对之作了概括。很清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并不是越“公”越好（他始终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是：尽可能限制分工与商品交换，通过“斗私批修”，通过干部与群众的相互监督与交流，使人人都表现出高昂的革命热情与一心为公的献身精神。他们用这种人格的道德力量而不是以商品交换的原则来努力工作。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大字报等，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毛泽东使部分群众按给定的原则有限地参入对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管理。以不断改变人们社会地位的办法，造成一种类似于革命时期的激动，以此将战争时期的那种普遍的献身精神固定化、持续化。并以此对付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与腐化作风。

用无私的道德风貌促进生产与工作，生产与工作服从于这种道德精神的培养（这是“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真实翻译），在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人们的道德日日崇高。——这就是老人家的社会主义理想。

简而言之，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实际上是将社会看作必然的过程，对这个过程抱着现实的态度与将社会看作人的道德领域，对社会发展抱着伦理的、理想的态度分歧；所谓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引入市场因素与按某种道德意志办事，将经济活动变作伦理活动、政治活动的斗争。而所谓“阶级斗争”之主要内容，就是上述斗争的社会表现。

这就是实质。

当然，并不是说，那些在“文革”中被始终批判的“资产阶级”就能按经济规律办事，自觉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挨批判的原因太复杂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被自己的对手认为是那样。

在晚年的毛泽东那里，没有真正意义的经济科学，只有作为伦理学一部分的经济观。因此，在方法上表现为，他不是从对客观现实的冷峻分析中，说明我们只能怎么做。而是凭借那雄浑的气魄与浪漫主义的热情，从一种理想、信念出发，一个劲地教导人们应该怎么做、要怎么做。如：“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等等。这种态度，这种方法，再加上他的天赋及他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一惊人成就所带来的巨大权能感，使他根本就不相信有客观规律这劳什子的存在。从“大跃进”那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指标，到“文革”中派不懂科学的群众去管科研机关及大专院校，这漫画般的实践告诉我们，毛泽东实在是相信，人的意志可以创造一切。

因此，与那些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不同，他坚信自己的理想可以不断对象化。而只有将理想的东西以现实的感性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才能有自由的美感。诗人、艺术家对象化的中介是语言、音响、色彩、线条。在毛泽东，这中介是政治，是各种经济文化措施，是奔腾咆哮的群众运动。

这样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总是孤独的。他那崇高的、美的追求一旦实现——哪怕是极有限，也会使他有一种登仙般的飞扬感。而

这种追求和快感，在逻辑上和语言上都是不能表达、秘不可宣的，只有同样伟大的艺术家才可以通过直觉感受，常人无法体验。这些，都时时增加着毛泽东的孤独感。所以，他每每太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太少！在晚年，他每一种思想的发表和每项“成就”的取得，都推动他脱离他的同事，推动他走向新的专制。

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都有他那个时代深深的印记，都有其深厚的世俗的基础。毛泽东对待社会发展的伦理态度，是独特的。它高扬的，不是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风貌。这与卢梭、康德不同（他们认为，人不能是工具，人的存在就是一个目的），与强调人自身的责任的萨特，抗议现代社会使人抽象化的马尔库塞相距更远。他是思想家，更是一个治理社会的政治家。他所面临的社会正开始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正由革命时期的热烈转向和平期的冷静。这个古朴的社会正面临现代社会讲求实利的铜臭味儿的侵扰。这对一个将道德评价放在科学研究之上的人来说，会有一个强烈的危机感，感到现实需要一种强大的反利己主义的道德力量。更何况，鼓励为集体、为国家献身，几乎是任何成功了的政治家的嗜好——因为这是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的委婉说法。所以，这种伦理的态度，乃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它代表了一个特定阶层的政治要求。

毛泽东晚年的这种伦理态度，又是小生产的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延伸，是古代传统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义尊道克己尽忠，乃我们传统的美德。——历史现象是多么的矛盾！在理论上，他是反儒的猛将。可感情毕竟代替不了科学。当他艰苦奋斗，将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向彻底摆脱商品经济的行政型方向引导时，当他拒绝民主与法制，希望用道德的力量保持社会的淳清时，他事与愿违；在实际上，他成了中国传统的最有力的维护者与再造者。他不知道，传统的改变，靠现实的改

造,而不是靠理论的批判。不消除旧传统赖以存在的现实,就不能消除旧传统本身。唯有商品经济,才是儒家传统的挑战者。

实际上,以审美的、伦理的态度,而不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社会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个阶层不是别的,是万头攒动的小生产。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邪恶”的过程。大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分工、交换,进而是商品经济的活跃,必然伴随着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发生剧烈的变化。大工业及它要求的商品交换,打破了小生产那牧歌式的和谐;利润、价格、成本等经济杠杆的普遍作用、竞争带来的不稳定、贫富差别的扩大,使社会行为中的道德判断与审美价值的作用迅速降低;工艺流程所要求的严厉的纪律,使昨天还是农民的生产者浑身不自在;手工业的“半艺术性质的手工”这支中世纪的紫罗兰,被日益单调而片面的劳动所践踏。这一切,既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这种历史的阔步前进,有兴奋与欢笑,也有痛苦与惋惜。它常常使群众感到不舒适,甚至愤懑、压抑,更使一些道德家、艺术家忧心忡忡,进而将构想理想社会视为己任。

对于部分干部、甚至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习惯欣赏军事、农业活动的方式。他们熟悉这些,他们因为精于此道而地位显赫、受人尊敬。利润挂帅等商品经济的那一套,他们只是听说在西方资本主义时兴。在技术上、道德上他们都难以接受,而且本能地感到它的兴起会使自己的历史失去光彩,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动摇。

可见,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伦理的态度对待社会,将经济活动作为伦理活动的一部分,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有多么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它以一种曲折、“崇高”的形式,表现着小生产的传统对现代文明的反抗。表现着部分群

众在历史转变时期的一种空想。在工业化的过程与小生产的传统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形成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并不奇怪。这种思想为广大群众热烈地、真心地——当然也是短时期的——拥戴也是自然的。这里不仅仅是盲目的崇拜。这种崇拜的背后有一个广泛的阶层对自己利益、自己的习惯的代表的认可。

妨碍我们看到毛泽东晚年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的，除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及他的政治作用之外，“造反派”那幼稚而剧烈的破坏性冲动也过多地吸引了我们的感情和注意力，“文革”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系统具体地化作方针政策，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日夜研读“最高指示”，主动而创造性地贯彻它。“开门办学”，“大寨式评工分”，“创办大庆式企业”，“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等等，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生事物”，并急急奔走于街头巷尾，查档案，搞“清队”，开展“大批判”。当时我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是多么高涨！这是因为我们一些人程度不同地喜欢这一套，习惯这一套，和这一套有深切的感情和利益的联系。因此，若后辈人追问我们，历史罪责的肇事者在哪里？我们应面带愧色但却勇敢地回答：就在这里！我们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是不幸的受害者，又是不幸的创造者。今天，在改革的时代，当我们从事新的社会改造时，我们得下力气来改造自己。我们永远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又永远是被历史改造的客体。不能与那些总是能迅速忘掉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迅速地将罪责推给别人而不知疲倦地自夸的人站在一起。

## 二

发动“文化大革命”，对晚年的毛泽东来说，就是要廓清道路，使上述的社会理想得以付诸实践。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他决不会满足于形成一个理论的自我。只有使这个理论的自我得以对

象化，他所处的社会按照他的理想改造，他才能安静、满足。

在很多人看来，“文革”的发动，似乎只是毛泽东现实的政治需要——他感到大权旁落，号令不行，所以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解决他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如果仅将“文革”的原因归于此，那就不能解释，毛泽东的政治“危机”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危机”解决之后，为什么他还要坚韧不拔地使“文革”继续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结。

伟大的人物自有他伟大的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毛泽东曾说过，他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个是将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他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看得较轻。他要干一番更大的事业：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解决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的弊病，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在这个理想的国度里，如前所述，人们以无私的热情和崇高的精神去工作，社会既发达又高尚，首先是高尚。

毛泽东的这种社会理想，从某种角度说，是建立在他对现实的观察上。——他是一个多么丰富的人！他兼浪漫主义的高蹈远举与现实主义的洞悉入微。他如晴空上一只白鹤，以高屋建瓴之势看世界，从不为世俗之见所动。当人们为公有制的建立而欢呼雀跃时，当一些理论家、文学家以粉饰现实为己任时，他却冷静地看到，在我们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天国并没有到来。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弊病出现并正在发展：这里有腐化堕落、官僚主义、干部与群众的对立等等。然而，他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的深厚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制度的基础，却将诸如此类的事情归结为道德上、认识上或政策方针上的缺陷。他要以自己的社会理想——即直接用道德的力量，或者用群众运动来实施道德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晚年的毛泽东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斥责及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我们看到，他认为，西方发达，却没我们崇高、公正。那里因商品经济及物质刺激带来了两极分化与道德的沦丧。他幻想能避免这些，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像“五·七指示”描述的那样，象“大庆”“大寨”那样，生产比西方发展快，人格又不失其纯朴与崇高。他要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与道德沦丧的矛盾，讲求实利与追求崇高理想之间的矛盾，要解决魔鬼与天使的永恒冲突。

他将这些看作是他晚年最壮丽的事业。

人类个体精神与其类的精神之底层是同一的，而这精神的底层却导向宇宙的绝对。因此，偏居一隅的伟大人物觉醒到世界永恒的主题，并不奇怪。但知难行更难，一旦要解决这个问题，谁都得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中国，将解决上述矛盾，即将人的发展（虽然只是道德的发展）放在物质财富增长之上的历史条件远远没有具备。因此，毛泽东晚年的理想，所谓“政治挂帅、思想第一”的方针，便成为浪漫主义的空想。在实际中，就会成为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强行塞入传统的小生产的原则之中的历史倒退。

然而，现实是比任何伟人更伟大得多的力量。对毛泽东的那些同事，特别是从事具体工作的各级干部来说，这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寸步难行。不注意经济核算，不利用成本、价格、利润等杠杆，就不可能组织起正常的物质生产，大工业要求的分工，物质的稀缺性所要求的商品交换的发展是不可遏止的。这些，都与毛泽东的理想，与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他因此将之看作是一种政治力量对他的抵制。事实上也是这样，但这抵制是不自觉的。

毛泽东所主张的用一种超经济的力量去激励人们，用革命时期刚刚结束时，群众所具有的崇高热情和献身精神，用幼稚的人民

对明天的美好憧憬去推动人民奋力工作，曾经有过激动人心的效果。这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然而，这种盲目的热情，不顾客观规律的制约，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当精疲力尽的干部和群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血汗付诸东流时，该是多么沮丧！他们那被浪漫谛克的经济方针所唤起的热情，一度变成黑夜一样的冷静与沉寂。在这冷静、沉寂的夜色中，怀疑的蠕动隐隐可见。

恰恰在这时，为党和国家长远计，毛泽东同志主动退居到二线，让刘少奇等同志主持国家的日常工作。他们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当时，这些同志虽然不可能自觉到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道路，但他们却没有那么多的浪漫气质，刚刚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慎重乃其基本功。而且，现实太严峻了，唯有将毛泽东那种搞经济的方法搁置一旁，唯有按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使元气大伤的国家经济得以恢复。果然，这样做后，国民经济很快得以恢复。这种开始撇开经济工作中“政治挂帅”的伦理目标，力图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方针，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接受。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同志退居二线以后，他的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他的同事全力贯彻。现实不允许这样做。他在经济工作中的份量逐渐减轻。毛泽东谙熟韩非以来的中国政治理论及以刘邦、赵匡胤、朱元璋等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中国历史，他对大权旁落的政治威胁特别敏感。这样，他渐渐有了危机感，党内的矛盾开始走向激化。

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毛泽东决心解决他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以保证他的社会理想——他始终认为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走向繁荣、解决现实矛盾的最好的路——得以实行。他以难以置信的勇气，发动群众，打乱了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他对依附于这种体制上的干部失去了政治上的信赖，认为各级都有

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要重新组合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有利于自己的思想路线得以实现的政治格局。而且，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当下的制度与干部队伍正在滋生官僚主义与腐化作风，正在走以利润挂帅为特点的“修正主义”的路，他要按自己的社会理想逐渐创造出的一套新的、永远使人保持战争时期那股劲的新制度，并让间或兴起的群众运动保证之。

毛泽东很清楚，他这样做，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事实也是这样。他仍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他那以伦理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的思想，对广大的阶层，包括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有极大的感召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以来，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经济建设在一段时间的瞎折腾，使很多人不满。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以权整人，日趋严重。干部与群众之间、知识分子与党之间的矛盾在发展。党内、知识分子中间的宗派倾向日见公开化，群众中也形成了利益不同、地位有别的不同阶层等等。再加上政治生活中没有民主法制、日常生活中禁锢言行的档案制度、固定的劳动人事制度（谁得罪了领导，就会因此倒霉一辈子），报刊宣传的千篇一律，使人们的不满，难以找到可渲泄之处。——对一个社会来说，这很可怕，很难避免破坏性极强的大动乱。可惜，“文革”中的动乱，掩盖了“文革”前的这些弊病。一种强的记忆抑制了一种弱的记忆，今天，要公正地反思这些，并不容易。虽然这是重要无比的事情。

上有此种意愿，下有此种基础，暴烈的“文革”之勃发，并不奇怪。

“文革”发动后，毛泽东的政治威胁暂时地解除了，他似乎可以无阻碍地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了。然而，他也意识到，他的理想的实现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他过于相信自己的意志力，“文革”发起后，他致力于将自己的思想落实到各个领域，企图将之渗透到人

的心灵。他频频干预政治与经济生活。在大的方针上，他绝对不允许违背他的意志去搞“右倾翻案”。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对一个政治家或政治集团来说，只有使他的政治活动、他的个性特征渗透到经济领域，他才能形成与自身利益一致的社会阶层，他的政治地位才可能真正巩固。这就是“文革”得以持续十年的根本原因。

对社会发展持伦理的态度，对社会问题报以道德上的热情和审美的空想，乃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和伟大的潜能。社会实践特别偏爱这种人，会引导他逐渐走向科学——除非他一定要做一个诗人。对晚年的毛泽东来说，为什么他的思想始终陷入那种伦理的、审美的空想？如果从57年算起，历史给了他整整20年啊！其原因除他的唯意志论外，也如上述。这条路走了，就不得不走下去。被怀疑，开始要“改正”，这就意味着，他全错了，对的是其政敌，他及拥戴他的那个阶层应该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这就不仅是一个人的意愿的改变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社会政治关系的大变动！实际上，早在3年困难时期，他就怀疑过自己（他对彭德怀说：可能你是对的）。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说过：真正拥护“文革”的，只是少数。百年之后的他将是怎样，他也有预感——当年的自信，此时已所剩无几了。然而，他充其量也只是在犹豫、茫然，终于没能作彻底的调整。事情也早已由不得他了。这真是一幕令人沉痛的历史悲剧……。

实际上，即使在我们这里，对社会的认识，一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来就不是一个纯逻辑过程，不是正确的、符合全社会的東西就一定占上风。它往往更多地是不自觉地服从了一定社会集团的要求。公正地说，使社会政策服从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无可指责。问题是，这个社会集团的利益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否一致？更进一步说，若不一致，也无可厚非。因为一致与否，是客观的、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之后的本质规定。把握了它，有认识

能力的限制,把握后去实现它,又有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限制。而对一个社会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一种政策体系因只是迎合某集团利益,或因某种主观原因而正在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时,有没有另一种社会力量去抑制它?

答案只有一个,靠政治民主。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要求,也是伟大人物安享天年的保证。

### 三

最后,让我们结合现实,对晚年的毛泽东思想略作理论上的分析。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一个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痛苦与“邪恶”的过程,是一个传统的道德判断与审美价值的作用降低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关系不断调整,人们的心理与习惯不断变化的过程。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是我们喜欢与不喜欢的问题。

在这里,特别为人们,首先是诗人、道德家所困扰的,是财富的增长伴随着道德的“沦丧”,是追求实利与向往诗意的矛盾,是自由发展的机会均等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

若从卢梭算起,人类努力摆脱这二难的窘境,已200余年。在这个问题上,有针锋相对的两拨人。一类,如亚当·斯密,特别是大卫·李嘉图。他们鼓吹必须以物质生产自身为目的,他们认为,人的发展,最终得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为了尽快发展生产力,一切应在所不惜。对此,马克思说:“他要求为生产而生产,并且这种要求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一样,主张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不外是指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外是指人类天性的财富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如果我们象西斯蒙第一样把个人幸福和这个

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必须压制全体的发展,以保证个人的幸福,且不说这种充满热情的考察不会有任何实效,他也没有理解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首先要以多数个人和整个阶级作为牺牲,但最后终究会克服这种对抗,而与个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sup>①</sup>。对于李嘉图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的方法,马克思也予以肯定:“李嘉图的无所顾虑的性质,不只是科学上的诚实性,并且从他的观点说,还是科学上的必要性。”<sup>②</sup>应该指出,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那么的陌生。他们的习惯、小生产的心理影响了他们的注意力。

还有另一类人,如西斯蒙第,和大卫·李嘉图不同,他出生在当时小生产还占优势的法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西斯蒙第用应该如何如何的道德评价和善良愿望代替了严肃的科学分析。他指责李嘉图忘记了人,主张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的幸福——这实际上就是伦理学了。对此,列宁说道:“西斯蒙第”只限于以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伤感主义的批评,这种以伤感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sup>③</sup>列宁将西斯蒙第与俄国的民粹派的经济思想并称为“经济浪漫主义”,他们的特点是,将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的、深深植根于现实制度的种种矛盾,当作人们,首先是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措施,甚至道德上的错误。在解决这些矛盾上,他们因此满足于申诉、说教,向统治者呼吁和出谋划策。他们还企图用已被现代社会冲破了的传统社会的原则去规范现代社会。因此,这些对社会、对人民充满了热情的崇高、正直的人们,却始终站在空想、反动的立场上。

---

<sup>①②</sup> 《剩余价值学说》第2册第121—122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第2卷第163页。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我们工业化的进展,随着革命时期的热情、无私精神的消退及各种社会矛盾的生长,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浪漫主义日益高涨。我们总是从道德上指责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那里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总是从道德上、思想上、至多只是从政策方针上找寻现实矛盾产生的根源。而且,西方世界给我们展现的,一方面是现代化的金碧辉煌,另一方面又是人人自私、竞争中的动荡和不平等。这使我们既羡慕,又为我们的稳定、不那么唯利是图的“崇高”而自豪。我们害怕并决心抵御这种稳定与崇高受到侵害。幻想将发达的现代社会塞进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与习惯的原则之中,幻想将中国建设成既有现代社会的发达,又有传统社会的古朴、崇高的理想王国,《五·七指示》和毛泽东晚年的基本思想,正是这种愿望的表达。所谓大庆、大寨式的道路,也正是企图实现这种空想的徒劳的试验。

上述可见,我们对一种空想的、过时的原则的追求,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大卫·李嘉图与西斯蒙第对立的延续。在这个对立中,我们这些忠实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却精神抖擞地站到了被马克思批判的那一边。这里,理论上的重要原因,除了长期以来我们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化、庸俗化之外,还在于我们因拒绝理论探讨的自由而使自身离开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实际上,在卢梭之后,试图解决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道德完善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冲突,探讨人格走向崇高之路的哲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等不可胜数。这个永恒的主题产生了哲学与艺术的五采缤纷的百花园。试以划时代的人物——伊曼努尔·康德为例。他那否定善良的道德是当下经验与说教的产物的先验哲学,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正是这种哲学诱导了《浮士德》、《精神现象学》这些巨著的诞生。哥德、黑格尔在这里告

诉我们，人类精神，当然包括道德意志的发展，是一个多么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只有经历生活中一个个险峰式的阶段，人格才可能走向完善，所有这些理论遗产，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这真正科学的人的学说。这个学说告诉我们，普遍的人类意识，包括道德意识的发展，有不可逾越的阶段，必须以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永远的动力就是矛盾，包括那善与恶的冲突。

事情正是这样。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时候，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很多与我们的崇高理想格格不入的东西，正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不求进步。这正是历史进步的必须条件。只有物质条件的具备，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就是人的力量、人的自由的发展）、自由时间的增加，及建立在它之上的合理的社会的结构，社会文化事业的普遍发展，那些问题才能根本解决。正确的政策，只能加速这种历史进程，不可能代替。认识不到这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深刻含义，热衷于道德说教，去寻求能避免一切邪恶的政策，不但徒劳无益，而且会直接导致“文革”式的荒唐举动。“文革”发起的根据之一，不就是认为通过说教，通过政治运动，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式的政策措施，就可以使人崇高，进而祛除邪恶吗？

在思考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因素时，我们深深感到：事情没有完！一方面，彻底摒弃那种以伦理的、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发展，以道德评价代替科学分析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不是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那种对我们前进的步伐提出的种种责难，不正是来自这方面吗？把思想政治工作归之于道德说教，将马克思主义，将精神文明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利他主义不是很普遍吗？我们要警觉，那种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为目的的“革命者”，看起来是“崇高”。实际上呢？有些人却是小生产的

狭隘、无知、贫穷、对显贵的顶礼膜拜、对大自然听天由命的捍卫者。而对“无私”这禁欲主义的宣传，又常常隐藏垄断政治经济特权的极端自私与专制——他的善良与崇高又在那里呢？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摒弃对社会发展的空想态度。过去，我们幻想以“大庆大寨”之路去逃避“现代社会病”。现在，人类良知又赋予我们以新的空想。它以为，“商品经济”冠之以“社会主义”便可包医百病。这不可能，我们必须以巨大的心理承受力及特别顽强的劲头踏上艰难的历史必然之路。小生产国家实现现代化，既是上天堂之路，又是下地狱之路，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与幻想。

（原载《青年论坛》1986年第11期，收入本书时，编者对内容做了少量删节，并对个别词语做了订正）

# 空想与理想之间

——对建国后一种禁欲主义的考察与思考

郑 谦

禁欲主义(或制欲主义)是一种轻视或极端轻视、节制个人物质欲望,以此作为完善道德、实现世俗或宗教理想手段的哲学或伦理学。历史上,它曾经成为一些哲学或宗教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它也曾占有一定地位,特别是在18世纪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太平天国起义中及俄国民粹派那里。

18世纪德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马布利的学说中,都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色彩。在他们所设计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兰图中,规定人们要住相同形式和大小的住宅。穿着同样质量、颜色和数量的衣服,饮食应有节制,衣着不能过于华美。他们认为,在人类所应追求的幸福中,并不包括享受和奢华,禁欲主义的生活才是幸福的;鄙弃财宝和享受是一种美德和理性……。因此,马布利主张制定取消豪华法和减少需要、提倡生活朴素的法律。他们向往和宣扬斯巴达式的精神,主张斯巴达式的生活,认为以贫困、自制、节制和勇敢自豪的斯巴达人是幸福的。正因为如此,恩格斯中肯地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称为“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sup>①</sup>。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6页。

空想社会主义的禁欲主义与宗教神学及其他思想流派的禁欲主义不一样。这不仅在于它们对“欲”的理解很不相同，而且还在于它们对禁欲手段、目的的看法大相径庭。

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种种禁欲主义思潮，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度里，曾起过不同作用。一般来说，在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禁欲主义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在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反对现行制度的斗争中，曾经起过某种积极的作用，“这种严峻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摒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着统治阶级树立起斯巴达式严格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下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sup>①</sup>。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禁欲主义失去了动员、鼓舞人民的作用，成为一种落后的空想，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们逐渐摒弃了它。在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禁欲主义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傅立叶把“贫穷就是幸福”的主张看做是对人性的歪曲。在他的理想社会中，凡是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情欲都应得到满足，人们应该享受比文明制度中的达官贵人和国王更加富裕的生活。圣西门则明确地把满足人们的需要，最圆满地改善无产者的身心生活，规定为未来社会组织“唯一而长远的目的”<sup>②</sup>。禁欲主义的被否定，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导致了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终结，但却不象人们曾经习以为常地认为的那样，一劳永逸地结束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但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正确地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20页。

<sup>②</sup> 见《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卷第183页。

结合起来，不能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仍然有可能从科学变成空想。当然，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与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在我国 1957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我们的一些严重失误中，就包含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涉及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空想论中，禁欲主义一直占有突出的地位。

## 二

与历史上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禁欲主义不同，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度出现的禁欲主义，不具有那样独立、明确的理论形态，也不曾以禁欲主义自居。它是建国后“左”的错误的产物，是构成各种“左”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产生了相当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禁欲主义倾向，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中。

这种禁欲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穷则革命富则修”的社会主义观

中国革命是在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社会中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在这里，极端贫困所造成的尖锐阶级矛盾成为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这种经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毛泽东根据以往的经验，强调了穷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意义。他说：“贫农特别容易入社，较富裕农民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sup>①</sup>。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又说，一穷二白“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78—179 页。

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就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sup>①</sup>。195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sup>②</sup>。这种认识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具有很大的鼓动作用。它虽已有一些偏颇,但在当时还没有超出合理的界限。

“一穷二白”的理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而这种完成又反过来发展了这种理论。1957年以后,这种关于穷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

1958年5月,《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正因为我国又穷又白,我国人民特别迫切要求革命,要求改变我国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要求建设繁荣、富强、幸福的生活,而具有这样强烈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六亿人民,勇敢勤劳,正是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在这股伟大的力量面前,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在这里,对“穷”和“白”的赞美就多少有些超出适度的界限了。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党中央领导层内存在着一种认识,即“趁穷过渡”。认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应趁穷之势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如果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超过了工人收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反而困难更多,所以要趁热打铁,早转化比晚转化好。很明显,这种认识是1955年至1956年时趁穷合作化的继续和发展。

大跃进的失败,虽然使人们对急于过渡多少有了一些认识,但对穷的认识却依然如故。1960年,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人穷好些,富了就要注意,中国富起来也容易出修正主义,不能吃得再好……。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2页。

<sup>②</sup> 《红旗》1958年第1期。

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比较系统、集中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例如，他说，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他又说，法国《快报》评论中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

关于穷的具体内容和程度，他没有直接谈到，但有一段话似乎为此做了注脚。他说，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東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

从6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毛泽东在理论上一直坚持着这种对穷的看法。1964年初，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提出，苏联的修正主义是贵族工人和富裕农民的产物，而不是广大贫苦工人和农民的产物。工人贵族和富裕农民产生修正主义，广大的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产生马列主义。1973年，他又在同外宾谈话中说，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越穷越好，就会革命，西方国家不大行了。此后几年中，他还几次用同样的话谈到这个观点。

总之，在晚年，毛泽东越来越强调穷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他看来，穷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三大改造的天然优势，而且也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必要条件，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手段，是衡量修正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对于个人来说，穷则是纯洁灵魂、完善道德、保持革命精神的前提。

当然，毛泽东也讲过相反的话。例如，在50年代他曾说过，我们应该尽快发展生产力，否则就会被开除“球籍”。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他本意还是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把生产搞上去。但是，第一，他的这种关于发展生产的思想不久就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

想所取代；第二，他关于发展生产的思想很快就被他思想中的另一个方面——富则变修的忧虑——所限制和阻碍。他遇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要提高人民的生活；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增加了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他热烈地响往着尽快实现中国的富庶与强盛，但对人民中每一个个体的富裕却表现出不以为然甚至疑虑的态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这些矛盾中，他的注意力越来越放到了反修防修这一面。

为了维持穷的存在，禁欲主义就是必须的了。本来，在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是相当低下了，但这还不够，还不足以保证人们的革命精神和纯洁的道德。所以，必须对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进行人为的限制和压抑。

这种理论和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时，西装革履、古玩字画、花鸟鱼虫、化妆美容、扑克麻将、文化娱乐、室内装璜、烹调美食，统统都在“打倒”、“横扫”之列，就连姑娘们的长辫、裙子、服装店里的大镜子都不能幸免，因为它们都破坏了穷的形象，违背了穷的宗旨。“扫四旧”的红卫兵就曾认真而又严肃地问道：“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sup>①</sup>在那个年代里到过中国的外国人，都对当时中国人不分性别、季节和年龄的单调划一的兰灰色制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几乎是所有的人都真诚地相信，舒适、享受、漂亮以及一切对美的追求都是资产阶级的，物质上的富有必然导致精神上的堕落。而安贫、粗陋、单调、恬淡寡欲则是无产阶级的象征，才能保证精神上的富有。他们用“忆苦”来得到“甜”的享受；用禁欲来

---

<sup>①</sup> 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促进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金碧辉煌的大厦，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贫穷、禁欲然而又是纯洁的基础之上。这样一种程度、规模的禁欲主义在当代国际共运史上是罕见的。

## 二、轻视以至反对物质利益的社会发展观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他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成为他从学法律改为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对物质利益问题十分重视，把它作为构建自己理论大厦的重要基石。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物质利益问题在我国却经历了另外一种遭遇。

1956年至1957年间，党中央和毛泽东一度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自然开战。工作重点转移了，与此密切相关的整个社会乃至个人的动力结构、机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代里，正如列宁所说：“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sup>②</sup>，以及“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sup>③</sup>。然而，在50年代中后期，在我们党内的一个重要文献、理论著作及党的领导人的著述中，虽然还没有直接提出对物质利益的非议，但对它的重视程度却也显然不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及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需要。

1958年大跃进时，对物质利益作用的忽视已经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来。1958年1月《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中说：“整风运动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我们的事业是革命的事业，最需要的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从字面上看，这些论断也许并没有多少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第51页。

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它与上面所引列宁的那些话相比，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

但是，如果说，在发动大跃进时，对物质利益的态度还只是轻视或冷淡的话，那么，在大跃进进入高潮后，随着对供给制的赞美和几年进入共产主义口号的提出，物质利益开始逐渐成为讨伐的对象。

1958年10月，《人民日报》转载了张春桥的一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中，张春桥把资产阶级法权作为他心目中的圣物——供给制——的对立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文中写道：“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而物质利益原则“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张春桥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与别人不同的是，当其他人在实践中逐渐放弃了这些观点时，他却一直狂热地坚持和发展着这套理论，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把它发展成为“全面专政”的理论。

大跃进的失败，虽然使许多人丧失了对供给制的热情，但对物质利益的警惕性却未曾消减，在1960年出版的一本很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参考资料》中，就曾写道：“物质利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论述过，也找不到这样的用语。”<sup>①</sup>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比较系统地谈到了他对物质利益的态度。他对教科书中有关物质利益的论述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他认为，教科书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

---

<sup>①</sup> 转引自《论物质利益》第15页。

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他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似乎离开了它，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太弱。他还说，教科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只是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们走向个人主义，等等。

不难看出，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把物质利益与个人主义等同起来，把人们的物质欲望以及为实现这些欲望的劳动看作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亵渎和对政治挂帅的否定。

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前，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物质利益原则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判。1966年2月《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社论提出：“怎样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一不能靠强制，二不能靠物质刺激，……最主要的，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提高人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如果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不搞政治挂帅，而搞物质刺激，引导人们去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和物质享受，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社论进一步提出：“……是无产阶级政治作统帅作灵魂，还是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作统帅作灵魂，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同年4月，在中央批发的一份文件的按语中，对实现物质利益原则的一些具体形式，也作了明确地否定。按语说：“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

“文化大革命”中，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又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度批判了物质利益原则。他说，我国相当大的

一个多数的工厂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原因是他们跟着刘少奇的路线走，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和奖金，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

总之，从1957年以后，经过10多年的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物质利益原则已经逐渐被当作与无产阶级政治和共产主义精神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原则，与“公”相对立而必须加以批判的“私”。人们习惯地认为，物质利益，物质欲望固然也能成为人们工作的动力，但它却刺激和发展了人们的私心杂念，对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产生了严重的威胁；我们完全可以摒弃这种沾染着铜臭气的动力，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政治，可以产生最纯正、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人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便清除物质利益、物质欲望对人们的诱惑。而这正是建立一个纯洁无瑕、无私无欲的理想社会的重要保证。

被这样一种理论影响或征服的人们，远没有今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那样多的物欲。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会斤斤计较个人的收入或支出，但却往往不知物质利益为何物；他们向往富裕的生活，但却不敢公开谈论它。而社会上的先进人物，更是自觉地禁欲克己、安贫乐道。他们在物质利益方面的一切损失，他们被压抑的物质欲望，都在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理想中，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热情中，在反修防修的信念中得到了精神上的补偿。

### 三、被曲解了的艰苦奋斗的人生观、伦理观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和建设史中，艰苦奋斗永远是一个具有魅力的、使人振奋的字眼。这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的字眼。它可以是指一种人生观，也可以说是一种伦理观；它既是一种工作作风，又代表一种事业精神。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艰苦奋斗的结果，艰苦奋斗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使世人瞩目的特点。

1949年，建国伊始，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十分正确和及时地认识

到,必须在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我们的这个特点和优势。1949年,毛泽东就提出:“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sup>①</sup>1956年底,他又提出:“……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sup>②</sup>。1957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又多次提到,整风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使一些革命意志衰退的同志重新振奋起来。

但是,1957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随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片面认识的加深,在对穷的赞美声中和对物质利益日益发展的警惕性中,对艰苦奋斗的理解和认识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偏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艰苦奋斗在某些特定时期(各战争时期)的某些特定的具体表现形式(如穿补丁衣服、吃大苦流大汗、吃窝头酸菜、供给制等等)绝对化,当成艰苦奋斗本身。所以,一提到艰苦奋斗就提到吃窝头、穿破衣服。而是我们已经有可能不吃窝头、穿破衣服时,就痛心疾首地认为已经把艰苦奋斗作风抛弃了。这就如同旧唯物主义者把物质的某些具体形态当成物质本身,而当这些具体的物质形态消灭时就惊呼物质消灭一样。

这样,以往立足于军事共产主义、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艰苦奋斗模式,被简单地、无条件地照搬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这种只是立足于以往基础,毫不顾及新形势、新内容、新基础的模式,越是向前发展,其片面性和形式主义的成份就越多。被歪曲了的艰苦奋斗精神往往只是以体力型、实物型、外在型等简单形态表现出来,其中很少甚至是没有包括知识、效率、效益观念等因素,并逐渐成为一种禁欲主义的要求和手段。

艰苦奋斗的歪曲形态基本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或没

---

<sup>①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页,329页。

有科学意识的苦干、蛮干，如大炼钢铁、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越奋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性越大。一种是禁绝物质利益、物质欲望的苦修苦练和清心寡欲式的个人完善。60年代初期，在宣传一位艰苦奋斗的先进人物——雷锋时，报纸和书籍中都只介绍了他节衣缩食、吃苦耐劳、克己利他这一面，而对他曾买了进口表，料子衣服这一面却讳莫如深，似乎使人们知道这一面就将大有损于英雄的形象。

诸如，此类的片面宣传，引导人们产生了一些对荣誉和美的畸形追求。例如人们将好的衣服压在箱底，而以穿着旧的、打补丁的衣服为时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象征。种花养鸟也为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不容。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功夫养花摆花。他感到不满的是，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

此时，被歪曲了的艰苦奋斗精神，已不再仅仅是为了克服生产或生活上的困难，而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反修防修的禁欲主义手段了。“文化大革命”中，艰苦奋斗更是畸形地发展为一种摒弃人生一切物质享受，排斥人们一切对美的追求的禁欲主义，和不计成本、不讲效益、不顾科学的“出大力流大汗”式的蛮干了。

我们过于留恋和偏爱艰苦奋斗精神的一些多少有些过时的形式，却丢掉了它的立义和精髓，使它越来越脱离了我们现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穷则革命富则修的社会主义观，轻视物质利益的社会发展观，以及被曲解了的形式化了的艰苦奋斗的人生观、伦理观，在这三者中，就其每个单项来说，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禁欲主义，但它们确实各自都包含着禁欲主义的因素；而它们的结合及相互作用，则从

理论形态、道德规范、社会风气等多方面构成了一种完备的当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禁欲主义思潮和实践。在这三者中，第一个因素显然具有本原的意义，它决定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后两个因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为前者所决定，但也具有各自独立的来源和意义，并反过来强化和发展了第一个因素。

这种禁欲主义充满着复杂、深刻的矛盾、从总体上看，它是错误的、落后的，但这却并不妨碍它又时时迸发出一些思想的火花。它注重人们的精神生活，希望用物质生活上的贫乏来保持精神上的丰富与纯洁，却不知道高尚、丰富的精神生活也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特别是对多数人来说更是如此。它崇尚道德而鄙视利益，认为利益天然具有利己排他性，而依靠道德的力量就可以建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却不知道脱离利益的道德的虚幻性质，更不知道道德从来不具有它所想象的那种决定一切的力量。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拜金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贪欲、丑恶充满义愤，它要消灭这些贪欲和丑恶，哪怕以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它沉缅于崇高的理想但却总把自己封闭在以往的经验的事实中，它充满献身精神但却黯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使得理想变成空想。它提倡吃苦耐劳但却不计效率和效益，它倡导普遍的克己利他，却不知道这要以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它可能在战争年代和困难时期熠熠生辉、虎虎有生气，但在建设时期，在商品经济正常发展年代却必然捉襟见肘、窘迫不堪。它满怀虔诚的愿望，得到的却是倒退和动乱。

空想和理想之间，并不存在形而上学者所想象的那种森严和绝对的界限。空想中包含有理想的因素，而理想一旦脱离实际也就成了空想。在这里，我们所应做的是：把握“适度”的界限。

### 三

建国后出现的这种禁欲主义，给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特别是在那些物质条件匮乏时期或困难时期，禁欲主义中所蕴含的重理想轻享受、重精神轻物欲、克己利他、不计报酬的精神，一度也曾使整个社会风气醇厚，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和献身精神，由于禁欲主义内在矛盾及其特点，使它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在物质生活条件缺乏的时候，越是能表现出一种奇特的调节作用：它使人们比较易于承受困苦的生活，用精神的力量多少弥补了物质上的匮乏；它使国家在经历严重困难时仍然保持了安定和活力，使人们在困难中仍然保持着希望和理想；它造成了困难，但同时又提供了一种克服困难的条件。三年困难时期的经历似乎可以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启示。

但是，这毕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仅仅是次要的一面。禁欲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破坏：

#### 一、禁欲主义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原因

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禁欲主义得以产生、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禁欲主义反过来又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生、发展。这种联系是明显的，由于把穷和革命、富和变修联系起来，由于把卫星上天和红旗落地联系起来，由于把强调物质利益当作是修正主义的表现，由于把艰苦奋斗曲解为禁绝物质享受，那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我们已经不再那么贫穷，在我们的卫星已经上天，在我们已有可能吃穿讲究一点的时候，在我们有可能满足较低层次的需要而产生一些较高层次的需求时，随之而来的对资本主义泛滥的忧虑可能不会亚于胜利的喜悦，甚至更多。在把西装、辫子、裙子和香水都当成资本主义去对待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程

度是不难想象的。

禁欲主义不仅产生了扩大化的动因，而且成了扩大化的重要手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扫四旧”、剪辫子、吃忆苦饭、五·七干校里的苦修苦练等等，都曾被认为是反修防修的有效措施。

这样，禁欲主义就从两方面满足和适应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一方面，它制造出足以使人们忧虑和警惕的严重阶级斗争事实，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反修防修、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手段。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禁欲主义就是这样相辅相成地同步发展的。

## 二、禁欲主义歪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结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但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sup>①</sup>。与阶级斗争相比，物质利益动力具有更为本原的意义，这一点在社会主义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

但是，如果一旦物质利益被禁欲主义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诱惑而必须革除和限制时，整个社会以至每一个劳动者又该到那里去寻找各自的发展动力呢？只有从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狂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真诚而又盲目的革命热情和纯洁的道德领域里去寻找，为了在物质利益之外得到这一切，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教育运动、整风运动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文化艺术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动向就必须加以严密的注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思想的纯洁，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挂帅就必须时时、处处加以强调，因为它不仅是对物质利益的否定，也是对这种否定所造成的动力真空的填补。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在当时，人们普遍真诚地相信，应该而且可以通过频繁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去保持和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而正是这种热情（而不是对物质利益的关心）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强大而又纯正的动力。禁欲主义式地对物质利益的否定，不仅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发展了精神万能论、上层建筑决定论和道德决定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结构因此变得混乱和错误。

### 三、禁欲主义本能地要求平均主义，严重地阻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欲主义既然否认或轻视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那么，不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曾经对平均主义作过怎样大量和深刻的批判，也难以减少它对平均主义的依恋与向往。这是建国后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倡平均主义，但平均主义却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低的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平均消费，或者，用平均消费来维持低的物质生活水平，二者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

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禁欲主义导致了对消费的忽视，消费没有被当作对生产具有积极反作用的因素，而是被当作可能导致人们贪图享受的潜在原因。这大概也是建国后长期存在的重积累、轻消费的一个原因。

这样，禁欲主义以它对物质利益的轻视以至反对，以它对消费的压抑，严重地阻碍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禁欲主义的本意来看，它是真诚地希望用清贫的生活来保持高尚的理想和精神，用穷来抵御资本主义的腐蚀和防止修正主义的，但是，这个目的达到了吗？没有。本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消极现象，而这正是禁欲主义所警惕和防范的重要对象之一。但它所采取的方式却是与社会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它不是以发展商品经济的方法，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弊端，而是用限制商品

经济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再强大的行政力量也无法对商品经济施号发令。商品经济可能会受到阻碍，但却不可能被遏止。它所造成的那些消极现象，除了引起禁欲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冲动外，不可能被真正地解决。

在非经济领域中，禁欲主义的处境更为窘迫。禁欲主义确实使一些人严于律己、克己利他、志存高远，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及因高度集权的，以官为本位的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又使社会上和党内一些腐败现象不断产生。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所造成的种种特权，被这种特权刺激起来的物质享受欲望及其所带来的种种非经济收入，远非禁欲主义的说教所能感化和约束。由特权所产生的贪欲和腐败，使天真的禁欲主义者无法理解，使幼稚的禁欲主义方法显得滑稽可笑。

不论当代禁欲主义如何真诚和热忱，它从未达到过自己的目的，它所造成的是它自己也无法理解和驾驭的破坏。这是当代空想社会主义必然的悲剧。

#### 四

在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结束古典空想社会主义 100 多年后的当代，为什么又会出现这种以禁欲主义为重要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并造成那样的后果呢？

在历史上，越是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发展的国家里，那些只有在资本主义比较发展阶段才能充分显示出来的物质利益原则表露得越不明显，社会化大生产对于改造整个社会的意义越是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在这些国家里，因贫穷落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产生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曾经成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这种状况使得这些国家中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即认为资本主义的不

发展反而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在俄国早期民粹派和我国孙中山那里，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端倪。其实，这里已经以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蕴含了趁穷过渡的思想萌芽。

中国革命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长期以来，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中，普遍实行着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在那时，对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有的只是殊死的拚杀搏斗，而没有个人的物质利益可言——尽管他们的奋斗牺牲是为着全民族长远的物质利益。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作风、光荣传统就是在这个时期、这种基础上形成的。很明显，不经过发展和创新，把这些传统和作风直接搬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那就只能导致普遍的禁欲主义。

1958年大跃进中，为了实现在几年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大干、苦干、拼命干。在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现在搞建设，这也是一场恶战，要拚几年命，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他认为，共产主义道德不能按钟头计算工作，否则还算什么道德高尚。当时那种狂热的气氛，也是禁欲主义能够被提出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原因。

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成了压倒一切的现实问题。为渡过难关，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在人们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除了“禁欲”还能有什么选择呢？物质生活的匮乏，又强化起码是掩盖了禁欲主义的错误和危害。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方面苦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一方面，由于理论上的失误，对商品经济一直采取了怀疑以至压抑的态度。这一失误不仅阻碍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冲淡了禁欲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尖锐冲突，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逐步发展，是禁欲主义得以形成，发展的直接、主要原因，不论是对穷的赞美，

还是对物质利益的轻视，还是对艰苦奋斗精神的曲解，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都是服务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二者相辅相成，同步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到顶峰之时，也是禁欲主义全面普及之日。

从主观方面看，还有一点是必须提及的，这就是我们对革命战争年代一些经验和传统的绝对化。1960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的脱产人员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不为待遇问题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反而发生许多问题。他又说，以往打仗，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是靠路线的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党内外相当多的一部态分同志中，他们心目中的传统实际上是凝固的而不是发展的，是静的而不是动态的，是面向过去而不是立足现在和面向将来的。科学地、发展地对待我们的光荣传统，这是我们从对禁欲主义的分析中所应得出的重要教训之一。

在更深的层次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禁欲主义的深远影响。在中国伦理型的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崇俭黜奢的价值观，功利观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历史上人们对“义”的解释不同、内涵各异，尽管不少人对它只是说说而已，但它的确是历代许多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特别是在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它是一切有理想，有操守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支柱。由这种价值观派生出来的安贫乐道、寡欲轻利、俭以养廉、艰苦玉成等古训，已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特征中的重要方面。不难看出，这种义利观既可以成为我们振奋精神、追求理想的思想渊源，也不难成为通往禁欲主义的桥梁。

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经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特殊历程和环境……这一切因素提供了有利于禁欲主义滋生、发展的条件。反修防修需要禁欲、苦干蛮干时自觉禁欲，困难时期不得不“禁欲”，发扬传统被误认为是禁欲……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我们很难摆脱它的困扰。但是，我们终于战胜了它，虽然代价过于沉重。

## 五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禁欲主义在我国已成为历史。现在，我们肩负着新的任务，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疑惑。

1976年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之上。而且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就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展人们的物质享受欲望，作为各种经济杠杆的原动力。

但是，盲目的，不加引导和没有制约的物欲，又会使社会充满自私、贪婪、利己、欺骗。价值规律不能调节一切，物质刺激也有它的天然限度。

物欲发展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伦理道德又当如何呢？我们又面临着利益与道德、精神与物质的二难选择，不过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难道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享受水平和欲望的提高，必然要以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牺牲为代价吗？难道经济杠杆与理想道德竟是那样不相容吗？难道艰苦奋斗的年代已经离我们那么久远了吗？难道人们只有浸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才能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吗？难道“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已经过时，已该成为人们轻蔑调侃的对象了吗？或者，反过来说，为了克服商品经济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我们就必须再次求助于禁欲主义的神通吗？为了消灭物欲发展所带来的利己与贪婪，我们还要再次托庇于“一穷二白”，回

复到田园诗般的乌托邦中去吗？

历史不容许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困惑、拖延得太久。

希望靠禁欲主义去净化灵魂，保持理想是一种空想。以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自然而然地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同样也是一种空想。只靠理想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在精神与物质、道德与利益、理想与物欲之间，天平总是向前者倾斜的话，那么，在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天平总是倾斜于后者。这似乎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

不平衡是发展的结果，却不是我们的目的。与其在汹涌、盲目的物欲洪流的下流疲于奔命地堵缺补漏，不如在发展物欲的初期就以一种正确的精神力量制约和引导它。

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平衡，需要寻找制约和平衡不断发展起来的物欲的因素和机制。

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需要我们投入的不仅仅是资金、技术、设备这些“硬件”，还有人的素质、理想的力量、艰苦奋斗的作风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些不能靠市场调节的“软件”。而正是在这里，包含着天然的优势。

当我们仔细考察那些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和时，就会发现它们的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顽强的奋斗精神。产生这种精神的原因很多，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

我们仍然要艰苦奋斗，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起点上。没有这种精神，中华民族的复兴、腾飞是不可能的。当然，艰苦奋斗不再表现为补钉累累，粗茶淡饭。关键的是它的核心，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献身精神和工作作风。把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某些具体形式照搬到社会主义社会是

空想，而把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发展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中的艰苦奋斗则是我们的理想。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sup>①</sup>毛泽东在32年前说得多么好啊！

（原载《党史文汇》1988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作者对内容做了少量增删）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9页。

#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历史考察\*

许建华

已经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主要领袖人物欣赏和接受个人崇拜，被一些阴谋家、野心家利用，结果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这在我党历史上和国际共运发展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正确研究这方面的史实，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搞好执政党的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探讨毛泽东由反对个人崇拜到欣赏和接受个人崇拜的过程，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斧正。

## 毛泽东曾经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旗手

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曾经是毛泽东所遵循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原则。很早以来，他就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在我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当斯大林已经是共产国际的领袖和导师，各国共产党都很尊敬他，甚至是迷信他，普遍地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魄力，顶住了这种不正确的倾向和压力，他既没有被共产国际派来

---

\* 此文原标题为《毛泽东同志由反对个人崇拜到接受个人崇拜的过程》，现在的标题系由本书编者重拟。

的而又深受斯大林所赏识的王明的气势所吓倒，也没有盲目相信斯大林，而是同他的战友一起，对王明的“左”右倾错误做了坚韧不拔的斗争，把中国革命从绝境引向胜利。在毛泽东成为党的主要领袖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坚持着一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党员中、群众中。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他同大家一起开会、谈话、照像时，没有把自己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譬如照像，他常是站在或坐在一边。1949年开政协会议，中共代表团那张照片，他和刘少奇在第一排的两边，中间是四老。

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反对过分颂扬个人、突出个人。1943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决议，主席有最后否决权，但他决不轻易使用这个权利。就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里，凡重大问题，他都要找身边的和可能找到的中央同志研究。1945年写历史决议的时候，他一再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sup>①</sup>1954年起草宪法时，他亲自删掉了过分称颂他的条文，并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sup>②</sup>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吴玉章说毛泽东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提出了“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他立即指出：农业合作化并不是什么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要说有，就是在形式和细节方面，如互助组的普遍发展，全行业公私合营等，这是新的。

<sup>①</sup> 《红旗》1981年第14期第7、8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1页。

他提倡自我批评，并处处以身作则。他向大家讲自己成长的过程，犯过的错误，并随时纠正报刊对他不恰当的宣传。在七大会议上，他说：“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上，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sup>①</sup>晋察冀根据地出版发行的一个课本上说他从小不信神，10岁就反对迷信，他又指出：他小时候是信神的，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他多次讲过，他曾信过孔夫子，信过资本家宣传的那一套。他还多次讲过，他需要学习和改造，直到1957年还讲：“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接受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sup>②</sup>他反复讲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他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不是生而知之，是人不是神。

为了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他和党中央的其他同志一起，曾经采取了很多重大措施。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经他提议，中央讨论通过，规定了六条。1953年在夏季财经工作会议上，他又重申了这六条：一曰不作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并说：“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sup>③</sup>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不要用人名作地名，不许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斯、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从实践中总结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的经

---

① 《红旗》1981年第14期第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2—38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7页。

验，并把它提到理论高度去认识。在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之后，他重申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纪律，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写了《整顿党的作风》等光辉著作，认真总结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教训。1945年在七大会议上，他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著名论断。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防止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1951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的防止腐蚀的方针，并且亲自决定公审和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党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建国初期我党能够保持和发扬延安作风，和这次运动胜利开展是有很大关系的。1953年在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他提议写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成立了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这个决议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认识领袖和群众的正确关系等问题。他说：“只有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sup>①</sup>1956年，他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起，讨论和通过了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科学地总结了斯大林在个人崇拜问题上造成的错误，指出了我党应当吸取的教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6，151页。

训。文章中说：“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关于我党应当吸取的教训，可归纳为四条：（一）“必须警惕：有些人当他们为了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二）“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三）“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四）“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sup>①</sup>。

总之，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及时地总结了坚持集体领导、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且由他主持、讨论、通过颁发了不少文件，他也亲自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规定》、《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这些文件和文章，论述精辟，内容丰富，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的下列观点：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关于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艰苦奋斗，关于党的三大作风及反对骄傲情绪，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盲从、提倡思索，关于整风、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等等。这些观点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精神财富，也是搞好党的建设，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强大思想武器。

## 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的 思想转变过程及原因

### 一、由反对个人崇拜转向接受个人崇拜，毛泽东是经历了一个

<sup>①</sup> 《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1编第380—385页。

相当长的过程的。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显然,毛泽东的这种提法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教导,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这表明他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个原则问题上已经产生了怀疑和动摇。1959年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指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实际存在的错误,提议在总路线中加上有计划按比例的内容,便被打成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表示他已经在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了。后来,由于1958年的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这使我党,也包括毛泽东的思想有了很大清醒。于是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主动做了自我检查,承担了责任,并且作了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实行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他说:“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专断。”“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sup>①</sup>看来助长个人崇拜的“一言堂”的状况可能改变。但是由于苏共召开了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再次强调反对个人崇拜,对斯大林作了进一步的否定,这就使毛泽东的态度一下来了个大转弯。这个大转弯表现在1963年6月14日中央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建议》的第21条说:“近几年以来,有些人违犯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

---

<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第614、616页。

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按:即反对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sup>①</sup>这里虽然批判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政治阴谋,但却否定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否定了反对个人崇拜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为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造神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到1965年1月,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时说:那时(按:指1956年至谈话时)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这就表明,此时,他主张搞个人崇拜了。回想“文化大革命”前期,林彪、“四人帮”搞的红海洋、红宝书、忠字舞、语录操、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个人崇拜的形式,虽然有时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但总是有增无减的情形,就可看到这是同他主张要搞个人崇拜这一主导思想是分不开的。到1970年12月,他又对斯诺解释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有必要采取个人崇拜这种讨嫌的做法,并且预言这种作法将逐渐改变。他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又说: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所谓的“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这些话又表明,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此时他主张降温。为了降温,1971年以中央名义下达了文件,出版发行了斯诺的访华文章。文章中说:“毛主席对这种有关神和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sup>②</sup>在中央允许发行的书籍中,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毛泽东,在当时,没有他的批准是不可能这样做。这又证明,此次他是真正主张降温的。

<sup>①</sup> 《红旗》1963年第12期第26、27页。

<sup>②</sup> 《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第15页。

二、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为坚持和发展这一原则，毛泽东曾经做过坚韧不拔地努力，为什么后来他却怀疑、放弃这一原则？是什么东西促使他思想上发生了这样的转变？要探讨他思想大转变的原因，也只能从当时的社会存在中去找。

(1)赫鲁晓夫强调全面反对个人崇拜，彻底否定斯大林，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混乱，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对此，我党和毛泽东虽然有不同看法，但还是把赫鲁晓夫的这些做法同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作为两个问题去处理。在公开场合，既说了些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话，又在肯定斯大林的功绩、保护斯大林的原则下，批评了斯大林在个人崇拜及其它问题上的错误，也初步探讨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这是十分可喜的。很可惜，进入60年代后，由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多端，迫使我们中断了这个研究工作。

长期以来，斯大林被认为是国际共运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是全世界都十分注重和关注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在苏共二十大后，就围绕着斯大林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出现了一些我们不曾料到的事，例如，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1957年对于我国来说又是不平静的一年。在我们党内，思想也起了波动。由于过去“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压力很

大。”<sup>①</sup>因而党内对斯大林的态度很不一致。这些国际国内的种种现象，反映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就使他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正如他在成都会议上所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我们发展马列主义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惧的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在他身后重演“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闹剧。这样，毛泽东同志便对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发生了怀疑和动摇，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说法。

3年困难时期的到来，使毛泽东再次认识到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个人崇拜的危害性，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纠正个人崇拜的现象，但由于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又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幌子下，进一步全盘否定斯大林，直到把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毛泽东更加担心有人利用反对个人崇拜干坏事。这种担心就促成了他思想上的急遽转变，由怀疑动摇发展到理论上的彻底否定，并且明确提出在我党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最高领导权这样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从此，他就处处注意观察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了。由于他长期退居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务工作，他又对刘少奇在困难时期所采取的措施很不满意，因而便对刘少奇产生了怀疑。1956年春，中日两党会谈，联合公报已经商定，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判苏共，对此，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表示同意。汇报给毛泽东后，他说：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这样他就行使了否决权。苏共二十三大大发来邀请信，他未定可否，要在京常委讨论。在京常委提出应邀进行斗争的方案，也都予以否决。这种种现象就使他形成了刘少奇“妄图以妥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僵局的问题”<sup>②</sup>的认识，从而认为刘少奇正是睡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sup>②</sup> 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

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而刘少奇当时在我党和我国人民中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为了打倒所谓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就轻率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提出“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并欣赏和接受个人崇拜。

(2)急于求成的思想，使毛泽东变得急躁和听不得不同意见。

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负。建国初，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封锁禁运。1959年后，苏联又卡我们的脖子。从战略眼光看，我国处于被包围的态势。由此而使我党，特别是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极大的紧迫感。翻一翻他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就可以看到，他处处是强调加快建设速度，改变挨打受欺的地位。当然，那时我国也确实出现了加快建设速度的客观可能性：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生产力初步获得了解放；“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全国人民情绪高涨，斗志昂扬。这时如能正确地全面分析形势，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建设速度无疑会以惊人步伐前进。然而，那时，毛泽东已经在接连不断的胜利面前，变得不那么谦虚了，加上思想非常紧张，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大跃进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对此，国际上的敌人乘机讥笑攻击，国内出现了埋怨情绪，党内出现了意见分歧。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党内外夹攻”。为了统一思想，战胜困难，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连续开了六次重要会议，纠正“左”的错误，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党内两种意见还是尖锐对立。由于当时毛泽东对“左”的指导思想缺乏认识，所以对反“左”的意见听不进去，当经过较长时期的努力后，仍然没有“说服”了反“左”的同志，这就使他联想到阶级斗争，联想到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于是在庐山会议后期，就批判彭德怀，拒绝甚至压制不同意见。

(3)在毛泽东走向接受个人崇拜的过程中,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等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上述这伙人大搞造神运动,制造个人崇拜的种种恶迹,我不想一一赘述,我只指出,这些人是非常善于察颜观色、曲意逢迎、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例如林彪,他是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攫取了国防部长要职的,当时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已经产生怀疑。林彪看准了这一点,一上台就声嘶力竭地发誓要“高举”。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在大会上毛泽东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却装出要真心拥护的样子,说:“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当前出现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当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的时候,他就出语录,写文章,提出“顶峰论”,鼓吹“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恶劣的是于1966年9月18日,他竟在天安门城楼上说:毛泽东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的一个天才。因此,确切地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我国出现的个人崇拜的热潮,正是林彪一伙利用毛泽东同志思想上的动摇和广大群众无比尊敬、爱戴毛泽东的心情,煽动起来的,制造出来的。

(4)脱离集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使毛泽东逐渐变得主观和专断起来。

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正如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主要在他的晚年,由于长期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而过分地相信自己,越来越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党的集体领导,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这样就不能不发生许多失误,直到发生‘文化大

革命’那样全局性和长时间的严重失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很大不幸。”这里虽然分析的是工作失误的原因，但实际上也是思想迷雾，走上个人崇拜方面的原因。

另外还有：我国的封建历史特别长，封建主义思想对我党有很大影响，一言堂、家长制、特权思想、官僚主义等封建遗毒曾反复在我党出现；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而小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屈从权力，迷信权威，崇拜偶像，渴望恩赐，即使在集体化后，这种情况也一下改变不了；我党的制度有缺陷，允许个人行使否决权，实际领导人终身制；国际共运中关于领袖和政党的理论有偏差，等等。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研究不够透彻，认为个人崇拜可以为政治需要服务，需要时就搞，不需要时就反对。

当然，毛泽东接受个人崇拜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而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在60、70年代，他一方面默许、支持林彪一伙搞个人崇拜，一方面又批判林彪一伙神化他个人的种种谬论。现在我们研究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决不可忘记他的另外一部分言论。例如，他曾多次指出：请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当有人祝他万寿无疆时，他当即指出：没有什么万寿无疆的，这不科学。他曾亲自删掉林彪提出的三个副词，很早就批判了“天才论”。1966年7月8日，他在一封信中就批判了林彪提出的“天才论”。1971年8月15日他又指出：我党多年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了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1971年8月——9月12日在外地巡视期间，他多次指出：“我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

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泽东虽然让别人崇拜自己，但他自己还没有神化自己。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么回事。”凡是被实践检验，证明是错了的，他就勇于承认，认识多少，承认多少，改正多少。如他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就是如此。又如在1965年10月，他就当着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的面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起来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再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为贺龙平反，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等等，都说明他没有神化自己。

上述事实就说明，毛泽东欣赏和接受个人崇拜是由于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的，他并没有完全陷入个人崇拜的深渊。对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绝不可搞绝对化、片面化。

（原载《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编者对个别词句做了增删）

# 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描

萧 廷 中

## 一

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从总体上看具有极其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在他的意识结构中，“人民”或“群众”其实总是与“小人物”、“穷人”、“贱人”、“下等人”、“被压迫者”等等划等号的。这样，毛泽东的人民群众观，就与他对人的限定与划分有着直接关联了。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主张“阶级论”而取消抽象人性观地位的。他不是一次地对超阶级的普遍人性论进行猛烈的抨击，其中最有名莫过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那一段话，解放以后他又说过多次。“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sup>①</sup>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对“阶级”的划分本身就有着严重的误差。一些资料表明，他观念中的“阶级”实际的内涵只是“身份”。只要出身贫寒、身份低下，再加上自我奋斗，就说明了他曾是被压迫者，天生具有反抗意识，因而也就最有创造性。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讲“破除迷信”问题，一连举出近40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

---

<sup>①</sup>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讲话》。

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并以相对肯定的口吻设问:“这是不是个普遍(客观)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可以说,多数是如此。”<sup>①</sup>

在同一时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戎崔使君序》一文时,即兴随笔,作了千余字的长段批语,其中除考证王勃本人的经历外,又写道:

“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才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sup>②</sup>

这段卷头眉批显然主要是为自己看的,因而它比较全面、完整地反映出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和意图。这里,他十分突出地强调由“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必然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从而构成了极为明显的“压抑——创新”的价值取向。在毛泽东晚年的大量论述中,这种价值取向表现得特别突出,就其实质而言,它反映的潜在精神却是追求人的社会身份的均等。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sub>·</sub>的实现欲望,而压抑着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堕性。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赋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

<sup>①</sup>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sup>②</sup> 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史的阻碍；前者是弱小的，但却蕴育着伟大，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上述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文革”中毛泽东又一再重申，“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干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sup>①</sup>因而人类发展的途径，似乎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堕性，在社会身份的天平上寻求新的均衡点。

## 二

基于这种“压抑——创新”的核心观念，毛泽东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了他的社会改造理想：

其一，在干部与群众之间，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鼓励来自下层的冲动，任何时候他都敏感地去寻找、发现和拯救那些破土而出的希望之芽。在“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说：“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sup>②</sup>。联系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毛泽东的其它论述，显然，这里他所谓“本质上”的含义，只指急于摆脱贫困面貌，追求富足生活的本能。可以说在一系列需要选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态度，而没有过迟疑和动摇。在他看来，压抑群体的生存本能，与其说是一种失误，不如说是极大的罪恶。正因如此，他对“官僚主义”体现出同样的敏感，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丑恶：“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

<sup>①</sup> 《1967年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9页。

以平民愤”<sup>①</sup>。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新权贵”呢？毛泽东回答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sup>②</sup>。甚至在病重期间，毛泽东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sup>③</sup>。

其二，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毛泽东将二者看成“源”与“流”、“体”与“用”之间的关系。不能说毛泽东完全否认甚至敌视知识和科学的价值，因为一方面在他晚年的著述中的确多次谈到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认为“老九不能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经验，以务实为本的治国政治家，他不可能完全抛弃社会现实而陷入纯粹的思辨遐想。问题在于究竟毛泽东如何权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怎样看待知识价值在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历史地位。

在毛泽东看来，体、脑劳动都不可缺少，但前者是“源”，而后者是“流”，前者是“体”，而后者为“用”，二者的位置不能颠倒，即所谓“皮毛之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3页。

② 《1967年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

③ 参阅北京市委宣传部印：《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五个发言材料》（1976年4月20日）。

不下聘书了”<sup>①</sup>。显然，这里知识分子与“劳动者”被视为相互外在的二元主体。

为了扭转这种相互外在的二元主体结构，毛泽东试图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运用强力实现“劳动者”与知识分子的身份互换，即所谓“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一方面主张“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sup>②</sup>。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sup>③</sup>。另一方面，在全国大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和“军宣队”，建立由基层社会组织直接推荐的工农兵学员选拔制度<sup>④</sup>。表面上看，毛泽东的意图和措施是要以此达到民族文化水准的平衡，而实质上的潜在目标仍然是追求人的社会身份的均等。

毛泽东上述“身份均平”的价值观反映，其理论根源在于轻理性而重经验，将社会发展仅仅看作一个可由个体情感和主观意愿任意支配的历史过程。他的这种主观倾向，明确地反映在下面的评论之中：

“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

---

①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78年单行本第32页。

② 《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

③ 转引自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④ 这里的问题是作为总体模式的社会结构变更，并不涉及“工农兵学员”的历史评价问题。

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祖冲之自己也没有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也没上过大学，是个吹打手，人家死人了，他去吹吹打打”。“高尔基只读过两年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的，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汽机”<sup>①</sup>。

甚至直到逝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坚持认为：孔子、秦始皇、汉武帝、曹操、朱元璋没上过大学，但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sup>②</sup>。

其三，在“小人物”与权威者（与此相适应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毛泽东也自觉或不自觉充当着保护和拯救前者的角色。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似乎具有进化论倾向，他几次说过“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sup>③</sup>的话。例如，1954年毛泽东支持李希凡、兰翎的《红楼梦简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毛泽东给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我们甚至可以说其直接矛头也并非对着俞平伯本人，更主要的目的只不过是表现自己要为“小人物”说话的姿态罢了。1965年初，毛泽东看到徐寅生讲打乒乓球的讲话后，立即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参考，认为“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批老将挑战了”，“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也未忘记加上一句“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

---

① 《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

② 参阅《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③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sup>①</sup>。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伦理观的实质都是试图通过各种社会角色的功能互换，借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别，从而达到“等贵贱”的价值均平境界。很显然，这里毛泽东表现出某种巨大的超越冲动；“身份”的均平憧憬标志着超越固有社会结构对人的规定，同时它也体现着超越经济基础而谋求主体片面实现的追求。换句话说，毛泽东忽略一切产生社会身份的社会条件而不论，却把某种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际关系，主观、人为地、强制急迫地施加于现行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例如，1966年5月7日在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以“学校”为社会发展模式，提出各行各业，工、农、兵、学、商都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这样虽然形式上仍然存在着社会分工的差别，但实质上却使社会组合简化为一种同样的统一模式：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毛泽东认为，这样“社会角色”就会逐渐形成固有内容的淡化，其自身的鲜明特征将被某种“同构群体”所取代。进而，人类群体的阶层差别就随之消失，高与低、贵与贱、脑力与体力、城市与乡村、干部与群众，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等等的对立将自然趋于缓和。总之，全国人民那时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正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和精神的境界，这，正是毛泽东所设

---

<sup>①</sup> 见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五·一六通知》最早作为党内文件传达，一年以后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依据的超时代的社会发展观。

建立在旧有社会结构基础上的超越意识，其实质只能是一种心理幻觉和情感冲动。因为，未来毕竟只能以现实为前提，无论理想的旗帜多么艳丽，其价值的归宿最终只能落回原点，观念的异化在此是必不可免的，对于一个富有浓厚实证精神的政治哲学家尤其如此。就在《五七指示》的最后，毛泽东特意对林彪说：“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事实的确如此，战争时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平均风尚的弱化，时时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中引发眷恋的情感。他曾屡次重申：“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sup>①</sup>。他认为：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又说，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差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抗日战争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sup>②</sup>。

对于战争时期社会人际关系的留恋，表面上反映着毛泽东崇尚节俭、廉正、牺牲自我的道德观念，但实质上它却表现着他复归旧有传统，向往自然经济（农耕社会）的文化无意识。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历史与未来的重叠就是现实，他所超越前人的目标其实就在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0页。

<sup>②</sup> 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他背后的包袱。毛泽东深深地被古代农民战争的平均主义所吸引。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

“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sup>①</sup>。

同年12月7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期间读《三国志·张鲁传》时，随手写下又随手涂掉的一段批语，更把旧式农民运动的“置义舍”行为与现实国家建设的方向直接联系起来，从而道出了他想说又不愿明说的内在心理意图：

“这里（指《张鲁传》——引者）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象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sup>②</sup>。

但是，超越社会结构和历史时代的主观意愿，归根结底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因为这种超越的理论要素深深地根植于旧有传统的土壤之中，它形式上超前而本质上却在复旧，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循环性复归。简单说，这种“超越——复旧”理论异化的内在机制不是别的，正是执著追求那反社会化过程，反人类发展秩序的“身份均平”。正如毛泽东自己概括“农民革命战争”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共同之处时所说：“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

① 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2页。

食”<sup>①</sup>。

或许问题并不十分复杂，既然毛泽东内心憧憬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恰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的均平“梦想”，那么与这种价值取向格格不入的社会分工及其个体意识的自觉，自然也就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西东，与此相联系的“身份”从而也就随之成为与“压迫”、“特权”、“等级”同日而语的罪恶。可是，在理性的意义上考察，“身份”其实只是识别一个特定社会角色的标志或手段，它作为界定与衡量社会个体的一种形式，其本质包含着对人类价值，特别是个体价值的承认、鼓励和肯定。社会发展愈现代化，利益主体就愈趋于丰富性和多元化，进而社会给予人们的角色地位就愈复杂化，随之所谓社会身份也就愈明显化。正是在这样的进化环境中，竞争机制逐渐完善，人的智能和力量就以具体、现实的形式充分发挥出来。这也就是说，只有高扬个体价值的理性旗帜，才能使压抑着的潜力爆发、释放，而“身份”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体价值的“影子座标”，具有强化主体意识、增进社会有机体的内在活力的巨大调节功能与促进作用。因而它不是罪恶，而是进步，不是压抑，而是激励。

毛泽东的观念与此相反。他的社会发展观不是主动、积极地调动人的潜能，而是通过压抑个体而达到维持群体，削足适履地迎合和鼓励由于贫困带来的堕性。不能说毛泽东对“富裕”具有本能的烦感，但是他又的确把个体的富足视为万恶之源，甚至可以说，他对于个人的致富总是持有高度的警觉，并时刻感触到某种深刻的危机。自1956年2月以来，毛泽东反复讲“一穷二白”，认为农民要富，但不可太富。“中国又穷又白，穷就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做文章。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sup>②</sup>。“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

①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2页。

② 《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时才向货郎担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sup>①</sup>。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对外国评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的观点表示欣赏,认为这话讲得好,因为穷就有压力,就要革命,就要不断进取。“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sup>②</sup>。以后毛泽东干脆把阶级斗争说成“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因为“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说话,”而若干领导则“就要代表富裕农民”<sup>③</sup>。为什么会越富越糟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以抑制个体来促进群体的价值倾向。在他那里,个人与集体,个体与群体是此消彼长,彼消此长的对立产物,前者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相联系,后者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联系,二者水火不容: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sup>④</sup>“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sup>⑤</sup>。

显然,这也就是说,独立的、具体的个人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不仅是无价值的,而且是极有害的。因此,个体的“自我”丧失的愈彻底,群体的利益实现得也就愈加充分,当人们已感觉不到“自我”存在的确切位置和具体的生命意义时,当具体的人完全被群体掩

---

① 《1958年3月23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②③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④ 《1962年8月9日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⑤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盖、吞食并融化的某种集体人格的文化潜意识时，当个体完全、无私、整体地将“自我”奉献给社会共同体时，当社会身份达到均平，彻底被公共的“价值同构形象”所最终同化时，那么毛泽东观念中的理想“共产主义”就真正地实现了。不难看出，正是在“社会身份均平化”的竭力追求中，积淀下了个人独断的祸种。在一个失去“自我”的民族的头，必然高高耸立着一个超越一切、绝对实现的“自我”，一个远远超出群体利益需要的至上权威。如果说，卢梭含有内在矛盾的社会契约论，曾间接成为法国雅各宾派专政的思想武器，那么，毛泽东的均平身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实践，则更为直接地为“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上、文化上和潜意识形态上的准备。

这样，相信人民变成了自我的理想满足；群众运动实质则是运动群众；极度的苦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丧失自我的主体支撑着荒唐的欲动。理性被贫困所吞食了，发展被愚昧所阻碍了，这，在我们民族的悲壮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伤痕，同时也在人类宏观发展的诗章中写下了刻骨铭心的“反思篇”。

（选自《走向未来》丛刊总第8期）

# 第 四 编



## 通向“文化革命”之路

——关于“文革”产生的文化背景的一场对话

黎澍 戴晴

戴：今天，也就是在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20年之后的今天，大家都在谈论体制改革的文化背景，谈中华民族深层文化意念的变更。作为一位近代史学家与政论家，您觉得，这场讨论可不可以看做是一场真正的、悄悄进行着的文化革命？如果是这样，与20年前的那一场有没有相通之处？

黎：今天，与改革相适应的深层文化意念的现代化与那场“文化大革命”刚好相反。那是一场闹剧。廖沫沙说，那是“大革文化命”，把文化革掉。确实是这样，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厉害。焚书坑儒只坑了460多人，“文化大革命”整死了多少？谁也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数目。而该革的“四旧”不但没有革掉，反比不革还多些。宗教徒多了，求神拜佛的人多了。买卖婚姻也出现了，社会秩序破坏了，人们的思想失去了平衡，甚至脱离了正确的轨道。比如“向钱看”，硬是到了不可以常理忖度的地步，这是“文化大革命”提倡“破四旧”、禁欲主义和“穷过渡”带来的后遗症。应该说，今天的文化反思和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的建立，是整个民族面对着这一系列后遗症而出现的震惊与猛醒。如果说，这与“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相通之处，我想，就在这里。它确是一次无声无息、扎实清醒的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大挥大喊大叫的“革命”是大不相同的。

**戴：**那么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初衷究竟是什么呢——革文化的命？还是象 1942 年在延安一样，为进行政治斗争，先进行一场思想运动？

**黎：**现在看来还是政治斗争。他对身后之事不放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但他所凭借的，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这就是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有了这两条，人们就疯狂地“反修”，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那里。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几年，看到 1964 年、1962 年、1960 年，就会看出，那时的“反修”，是教条主义已经极端化的表现。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更僵得连弯都拐不过来了。什么都是资产阶级，简直使人感到坐立不安。其实中国有多少资产阶级？真正的资本家数不出多少。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无非是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体系，极端僵化的教条，谁动它一点就是修正主义。

**戴：**这种将战斗的、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起自何时呢？总不至于在本世纪初，当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选择救国救民之路的时候就开始了吧？

**黎：**没那么早，不过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极“左”思潮从来就有，是从共产国际，从斯大林那里来的。40年代初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奠定本始于同王明的斗争。按王明的一套当然是把中国革命断送掉，毛泽东当时的确是挽救了中国革命，的确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戴：**但这不是与教条主义的斗争吗？

**黎：**是，不过另一方面又必须表明，他忠于教条主义。王明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把王明整下去而不开罪于第三国际，只有这样办。实际上斯大林十分看不起中国人，根本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认为中国共产党成不了事。有一桩大家都知道的史实：1945 年，美国派到中国的大使赫尔利上任之前，先到莫斯科，找到莫洛

托夫，问他苏联到底支持中国的哪一派，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莫说支持蒋。随后赫尔利见到斯大林，又向斯大林要求证实这话，斯大林说：“是的，我们支持蒋委员长！”接着还证实了莫洛托夫讲过的“中国有人自称共产党，其实不是，就是一批人没有土地，分了土地就完了”。——根本瞧不起中国共产党。到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在一次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时候，斯大林说，“我们把中国问题看错了，中国同志是对的”。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他又怀疑毛泽东是铁托。为了表明不是，毛泽东不得不十分谨慎，极力表现忠于斯大林，学苏联学得非常坚决。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现在有人叫它斯大林主义的、死守那些僵硬的教条……

戴：如果说我们的教条主义是慑于北方的压力的结果，那么随着斯大林去世，压力解除，不是应该消失，至少是淡化了么？

黎：已经接受了整个体制，成了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搞体制改革就是改这个体制，不过很难改就是了。其实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私交并不好，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想强迫中国人就范，但这里不买你的账，于是乎就反修。修在哪里？赫鲁晓夫不过把斯大林的体制稍微变了一点点，我们就反。其实人家已经够教条啦！不过我们比他们还要教条。

戴：为什么对于教条主义我们那么容易接受，接受之后又那么难于抛弃？

黎：愚昧。愚昧从何而来，贫穷。还是这个道理。文化水平很低，理论水平很低，不知世界之大，只守着这一点点东西。教条主义拼命“左”倾，极“左”，口号是反修，还要防修，反映到经济上就是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认为人民不能太富了，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毛本人甚至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上搞成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无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

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佳土壤。

戴：在《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晚年就是这样批评的。但这种说法，究竟指一个问题的两个内容，还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

黎：个人专断是个人崇拜的基础。个人崇拜从哪里来的？还是由于个人专断……

戴：我理解的刚好相反：没有个人崇拜，专断是专断不成的。

黎：不然。个人崇拜，从眼下看，至少再出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而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广大，与中国小农经济联在一起。也就是说，一是有人要人崇拜；二是有人要去崇拜。你想想，萌芽在哪里？就在个人专断。不少人希望有什么事找个人点下头就行了，多痛快？！用不着开会，也用不着研究筹划，一点头，划了圈，拿出去就是依据，人家也就买账。个人专断是个人崇拜的广阔基础，也就是家长制。家长制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中国人历来有个习惯，叫做找靠山。年轻人到社会上混事，钻门路，靠山越硬越大越好。这就是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什么原则都没有，只有个人利益，这就是个人崇拜的基础。

戴：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过从文化的角度批判个人崇拜的传统？比如说“五·四”时候……

黎：没有，从来没有过，这是思想意识最深层的东西。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到了中国，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还是要的。在他与斯诺的谈话里就讲到：“谁不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呀，我看你就需要一点”。他既然坚持要个人崇拜，我们就一度把个人崇拜改为个人迷信，好象崇拜还可以，迷信才不好似的。其实这不过是在字面上做功夫。

戴：但是党内的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倒象是有个传统，是不是从陈独秀开始，几代领袖一直延续下来？

黎：是这样。你去查查看，文件上都批评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后来王明也搞，每个会上都拚命喊“斯大林同志万岁”，其实是在中国树他自己。

戴：党内喊“万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过一种力量，或者说企图，想打破这一套，但未成气候？

黎：恐怕还是从王明喊“斯大林万岁”开始的。党内喊“万岁”，开始并不习惯，延安的时候就有人在会上提出来过。连我们湖南的程潜，人家喊“蒋总司令万岁”，他说，“总司令还万岁，那怎么得了呀，你这样喊不是要叫人做皇帝吗？”民主传统从来没有建立，就是把皇帝推翻罢了。而推翻一个皇帝，后面跟了不知多少人想做，解放后出过多少皇帝？恐怕有好几百，“文化革命”当中就出了不少，什么山东、陕西等等，好象许多省里都出过。奇怪的是有人称帝，居然就有人拥护，就有人送女儿去给他当妃子，似乎这才是做皇帝的排场。自己想做皇帝，拥护别个做皇帝，都是帝王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特别是在农村，这种思想，直到现在也还不能认为已经绝灭，说不定什么时候怪事又出现了。如何消除？根本的办法。我以为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提高文化，三是普遍推行民主制，杜绝个人专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真进步了。但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多少年？一百年，还是几百年？很难说。

戴：但西方也曾经历过专制主义统治，他们的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是如何中断的呢？

黎：那不一样。在西方，从古代就有贵族民主传统。什么事须经哪些人讨论，什么事如何定夺，都有一套系统，对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独裁者往往会被搞掉，比如凯撒，比如庞贝。莎士比亚那出戏《裘力斯·凯撒》，写的就是暴君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回头一看，原来是最亲信的人勃鲁脱斯。问了一句：“是你吗？”就倒了下来，知道没有希望了。他们从来就有制裁独裁专制的传统，而中国

有的则是拥戴个人专制的传统，自秦以来，越来越厉害。明朝已经不得了，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连孟夫子都容不得，把《孟子》删掉十多处。为什么？因为孟夫子讲了“民为贵，君为轻”一类的话，这还得了？清朝比明朝还厉害，你看清朝的文字狱档案，那算什么呀？随便解释，拐弯抹角解释，就可以制造一个案子，诛九族，甚至十族，门生故旧全部杀光……

戴：其实回过头来看看，春秋时候还真有点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味道，怎么就没有延续下来？

黎：这是因为后来定于一尊。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为了定于一尊，汉朝制定“废黜百家，独儒术”；唐朝出了科举，大家读经书，然后考试。李世民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天下英雄都落到我手里来了。不干别的，就读那么几句书，然后来考官。到了宋朝，出了几个儒家学派，对明清两代大有影响。那时青年上学，读《四书》要读朱熹集注的，考试以此为据，不能有别的解释。念书的人一生精力都倾注在这里面了。

戴：难道没有人想过要反对这一套？

黎：无从反对起，反对就砍脑袋，于是产生如鲁迅先生说的奴性，它源于贫穷和压迫。我们看到好多书都描写反抗，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是反抗，而是如鲁迅所讲“求做奴隶而不可得”。

戴：然而却有“造反有理”这样的口号。我一直觉得，“文革”当中叫得最响、最普遍的“造反”，其实并不是叛逆，而是忠顺。

黎：“造反有理”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理解。至于造反，这使我想到了可以画一幅绝妙的漫画。你看“文革”中红卫兵手挥语录，口喊“万岁！万岁！”到处去破“四旧”。你看，这不是一幅满含讽刺意味的画面吗？人家门口一对石狮子，砸掉它有什么意思？有许多旧地名是历史的遗址，代表一个地方的特点。曾经在这里住

过或者逗留过的人，旧地重游，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也有助于回忆往事，全给改了，岂不令人扫兴？可是那时要做的不做，不要做的拚命做。自己脑子已经旧得够可以了，而破的却都是形式上的东西。应该说，毛泽东利用人家对他的崇拜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但有那么多人人都去崇拜，这就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了。

**戴：**这正是我要问的：为什么那时候成千上万单纯热情的少年——而且还是用最高尚的理想教育起来——会表现得那么残忍狂瞽？那么多身经百战甚至享誉中外的老干部、老学者都发了懵，让低头就低头，说打倒就打倒？

**黎：**大家水平都不高，只能这样理解。本来只要用脑筋想想，听人家几句冷静的话，好多事都可以避免。但那时天昏地暗，不辨东西南北，哪里听得进去？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轻信，培养你崇拜，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一片声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中国的事情、外国的事情、历史上的事情、身边发生的事情究竟知道多少？老实说，实在不多。对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毛泽东说过，这种事在西欧那些国家就不会发生了。这话的意思是，西欧国家民主传统比较稳固，文化素养高。文化革命在中国发生不是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了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遗产，本来就不行了，还舍不得丢掉，因此学习外国，吸收科学和民主精神难以彻底。学了多少年了？从“五·四”算起，60、70年；从清末算起，100多年。直到“文化革命”，我们脑子里还是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不问所犯何罪，已是罪该万死。什么是“走资派”，“走资派”该当何罪？我问了10年，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讲你非法，其实他随便抓人、关人、捆人、打人、侵犯人身自由。谁非法？谁犯罪？但那时脑子里没有这些东西，大家都处于愚昧状态。

戴：您认为，1966年的这场大动乱的发生，究竟出于偶然还是必然，他为什么偏偏选“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字眼？

黎：必然。为什么？就是刚才讲的，有了愚昧，就有教条主义，就有个人崇拜，就受人利用、任人宰割。至于“文化”，60年开头恐怕是想把运动范围框在文化之内，革文化的命。其实解放以来一贯这样，一直在文化圈子里对文化人下手，《武训传》、胡风、《红楼梦》、胡适、《海瑞罢官》，一路下来，没有停过。对有知识的人不放心，只喜欢那种什么都没有、听话、让干什么干什么的人……

戴：那么，有没有偶然性呢，比如有了江青这么个人，又比如张春桥、姚文元的启用？

黎：没有。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份，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权力大了，地位高了，人就变了。至于文化界有人投靠，不是张三就是李四，总是会有的。

戴：您认为，类似“文化革命”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会不会重演？

黎：历史总会重复的，特别在基础不变或几乎未变的情况下；但它决不可能在原地原样重复。历史的发展是螺旋状，这是谁都知道的。圈子转得有时候密一点，有时候疏一点，不一样。如果老在原处转，进步就停滞了。当然人物情节可能不同，但性质总是相近的。

戴：这么说来，防止类似的民族悲剧重演，唯一的办法是变更基础了？

黎：只有基础变了，历史发展的轨道才真正变了。我过去曾相信情形会一下子改变，现在看来不行，一定要在和平安定的环境

里，“和平演变”。革命现在看来是不得已的事，最好不要革，要靠教育发达，文化繁荣，还有民主精神生成。而这些还是有赖于生活富裕。一个人经济上独立了，思想就独立了，精神也就独立了，否则老是想着要去依附他人。

**戴：**最后想要请教的是，这样一场牵动 10 亿人的大革命，不会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吧？

**黎：**当然不是，至少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觉醒。这觉醒集中表现在改革与开放。改革，就是不要教条主义；开放，是减少愚昧。但我们国家人太多了，要想改变体制，满足需求，很不容易。现在面临最大的难题是人口负担，但也只有背上，昂起头来向前走下去。

（原载 1986 年 9 月 22 日《世界经济导报》，收入本书时，编者对一个句子做了删节）

# 昨天与今天

## ——关于“文革”的谈话

王绍光 蔡崇国 程颖

程：你们俩为什么选择“文革”这个大题目，也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王：我从来以为，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今天。一个社会在动荡的时候，社会的基本矛盾便都展开来了。这是研究它，把握它的最好时机，“文革”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它把社会的各种矛盾，乃至最细小的矛盾都以放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把中国社会无论是传统的东西还是解放以来我们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包含的矛盾都以夸张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甚至推向极端。这种放大的作用，就象研究生物，用放大镜、显微镜一样。“文革”的作用，它本身的影响，同我们现在遇到的大量问题，不论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都有着直接的联系。研究“文革”，对于了解中国，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性格，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蔡：“文革”将中国的矛盾在时间比较短，空间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表现了出来。具体说来，当时我国整个社会，就象列宁讲的，经济浪漫主义，追求一种道德的，伦理的目标。我们过去所谓政治挂帅，从理论上讲，就是追求道德伦理的目标，以这个为第一，而这在“文革”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王：你所讲的这种浪漫的经济，在西方叫作“道德经济”。这

种经济实际上就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

**囊：**它实际就是把我国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道德化，一切都以服从提高人的道德精神为基本目的。也就是说以平等为目的，而不是以效益为目的。这种东西有更深的背景，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延续。它第一个背景是国际背景。从卢梭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的道德似乎不如古代社会了。这对卢梭这样一些思想家、文学家来说是痛苦的。社会是发展了，可是失去诗意，失去自然社会牧歌式的和谐。这和谐被大工业破坏了。在一个时期中，西方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带来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道德沦丧。这使我们中国一些人，一方面为我们的落后不安，另一方面又为我们的高尚而自豪。所以他们就希望，中国既有西方现代社会的发达，同时又有传统社会的高尚，想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不仅是中国，而且是现代社会以来，西方一批科学家、思想家、道德家、诗人的理想。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工业的发达与缺乏诗意的矛盾，也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矛盾。这里所谓感性，就是追求审美和道德的完美境界；从理性来说，人们必须发展技术，发展生产力。人的真和善的矛盾、效益和诗意的矛盾在现代社会很尖锐。

再一个背景，新中国建国前夕至 50 年代，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那时人们有一种共同的愿望，即打倒蒋家王朝，破坏封建的地主经济，同时在城市破坏封建官僚经济。人民对这些旧的社会形态深恶痛绝。共产党领导人们打破了旧秩序。50 年代就使得个人的利益同社会的普遍利益比较一致。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显得不那么自私，因为他认为个人的利益首先表现在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去。加上 50 年代人们的道德确实比较高尚，生产力也发展较快。这使我们党内产生了一种认识倾向，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王：这个还可再往前追溯一点。1840年外国列强打进来，把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打破了，同时也使许多人（主要是农民）以前的地位保不住了，新的地位还没有得到，这时候就容易产生革命，他们希望重新回到一种稳态。尽管农民所期望的那种稳态同共产党要发展工业经济，同时又保持平等的社会目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但在推翻蒋家王朝，在“破坏”这个层次上，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50年代，人们的精神比较高涨，同当时恢复性的经济时期有关。当时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21.4%的增长率。所有制的改变，也的确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多数人地位上升了，生产发展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和个人利益的实现在这里达到了普遍的一致。这样，人们就普遍把社会的发展看作了自身的发展，于是考虑自身同考虑社会就是一个方向。这时候的人绝不是禁欲，不考虑自己，而是他自身的要求在当时同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于是带来道德的普遍高尚。这点有很大的历史惯性，我们许多人就希望把这种战时或革命时期的道德普遍高尚，或者说这种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的一致持久化，把保持人的道德高尚放在第一位。

所谓的道德高尚，我理解，就是要造成一种平等的社会。毛泽东的想法，尤其是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想法，体现的都是这种思想。穷一点无所谓，但要平等。公社里那些破破烂烂的桌子、碗呀什么的，合在一块儿，大家都有饭吃就行，所以讲“穷过渡”。在穷的情况下，大家不要互相争夺，而要彼此谦让；慢慢地又加进一些东西，如必须认真工作；逐渐再加进一些政治化的东西，听领导的话，汇报思想，帮大家做好事儿，互相关心，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有点儿类似《水浒》中那种传统的东西。

蔡：这种讲平等，讲道德高尚，其实是现实经济制度的要求。当时我们选择苏联模式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模式本身缺乏激发人的积极性的动力。一切都是从上往下的。个人的利益同整个生

产的发展在这种体制下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王：50年代中期就有些工人抱怨，那时已经卡得很死，他们说，我们现在还没以前自由。

蔡：这个东西有点儿象大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同自由散漫惯了的小农出生的人在心理、习惯上的一种冲突。他们不希望过这种不自由的生活。

程：王，你曾说过，你认为“‘文革’不会再发生了”这种说法是浅薄的，是吗？

王：持这种说法的人有两点根据。其一：老百姓吸取教训了。其实，人是最健忘的，整体的人是难以吸取教训的。其二：我们现在没有了毛泽东。那么，到底是我们这个民族培养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培养了我们这个民族？如果民族需要那种登高一呼的领袖人物，这种人物就会应运而生。所以，仅仅说因为没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就不会再发生“文革”的说法也是不合逻辑的。

程：王，能谈谈国外研究“文革”问题的情况吗？

王：就我所看到的英文资料，大致有100来本专门涉及或主要谈“文革”的书；论文总有上千种，除去英文的，香港的中文的就相当多了。国外研究“文革”的人，现在主要是研究毛泽东。关于他为什么发动“文革”，有好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因为毛泽东同其他人如刘少奇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纯粹的权力之争；第三种意见认为二者兼而有之。国外现在基本上从这三个方面研究毛泽东。也有一部分人开始着眼于分析中国的社会秩序。

程：有些什么专著吗？

王：有一本书叫《天籁》，台湾翻译的，写个人的经历。再就是梁恒写的《革命之子》。另外，最近有一套三卷本的，叫《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现已写了两本。这是从解放一直写到“文革”，现在还

没写到文革。它主要讲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

程：你认为国外的这些研究者思路是否正确？

王：很难说他们的思路对不对。他们常常缺乏一些侧面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料。比如，我觉得“文革”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研究：第一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做这方面工作的人较多，但还不够；第二就是当时中国的制度不能阻止毛泽东和其他的几个人发动这场运动，这个层次做工作的人较少；第三是群众为什么起来响应，这也做得很不够。所以，我觉得他们没能从各个方面去做研究“文革”的工作。再一个，他们毕竟没有亲身经历，对“文革”中的那些气氛，没感受，要么过于夸张了，要么没提到。

程：目前国内的研究情况呢？

蔡：国内有很多人做这些工作，但，要么没完成，要么完成了，很难出版，发表。发表了的一些，很难说是科学研究，多数是回忆，批判，或是感情的发泄。他们共同的问题，一个是受历史条件，政治条件的限制，难以做到公正；再一个是缺少冷静的理论分析；没深度；第三是缺乏历史感，总是拿今天的眼光，以今天的感情去谈说过去，总是以现实政策的思维框架去统摄过去，而且那种感情因素太重，他们忽视了“文革”是亿万群众参加的运动，好象“文革”只是发生在上层。

“文革”研究实质应是对现实的冷静批判。它的困难也在这里。不过，只要有理论素养，有历史感，有政治智慧，科学研究并不是不可能的。

王：这方面的一个缺陷是，文章多是描述性的，不是分析性的，只讲发生了，不讲为什么发生了。也就是蔡说的，没理论。当然，这与理论环境是否宽松有关。另一缺陷是，研究要大量占有材料，而人们却很少坐下来收集资料。

另外，讲到群众的热情，一些人老爱将之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影响。这是文化热的威力影响到“文革”的研究。其实，“文革”前群众的心理，主要是当时的高度集中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建构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是主要的。

王：“文革”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我们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不研究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不研究中央当时为什么不能阻止“文革”的发生，而主要研究群众。

程：你认为研究“文革”中的群众有什么意义？

王：首先是吸取教训；再则是发展到政治理论。在国外，政治中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是很发达的，且有各种理论。我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是认为群众有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是无意识的（他可能以为是自觉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群众卷进去，是因为受蒙蔽。我的研究告诉我，不完全是这样。说是受蒙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文革”卷进去的许多人，他们不愿正视这段历史，要开脱自己；第二个原因是，他真认为自己受了蒙蔽：我当时真蠢，就这么响应号召，结果吃了许多亏。实际上当时他们并不是全受蒙蔽，他们的下意识在左右着他们理解毛泽东的各种号召。事实上，如果都是受蒙蔽，那么就都应该是一派，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一派，而实际上却分了许多派，而且派分得非常明显，这与各派人物的经历、地位很有关系。

程：蔡，我读了你的《论一九六六年》，是从我国的社会生活及生活方式的分析中揭示“文革”发生的必然。听说你还要写群众与“文革”的关系的文章，是吗？

蔡：是的。不过，我讲群众运动，与王的角度不同。我主要从“运动”这点上讲，大规模的、虽有间断却是持续着的群众运动，怎样使社会阶层分化，使群众心理有不健康的趋向，使社会状况的病态日趋严重。比如，持续的运动产生了一个数量较多，权力较大的一个阶层，他们的习惯，价值观及利益都附在运动这种社会活动方

式之上，他们的这些东西都与社会经济及科学发展的要求格格不入，然而，他们又有决定政策及人事的极大权力，这就使中国的社会很难走向以经济、科学发展为中心，以民主、法制为保障的社会，就使我国政治背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要求而去适应极抽象的习惯、价值观，去适应一部分人的利益。运动又使群众及社会精英的真实的，本能的东西，为免遭个人的孤立而压到无意识的精神深处，造成一种广泛的精神不健全的社会症状。这使人们不是全神贯注地面向社会的真实及自我的真实，不是去开创前进的道路，而是整天担忧，观望，去注意构筑各种堡垒来保护自己，从而使精神萎靡，个性泯灭，而这是最大的民族危机。

我还准备写“文革与新生事物”一文，具体剖析诸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农兵上大学、知青上山下乡等“新生事物”。因为这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何况，在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当时的中央提出：对“新生事物”抱什么态度，也就是对“文革”抱什么态度，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我基本的方法，不是将“新生事物”完全看作是荒诞的，而是首先分析它的历史背景及合理性的片面。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58年的苗头开始——更早，是中央鼓励农村的中学毕业生回乡生产——到1968年形成高潮，其历史背景就有当时就业不充分，学生脱离实际，教育脱离生产，农村文化落后，中小学毕业生奇缺而城市的知识青年大量赋闲在家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这合乎理性的片面如何被推向极端，是什么东西将之推向极端的等等。

我还想写写“文革”为什么会失败，它怎样唤起人们的热情和期愿，又怎样使一个又一个阶层失望、冷漠的。还可以将“文革”抽象化，将其看作是一个中性的社会改革运动，从策略上考察它的失败原因，这是意味深长的。如“文革”没有理论准备，谁也不知道它要破坏什么旧的东西，不知道主要建立什么新的东西，这破旧立新

的社会基础、依靠的力量又在哪里等等。

最后，我还想考察“文革”的历史后果。这个历史后果影响非常深远。一方面，它使人们对“文革”前、“文革”中的经济、政治制度非常失望，从而为今天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中止、掩盖了“文革”前的社会弊病及各种矛盾的发展，反衬出“文革”前的繁荣，这就增强了“文革”前的社会的历史惯性，这又是今天的改革的困难所在。

程：王，你正在写关于“文革”的博士论文，我感觉到了你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文革”不完全是一个受控的过程。是吗？

蔡：也就是说，“文革”的发起、发展如果是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每个重大事件是按毛泽东的意志发生，如果是这样，就是受控过程。实际上不可能是这样的。对吧？

王：从过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开始，毛泽东希望“文革”能快速发展。但工作组派到全国各地，等到毛泽东回到北京，把工作组又都撤了。后来北京出现的“反四旧”，并没将矛头指向走资派，“反四旧”很难说是毛泽东支持的。这“反四旧”实际上还是按传统的做法，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与领导作对的人。然后是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是要批倒刘少奇，结果呢，以前受压抑的人一起来，大量的矛头是对以前整过自己的另一部分人的。结果引起了一种群众斗争。到了1966年底毛泽东讲1967年是“文革”全面胜利的一年。当时没有提夺权。1967年初“一月革命”出现了。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权夺过来，然后再干别的。但一夺权，全国各地，各省、中央的部、委，夺权之后就是分裂。张春桥也讲了上海经过的几次夺权，根本不是向走资派夺权，而是相互夺权。这样打来打去，毛泽东又觉得不行，于是提出三结合呀，解放军支左呀。解放军一进来，又将事情弄偏了，将毛泽东寄以希望的左派打了下去。然后到了4月份再提出领导要正确对

待革命小将，不要压制革命小将，让革命小将出来。革命小将一出来，却导致了全国性的分裂，没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来。全国抢枪，全国大打，这就远远超出了毛泽东的想象。1970年毛泽东接见斯诺时就讲，1967年7~8月是全面内战。他后来讲“文革”有两个弊病，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那时候他已失控了。往后是成立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之间打了起来，成立革委会非常困难。直到1968年7月，毛泽东接见北京的五大领袖提出“黑手”问题，说黑手就是我，就是我派工宣队去压制你们的，谁要是再顽抗，我就派部队围歼。措词很严厉，他想压住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这样，到了清队，就将造反派这股社会势力压了下去。“文革”的前三年，大家都认为是最主要的几年，这段时间局势很少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发展。

**程：**推动群众运动的某种力，除了来自毛泽东的领导外，还有什么呢？

**王：**是群众运动自身的逻辑。说细一点就是社会的各个集团有不同的要求，这形成各个力的线，最后走的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这个线不是哪一个集团的意愿，也不是毛泽东的意愿，是历史的作用。

**蔡：**从理论上说，就是社会的改变，只能通过社会的力量。理论、思想要对社会起作用，单靠自身的直接作用是不行的，它必须与一定的社会集团相结合，变成一种社会的运动、社会的力量才能起作用。而一种理论、思想与一定的社会集团结合，就会改变自己。它激起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往往与自身离异，甚至会反对自己。就毛泽东来说，他有自己的理想。他要用自己的理想改变社会，就要使自己的思想与群众结合，变成群众的要求，变成群众运动。问题是，群众是具体的。第一，群众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利益要求；第二，他们有不同的文化素养和不同的心

理。他们按他们的利益要求，按传统文化建构的心理，按他们的文化素养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这样，毛泽东的思想与群众一结合，往往就变成了与毛泽东的思想本身相离异的一种东西，他也就难以控制。换句话说，群众运动一旦起来，就与引它起来的那种思想拉开了距离。

程：现在我们是不是谈谈为什么群众会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你们能不能同意“群众是受蒙蔽，是盲从，是糊涂”这种说法？

王：我完全不同意。说是“毛登高一呼，亿万群众起来，”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起来响应号召，慢慢才越来越多，有个“理解”的过程。还有个个人崇拜的作用。在中国出现个人崇拜，这有很长远的历史根源。一方面，如马克思讲过的，小农经济希望从上面洒下阳光雨露。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我国革命史上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根据地时很多人就觉得，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象王稼祥、张闻天这些党内的知识分子，在1941、1942年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时，都起过非常大的作用，而他们以前都曾是毛泽东的对立面。还有陈毅，后来却信服了。1943年政治局作过一项决议：政治局的意见不一致时，毛主席说了算，有最后拍板的权力。先是党中央对毛的崇拜，然后扩大到全党，再扩大到全国。我们国家有一种基础，需要个人崇拜这个东西。有一位作家的一句话说得很对：是老百姓的烟火熏黑了菩萨。

程：刚才讲的如果是群众受蒙蔽的一面，现在应谈谈不受蒙蔽的一面。

王：要认识到，个人崇拜只是一种服从力，它不能原本地解释偶像发出的信号。毛泽东有他的思想，大家都可以崇拜他。但，大家却可以不同地解释他。按弗洛姆讲的，社会无意识是存在的，无意识的东西往往是本能里边至关重要的。你觉得你相信的东西往

往不是你真实的东西。在“文革”中，老百姓却认为自己的解释是按毛泽东的真正思想来的。实际上，各社会集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当时至少有两个毛泽东。简单地说，造反派有造反派的毛泽东，保守派有保守派的毛泽东，他们都真诚地相信是在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

**蔡：**实际上，他们的解释，遵循的是他们自己对毛泽东的理解。

**王：**扩大点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毛泽东。说受蒙蔽，在大家都相信毛泽东这个角度讲是对的。但，你又不是受谁的蒙蔽，是你自己有这个内心需要。自己是自己的蒙蔽者。

**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受蒙蔽者？

**王：**从根本上没有。

**蔡：**“文革”开始，最先投入的是学生。学生起来造反是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看看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起来造反的过程。当时，毛泽东说搞教育革命、文化革命。而很多中学生也正感到不满：有的是工农子弟，家境贫寒，条件不好，成绩较差，上大学竞争不过资本家、干部的子女，故有的人就提出造考试制度的反，不要考试；那些成份不好，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在当时体制下也受压抑，深感前景不妙。

其实，这里还有些心理上的原因。比起埋头读书，做作业，考试来，造反是一种精神的渲泄，很刺激，很好玩，又能因此为人所敬畏，象阿Q那样，可以大胆地骂赵太爷一声：妈妈的。于是人们就纷纷造反。其中也有对教育制度表示反感，对强制灌输一些无用的知识表示反感的原因。

**王：**最先起来造反的学生，是一些干部子弟。他们觉得大学的学生构成不合理。如清华，有40%的学生是成份“不好”的，还有40%是非劳动人民子女。只有20%是工农子弟。工农、革命干部

占人口绝大多数，而在大学，甚至好的高中里，他们的子弟却不成比例。这种现象引起了不满。但1963年以后这种情况有变化，出身不好的上大学非常困难。1966年又提出把政治表现作为上大学的条件之一。

蔡：说这些，就是要指出，当时毛泽东的号召为什么易为人们接受，是因为这些号召与人们当时的地位、与改变自己地位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仅讲个人崇拜和受蒙蔽的作用是不行的。

当时一系列的政策及社会状况导致不满的问题，在工厂里也有。比如，工人、干部中不乏能力强的人，但是只因说“错”了话，得罪了上级，或因成份、社会关系中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不能享有公正的待遇。相反，一些能力差的人，只要关系好，社会关系清楚、成份好，就可以上去。决定一个人社会及经济地位的，是成份、与领导的关系及所谓的政治表现而不是能力。毛泽东的号召使他们得到了合法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地位，故按自己的逻辑起来造反，投身“文革”。

当然，不是说有了不满，号召造反、革命就是正当的。问题在于，是哪些人不满，这不满有多大的强度。革命、造反的合理性应建立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上。

程：蔡讲了群众怎么起来及“文革”前的社会矛盾。我希望你们再以群众运动的逻辑讲讲群众运动。

王：社会有两种不同的根本的价值观。一种是平等的价值观，一种是自由的价值观。平等是讲结果的价值观，自由从本质上讲是指机会均等。资本主义信奉机会均等，社会主义社会则追求结果平等，这两个大家都觉得是好事情，可以结合，实际上很难结合。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往往是不平等引起的而不是不自由引起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一样了，往往是不自由引起的。追求自由是一回事，追求平等又是一回事。追求平等就得

限制自由，因为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社会地位也不一致，不限制就会造成不平等，因此得限制一些人的自由。限制就得有一种政治强力，而限制本身的持续，这种实行限制的政治强力制度化之后，本身就成为一种高居社会集团之上的力量，这就是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反而造成社会的不平等，这一点，在“文革”以前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得较明显。

作为保证结果平等的政治力量，一定会表现为国家干部等权力日益增大的社会力量。他们由政治上高居于他人之上，日益转变为在社会地位上、经济上高居于他人之上。但，这个转变，“文革”之前并没有完成。那时，医生、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也是较高的，所以，有许多人并不想当干部，并不是像现在，人们的当官意识这么强。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文革”前也不严重。外国一些人写文章，说中国“文革”前经济上出现了分裂，出现了新的阶级，经济上的不平等引起了造反。在我采访的所有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说当时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造反，往往说起的，是政治上的不平等，而这个政治上的不平等常常是追求结果的平等引起的。“文革”前的社会，人们政治上的不平等来自两种社会分化，第一种我将之称为阶级种姓化。解放后，我们实际上将阶级种姓化了。你是这个阶级的人，就是这个阶级的人格化的代表，你的下一代也是。在“文革”中有人提出来，出身好的是红烙印，不好的是黄烙印，出身坏的是黑烙印，就象奴隶的烙印。那些出身不好的，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这就造成很大的社会分化。出身好的，不好的，很清楚自己的命运。第二个分化是先进与落后之分。“文革”前提倡一种道德精神，要像白求恩、张思德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你看“文革”前的报纸，越往后你这个人就越不能有一点缺点，否则就不是纯粹的人。先进与落后之分的矛盾很大。“文革”前有一大批“落后”的人，这些人往往是因为能力过剩或小调皮而“落后”，他们受到很大

的压力。当然，仅仅有压抑感还不足以使人起来造反。如果一个社会能给人以各种出路，就是说，你在这里受压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如中国老话所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这就能使压抑感释放出来。这就是有“出口”。如美国人讲，受压抑，有找出口、抗议、服从三种选择。有出口，抗议的力量就小。而“文革”前的社会没这样的出口，或者说，出口越来越小。比如说，以前，出身不好的学生，政治上没出路，可以在业务上搞出名堂，去做专家。到1963年左右，出身不好的上大学的机会很少；1966年有人提出出身不好的根本不让上大学，这个出口就堵死了。人们的压抑感无处释放，就会积累。

如果想跳出国家安排的束缚，自己干，那么，还有一条线牵住你，这就是档案。你到那里，档案便跟到那里，档案不存在，你这个人也就不存在。你再好，档案里有一点说你是个坏人，你就是坏人。这样，社会就缺少出口，压抑都沉淀下来了。政治运动也一次又一次地将各种人赶到自己的对立面。一方面有压抑感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种压抑感越来越强烈。

到1966年，社会把这种压抑感变成公开的耻辱。在有的学校，站队，红五类在前，非红五类在中间，黑五类站后边。红五类可以唱《东方红》，非红五类可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黑五类什么也不能唱，还有人朝他们身上吐唾沫，胸前挂牌子，家里也挂上什么成份的牌子。还有抄家，使压抑感达到了爆发的边缘。转折的标志是1966年第13期《红旗》杂志的社论，它说，我们批判的矛头不是指这些人，而是走资派。这些人因此就爆发了，起来造反。

这些使我们看到，“文革”爆发前的17年积淀了什么东西。

程：除上面你们所说的那些“文革”前导致人们不满的社会问题外，还有什么吗？

蔡：当然有。没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法制保障导致政策的急

剧摆动，常常使一些人因此倒霉。上面精神的突然改变，总是将贯彻前一种精神的积极分子抛了出来，跌落在地，起码使他们难堪好一阵子。事实也教训了人们：什么事都要看一看再说，消极圆滑最安全。

还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前的舆论宣传体制。“文革”前的舆论工具没有沟通当时的政治、政策与社会真实的联系，相反，它只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以粉饰现实的方法隔离了政策与社会真实之间的联系，使当时的政治缺少不失真的信息来源。

程：让我们换个话题吧。“文革”中有一种特别的现象，即“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这两派的形成是否与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同有联系呢？

王：这要在对“文革”前的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的分析中得到说明。“文革”以前，劳动人民，包括干部，较之1949年以前，经济状况有了提高，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这是“红五类”。所谓“灰五类”，即一些职员、中农出身的等等，社会地位没下降，经济地位变动的幅度不大。所谓“黑五类”，经济地位有所下降，政治、社会地位大大下降了。当然，这是与自身的比较，是纵向比较。横向比，“黑五类”，包括一些“灰五类”，经济地位虽下降了，但也不比其他入差。如资本家，经济地位较过去下降了，其家庭生活也比工农强。一些职员也是这样，社会地位也不比工农差，但政治地位却下降了。一个社会对各阶层来说，如果政治、社会、经济地位这三种情况的变化是同步的，倒没什么。如果不同步就造成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不满意的地方。

藁：群众起来造反，他们之间的对立，其原因有时简单到好笑的程度：他造反没与我通气，自傲，我就要成立一个组织反对。这里有个对群众的认识问题。过去我们一直靠群众运动这种方式来解决我们许多政治社会问题，其思想方法上的根据，是将群众理想

化、概念化。实际上，群众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为利益关系不同的阶层，其中的每人又因其文化素养、个性不同、经历不同而有不同的心理倾向与要求。号召他们去搞政治运动，他们总是按自己的文化素养、利益要求及个性习惯去领会、从事这个活动。对社会、集体乃至个人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只能靠理论的抽象才能实现，群众之多数不可能自己直接走到这一步。常常有这种情况，他们因极小的因素对立了，而一旦对立，在那个条件下，微小的对立因素就会膨胀。因为是对立的两派，就得对立下去，争个你死我活。到头来，究竟是因为什么，谁也不知道。

在今天，我们一定要反对那种将群众、“工人阶级”等概念化、理想化的倾向。一旦我们撇开这柏拉图式的理念论方法而去看真实的群众，我们就能理解“文革”中群众组织为何长期对立。

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群众组织的协调。1968年4至7月，开了一个全国的造反派的联合会，这带有组党的性质。这些，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北京的几大造反组织。因为发展下去，它们就要组党，这就很危险。

蔡：而毛泽东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制止了群众组织的这种发展，并取缔那些组织，他也就极大地削弱了自己的基础。

王：毛泽东在“文革”中否定了一切权威，包括党的权威、“文革”前很神圣的理论、制度的权威，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权威，这就将自己的根基逐渐除掉了。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程：王，你曾说过，毛泽东提前发起了“文革”，这是否说，没有毛泽东，“文革”迟早也会发生，即“文革”是不可避免的呢？

王：不能这么说。不能将社会的必然性作这样的理解。我们说“文革”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是说它的发生发展不只是哪个人的

意愿起作用，它有其内部的矛盾根据。苏联没有“文革”，唯中国有，比较起来，中国有许多苏联所没有的社会矛盾。如苏联没有上述阶级划分种姓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等。

蔡：在社会领域，没有人的活动，任何必然性都不会自发地实现自己。从这个意义上仍然应当说，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革”。不过，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大题目了。

# 毛泽东晚年文化思想散论

何 平 朱学勤

## 一

毛泽东是政治家，是诗人。他不是、也不屑于成为一名刻板的学者。他的思想一泻千里，奔腾跳跃，常有惊人之笔，但语汇粗拙、笨重，始终缺乏一个规范、精致的表达形式。他几乎从未给他使用的概念以明确的界说。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时曾发现毛泽东有用政治名词说明问题的习惯，这种习惯显然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这些政治术语妨碍了人们对潜藏其后的丰富的、超越政治规范的文化思想的认识。生硬的政治术语不仅迷惑了别人，有时也迷惑了他自己。

不言而喻，毛泽东在大量采用政治术语的时候，某些错误的政治理论必然孳入他的文化思想。就是属于他文化思想范围内的某些理论，也曾做过大规模的、以失败告终的试验。对那些曾经为人们异常熟悉的理论做新的文化解读，势必将面对一个情感上、心理上的巨大考验。重新审视这笔含混不清的遗产，首先应该期望足够的成熟和从容。

## 二

在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有一个占中心地位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他屡次告诫人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

搞修正主义。直到去世为止，他每年都会用差不多同样的语言重复这个主题。颇堪玩味的是，毛泽东几乎从未认为有谁符合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几乎从未说过哪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连“懂马克思主义”这个平常的肯定之辞都很少使用。如果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那在毛泽东身边并不缺乏足当“马克思主义者”称号的专家；如果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指他本人的一系列政治性指示，那按照当时贯彻“最高指示”迅速、彻底的程度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不胜其多。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大异于常人解释的独特内容。

这一“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引人注意的特点。第一，它不能通过表面的阅读来把握。1964年9月10日，一些来访的法国人对毛泽东谈及他们访问西安某技术学校时，发现那里的学生能背诵毛主席的著作，并用毛主席著作中的话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毫不在意地回答：好不好，要看将来。现在他们所学的只能当资料。毛泽东还屡次强调深入实践对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这种“总体性认识，深层把握，行为传递”（这是我们对毛泽东之“马克思主义”体认方式的概括——作者按）的特征，正是文化传播与一般思想传播的区别所在。第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议论，主要是针对文化部门的。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最经常地指向理论界、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卫生界，这是他观察文化部门的结果。毛泽东晚年对文化部门知识分子的最高赞赏是“老九不能走”，根据即在于：“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懂点马列的。”<sup>①</sup>

---

<sup>①</sup> 转引自《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不妨设定，这一“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对他晚年文化思想的概括性命名。

### 三

作为一位有力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极大地调整了亿万人思想流向的巨人，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历史观。

毛泽东的历史观是奴隶史观。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党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而绝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这篇在党内斗争中产生的即时之作，以明确的语言表达了毛泽东长萦于怀的对历史根本问题的思索。“奴隶史观”是理解毛泽东晚年文化思想的一把钥匙。

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发言可以追溯到更早。1965年8月出版后风行全国的《毛主席语录》第二部份的头两段话，就是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对他历史观的表达：“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谁不了解这一点，就不懂得最起码的知识”。44年之后，毛泽东在病榻上几乎一字不差地再次重复了这段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他只另加了三个字：“包括我”<sup>①</sup>。

毛泽东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是由最底层、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但历史创造者在历史上遭遇的命运却极不公正，他们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种意义上的被压迫者。这样，必然发生革命。革命就是为了反抗压迫，“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搞革

---

<sup>①</sup> 《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讲话》。

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sup>①</sup>一切反抗压迫的斗争都是合理的——造反有理。但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的社会结构。毛泽东注意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革命是一种感情……人不会喜欢一辈子都背着革命的担子”<sup>②</sup>。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他的历史观仍然坚信不疑，被出卖的革命（他称之为修正主义）将是下一轮革命的起点。“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呢。”<sup>③</sup>

毛泽东晚年基本上不注意自己理论思想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新见奇想，常常散漫出之，使人难得要领。独有当他作为一个诗人长吟挥笔之际，他的思路才变得异常的明晰、透彻。他于1964年填写的《贺新郎·读史》，以诗为论，一咏三叹，完整地表达了他的“奴隶史观——革命论”思想。词的下半阙为：“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一部廿四史，毕竟必须从“盗跖庄跻”说起，必须从奴隶“奋起挥黄钺”说起。

#### 四

在毛泽东的历史观照中，最使他激动不安的是与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但比这种压迫更为深刻的是文化压迫现象。底层群众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文化创造者。底层群众创造了各种文化活动的

---

① 《与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7月5日）。

② 〔法〕安德烈·马尔罗《回忆录》，纽约1968年版第384页。

③ 《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讲话》。

前提,同时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奴隶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在品质上比上流人物、高贵者的文化要优越得多。然而,文化的创造者却不能享有文化,社会的主流文化、规范文化对奴隶的文化创造断然拒斥,奴隶在文化上被官方规定为卑贱者。因此,毛泽东呼唤的社会革命就必然以文化改造、文化革命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他特别倾心于下层群众对规范文化、精英人物的对抗姿态。“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句卢梭式的名言即是他对历史的总结,也是他观照现实的出发点。

50年代末,他曾批文教请中央工交各部门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二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他坚信:“‘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sup>①</sup>

1962年,他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语中写道:“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轻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会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些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现在许多大学教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的工人反而有发明。”

挑战——战而胜之,当下层群众的非规范文化与主流的规范文化处于这样一种关系时,毛泽东最感满意。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根本的革命之前,在下层群众终于能自由、全面地创造、

---

<sup>①</sup> 1958年5月18日的批语。

表现自己的文化之前，非规范文化最宝贵的品格或者表现为对主流的规范文化的批判和叛逆，或者表现为不是迎合、而是背离规范文化的创造。批判和创造，是奴隶文化的精粹，是奴隶和奴才的根本区别。对后者，毛泽东深恶痛绝，他厌恶武训，鄙视贾桂，他宁愿为阿Q的革命欢呼也不愿接受“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合理主义。

## 五

毛泽东晚年文化思想中最尖锐的部分，大概是对整个规范化，对所有文化部门排炮般的攻击。

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晚年在政治理论上的失误，在于毛泽东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观察社会而得出的曲解事实的结论。

然而，即便将这些政治理论前提抽离，毛泽东的批判仍然有它自成一格的论据。

李泽厚认为，中华民族有四大实用文化——兵、农、医、艺（首先是技艺），这四大实用文化对维系中国民族的生存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sup>①</sup>。毛泽东晚年实际上正是有意无意地以这四大实用文化专家的身份来发表他的高言谰论的。

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杰出的军事领袖的地位无可怀疑。他对自己成功经验的总结是：一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sup>②</sup>。他认为，现在的军事院校办得一塌糊涂，“过去没有军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院校。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院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我们各

<sup>①</sup> 《中国思想史杂谈》，《复旦学报》1985年5期。

<sup>②</sup> 《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4月15日）。

军区的司令员过去都是老粗嘛！”<sup>①</sup>这些老粗，凭借着“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关张赵马黄的武器”<sup>②</sup>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结论是：“书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战场就是学校”<sup>③</sup>。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毛泽东一生都保持着对农学的兴趣，他在这方面有着足够的自信。他手订的“农业八字宪法”现在已被人逐渐淡忘，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失为稼穡之学中的一家之言。他对现代农业教育体系极度不满，以不容置辩的口吻问道：农业大学亦在城里不是见鬼嘛？！毛泽东自称“医科我多少懂一点”<sup>④</sup>。他真正熟悉的很可能仅限于中国的传统医学，然而他对医学理论和医疗体制的弱点、弊端却洞悉无遗。他不无调侃地说：“以前没听说那么多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很可能是我们医生找出来的。”<sup>⑤</sup>在看了介绍医务人员在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研究等方面贡献的文章后，他的指斥大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有‘华陀无奈小虫何’，今后医学界要大力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sup>⑥</sup>他饶有兴趣地要卫生部门研究神医，并历数神医的三大好处：“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比骗人的医生要好”<sup>⑦</sup>。

①③ 《接见苏班德里约时的谈话》（1965年1月27日）。

②《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2月13日）。

④ 《与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7月5日）。

⑤ 《与越南外宾谈保健工作》（1964年1月24日）。

⑥ 《1966年3月21日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

⑦ 《听取卫生工作汇报时的指示》（1965年8月2日）。

当代科学技术大概是毛泽东最感生疏的一个领域。因此，毛泽东对科技部门和科技人员常常有一种格外的尊重。他一面号召知识分子统统下去，另一面却指示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专搞尖端技术<sup>①</sup>。他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分类：“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sup>②</sup>“大体上可以说是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sup>③</sup>。当文化大革命将全国的大学尽数摧毁之后，毛泽东发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但马上补充说，“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sup>④</sup>

毛泽东对实用文化的重视与对规范文化的抨击互为表里。实用文化就其原生形态和主要功用来说都是非规范的，它可以被社会规范文化吸收整合，但它一旦被社会主流文化所规范，往往会失去原有的生命力，走向形式化和僵化。而实用文化每一个进步，通常都意味着创造性地突破既定规范，脱离原来的文化整合。实用文化的这些固有品格，与毛泽东的价值取向极为吻合。

毛泽东攻击的炮火覆盖了整个文化领域。文艺、卫生、新闻、科学、学术各界无一幸免，然而毛泽东晚年批判锋芒集中指向的则是教育界。教育是规范文化的代表和组织者，教育体系中的学科分类反映、同时也决定了社会的文化分类，教育的体系和内容是规范文化最完整的代表。要改造规范文化必须从教育入手。毛泽东晚年教育革命的言论人们曾经耳熟能详，至今记忆犹新，择其要者

---

① 参见《关于发展原子弹、氢弹的指示》（1958年6月）。

②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1年8月24日）。

③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1964年8月29日）。

④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为：一、学校教育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二十几年紧张的学校生活搞坏了学生的身体，而学生却学不到什么实际有用的东西，不辨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么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真是害死人”<sup>①</sup>。二、教员只会凭讲稿上课，既懒又蠢，误人子弟。真学问也是一入太庙，便为牺牲，结果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三、整个学校弥漫着鄙视劳动人民的恶劣空气，大小知识分子都以精神贵族自居。毛泽东愤慨地要求把他们“统统赶出城，统统轰下去。谁不下去就不给他开饭”<sup>②</sup>。及至文化大革命，终于演成“停课闹革命”（事实上停办大学）骇人听闻的一幕。

## 六

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有两个基本的、但经常被人忽视的环节：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本人的阅读。前者是他最富个性的文化创造，后者则表现了他未加修饰的选择与取向。这二者透露的信息未必严密确定，但有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摇曳多姿、色彩斑斓的丰富。凡说不尽的东西，毛泽东可以用他的诗句、他的阅读作出深入的说明。

毛泽东对《水浒》这部小说的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下层群众集体造反的故事，它展示了一种反规范的社会结构、一种反规范的生活方式、一种反规范的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水浒》这部书是毛泽东毕生事业的背景音乐，每到重要关头就轰然作响，反复变奏。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在他的启蒙期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是《水浒》。他少年时代对梁山英雄的叛逆精神十分向往。毛泽

<sup>①</sup> 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

<sup>②</sup> 《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2月13日）。

东在少年时代与父亲发生过剧烈的冲突——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无数次斗争的开端。他后来明确地告诉别人，他将专横的父亲视为《水浒》中的贪官，而他自己的角色无疑是“替天行道”的好汉。入小学后，《水浒》成了毛泽东批判历史教本的依据以及率领童年伙伴砸土地庙、孔子牌位的向导。主持“新民学会”期间，毛泽东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

投身革命后，毛泽东与《水浒》几乎须臾不离。在江西苏区受到排斥时，退隐读书的书单上有《水浒》；长征之前，经过简装整理的行李中珍藏着一套《水浒》；在延安整风中，《水浒》是他圈定的阅读书目。在四卷《毛泽东选集》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引用的《水浒》典故。毛泽东前半生对《水浒》的理解、《水浒》在这一时期对毛泽东的启示，完全可以用他看了根据《水浒》故事改编的评剧《逼上梁山》后所写的那封信中的话来概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亦可读作在旧的历史舞台上、在旧的文化中——引者按）人民却成了渣滓。这种颠倒的历史现在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

然而到了晚年，毛泽东对《水浒》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批示可以看成他晚年文化思想的点睛之笔，千里伏线，到此结穴。

“四人帮”曾用毛泽东的这段批示作为攻击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炮弹，这是一个已经查清的阴谋。根据芦荻提供的材料，毛泽东在1975年以前已作过同样内容的讲话，根本没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sup>①</sup>。毛泽东在这里所做的是一种意义广泛的文化讨论。

毛泽东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追问梁山好汉最终结局而得到的答案。《水

---

<sup>①</sup> 转引自《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游》英雄好汉座次排定，俨然结成一个逸出常规的社会组织，这是造反事业具有文化内容的一次胜利。但这一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没有武装外衣的文化镇压——招安措施下，梁山事业失败了，颠倒过来的历史再次颠倒回去，宋江俯首贴耳地认同于规范文化，“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聚义厅”是非规范文化的标志，“忠义堂”是规范文化的符号，一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内容的文化反抗，其结局必然是悲惨的。毛泽东又一次感到他与另一个孤独的文化巨人——鲁迅心心相印：“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sup>①</sup>但即使具有文化改造的雄心，途径在哪里？结局又将如何？毛泽东并没有指出。

与对《水浒》的失望相映照，毛泽东晚年对另一部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兴趣却日盛一日，流风所及，在文化大革命学术凋零的局面中，曾使“红学”一度畸形繁荣。毛泽东申明：“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sup>②</sup>除了他已经说出的，这部小说还可能有什么他未曾言明的启发意义呢？曹雪芹笔下的女儿国中，有没有另一种形式的非规范文化挑战？把仕途经济视为“混帐”的林黛玉，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箴言前茫然掉首而去的贾宝玉是不是代表了不同于梁山英雄硬性造反、但却更为深刻的软性反抗精神呢？哲人已逝，对无法言说者只能保持沉默。

## 七

极而言之，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思想可以归结为对绵延至今的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质疑和挑战，仅此一点就足以

<sup>①</sup> 转引自《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sup>②</sup> 《和王海蓉的几次谈话》（1965年）。

奠定他在古往今来思想家中卓尔不群的地位。只要当代文明沿着既定的轨道继续演进,这样的疑问和挑战就永远不会成为绝响。

中华民族 20 世纪面临的主要课题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任何一个政治领袖对此都无权回避。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思想几乎完全脱离了主题,思想发展的轨迹愈来愈凌空蹈虚。这样,他不可避免地要在全局性的问题上犯错误。

就毛泽东晚年文化思想本身而言,它也尚处于远未充分发育的阶段。毛泽东晚年解决文化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完全是政治性的、行政性的。“借思想文化方法解决问题”这一缠绕着“五·四”以来中国思想家的梦魇在毛泽东这里倒错为“借政治、行政手段解决文化问题”。这样,他对任何一个实质上属于文化范围的问题的处理会引出更多的问题和困难,最后积重难返,而大背他的初衷。

（原载《走向未来》丛刊总第 7 期，收入本书时，编者对一处语句做了订正）

# 毛泽东：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

许纪霖

在中国，喜欢谈论毛泽东的人是何其之多，但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人又是如此的少，以至于当我读罢英国伦敦大学美籍教授斯拉姆题为《毛泽东》的政治传记后，不由地感到一丝惭愧，作为中国人，作为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我们，本该是更有权利、义务和能力来做这份工作的。然而这些年来，我们或许受了各种各样情结的纠缠，对毛泽东始终缺乏一个超越个人情感和利益之上的公正认识，而陷入了某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形式逻辑思维迷津。这算不上历史的反思，真正的反思应该从时间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一个宏观的空间系统中重新理解故人。而今，距“文革”结束已经整整 12 年了，在这样的时候坐下来心平气和地研究毛泽东，恐怕不能说是一种“忘本”吧。

## 从正剧到悲剧的个人魅力

毛泽东在晚年曾经说过，他一生只做过两件事情，一是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前者给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后者却毁了他身后的尊严。时下有关毛泽东的褒贬之说，大都以为这两件事作为界域的。笔者无意改变这样的盖棺之论，只是在想，倘若我们能够在一般的价值评判上提升一层，是否可以发见：在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历史联系？

当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被拥戴为全党的和全民族的领袖，这一地位是如此的不可动摇，以至于没有哪个人会怀疑它的合法性(legitimacy)。那么，这一合法性究竟渊源于何处？按照韦伯的经典说法，权威的合法性有三种类型：传统型的、法理型的和个人魅力型的。毛泽东是一个造反者，他不可能在旧的社会系统中得到其传统的或世袭的合法性基础；他的领袖地位虽然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并在党章上予以确认，但其权威运作的实际内涵可远非党章或党的系统所能框限。显然，毛泽东权威的合法性性质既非传统型的、也非法理型的，而是来自他的个人魅力(charisma)。

个人魅力型的权威往往孕育于乱世，孕育于历史的大变动时代。当一个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当原有的政治权威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现存的价值信仰系统和社会规范不再能够威慑人心、维系人际关系的时候，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期待这样一种权威人物的降临：他应该具有先知的智慧，能够描画一幅未来世界的理想图景，重建社会的价值信仰系统；他应该散发出救世主的光晕，为民族指明一条摆脱厄运、走向光明的简捷道路；他应该充满领袖的气魄，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吸引和凝聚千百万分散的个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纪律严明的宗教式团体。概而言之，他应该是一个洋溢着非凡魅力的神——他本身就代表着、甚至等同于民族的未来和理想，足以感召所有赤诚的信徒为此而奋斗、献身。显然，近代中国正是一个需要个人魅力型权威的时代。触目惊心的国耻大辱，愈演愈烈的社会动乱，民族文化的深刻危机，社会道德的沦丧败坏……当议会民主制(法理型)和袁氏、张勋复辟(传统型)等各种权威组织形式被证明并不能拯救这一切时，那种崛起于社会底层的人格权威便应运而生了。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再也没有什么比这首在某个时期曾经一度替代了国歌的陕北民歌更能透露出中国社会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接受毛泽东的内在信息。确实，毛泽东作为全党的、民族的“救星”，在个人素质上具备了其他竞争者所不曾具备的charisma条件。他通晓中国的历史文化、深谙这个社会内部结构和运行规则，因此能够将异域的马列主义灵活地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际，将之转化为连村野百姓亦喜闻乐见的民族的思维方法、语言形式，这是言必称希腊、莫斯科而显得理论过于深奥、艰涩的王明之辈所远远不能比拟的。他具备出众的组织才能和驾驭手腕，善于处理、调动权力系统内部复杂的矛盾关系，以“团结——批评——团结”的刚柔相济原则，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又是书生气十足，只知一味意气用事的陈独秀等人所匮乏的。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具有一般的党内实干家所不具备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尽管出生于韶山冲这一偏僻的山村，但在那块土地上却有着楚汉浪漫主义的悠久文化传统。天生的诗人气质与后天得来的广博知识相结合，就形成了他独特的、充满个性的理想。这理想气势之磅礴、目标之宏伟、意境之瑰丽，使每个有志于革命的救国之士不能不为之感染、动心。这样，毛泽东便体现了作为一个charisma权威的全部魅力；他是平易近人的，却又令人敬畏；他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着革命的真理，却又没法儿测度他内心那种充满神秘感的理想憧憬；他比谁都要现实功利，能够实实在在地设计一条民族解放的大道，他又比谁都更浪漫超脱，以哲人的热忱关切着人类的、自然的和宇宙的形而上问题……这种种可望而不可即，似乎易懂又难以悟透的气质、意蕴，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人间神”效应。

尽管我们今天可以指出这样一种个人魅力型权威具有现代迷信的色彩，但它在当时的战争环境和社会氛围下却是充分合理的。作为一种合法性的象征符号，charisma首先扮演着改朝换代的组织者角色。革命固然需要理智的自觉认识，但更需要信仰的宗教热忱，尤其当革命异常紧迫、革命者文化素质低下时尤为如此。在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不可能象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那样，从容地进行各种理论的论辩，通过诉诸理性以达到全党的共识；为了统一思想，协调行动，不得不尽可能迅速地找到一个正确的领袖，以他的是非为全党的是非。唯有如此，革命队伍才能形成铁一般的纪律，钢一般的力量。也只有树立了领袖的绝对的、崇高的威望，革命者对事业的忠诚，献身才有了实际可行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在几经挫折、分裂之后，终于认同毛泽东为全党的最高权威，确乎是由弱而强、转败为胜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charisma对旧制度的崩溃也起着摧枯拉朽的非常作用。原有的价值信仰系统或行政权力系统之所以失去合法性，主要不在于它们自身已经衰败，而是由于受到了生机勃勃的新权威挑战。中国的老百姓也许习惯了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当他们欲表达自己对新制度的拥护时往往表现为对这一制度人格代表的个人崇拜。这样，毛泽东在国人心目中便等同于新社会，如同蒋介石代表整个黑暗的旧中国一般。中国的知识分子亦作如此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应邀赴重庆讲判。中国前途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国共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而且也体现为两党最高领袖的个人魅力较量。一个多少是偶然的事情，竟使蒋在毛面前败下阵来。当时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兴笔录下《沁园春·雪》相赠。词作在报纸上刊出后，竟轰动山城整个知识阶层。大后方的知识分子以往对毛泽东所知甚浅，以为不过是民间草莽英雄。然而《沁园春》中所蕴含的胸襟、气魄，所体现的才思、文采，却令他们大为震

惊：这不就是集圣王于一身的当世“风流人物”么？这不就是足以治平天下的民族救星么？相形之下，那个身着戎装、神情刻板的“蒋委员长”倒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而已。当知识分子们为毛词所倾倒，纷纷提笔唱和时，这样的中国文人式对话实际已经不自觉地为他们日后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领导奠定了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话从权威的组织构成来说确乎千真万确。社会的客观需要加上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二者构成了建国以后他作为全党、全国最高领袖的绝对地位，当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独立、统一、和平的生活时，人民也怀着由衷的感激、信任之情继续将民族的未来命运托付给他，相信在他的领导之下能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何况新中国的建设、赶超世界发达国家也是一场不逊于民主革命的和平战争，同样需要全民族宗教般的热忱，大家庭式的团结和无私的个人牺牲。随着年岁的增长，经验的积累，毛泽东的智慧也愈来愈成熟，他的个人魅力与日俱增，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已多少有点自觉地去扮演一个神的角色，沉浸在自己所设想的那种神秘意境中，并通过神喻般的只言片语传达那个中的底蕴，令每一个见到他的人（包括中国人与外国人）都感到一种身不由己的敬畏感。个别清醒者即令在理智上有所反抗，但在情感上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忠诚。象远在海外的傅聪先生亦不能幸免，一方面他对“文革”充满绝望，另一方面对毛泽东仍然怀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倾心。他从毛的诗词中体味到后者对人生和宇宙的深刻感受，他没法儿抵御这位圣哲意境玄高的魅力。

从民主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个人魅力逐渐达到顶峰，他的个人权威、别人对他的崇拜也随之登峰造极。如此一来，整个民族的命运就维系于他个人的喜怒哀乐。但他毕竟只是一个

人，不可能象神那般不犯错误。如同历史上许多巨人一般；他在一生中演出两幕戏，尽管他扮演的是同一个 charisma 的角色，戏剧效果却迥然相异，第一幕是正剧，第二幕却流为悲剧。

## 反抗规范的造反者

毛泽东成为一个悲剧人物，是从他开始独立地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为肇端的。

建国以后，在社会行政管理系统中，在战争环境下所形成的个人魅力型权威面临着向法理型权威转化的问题。因为 charisma 是一种缺乏理性的、非常态的组织形式，它在历史的大转变年代可以成为一种非凡的革命力量，但那种权力运动中的无规范性和反经济性却使得它不适合于旨在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和平建设年代。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和社会管理需要一系列严密清晰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需要超乎个人意志之上的、以法律为核心的组织力量，这就使个人魅力型势不可避免地要向法理型转化。在建国头七年，近乎全盘照搬苏联的社会管理模式亦可视作这一转化的标志。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里可以得心应手地指挥千军万马，但他对骤然而至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化管理却感到陌生，在没有其它先例可循的情形下，他欣然接受了苏联的经验。他在接见来访的苏联客人时用幽默的语言道出了自己谦诚的心情：你们是大乌龟，我们是小乌龟，我们只要跟着你们在后面爬就是了。

然而毛泽东在气质上毕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创造奇才，他从不满足现存的、既定的一切，总是以他深邃的、富于幻想的头脑在思索、判断，力图追求更完善的境界。不久，他就逐渐觉察到苏联模式中种种不尽满意之处，并且在公开场合时时流露出来。纵观他

的批评言论，可以发现其焦点集中在对苏联模式“规范性”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上。他不满意法治，认为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他讨厌“繁文缛节”的各种规章制度，抨击它们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成了猫鼠关系，他更反对形式化的教学和考试制度，指责它们妨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等等等等。

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整个法理型组织形式的不满。他以自己独特的深刻目光窥见到了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法理型背后所隐含的人的异化。法理型权威在行政组织系统中表现为一种科层制(bureaucracy)，它具有形式合理而实质非理性的性质。科层制的形式合理性保证了行政的高效率、知识的优越权和决策中的理性化、科学化，但从价值角度而言它又造成了压抑人自由本性的“非人化”，使人成为庞大社会组织系统中实行某种指令的工具；它克服了传统型的官僚主义，却又带来了技术上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深为忧虑地注视着苏联模式运作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压抑的状况，他从来不太看重物质的或组织的作用，独视人为生产力诸要素中最宝贵的因素，而人之所以宝贵，不在于其体能或理性，而是其意志或精神。为什么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能够打败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他坚信就是由于有一股革命的精神。新中国建立多少年了，他依然怀着深深的感情眷恋着战争年代的情形，那种不是依靠规范，而是凭借着共同的情感，凭藉着对理想的忠诚而联系起来的精神团体，那种不计较物质利益，上下平等的供给制生活。因为在charisma团体中人的精神主宰了一切，成为革命的原动力。个人魅力型权威对毛泽东个人成为一种永恒的魅力，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力图在现代化大生产中还原革命的精神本色。

令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又与他素来的反儒倾向有着某种联系。他将规章制度说成是管人的、压制人的

“礼”，而对礼教的厌恶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他的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本来现代化的规章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社会并无多少共通之处，但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僵硬的、缺乏人情味的规范，妨碍了人的意志的自由发挥。他对礼教的厌恶强化了对苏联模式的不满，而对苏联模式的不满也反过来滋长了他反儒的情绪。毛泽东并非全盘反儒，儒学中的不少成份他还是不自觉地有所继承，但儒学的两大内核——忠孝至上的纲常伦理与“天人合一”的和谐意境毛泽东可谓深恶痛绝。

许多现代中国的著名人物都愿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符合传统美德的孝子，唯独毛反其道而行之，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有声有色地渲染自己如何不孝，与父亲作对。这种非孝的姿态意味着对强调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学习的“前喻文化”的否定。他到50年代后期愈来愈强烈地抨击老年人压制青年人的传统规范、反复论证“儿子比父亲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因为“人怕出名猪怕壮”，成名的老人最怕事，最无创造性，而受压迫的青年人则可以创造新学派，改变旧世界。他将希望的目光投射在尚有创造灵气的青年身上，将他们视作“八、九点钟的太阳”，鼓励他们起来造反，造考试的反，造先生的反，天不怕，地不怕，充分展现自己的创造本性。他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种“造反哲学”在逻辑上很显得武断，但颇吻合毛泽东的个性。毛终其一生是一个造反者的形象，童年时造父亲的反，少年时造校规的反，青年时造省长的反，成年时又造整个旧世界的反。及至晚年，一旦发现他亲手缔造的新中国并不符合自己的理想，不惜带头造反，想打碎重造一个。这种永不安宁的心态，渴求完美的气魄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诗人，他的思绪中浪漫主义色彩过于浓郁，犹如法国大作家马尔罗所说的：“他

脑子里有个幻象，这幻象迷住了他。”毛对自己的理想十分顶真，他经常用理想去衡量现实，结果发现现实的种种不如己意之处。他讨厌中国传统心理中的中庸、和谐、不争、守成、世故……，他内心永远沸腾着骚动不安的情绪，竭力想打破现实的平衡，在动荡的不平衡中重建理想的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哲学中着力强调矛盾、对立、一分为二，在政治上高扬阶级斗争的缘故。他一反“天人合一”的民族传统，豪迈地宣布：“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在长江中搏击浪涛，在党内搏击“修正主义”，在这种种搏击中他渲泄着自己的理想、爱憎、快意……当无所搏击时，他会感到某种惆怅、寂寞，他需要强劲的对立面激发自己的斗志，在斗争中改天换地，将理想转换成现实。毛泽东在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之所以还要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甚至在党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勉强地制造一个党内修正主义、“走资派”的概念，这里面固然大半因为其理性思考中的迷误，但非理性的因素也未尝不曾摆布过他的思绪。

这样，毛泽东内心中的反儒学情绪与现实中对苏联模式的反感叠加在一起，就促使他的一种非凡的浪漫精神，独创地去探索一条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在于：它所凭借的资源不是物质的、技术的、管理的力量，而是人的意志力量、群众的自发首创精神；它摈弃一切形式的规范，而直接诉诸于自觉的献身理想、献身领袖。于是，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试图重建个人魅力型的组织系统，以取代那多少是法理型的苏联管理模式。他构画了一幅又一幅充满诱惑的乌托邦图景，以此激励几万万人民的热情，用战争年代的牺牲精神建设社会主义。他培养人民对他的无限忠诚，通过“信徒”与“上帝”的直接沟通，来克服和避免科层制中的官僚主义。……然而，理想中设计得相当完美的这一切最后通通失败了，不仅如此，实践的结果是那样的残酷，连毛泽东本人也大感

意外，陷入了苦恼的困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那份自信，虽然还执着于自己的理想，那个对他具有永恒魅力的梦。可以说，老人家是抱着难言的遗憾溘然谢世的。

### 始料不及的以传统反传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中国文化心理的叛逆，是反传统的斗士。然而他所一手导演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戏剧却全然是一幅传统的现代漫画。这意味着，在他的文化素养中，保留着另一些传统的底色。

毛泽东是个读书人，无论是战争的环境，还是和平年代，经常手不释卷。尽管他读书的范围很广，但有两类书最为偏爱，一是西方的马列主义著作，二是中国的古史经典。这二者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两大文化源头。他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不谓不深厚，但相形之下，他对中国文化更为熟稔。在对古代诸子百家的态度上，毛基本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立场，但毕竟有所取舍。作为“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他对儒学颇为不恭，感情上较为疏远。而对其它几家则各取所需。他曾经承认在自己的个性中有虎气，也有猴气。这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浑重、豪放、一股凛然的帝王之气。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着老庄一般的超凡脱俗、即兴随意、浪漫、洒脱。

不过，对毛泽东文化性格影响最深的却是鲜为人注意的墨家。墨家在先秦属于与儒学齐名的两大显学之一，后来在历史中逐渐式微，但它的理想却通过历代底层的农民起义一再复现出来。毛泽东喜欢读人物传记，尤其是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从陈涉、吴广、张角、张鲁、到王仙芝、黄巢、李自成，读来无不兴味盎然。1958年底，他读了《三国志》中的《张鲁传》，大受鼓舞，在批注中将

张鲁的五斗米道内容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一作了比较。李泽厚认为：“非命”，“节用”（重视生产），“交利”，“兼爱”（乐园空想）和“天志”“尚同”（宗教专制）是墨子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毛泽东对《墨子》是否有过精细的研究尚不得而知，但其晚年的实践与墨子的主张是如此的神似却令人惊讶。

也许除了在历代农民起义的史书中汲取墨家的营养之外，现实环境是一个更重要的滋育土壤。毛泽东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产生了他性格中的二重性。作为一个信仰马列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他竭力要用无产阶级的现代思想影响、教育和改造农民；但在感情上、气质上与中国的农民又有着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他理解农民，同情农民，甚至将农民理想化、神圣化。毛泽东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场农民战争，而长期的乡村环境也反过来熔铸了他农民本色的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和认知心理。墨家本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理想学说，在20世纪的农民战争领袖身上又一次得以复制，自然是不足为奇了。

当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时候，在以农民为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中往往会产生一股民粹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的基本特征在于：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和伦理的祸害，力图通过发掘本国文明中的资源，以一种独特的民族方式绕过工业化文明，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而主观地美化农民、崇拜农民、以传统农业社会作为超越的理想基础，便是要害所在。在19世纪的俄国，当马克思主义尚未成为社会思潮主流时，民粹主义曾经风行一时。印度的甘地主义、当代非洲的众多“社会主义”皆是民粹主义的形形色色变种。在现代中国，民粹主义却作为一股暗潮悄悄地潜伏于两部分知识分子身上。一部分是诸如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这样的党外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则是从李大钊直到毛泽东的部分富于平民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当

全党马克思主义占主流的时候，这一思潮常常是隐而不显；一旦遭际到某种机遇，便会泛滥成灾。当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愈来愈对工业化文明表示怀疑的时候，当他开始独立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为潜伏在思想深处的民粹意识所摆布。他曾经率领农民以土枪土炮打下了全中国，他认定用土高炉、土技术也能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虽然一穷二白，缺乏最基础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但他坚信人口众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势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不再相信西方积累了几百年的工业社会规范，反过来迷信中国传统中那种自发的小生产经验。他象墨子一样执着于经验理性，沉耽于“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空想，并将理想的实现寄托于信徒们“摩顶放踵”的殉道精神。当不曾受过西方工业化文明洗礼的毛泽东试图超越工业化文明时，就不得不到他所熟悉的传统农业文明中汲取灵感了。

一方面是宏伟瑰丽的奇思异想，另一方面却是自我封闭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是反抗传统的狂放气魄，另一方面又是被摆布于传统的思维心态，这，便构成了“大跃进”和“文革”的设计者以墨反儒，以传统反传统的矛盾姿态。毛泽东反传统所打断的不是传统在现代生活的蔓延，倒是现代化工业文明在中国的历史进程，看起来这一切仿佛是一场荒诞不经的喜剧，但对于整个民族与毛泽东本人来说却未始不是一种始料不及的悲哀。

毛泽东的一生前一半是个成功者，后一半却是个失败者。有人也许会说：他的功绩与过错加起来等于零。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苛刻。毛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对传统与现代规范的反抗，对乌托邦理想的浪漫实践，虽然使他的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未尝不可以视作人类生存方式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其之所以有意义，不在于其成功，而是它的失败给全世界愿意继续探索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一样，毛泽东本身就意味

着一笔永恒的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这遗产属于全人类，更属于它的故乡。谁又能说，今日的中国现代化改革不曾领略着毛泽东遗产(包括正面的与负面的)恩泽呢？

(原载《书林》1988年第9期，收入本书时，编者对标题做了部分删节，对文内两处词语做了技术性变动)

# 毛泽东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

## ——与施拉姆教授的对话

朱学勤

自从19世纪中期那批俄国知识分子提出“民粹主义”以来，后继者不乏其人。但是谁也没有权力，没有机会，更没有勇气在一个大国范围内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唯有毛泽东例外。他集权力、机会、勇气于一身，把7亿人口的国家搞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试验室，结结实实地进行了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

近年来国外汉学界对此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美籍英国学者斯特尔特·施拉姆教授的政治传记《毛泽东》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托，提出了一连串新颖而又逼人的观点。当我读着此书时，内心里却与作者进行着一场严肃的对话。

以下，▲为作者施拉姆，■为读者本人。

▲到十九世纪末，显而易见，中国必须向欧洲人学习，以增强国力，抵抗其入侵。但是，这种必要性所引起的羞辱感，却不亚于中国人历来对夷人所怀抱的巨大优越感。中国人因忧虑国家的前途，也因捉摸不定究竟能够或者应当从历史上批判地继承些什么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出世了。（《毛泽东》序言jii-jv）<sup>①</sup>

---

<sup>①</sup> 本文所引施拉姆《毛泽东》一书的页码，均根据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编译出版的该书中文本页码标出。

■所谓“羞辱感”与“优越感”的矛盾，换算成政治语言，就是民主要求与民族尊严的冲突。明年就是五四运动70周年。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忙着准备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但是，很少人冷静下来想一想，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改造”与紧接其后五四运动提出的“民族救亡”这两者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裂缝。五四运动汇合了这两大口号，也聚拢了这一对矛盾。它因此而成为中国新文化的起源，但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百年动乱的根源。因为它汇聚了这一矛盾，却无力解决这一矛盾。你要振兴这个古老的民族吗？第一当然是弘扬民族意识，尊重民族遗产，第二却不得不拜鬼子为师，引进西方民主，与本民族的文化积淀决裂。两者缺一不可，两者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若尊重民族感情，势必削弱拜鬼子为师的热情；若坚持输入西方民主，则难免伤害民族尊重。这一两难处境曾经折磨了整整一代人，后来，又随着那一代精英领导中国政治领导中国文化的活动，深深地潜入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根部。这是一个时代的梦魇，它造成的心理张力几代人都难以消化。它攫住了康有为梁启超，攫住了李大钊、陈独秀，同样，也会攫住它们的后起之秀——毛泽东。

▲毛泽东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因为陈不妥协地拥护一切不受束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事物，能够满足他渴求解放的同一愿望。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不仅因为李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创始人，毛泽东在这个小组里扩大了这方面的知识，还因为他同李非常相像，也是满怀热情地献身于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事业。（《毛泽东》第29页）

■1914—1915年，陈、李之间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论战，争论自由启蒙与国家生存相比，何者更为重要。李大钊强烈主张，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苦，也比沦为“亡国奴”为好。1919年初，毛泽东进京，横陈在他面前的就是这一尖锐的两难选择。是象李大钊

那样，维护民族尊严，还是象陈独秀那样，破坏民族的价值观念？毛泽东曾在这两者之间游移徘徊，依违不定，之所以如此，不在于毛泽东那时缺少足够的判断能力，而在于以李、陈为代表的在新文化源头爆发的这场分歧实在重大，远远超过了一个青年人抉择的思想范围。这一分歧不是两个文化领袖的性格冲突，而是两个时代主题：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撞。后来，随着李、陈二人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冲撞又带进了党内。因此，它不仅预示了毛泽东一生活动的双重面貌，也预示了日后半个多世纪中这个世界第一大党内部爆发的所谓“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分歧与理论危机。

▲发表在《湘江评论》上《论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标志着毛泽东在思想上出现了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倾向的极其重要的一面。（《毛泽东》第33页）

■这是1919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似乎终于结束了他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徘徊局面，走向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是被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两难处境逼出来的。落后国家在近代化起步时，几乎都要经历一个民族尊严与民主要求同时并存而又二律背反的发展阶段。这种两难处境逼着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左冲右突，不得安宁，迟早要逼出一个超越两者的第三理论：民粹主义。这一理论的鲜明特点是：排斥现代知识及其载体——城市知识分子，投向远离现代知识的农村居民。为什么要排斥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两难处境本身就是由知识分子的两重性造成的。知识分子既是西方文化的引进者，又是传统价值的承继者，不摆脱他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两难处境。为什么要投向农民？这是因为他们有民族观念，无西方文化的侵染；他们有民主要求，仅限于获得土地——这一生存需要。农民的民族民主要求可以同时满足，却不会引起本民族文化的巨大断裂。因此，至少在

表面上，民粹主义具有超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超然面貌，对那部分富于献身精神不惜放弃本身知识特权的先进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至于由此而产生的另一危险——对民主启蒙的漠视，则可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民主要求来补偿。在民粹主义者看来，解放这一人数远为广大的阶层要比满足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求更为重要，更象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民粹，民粹，民族的精粹是农民。用19世纪70年代俄国人的话来说，就是“脱下学生装，到民间去”；用毛泽东后来在1926年更为发展的语言说，那就是：“若否定贫农，便是否定革命；若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sup>①</sup>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毛泽东当年竟然走上了如此简单如此可笑的农民革命的道路，似乎难以置信。但在当时，又有什么理论能象民粹主义那样能统一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能消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毛泽东所代表的那一批知识分子之所以进入民粹主义，是时代使然，是思想史逻辑发展的必然。

▲毛泽东在其自传中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确实如此。

■从民粹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只有一年之隔。对如此急骤而又自信的转折，施拉姆教授的研究似不应该同步加快，随其转折而转折，而应该停下脚步，谨慎地问一句：在这样迅速的转折中，民粹主义是被清算的呢？还是被嫁接了过来？

毛泽东后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已传入了中国，那时的思想界并不接受。为什么非要用十月革命的大炮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人接受？从思想史角度考察，那是因为十月革命并不是纯粹西方意义上的革命，而是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思想向东方落后地区

---

<sup>①</sup>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让渡的产物，在心理上容易为同属落后地区的中国人接受；还因为列宁在理论上十分自觉地继续向东方让渡马克思主义——把它解释成了东方人喜闻乐见的模样。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承认，世界革命的关键在亚洲，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不是欧洲革命的累赘，而且还是欧洲革命得以胜利的前提。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第一遭。在此之前，包括罗莎·卢森堡这样优秀的思想家在内的西欧马克思主义者，对非欧民族清一色都采取了极度轻视的态度。列宁的态度与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对东方民族感情的让步，大大缓解了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心理，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铺平了道路。对于毛泽东这样的五四时代知识分子来说，按照列宁让渡的面貌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比直接接受德国版马克思主义来得轻松、自然。它是一种光滑过渡，避免了与本民族文化断裂的痛苦。它允许保留在这以前已经积淀下来的本民族思想，包括那个好不容易才摸索出来的民粹主义。故而毛泽东如此自信，一年之内就能完成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大转变。很显然，在这样的转变中，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是不必要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

▲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出进入政界，有些人提出利用今后当教职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都遭到毛泽东反对。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答道：“学梁山泊好汉。”

刚好十年以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走上一条与此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的道路。（《毛泽东》第24页）

■这样崇拜底层社会的造反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毛泽东声称他已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在以后的造反道路上，他还是不断流露出这一“少年时代的热

情”。1926年的文章是一例证，1927年在井冈山上对王佐、袁良才的收容和重用，则更为严重，当时即引起了中央委员会的深切忧虑。

▲躲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对这些旧式造反者并不像毛那样有好感。相反，他们在收到关于毛的情况报告后深感不安。他们写信给朱德，要他与毛会合，以便纠正毛的错误。毛的主要错误就是他只像《水浒》中梁山泊的草莽英雄那样为民除害，而没有唤起民众自发地进行武装起义。（《毛泽东》第103-104页）

■把井冈山道路说成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并不过份。问题在于这一结合中，是否还结合了其他因素？这类因素很可能既是当初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日后大灾大难的伏线。1927年12月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身上的水浒倾向的第一次察觉。40年后，在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大招手的更为浪漫的姿态中，他们是否又嗅到了同样的气味呢？40年后他们的反应即使是正确的，但已为时过晚，再也没有新的力量可供调遣，与毛泽东的梁山习气相抗衡了。

▲1936年，毛泽东抵达延安，向全国各种力量发出呼吁，号召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引人注目的是，他于这年7月向国内哥老会发布的宣言。他甚至试图使哥老会的会员相信，他们的想法实际上是和中国共产党一致的，因为彼此都打富济贫，都反对外国压迫者而爱护本国同胞。（《毛泽东》第164—165页）

■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策略。但是在此之下，是否还有更深刻的联系呢？一条看不见的思想线联接在毛泽东的井冈山时代与延安时代之间。这条思想线到了延安整风时代将会看得十分清楚。他总是念念不忘《水浒》描写的那个下层农民集体造反的古老故事，也念念不忘潜行于现代社会之下的秘密会党，甚至坚持认为辛亥革命在南方的胜利是哥老会的胜利（见

施拉姆书第12页)。1935年毛泽东抵达黄土高原时填写的那首著名的词牌中,有这么两句:“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权威人士诠释说,他这是在怀念滞留于南方的游击队战友。有谁知道,除了红军游击队外,他是否还怀念另一支潜伏于地下的游击力量?

▲斯诺说,毛泽东的特征是将知识分子的深邃和农民的机敏结合了起来。史沫特莱接着说:“我最初所强烈感到的他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气质原来是不喜与人交流思想。朱德受爱戴,而毛泽东受尊敬。但是他性格内向,一般人敬而远之。”(《毛泽东》第177页)

■毛泽东的特征诚如斯诺所言。但是更为准确的表述,似应为:他是用知识分子的深邃去领导农民的机敏。知识分子放弃知识特权,俯身教诲愚夫愚妇——广大的农村居民,这在历史上是最富于道德魅力的形象。历史上一切清教或准清教运动,莫不因此而获得狂热的近乎宗教般的群众支持。民粹主义尽管隐含着排斥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结构,但是它的道德形象则更为吸引知识分子,尤其吸引饱经忧患苦无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沿海城市内大小知识分子之所以几乎无暇细想民粹主义将来对他们会产生什么不利后果,纷纷奔向延安,奔向清凉山下的排排窑洞,其秘密恐怕就在这里。

至于史沫特莱,她访问延安时,恰逢毛泽东正为他那场为后人垢病的婚事与党内同事们龃龉不快。史沫特莱以她女性特有的直觉,领悟到毛泽东可能有他独特的价值取向。我记得,这位敏感的女记者在施拉姆教授所引用的这段观感外,还说有一句令人更为警醒的话:“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有一扇门,一直没有向其他人打开。”

▲他出身于农民,他了解群众精神世界的需要。可是当毛在1949年着手完成其任务时,并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中国,而是几个中国。他个性中对一部分中国人有吸引力的那些方面,往往使

其他人反感。毛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可能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来说容易显得不那么温文尔雅。相反，他使中国西方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虽然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得到大部分城市居民的赞许，却稍稍扰乱了农民的心。

■1949年的毛泽东可能会突然发现他自己又回到了1919年。随着延安时代的结束，仅有道德上的魅力已不足以吸引知识分子。既然外敌已经肃清，民族业已独立，知识分子和城市其他居民理所当然地提出了现代化甚或西方化的要求。而农民则停留在原地，拒绝参加世界共同体，坚持原来的自然经济即道德经济的要求。这两种要求对毛泽东的夹击，可能会使他觉得30年历史竟如走了一圈鬼打墙，当年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分歧又出现了。

历史似乎不满意他从前那次选择，在这里又特意给他安排了一次再选择的机会。但是，毛泽东不屑于这种补考机会。他坚信他当初的那次选择。民粹主义既然能帮助他找到了井冈山的道路，那就一定能继续帮助他在一个东方大国建设起一套足以与西方现代文明相对抗的新文明。井冈山道路通四方，甚至还应该延伸，延伸为世界乡村包围世界城市的全球战略。

放弃了这次机会，接下来的事情则是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可以评论的了。合作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庆、学大寨、直至全民族都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文化大革命”……

▲中国人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声明中否认和平过渡的观点，从范畴上否认先进国家的革命问题和马克思、列宁时代所提出的革命问题应有所不同。他们后来不仅谴责陶里亚蒂那样的欧洲共产党人所作尝试的实质，而且还谴责他尝试这样一种现代化的事实本身。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局限于中国经验之内，而且通过这种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毛泽东》

第261—262页)

■后来发生的60年代初那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即以此为开端。对现代文化缺少了解，或者干脆说是不愿接受，这一民粹主义倾向使毛泽东越来越难以正确判断外部事务。浑朴的农业文明是否一定优越于腐熟的城市文明，世界的农业地区是否一定能拯救世界的城市地区——这一民粹主义的命题如果局限在学术范围内，或许可以讨论，也值得讨论。问题在于毛泽东从来不屑于这类学术讨论，而是习惯于在政治领域内一意孤行。他坚持他的民粹主义果然到了这样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在一国获胜之后，还要向它国输出，把井冈山道路强加给外国共产党人。过去确曾有过欧洲共产党人不了解亚洲的时代。现在却轮到他来开辟一个亚洲人不了解欧洲的时代了。这样的历史误会第一次发生时是悲剧，第二次发生时则是笑剧了。

▲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是毛精心安排和缅怀往事的一种尝试，他以此来重温五四时代的文化革命，同时他也想把另一代青少年投到政治舞台上去，就像他那一代人在五十年前突然作为改造中国的新尝试的推动者站在历史前列一样，从而重新体验他自己的青年时代。

当然，这整个过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进行的。它反映了今天的高级人物们之间关于正确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场辩论。也许这场辩论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掩饰下不再参加世界文化共同体，而参加世界文化共同体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毛泽东》第309—310页）

■千里伏线，到此结穴——“文化革命”符合毛泽东的一生逻辑。如同回光返照，“文化革命”鲜明地反映着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追求。毛泽东的思想活动起步时，新文化运动刚刚提出了激

越的民主主义要求，不幸却被更为紧迫的五四运动民族主义的口号打断。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冲撞造成了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动乱，也造成了毛泽东百年难解的“思想情结”。他的一生是试图统一民主要求与民族尊严的艰难一生。他自以为消解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并在晚年找到了毕其功于一役的理想模式——“文化革命”。然而，“文化革命”的惨败结局却证明：他以民粹主义来摆脱民主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压迫，可能会取得暂时成功，但不能保证最终胜利，相反，却激起了民主主义更强烈的冲动，更加恶化了那一折磨中国数代精英的时代矛盾。

▲虽然不可能预言中国人民在最近的将来要经受什么考验和震动，但看来不可避免的是，其他更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枯燥的但有效率的合理性的政策，最终将取代毛的干劲冲天的政策。……如果当真发生这种情况，毛的革命功绩不一定会被否定或者失去它的重要意义。这些功绩将简单地根据它们特有的历史背景被看作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经验，而不一定作为将来的样板。显然，这永远不会使毛满意。几个世纪以后，虽然毛和马克思一样会过时，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他。这样，任何人的雄心也就都可以满足了。（《毛泽东》第315页，全书至此完）

■毛泽东晚年是在封闭了中国也就封闭了他自己的孤独心境中去世的。问题回到开头：对他一生中执意坚持的民粹主义倾向该如何评价呢？如果我们继续处在封闭状态，那么，随着“文化革命”的失败，民粹主义的功过当然可以盖棺论定了。但是我们已经结束了封闭状态，已经能够听到海外非理性思潮掀起的喧嚣声浪。我们已经不能用一个封闭性结论来对待这一理论了，尽管这一理论过去在封闭状态中害苦了我们。民粹主义的影响可能不会缩小，相反还会扩大。它不仅在东方社会亚细亚特征的天然土壤上生生不息，还会在西方社会里那股对工业文明抗争的非理性运

动中摄取新的营养。因此，“文化革命”尽可否定，民粹主义的功过却会长期争论。是否能够这样预言呢？——只要人类文明沿着目前对抗性轨道继续前进，民粹主义将是东西方文化对话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引起争论！

（选自《书林》1988年第9期）

# 毛泽东在1957年\*

戴 晴

5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实际上是对现实情况的认可。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声明宣布它的开端，也没有哪个决议宣布这一结束。

如果细细考察囿囿个的“阵营”内部出现裂痕的原因，那么首先引起注意的，当是1948年被开除出9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到了这爆裂之声不绝于耳时，已经是极不平凡的1956年了。

第一个大动静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勇敢的改革家赫鲁晓夫的那篇简直没有什么理论性可言却极具震撼力的报告。斯大林的神坛崩塌了，人们于是开始有了自己思索的可能性。虽然目前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正在为消除对铁托的个人崇拜而努力，但当时在“阵营”之内，对这一行为看得最为透彻的，显然是这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元帅。在他的《普拉演讲》中，铁托谴责的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虽然他与这个“暴君”有过多次激烈的正面冲突<sup>①</sup>。铁托认为对人的褒贬无论如何总是第二位的。赫鲁晓夫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

---

\* 此文是作者《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的第二节和第六节，标题由作者新拟。

<sup>①</sup> 斯大林逝世后，在他书桌的抽屉底层，发现一封铁托给他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斯大林，请不要再派特务到南斯拉夫来暗杀我了。我已经把你派来干这件事的7个人都抓起来了。如果你不停止，那么我将不得不派遣我的人到莫斯科去。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将不必再派第二个人。”

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铁托认为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不是“由于斯大林老了，他开始有点愚蠢起来，犯了各种错误”。至于比较直接的根源，铁托指出的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领导方法与一长制，还有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与愿望”。

没过多久，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上街了。如果这里暂且不谈后来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从而对这一单纯的行为所加以的利用的话——对此，目前在观点甚至对当时事实的认定上还有很大争议——事情可能正如原英共党员、英《工人日报》记者、匈牙利事件的目睹者彼得·弗莱雅所说，在革命胜利了10年之后——

大多数匈牙利人是不要资本家或地主们回来的。但是今天，他们却理当地厌恶了那个贫穷、枯燥与恐怖的制度，厌恶了人家以共产主义名义送给他们的这个制度。此一情形的全部责任应该放在共产党领袖们的肩上，特别要让拉科西、法卡斯与吉罗来负，他们曾经答应给人以一个地上天国，而结果真正给人的却是一个与战前霍尔蒂海军上将法西斯专政同样压迫，同样值得非难的警察国家。工人们受剥削，威吓和欺骗。农民们也受剥削，威吓与欺骗。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提出一个为谁的问题，甚至于谈论政治问题时如果不用安全的，习见的，单调的废话来加以掩饰，就有为那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抓去的危险。这一个糜费了巨额国币来维持的机构，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而事实上，它却保护了少数寡头们的权力。为达此一目的，秘密警察应用了最惊人的方法，其中包括新闻检查，思想管制，监禁，酷刑与谋杀。其所以成为悲剧者，乃在于如此这般的制度却说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说成为“人民民主”，说成为走向共产主义去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认在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了破坏”，另一方面也最坚决地强调这两次事件的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至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

应该说，对这两方面，毛泽东的估计及预先采取的措置都远在他的欧洲同道之上。只看建国初，即史家所谓的“基本完成社会主

义改造时期”，一直不曾停顿过的全国性整肃：

- 1950年5月 共产党整风，整肃“打天下”的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
- 10月 镇压反革命
- 1951年5月 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 11月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 12月 三反，整肃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
- 1952年1月 五反，整肃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
- 1954年2月 揭发并制止了高、饶反党阴谋
- 10月 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批判历史学家尚钺，改组《文艺报》
- 12月 批判胡适思想
- 1955年2月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 下半年 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从这里可以看出的是，起码在那时，毛泽东与铁托的见解就是大相径庭的。毛泽东一方面十分注意执政党党员的个人品德——他对居功自傲、覬覦高位、贪污枉法等农民起义领袖们最常见的毛病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绝不容许思想异端，哪怕离政治很远很远并且非常专业化的独立思想的存在，比如俞平伯先生之不赞成新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

那时，没有人深究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数亿人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阶段以至体制——或称制度，这在英语世界里本是一个词system——的领悟，直到二、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出现。当时，对待人民，特别是人民之中涌动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倾向；对私产的珍视、对个人创造力的尊敬、对独立思

想、独立人格的捍卫意识等等，采用的办法有点类似鲶的治水——堵。而眼见堵不成的时候，就发生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了。

应该说，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及波、匈事件面前，中国共产党表现得比他的任何“兄弟”都镇定与从容。因为这个政权的班底并不是如匈牙利拉科西班子那样由斯大林一手扶植起来的，恰恰相反，她是在斗掉了斯氏的传声筒，并与这名专制者本人经过一场场又执拗、又瞻前顾后且极具分寸的较量之后，自己立住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类似匈牙利事件中的“帝国主义者和在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内外的反革命分子”，不但早已被处决或关押，与他们有着血统、情谊、包括思想联系的人，也都相应被置于某种监督、控制之下。当然更彻底的是灵魂出壳——或曰脱胎换骨、曰革心洗面——的完成，恰如丁玲女士在延安整风结束时极形象的描述：

开始有点恍然大悟，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就象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的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

但毛泽东显然不是沉湎于表面升平景象的小角色。他完全超出了马基雅维里对古代帝王们所作的种种结论。马氏断言：

当百姓对他怀有敬意之时，君王不必担心阴谋；但当百姓们对他表示敌对，而且怀有仇恨时，他就应当害怕一切事、害怕一切人。

事实上，在1956年，中国大陆并没有一份报纸或者一次演讲对当政者是怀有不敬的（还不要说仇恨）。但毛泽东具有的，显然不是常人的禀赋。只消望一眼微风拂动的树叶，他老人家就平抑不住对暴风雨的预感。更何况，那时在党内党外，特别在一批不明就里、一味将革命神圣化与理想化的青年中，一种不肯俯首贴耳，不时地总想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见解的倾向，正不断地冒出头来。

1956年秋，河北正定地质学校的学生与“主观武断专横厌恶一切反对意见、训斥辱骂持反对意见者”的政府官员冲突起来，《中国

青年报》整版报道并发了社论。

文学界，就在沈从文已万念俱灰，而老舍和巴金正不知怎么写才能跟上气势磅礴的新社会的时候，一股带着清新气息的风从北方吹来。苏联新小说《在区里的日子》、《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令“完全是自己培养出来”，不但满怀第一种忠诚，间或也怀有一些第二种忠诚的党员作家们欣喜不已。《在桥梁工地上》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于是出笼。

接着，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成了报面上的闻人。其实，保卫、照顾要人，让他们舒服、惬意、前前后后不可乱了章程，在左叶一类人看来，是高于一切的。记者以及记者背后的公众，算得了什么呢？“态度粗暴”也好、“破口大骂”也好，本是天经地义，不粗暴不骂倒是奇迹了。不幸的是在1956年，记者们还没有、或者说还不曾牢固地与这批侍卫们共识，难免挣扎了几下，终于实打实地被抓住，对左叶的驳诘，成了货真价实的“向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攻”。

如果再加上当时电影界的一番热闹<sup>①</sup>，这种种，都使毛泽东下决心必得有点举措，使得看起来在新政权下浅表的平静变成对她彻底的、遍布在各个层面上的、从内里到外表的深沉的折服。否则，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将永远处在愿望不曾实现的不宁之中，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睡不安稳”。也就是说，他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每个中国人都要象雷锋、象王铁人一样，对新政权无条件地忠诚与热爱，不管他是年轻的村姑，还是留洋的教授；也不管他是持枪的士兵，还是打坐的和尚。至于被分掉土地的富农和被赎买了产业的资本家，再加上他们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代理人”，就算做不到

---

<sup>①</sup> 1956年11月，上海文化界在文汇报上开展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影评家钟惦柴在北京文艺报上撰文《电影的锣鼓》、《为了前进》，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涉过多。后来，这场讨论被定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心悦诚服，也要放老实点。

当时确是一片欢欣与繁荣。笔者清楚记得的是，北京东单体育场外墙上的标语，既不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不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甚至连“行人车辆遵守交通规则”都不是。上面赫然写的是“姑娘们，打扮起来吧！”那阵子推出的新剧目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全台男女粉白黛绿，口里念着“只应天上有”的台词。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这繁荣到底能维持多久？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在这前后提出的。其实，只要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在一个国度中有切实的保障，本不必再用华美的诗一般的语言对它的必然结果加以特别的描述。但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情形似乎特别些。从今天所获得的材料看，这口号的形成不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而是毛泽东本人一步步思索、提炼最后极有耐心地说服人接受的。请看黎澍的回忆：

我大约是在1953年或1952年就获知毛泽东主张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取“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当时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个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交来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等等。毛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没有专就此事开过讨论会，而是根据毛的意见裁决的。）不久，又传来毛的指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我当时认为“百家争鸣”是指古代史而言，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古史去今已远，随便发表什么意见，与现实无关。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我当时怀疑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当时参加谈话的只有我和田家英二人。田问了些情况，没有提其他问题，似乎已有所闻。

到这时为止，这两句话还没有并提，将它们联缀在一起，成为

今天每个干部学人都能朗朗上口，或按汉语独特的缩词方式，简称“双百”的，是陈伯达。据陆定一回忆，某天夜晚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有毛泽东，陈伯达等。当时没有人记录。它的正式出现是在4月底。据黎澍回忆：

此后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4月25日和28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1956年5月2日毛又在最高国务会议谈到这个方针。最高国务会议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因此是第一次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待艺术和科学问题的方针。毛的态度使陆定一感到鼓舞。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学术文化界一千多人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在这个报告中特别谈到党史问题，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里，黎澍没有提到陆定一的另一段话，那段使所有的与会者直到30年后还难以忘怀的代表党的许诺。在郑重地向俞平伯先生表示道歉之后，陆定一宣布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陆甚至明确提出，还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

从陆定一后来的一系列举动中，包括在葬礼上向浦熙修郑重致歉，以及在80高龄仍然为“双百”辩护，可以推断，他在当年甚至直到如今都是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提出“双百”的诚意的。

但当时党内的反应，如果不说冷淡，至少也是观望的。之所以取这样的态度，就算不是因为对1942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别具心得的回忆，起码对毛泽东在局面纷复的1956年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党的情怀，还不大吃得透。

再看黎澍的回忆：

6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个报告。人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感觉政策难以掌握适当。《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4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忧虑。实际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感觉这个方针的宣传没有把握，不知怎么办好……毛的坚决态度和人们的观望不前适成对比，人们愈是观望、他愈是坚决。

从1956年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到1957年初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再到后来的最高国务会议，直到3月上旬的宣传工作会议，几乎整整一年，毛泽东一次次地做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是不是我的话讲过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了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

这前后，与正面阐扬这个口号相辅，有几件事情更令人惊异：在中共党内，历来不成文的规矩，“左”总是很吃香的。无论任何事，你只要一味“左”下去，或出于无知或出于狡狴，无不一帆风顺。而这时，毛泽东却对一连串的非“左”行为支持起来了。如说钟惦棐在电影界“作了一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的错误缺点，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电影局开门不够。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

对于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

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于陈其通等四人相当勇敢并且理直气壮地为维护党而对“双百”提出质疑的文章，毛泽东先是调侃他们：“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继而明确说：“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错误的，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对于既老成、又机智，既能坚持党性原则、又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一直有党内英才之称，但此时也已莫衷一是的邓拓所主持的《人民日报》，则一再点名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宣传，从陈其通的文章，最高国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

真是前所未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黎澍回忆：

当时（中国）在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取得的出人意料的进展使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充满信心。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合作化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工商业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可以说，所有私有制社会的各阶级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全消灭了。天下事如此易易，其令人踌躇满志，自不待言。早几年讲百家争鸣，因为是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无关宏旨；后来眼看阶级消灭了，区区学术问题固然不算什么，就是其他一些问题也不在话下，可以百家争鸣。所以贯彻这个方针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题目就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意义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

历来——直到今天——的教科书都将这部在1957年6月19日反右斗争要害关头发表的作品视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这一评价由康生打头，随后为全党全民所接受。细究起来，它与现代科学精神其实颇多相悖之处。别的不说，只看它所表现出的随意性：什么叫“对抗”而什么叫“非对抗”性矛盾？什么叫“敌”什么叫“我”？什么叫“鲜花”什么叫“毒草”？什么叫处理“当”了而什么叫“不当”？什么叫“共存”与“监督”，特别是这“存”，究竟指肉体的存还是精神与意志的存？什么叫“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以及它“结束”还是“没结束”？……要知道，对规矩着人们行为的法的语言要求是准确而不是涵义丰富、富于想象。中国的实践证明，这部作品不是法，却明显地高于法。公民们在怀着崇敬之心学习又学习之余，既搞不清周围是怎样一个世界，也搞不清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更不知道本来是响应号召的行为会不会招致杀身之祸。

但当时有幸听到产生这篇文章的那个讲话的录音的人，还清楚记得毛泽东那机智、透辟、通今博古、不带一点八股气的风格，以及马寅初、刘少奇等人当场无拘无束的插话。他们感受到的是“和煦的春风”般欢愉与温暖。直到1957年6月19日，当这个讲话以文章的形式正式发表时，这种温馨还没有从这批当代中国文化精英们心头消失殆尽，虽然他们发现当时在录音里明明听得清清楚楚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这种话已经不见，代之以并没有讲过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黎澍对当时的描述是：

人们目瞪口呆，毛本人也难于自圆其说。正式文本虽然经反复修改，

也还是不免自相矛盾。

但这一切，在1957年3月间，几乎还没有人能参透，也没有人能对它作个清晰的估评，更不要说对后来局势的发展有一个哪怕轮廓模糊的推测。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不能；曾彦修、沙文汉、陈其通不能；即便是陆定一、李维汉、邓拓也未必能。康生也许行，因为在那时，他突然不再养病了，活泼泼地，精神焕发地介入到几乎每一个具体步骤中。

最可怜的是那一整批饱学深思之士。他们在过去苦难的年代极难得地受到了完备的现代教育，诚心诚意地拥护新政权，1950—1955年所闻所见本已使他们决心三缄其口，这时又极可悲地被激发起来。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傅雷，这位纯洁的、理性的、一丝不苟的而且除了译好书之外绝对别无他图的翻译家热情洋溢地写道：“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既然他老人家说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傅雷决定“本着毛主席的精神，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与党“完全善意地互相批评，改善关系，同心一致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历史已经证明这“善意”并不是相互的，翻译家文质彬彬的建议无例外地被划入“猖狂进攻”一路。他熬过了“戴帽子”的50年代末，却没有胆子再熬揪头发打耳光的60年代中了。他与他贤惠的妻共同赴死，不为别的，只为尊严。

4月27日，正式指示发出，在全党进行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建国7年来第12场政治运动开始了。

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15天之后的语言——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场大“阳谋”开始了。

在195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3月10日。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sup>①</sup>，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先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份不常而不是从未公开的CP；第二，早在9个月前，在他《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中宣部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活动着，为《光明日报》物色总编辑。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一年后的局面：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形式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

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那时还没有《世界经济导报》，也没有《现代人报》，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sup>②</sup>而且是非共产党员办的《光明日报》，于是开始物色主角。本来，第四

---

<sup>①</sup> 李维汉有一段委婉而精彩的论述，解释为什么谋略会伴随毛泽东一生（起码是1927年或1935年之后的一生）：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此处的“反动派”，或许应包括不同阶段的本营垒内的政治对手，如张国焘、王明等。——笔者），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

<sup>②</sup> 后来，又想到何不让《文汇报》复刊？于是《文汇报》1956年10月复刊。这两份报纸，在1957年春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夏天以后，则作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受到首当其冲的批判。

届总编辑的第一人选是徐铸成。当时，这位倔脾气的老报人正经历着他那份缘抗日而创刊的《文汇报》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年，被日伪停掉的；第二次是1946年，国民党停的，这在前一节已经说到；第三次停在柯庆施手里，时间是1955年，公诸于世的名义是“自动”。

1956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都，在与柳湜、叶圣陶（这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着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么样？”这位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问。

“很好，很惬意。你瞧，住在乡下，有一部小车，没事就到处玩玩。”

“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得了心？”

“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

姚溱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党派，章伯钧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总编辑。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也以实言相告：

“做事总要有一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脚戏。现在我的人马都在《教师报》，让我光身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

“好，那就不勉强了。”姚溱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

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那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英国派头的他不认“班底”说，也不以“上无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战”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有政协吗？有宪法吗？他只认Fairy Play。他不用拉拢谁，也不用

提防谁,包括,比如说,常芝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真,令人心恻。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

虽然出自Prf. Lasaschj之门,储安平毕竟是中国入。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10年之后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他去了,并在海滨写作,直到秋天。1956年11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40年历史,类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虽然这已成局面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

1957年初,按照乔木“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从他后来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

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热。当时,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但也有不少疑虑。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10年前之嫌,反复切磋这8个字的含义。此时正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则“冒”得多了。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鸣?”

读者在前面已经知道储安平办《观察》的劲头,对他在此刻作如是说定觉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30年后,在1986年一次软科学的闭幕式上,当一位开明的中共高级干部将此观点再度明确提出时,与会群众竟欣喜若狂,于是引出郑重的否定与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当时,储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传开,原光华同学决定聚会作东请他。据赵家璧回忆,晚饭约在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9:00这位老学友才匆匆赶到。坐定之后,没吃几样菜,就被一部小车接走了——其红火与煞有介事至此。

几乎与此同时,在1957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的“亲莅巡说”,也正在紧运行中。在自主演说极为萎缩的中共内部<sup>①</sup>,享有巡说特权,并运用得极为漂亮的,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看来他对此也颇自知。终其一生,这法宝只在三次极为关键的时刻拿出来用过。这是第一次,以后的两次分别是1966年发动“文化革命”前夕和察觉了林彪班子的“不轨”之后。

先是在9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

---

<sup>①</sup> 其萎缩的程度实属世界罕见:德高望重的人大副委员长与孩子们联欢时,还要拿着讲稿念。这情形最近略有突破,如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之后与记者的公开会见。

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言论自由”：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

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么！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张收。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还有：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参加会。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

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拜见毛泽东时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次会见。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与邓拓都在场，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

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

当时徐铸成正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

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的“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了。他只是向党中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共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的心愿在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徐舍不得放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他在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

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了：

“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铸成还能说些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伟大的战略部署中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

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他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

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

过节,伴着巨大的红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储安平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行: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短暂的寂静。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上任。

接手光报,储安平最拿不出办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论;对此,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彻底交底: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1957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他对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

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笔者甚至倾向于认为,自1949年至今,很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就比如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

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的直接结果。问题党不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只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对他作为一个囫圇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的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的70天中，这种情绪也没打算隐瞒，几乎所有的人都记得他说的那番颇带了一点感情的话：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5月1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太太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对于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时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熬费苦心。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精采”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那篇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经下发，此时正是文中早已点明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顶点在哪儿呢？至今未见任何权威性的文献加以说明。若将随后批判的火力的强弱及对人头处理的宽严作参考，高潮应是那个与治蝗虫的农药同名的“六六六”事件了，即6位教授在6月6日应章伯钧之邀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对照他们当时所怀有的悃诚，和后来对他们的解释，只能说，“足令历史带泪看”。章伯钧先介绍学校的局面，请大家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如何工作。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老师若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闹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抡认为形势一触即发，共产党大意不得。钱伟长特别指出学生在到处找领袖，期望着教授们站出来说话……他们决定这时候一定得出来，不能让共产党进退不得，要帮助真正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毛公”，要帮助共产党稳住局面。

此时，距《人民日报》那篇晴空惊雷般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只有2天；李维汉那突然换了一副面孔的总结发言，也将在2天后作出。他们怎么会料到，毛泽东对“六六六”的理解竟是这样：

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李维汉去世前的一段回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局面形成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发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在这场较量中，很值得共产党骄傲的，是那段几乎每个中国人在文化革命中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语录——“阳谋”：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

这确是事实。毛泽东的警告在1957年1月即已作出：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

但怎么解释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座谈会呢？怎么解释那几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的谈笑呢？从4月30日到5月15日，只有半个月，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不过什么触动，使他一下子暴躁起来，而酿成这半个世纪都未必缓得过劲来的悲剧

呢？

李维汉这样回忆在5月10日前后“向主席汇报”的情景：

……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份。这伤害不仅仅在于诸如谁打天下、谁坐天下，交椅怎么摆等等要命的问题，而在于它是一个旧伤疤，伤害一直可以追溯到1910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sup>①</sup>。更不可以忽略的是，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

5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如不但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在16日之前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请看李维汉的回忆：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会被划为右派。

但当时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干确实有意保护一批人，究竟是有组织的布置，还只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学界盛传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秘书，“文化

---

<sup>①</sup> 当时周作人教授对青年毛润之很是忽视；图书馆的高级职员也因他以龙飞凤舞的字体写卡片而面斥。对此，毛曾在给家乡友人的信中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革命”刚刚开始就自杀了——特别着急，急得火烧火燎，一再提醒他30年代就相识相知的老友曾彦修，让他快快闭嘴。不过曾彦修对此予以否认。他清楚记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过激鸣放”把他吓坏了，比如“到人事科抢档案”、“到天安门示威”等等。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问能不能把他从这里调开。田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了，要放手发动群众，根本还没有发动起来嘛！”他又去找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克寒，陈也说：“没发动起来！真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不得了，怕什么？！”曾彦修记得很清楚，这时确实已不是5月初而是5月底。曾彦修认为，或许大家把田家英类似传说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头上，那次是对张闻天；时间是在两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那次，田家英与胡乔木苦苦劝说张闻天不要发言，张还是发了，从容而坦荡。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柯庆施此时心情可能相当复杂。他特别关照《文汇报》，凡是北京方面来的给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与他通气。那位老黄牛一般只知干活，不善言词的文汇老人严宝礼的名字就是北京点了而由柯庆施勾掉的。这一义举，并不表明柯庆施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有什么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如果非说有，也只在用语方面有了一点突破。他独到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李维汉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

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已经规定了他此后无可更改的被批斗的地位。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一时半，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这时候，他那“经民主党派一致推举”的可爱形象已不复存在。章伯钧此时对储安平的了解显然比两个月前勉强接受他的时候多了一点。他的回答是：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抬出卢郁文<sup>①</sup>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接着，6月9日，储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问到“打算如何就‘党天下’问题写检讨”的时候，储的回答是：“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还是别检讨了。

11日，《人民日报》点民盟的名：《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费孝通去看储。此时，储安平的“心气儿”似乎还很足。费孝通回忆：

谈到“党天下”的发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说许多人支持他的发言，表示颇有群众。并谈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要他再当总编辑，就得选他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笔者接触到这份文献时，很是吃了一惊。直到那时，储安平引以为恨的，不是别的，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党派，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事情做下去。

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声讨右派分子。储安平此时已不能不“向人民投降”，并以此为题作了一个4000字的发言。用今天的标准看，虽不十分诚恳，把自己骂得是够惨的了。而

---

<sup>①</sup> 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谩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且这检讨是他主动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他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但在别的会上——或者说在别的气氛或情绪下——就不是如此了。据他的同人对他的描述：

……不顾会上许多同志揭发的大量事实，储安平发言都是捧着一份过去他在别的会上交待时准备好的书面材料，照本宣读，且只谈《光明日报》的具体业务，避免回答政治问题。

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这篇文章如今已经收在他印制精美的选集里，发往全世界。一位执政党的领袖，这样品评他国度之内本来就极为稀缺的知识分子，无论就时间还是就地域而言，都可算是一个创举。而这创举的后果，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这一百天，时间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里“七上八下”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后来被划的与未被划的，总之在前一段有翘尾巴之嫌者，开始努力表现，以实际行动求自保。笔者在这里已不忍心摘录所有这些学者、教授、名流们横七竖八的相互揭发、质问、攻讦……

……

历史在这里写下了沉重的一页。

(选自《东方纪事》1989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编者对内容做了若干删节，并对个别词语做了变动)

## 晚年毛泽东与中国古典诗词

张 贻 玖

毛泽东的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晚年，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更是爱不释手。“诗言志”，从毛泽东晚年读诗的情况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到美的享受，也可领悟到他个人情感、性格和心理状况等多方面的宝贵信息。对此，这里仅作一简单介绍。

### 读屈原的《离骚》，心中“喜悦”

毛泽东爱读屈原的作品，特别是《离骚》。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恭整的笔迹抄录了《离骚》、《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写有各节提要。《讲堂录》共有47页，这部分抄文占去了前11页。1957年，他请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收集了50余种给他，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195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年、1961年他又两次要《楚辞》，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这期间他出差外地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这两本书。

在一本《屈宋古音义》（明，陈第撰）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划。如：“汨余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阶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掩

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凋零兮，恐美人之迟暮。……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今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叹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朝谇诤而夕替。……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之善淫。……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以上每句末都有圈断。

毛泽东读《离骚》不是一遍两遍，也超出了“三复四温”，而是从青年读到老年，常读常新，时有领会。

### 曹操的诗，“豁达通脱”，“极为本色”

毛泽东很欣赏曹操的诗文。有一次，他在和子女谈论诗词时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sup>①</sup>故居藏书里四种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中，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薤露》、《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诗，毛泽东都多次圈划过。大多数诗的标题前划着圈，诗中密密圈划。在一本《古诗源》中的“武帝”旁，毛泽东用红笔划着两条粗线。“武帝”下编者注释：“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毛泽东对此圈点断句。在《短歌行》的标题前有红、蓝两种笔迹划的圈记；全诗作了圈点。对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等诗句旁，他都加了密

<sup>①</sup> 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

圈。毛泽东爱读《观沧海》和《龟虽寿》这两首诗，不仅反复阅读多次圈划，并手书全诗。曹操的《观沧海》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毛泽东在好几部书里圈划过这首诗。在他写作《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时，对曹操的碣石遗篇念念不忘，发千古之幽情，感叹：“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龟虽寿》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两句诗，有不信天命、自己掌握命运的朴素唯物论，毛泽东很欣赏。1961年他在给胡乔木的一封信中说：“此诗宜读”。在读二十四史《南史·僧虔传》所写的批注中，也引用了这两句诗。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操的诗文形成“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曹操的诗文“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毛泽东在这些评论处，都用红笔划着着重线，在后面一段每句后划着圈，天头上划了一个大圈。

### 《盘中诗》值得“熟读”

毛泽东对封建社会中受压制、遭摧残的女性所写诗词，流露出由衷的同情和赏识。

在《古诗源》里，毛泽东对苏伯玉妻写的《盘中诗》有多次圈划。这首诗为：“山树高，鸟鸣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希。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心中悲。北上堂，西入阶。急机绞，杼声催。长叹息，当语谁。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还无期。结巾带，长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

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黄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苏，字伯玉。人才多，知谋足。家居长安身在蜀，何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今时人，知四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放在卧室里的一本《古诗源》中，毛泽东全部圈点了这首诗；诗末编者的注释除圈点外，对“使伯玉感悔，全在柔婉，不在怨怒，此深于情”处划着曲线；在“用意忠厚，千秋绝调”处划着曲线，句末连划三个圆圈。天头上批注：“熟读”，推荐给别人看。在另一本《古诗源》中，作者“苏伯玉妻”旁，划着红、蓝两色的着重线，天头上圈着一个大圈；《盘中诗》的标题旁划着曲线，天头上划着一个大圈；全诗都用蓝铅笔划着曲线；“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四句旁，除蓝铅笔的曲线外，又用红铅笔加了直线。诗末的编者注释中，“使伯玉感悔，全在柔婉，不在怨怒，此深于情”旁，也用红铅笔划了着重线。对这位连自己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民间女子的诗，从圈划上看，毛泽东最少读过三遍。他的批注和密密麻麻的圈划告诉我们，这首诗，他是很欣赏的。

《古诗源》里另一首汉乐府歌辞《上邪》，是以女性身份表达坚贞爱情的诗。全诗写道：“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毛泽东这首诗的标题前，连划了三个圈；标题旁，划有着重线；开头三句与结尾一句旁划着曲线；全诗每句都加了圈。在“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五句的旁边，分别标着“1、2、3、4、5”的数字，明确作者是用五种违反自然的现象，来表达自己的爱情生死不渝的决心。毛泽东对此诗读得非常认真仔细。

汉朝蔡琰写自己坎坷身世的《悲愤诗》，从战乱中为胡人所掳，到归汉时的母子别离，写得情真意切，凄楚动人。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前划着大圈套小圈，标题后连划了三个小圈，表示了对这首诗的重视。这首诗的最后几句，“……竭心自勉励。流离成鄙

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每句旁都划着圈。诗旁加了密圈，天头上也划着一个大圈套小圈的标记。还将此诗批送给别人阅读。在诗末编者的注释：“……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砂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由情真，亦由情深也”等句旁都划着曲线。对另一本《古诗源》中的这首诗，以及蔡琰著名的《胡笳十八拍》，毛泽东也有圈划。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首词凄婉哀怨，其中“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一千古绝唱，刻划出旧社会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性，在不幸的命运前孤苦无助的形象，感人至深。毛泽东对这首词的喜爱，表现在藏书中，凡载有这首词的集本，都留着他圈划的手迹。

以上封建社会的弱女子，尽管她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文学修养、诗词风格各有不同，但她们的作品都反映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倾诉了历代妇女痛苦的呻吟，哀怨的悲诉，是她们发自内心的声音，质朴而不矫情，它打动着毛泽东的心。

### 谢灵运的《登池上楼》，“通篇矛盾”

故居书房里有一本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古诗源》。毛泽东在南北朝晋宋之际著名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这首诗中，几乎每句旁都划着曲线，句末加着圈。在“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下面连划两个圈后，在天头、行间批注：“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标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

自江海人，忠又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这100多字的批注，远远超出作品本身，而是对谢灵运品德和政治态度的评价。

毛泽东在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南史》列传九中，仔细阅读圈点了有关谢灵运及其家族的历史资料。据列传记载：谢灵运是历史上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赫赫名将谢玄的孙子，谢氏家族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贵族、大官僚地主。谢灵运世袭康乐公，一生崇尚奢侈，纵情山水，博览群书，工诗善文。在政治上，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而宋武帝、文帝始终未委以军国要职，因此他“常怀愤惋”，并数次遭贬。后有人在文帝面前告他“谋反”，“遂有逆志”，因而被杀。死时49岁。池上楼在永嘉境内，《登池上楼》一诗是谢灵运被贬出任永嘉太守时所作。全诗反映他当时郁郁不得志的心态。被毛泽东称作“造反的檄文”的那四句诗，是他谋反时写的。

从批注看，毛泽东对谢灵运的政治作为，并非同情态度；但对谢灵运的诗却颇为重视。在写有批注的这本《古诗源》中，收进24首谢灵运的诗，他作了圈划的就有22首。《岁暮》是通过自然景物表达诗人的情怀，抒情与写景紧密结合的一首诗，毛泽东每句都加了圈，有的还加了三个圈。另一首《斋中读书》是言志记怀的，毛泽东也是逐句圈划。对谢灵运那些刻划自然风物的清丽诗句，如《邻里相送至方山》中的“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等，毛泽东都在句旁划着直线、曲线、曲线加直线；句末也都划着两三个圈。编者注释“别绪低徊”、“触景自得”两句旁划着曲线。《古诗源》的编者在注释中评论谢灵运的诗“一归自然”、“匠心独到”、“在新在俊”，毛泽东在这些地方都划着曲线和圈。《昭明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谢灵运的诗，毛泽东也圈划了不少。

## 王勃“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

王勃与骆宾王、卢照邻、杨炯四人，在唐太宗时齐名文坛，被称为“初唐四杰”。王勃是四杰中的佼佼者，诗文最有特色。

《新唐书》第210卷的《王勃传》中写道：“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寐，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毛泽东读到这里，用红铅笔划着着重线。在一本《初唐四杰集》里，毛泽东对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的标题前划着大圈，并写下一条长达1000多字的批注。从批注的内容看，大约写于1958年之后，60年代之前。批注考证了这篇文章“是去交趾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四了”。作《滕王阁序》时，王勃“应是二十四、五、六”，而不是象有些人说的是“十三岁，或十四岁。”批注写道：“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樟梓一带，河南之虢州。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安南）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批注从王勃的经历说起：“他作过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英王的斗鸡写了一篇檄某王斗鸡的文章。在虢州，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批注分析他的作品：“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批注赞扬道：“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

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由王勃年轻有为引发，毛泽东在批注中满怀激情地一再阐述自己的观点：“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等等。在这段批注中，毛泽东对诗人的作品进行了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并阐述了自己的社会进化观。

毛泽东还圈划批注过王勃其他一些诗。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有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毛泽东在天头上批道：“好”。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著名诗句下连着划了三个圈。《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是王勃用骈体文写成的诗序，毛泽东在“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警策凝练的句子后面划着圈。尤其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优美如画的句子表示了由衷的喜爱。60年代初，他在和子女们的一次谈话中，一边背诵这篇诗序中的佳句，一边悬肘挥毫，书写了这一名句，留下珍贵的墨迹。

### 杜甫的《北征》中有“比、兴”

1957年毛泽东在和臧克家等谈话时，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但从故居藏书中看，他读过杜甫不少诗，仅圈划的就有67首。成都会议时，他从杜甫草堂处借阅过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有12部108本，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对杜甫的诗，他圈划

过三四遍的有《梦李白二首》、《咏怀古迹五首》、《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楼》、《阁夜》、《春望》、《佳人》等等。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这些诗标题前，他都划着大圈，标题后连划三个小圈。

毛泽东对杜甫《北征》这首诗是肯定的，1965年他在给陈毅同志的信中谈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说：“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1923年，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一词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两句，原稿中本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另一稿“不愿作昵昵小儿女”）。“江海客”引自杜甫写给当时名相张镐的诗：“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1937年他在与朱光等谈论书法、艺术等问题时，引用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的序言中所说：“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郾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毛泽东认为，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是相通的，是至理名言。1964年，毛泽东由湖南返京，火车经过岳阳地段时，他索笔手书了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李白的诗“文采奇异，  
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有一份李白《梁父吟》的手抄本。它是用一寸大小楷体的毛笔字，抄录在16开毛边纸上的，共11页。右上角，有毛泽东用铅笔划着读过两遍的圈记。了解情况的同志说：这是毛泽东晚年，由于视力减退，为了读这首诗，特意让人用大字抄写出来的。在另一本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

里，他在“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两句旁，用红铅笔划着直线，在函套上也划着读过两遍的大圈。李白的这首诗，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所作。诗中大量引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中有为之士遭受的挫折，比拟自己的怀才不遇，控诉权奸当道的黑暗。诗人寄希望于未来，相信有才能的人，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抱负，不因受挫折而气馁，这是李白用世之心的积极方面。全诗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极富浪漫主义的文艺特色。毛泽东喜爱这首诗，早在60年代就凭记忆手书过这首诗；在他的晚年，对李白这首政治上失意后的悲愤之作，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表露出特殊的倾心。

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李白《将进酒》这首诗的标题前划着一个大圈，标题后连划三个小圈，天头上批注：“好诗”。“天生我材必有用”是李白对自己充满信心的道白。毛泽东对李白这种强烈追求个性解放，不畏权贵，不崇拜偶像的诗，都很欣赏。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宣州谢朓楼别校书叔云》中的“弃我去者，明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忧愁。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等等诗句，毛泽东都在句旁划着着重线；好几本诗集中，这些诗的标题前都划着两个、三个圈；有的书中，标题前划圈，标题后还连划三个小圈。

也是在那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李白的《蜀道难》这首诗的天头上划着一个大圈，批注道：“此篇有些意思”。毛泽东曾对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称赞说：“《蜀道难》写得很好，艺术性很高，对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写得淋漓尽致，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他还说：“对这首诗，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

必”<sup>①</sup>。毛泽东对李白这类诗如《上三峡》、《鹦鹉洲》、《鸣皋歌送岑征君》等都多次圈划。此外，他对《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子夜吴歌》等诗，都很爱读，多次圈划。

毛泽东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sup>②</sup>。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牺牲后，他忍受着自己内心的巨大苦痛写信劝慰岸英的妻子刘松林，要她多读些李白的诗，说李白的诗可以开阔胸怀。

### “李贺诗很值得一读”

1965年，毛泽东在写给陈毅的信中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在一则批注中，他称赞李贺是“英俊天才”，惋惜李贺的早夭。一本《新唐书》第230卷《李贺传》中，他在天头上标写着“李贺”两个醒目的大字，在记载李贺写诗“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等处，逐句加了旁圈。故居书房里藏有各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等。翻开这些书，每本都有毛泽东的圈划。在一本《李长吉歌诗集》杜牧所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多处划着曲线和圈。李贺流传于世的诗约有240首，毛泽东圈划过的有83首。有些诗圈划过四、五次。

毛泽东圈划得比较多的是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和《马诗二十三首》。这两组诗是李贺托物、托景、托事寄情，抒发自己对政治、对人生的抱负、见解和感慨的。毛泽东除了在几部李贺的专集中圈划这些诗外，在《唐诗别裁集》中也作了圈划。特别是对《南园》中的“男儿何不带吴钩？……”和“寻章摘句老雕虫，……”两首圈划

① 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

② 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

尤多。《致酒行》一诗中，诗人以汉朝的主父偃、唐太宗时的马周先遭厄运，后被重用的历史人物自勉自励，不以遭际“零落栖迟”、“幽寒”而气馁。诗的最后四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壮志当擎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表达了诗人希望有朝一日壮志得以实现的强烈愿望。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些诗句，在写《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时，点化运用出“一唱雄鸡天下白”这一诗句，形容由黑暗走向光明的中国。

毛泽东还多次圈划过李贺的《秦王饮酒歌》、《金铜仙人辞汉歌》、《苦昼短》、《昆仑使者》、《官街鼓》等诗。这些诗都是借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抒发诗人对当权者的不满，其中《金铜仙人辞汉歌》通过魏明帝搬迁汉武帝所铸金铜仙人这段历史，借古寓今。“天若有情天亦老”，是写仙人离京时的感叹。毛泽东在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时，引用了这一诗句并赋以新意。

毛泽东对李贺那些被誉为“胎息《楚辞》”的诗，如《巫山高》、《湘妃》、《神弦》、《雁门太守行》等等，也圈划得比较多。特别对《雁门太守行》一诗，流露出喜爱。

李贺以他奔放的激情，瑰丽多采的语汇，奇峭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写下一些具有神话色彩的游仙诗，如《天上谣》、《梦天》等。毛泽东在这些诗中都又圈又点又划。在一本黄陶庵评本的《李长吉集》中，毛泽东对《梦天》中“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两句末划着圈；在天头编者的评语：“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九州二句，妙有千古”处，每句都圈点断句，很重视这一评论。

### 背诵李商隐的《马嵬》诗

新中国成立后，一次，毛泽东请周谷城到中南海书房谈今论

古，一起游泳。当时，兴之所至，周谷城随口背诵起李商隐的《马嵬》这首诗：“海外徒闻更九州，……”背着背着，突然最后两句忘记了，一时接不上来。正在他十分尴尬的时候，毛泽东很自然地接口背诵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可见，毛泽东对李商隐的诗非常熟悉。《马嵬》是一首写安禄山之乱，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咏史诗。从故居藏书中看，这首诗毛泽东至少有三次圈划。李商隐写有很多咏史诗，借古讽今，笔触含蓄，主意精辟。如《贾生》、《北齐二首》、《隋宫》、《韩碑》等，毛泽东都有圈划，有的多达三五遍。

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特创作，这些诗大部分是写爱情的，也有一部分咏史的内容。李商隐的爱情诗，辞藻朴实而自然，情致缠绵而不庸俗，有感人的艺术魅力。“相见时难别亦难”这首《无题》诗，毛泽东在标题上连划三个圈，圈划过五遍。对含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著名诗句的无题诗，毛泽东都划着火圈、小圈，流露出极为赞赏的心情。另外如《锦瑟》、《夜雨寄北》、《嫦娥》等诗，毛泽东也是多次圈划的。

### 白居易“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

毛泽东在《注释唐诗三百首》中白居易的《琵琶行》这首诗的天头上，写着一段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对这首诗的标题连划三个大圈，在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句旁，一路密圈。《琵琶行》借一个沦落天涯弹琵琶女子的一生遭遇，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坎坷身世，及与之共鸣的思想感情。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使白居易的这首诗散发着异样的光彩。“同

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饱浸着诗人血和泪的传世诗句。毛泽东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

故居里还有一本平装的《白香山集》，其中《放言五首并序》的第三首是：“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1972年，毛泽东曾引用这首诗的后四句，对林彪做了刻骨逼真的评价。

### 对刘禹锡的诗“此种解释是错误的”

1975年春天，毛泽东已经80多岁高龄。有一天，他初次会见一位同志，道过姓名之后，问她：“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接着自己铿锵有力地吟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原来，这位同志的姓名恰好镶嵌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里，因此毛泽东很快联想到这首他所熟悉的诗。从藏书中看，毛泽东对这首诗先后圈划过六遍。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他在这首诗的标题前划着一个大圈，标题后又连划三个小圈。在另一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标题前，他用红铅笔也划了一个大圈。编者在诗后注释：“时梦得与元微之、韦楚客、白乐天各赋金陵怀古，梦得诗成，乐天览之曰：‘四人探骊龙，子已获珠，余皆鳞爪矣’。遂罢唱。”“梦得”是刘禹锡的字。毛泽东对这段注释，逐句加了圈点断句。

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毛泽东在诗人刘禹锡这个名字上面，用红铅笔划着一个大的圈记；旁边，用黑铅笔划着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的标题前用红铅笔划着圈；诗中用红、黑两色笔作了圈划；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

本春”两句诗旁，用红铅笔划着着重线。编者注释中写道：“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对这段注释作了断句，在“造化亦无如之何”下划着着重线，批注道：“此种解释是错误的”。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的优秀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有着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家，除写过《天论》等文章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外，在诗词中也常闪烁着哲理的光辉。1959年毛泽东在和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谈话时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可见，毛泽东对上面这首名诗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刘禹锡23岁时被贬，10年后被召回京，写了一首著名的《玄都观桃花》，感叹“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得罪了新贵，再度被贬。14年后，诗人又被召回，写下了《再游玄都观》，仍用讽刺的口吻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又重来”。充分表现了他政治上不畏强暴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很喜欢这两首诗，曾经挥毫手书过这两首诗。

毛泽东也很爱读刘禹锡的一些咏史诗。对《蜀先主庙》一诗，毛泽东批注：“略好”。对《乌衣巷》，圈划过六次。此外，对刘禹锡那些具有民歌风格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等也都有不少圈划。

### 浓圈密点罗隐的诗集

故居的藏书中，有罗隐的两本诗集——《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毛泽东对其中很多首诗划着浓圈密点，粗略的统计约有91首。

毛泽东圈划得比较多的是罗隐的咏史诗。如咏叹诸葛亮的《筹笔驿》：“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余岩下

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前划着三个大圈，每句诗末都划着圈，在第一句诗旁划着曲线，从第三句开始，一路密圈到底。他在读《南史·梁武帝》诗时，对这位创于己、亡于己的悲剧皇帝，引用了这首诗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作为批注。另对《王濬墓》、《西施》、《秦帝》、《董仲舒》等有独到见解、大胆评价的咏史诗，毛泽东都在标题前划着两三个大圈，诗内密圈加着曲线，对《董仲舒》一诗则是一路密圈到底。

罗隐是晚唐很有才气但又很不得志的诗人。他因写有《谗书》讥讽时政，触犯了统治阶级，因而十次考进士，十次落第，满腔怀才难展的悲愤，流露在作品中，既有比较清醒的揭露现实的一面，也不乏愤世嫉俗消极低沉的一面。如已广泛流传成为成语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他《自遣》诗中的一句。毛泽东对他的这首诗，一路密圈到底。罗隐的《嘲钟陵妓云英》：“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毛泽东对《罗昭谏集》中的这首诗最后两句，字字加了密圈。在《甲乙集》的这首诗中，除圈点外，还批注：“十上不中第”。

毛泽东读过的一本《通鉴纪事本末》第220卷记载：唐末藩镇割据，江东纷扰，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与黄巢所属孙儒旧部作战时，在杭州修筑城垒，“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罗隐曰：‘楼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毛泽东对罗隐的话，逐字加了旁圈，批注：“昭谏亦有军谋”。可见，毛泽东对罗隐的军事才能也是赏识的。

对罗隐的写景诗，如《七夕》、《浮云》、《京中正月七日立春》、《中秋夜不见月》等，毛泽东也是密圈、旁圈、双圈等作了不少圈划。有的还在大圈内套着两个小圈。

## 辛弃疾的词圈划得最多

毛泽东圈划过岳飞、张元干、张孝祥、苏轼、秦少游、李清照、萨都刺、纳兰性德等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从故居藏书中看到的，他圈划得最多的还是辛弃疾的词，约98首。一部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稼轩长短句》，共有四册，每册的封面上，他都用了粗重的红铅笔划着读过的圈记，书中有60多首词的标题上，也划着圈记，书中用黑、红两色铅笔划着圈、点、曲线。从圈划中不同颜色的笔迹估计，这部书可能是他在不同时期内断续读完的。在他经常翻阅的几部《词综》里，对辛弃疾的词也是多次圈划。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两首词，借赞扬孙权战胜北方敌人的武功，讽喻南宋统治集团投降主义的怯懦无能，并以廉颇自喻，表示为实现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理想，老骥伏枥，雄心不已的壮志，一向被认为是辛弃疾爱国主义的代表作。毛泽东多次圈划过这两首词，非常喜爱。熟悉他的田家英曾告诉诗人臧克家：毛泽东某首诗的起头，是有意仿照《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1957年3月，在一次由南京飞往上海的途中，当飞机飞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书写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并向同行的工作人员解释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的典故。京口北固亭在今江苏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词人、军事家、政治家，早年参加过抗金义军，后遭主和派的打击，长期落职闲居。他的《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扬济翁、周显先韵》这首词，抒发自己对往昔战斗生活的怀念和年老后壮志未酬的苦闷。毛泽东对这首词至少圈划过二遍，在标题的天头上划着大的圈记。他还细心地在了一本《词综》

里，把这首词中“列舰耸层楼”印错的“檻”字改为“舰”字。辛弃疾的这类词，毛泽东还反复圈过《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等多首。

辛弃疾那些描写细腻感情的抒情写景作品，毛泽东也很爱读。如《木兰花慢》，作者在词前写有一段小序：“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这首词为：“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荡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嫦娥不嫁谁留？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毛泽东在这首词的标题前连划三个大圈；对小序中的每句话都加了圈点；对词中七个疑问句后，每句都划着一个大大的问号。1964年8月，他在同周培源、于光远两人谈论哲学问题时，认为辛弃疾这首词，和晋朝张华《励志诗》中的“太仪斡运，天回地游”，都包含有地圆的意思。可见，毛泽东对辛弃疾这首词的着意圈划，除艺术上的欣赏外，还十分赞同词人辩证思维的深刻性。

### 读婉约派柳永的词

毛泽东说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并且说他的兴趣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sup>①</sup>。故居书房里有柳永的一本《乐章集》，在这本专集和《词综》里，毛泽东圈划过柳永的35首词，有的词是反复圈划的。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也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他出

---

<sup>①</sup> 曾三，《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

身于世代书香的宦官家庭,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勤奋读书,吟课诗词,精通音律,多才多艺。只因为被宋仁宗斥责为“薄于操行”,致使他屡试不第,50多岁才中进士,一生只做过屯田员外郎等小官,因而郁郁不得志。他的《鹤冲天》这首词,反映了他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消极心情。柳永在这首词里,傲然以“白衣卿相”自居,视“功名”为“浮名”,看得还不及“浅斟低唱”有意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是词人宦途失意后玩世不恭的自我解嘲。毛泽东密密圈划了这两句词。

柳永多次外出漫游,动辄“经年”。这些漫游,开阔了他的眼界,写下了描写杭州市井富庶、风光壮丽的《望海潮》;也写下了抒发别恨离愁,景、事、情浑然一体,极富感染力的《雨霖铃》,等等。这些被称作柳永代表作的词,毛泽东都有圈划。但圈划得比较多的是《乐章集》中的三首《满江红·桐州》,这三首词情景交融,真切动人。

柳永以他毕生的精力从事词的创作。他的《乐章集》存词194首,用了17个宫调,近百个词牌。其中只有4个调,21个词牌是明显采用前人的,其他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新声”。他在开拓慢词,转变词风,使词从狭隘的上层社会返回市井里巷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很重视他的词。

(节选自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10月版〕。作者对节选后的内容又做了部分增删,标题为本书编者所拟)

## 编 后

当把一叠叠处理好的文稿交付出版社时，作为一本实实在在的书算是编完了。但思绪并没有停顿下来，有些惆怅，有些忧郁，甚至有些亢奋的痛苦。我相信在人类生存的永恒长河中，毛泽东所留下的瞬间包含着无限的意义。特别是他的晚年实践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特定历史时期内我们民族的精神现象史。在这种含义上，我们说，这部书还远未编完，或许永远编不完。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智慧的成长，我不知道后人将怎样看待他，评价他，将怎样回顾和反思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但可以肯定的却有一点，那就是：“毛泽东研究”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这当然与毛泽东本人那浩瀚宏大、独树一帜和极其复杂的思维体系有关，也与他那充满自信、魅力非凡和富有神秘色彩的人格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与现代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密切相关，与“我们”的理性、情感、思维、行为、价值取向和生存需求等等密切相关。对现代中国来说，作为一个超越个体的整体精神形象，“毛泽东”已经转化为某种价值形式和文化符号，积淀于中国人，特别是老百姓的血液和灵魂之中。正因如此，“毛泽东研究”包含着无限的意义，是一部编不完，写不完的书。

1981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它使毛泽东从空寂的神界回到了火热的人间。一方面，《决议》扫除了曾经禁锢着

人们的理论“光环”，具有现实的思想解放意义；另一方面，它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原则性的公正评价，使人们对他的完整形象和总体思想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同时，《决议》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为科学、系统、深入、全面地展开对毛泽东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公正的政治评价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的结束，而恰恰是理性反思的开始，作为生活在毛泽东故乡——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我们的历史责任不是吃这个基础的“老本”，而是珍视这个基础，在与国际学术界积极交流的大环境中，作出应有的、名符其实的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第一流贡献。

基于这种考虑，就我个人来看，如果真要使“毛泽东研究”成为一门学问，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首先，编撰毛泽东编年史的工作是基础的一环。没有充分、丰富、扎实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研究”必然失于空泛。“无米之炊”无论如何也做不出饭来，“替代品”是史学研究中的大忌。这样，发掘、整理资料就成为深入研究首先的环节。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所能见到的资料极其有限，远远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从而直接影响和限制着中国学术界研究水平的正常发挥。由此就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比一般中国学者来说，在史料占有量上要丰富、扎实些——尽管其中难免夹带着一些谬误。毛泽东建国以后与外宾的大量谈话，由于是跟外宾讲的，在国际上已广为人知，但对于中国老百姓，甚至专门的研究人员来说，仍处于“绝密”状态，凡人不能轻易染指。读罢西方学者的若干较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尽管我们不尽同意他们的具体论点，但却不能不为他们较扎实的资料二夫而叹服。这其中除了潜心搜集之外，恐怕还有一些中国人所不具备的便利条件。我承认，一般中国记者没有索尔兹伯里那样的“神通”，想采访谁就采访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尔后，《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成为中

国译著中的畅销书；但我决不承认，中国人，特别是普通的研究工作者，无权知道本国的历史，无权涉猎科研范围内所必需的资料，更不能由此证明中国人天生愚笨，以致不能正确看待和把握自己的过去，不能全面理解自己曾走过的道路和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说来也太可悲了，问题往往出在自家身上：中国人封锁中国人。或许我太“幼稚”了，但我知道这些“幼稚”的想法最起码不违反形式逻辑。我相信，毛泽东九泉有知，一定会对这种不知从何谈起的现象感到愤慨，因为他在世时曾多次说过，对他的事情，由后人评说吧。

据我所知，目前大陆中国的许多青年学者都普遍对“毛泽东研究”予以重视。他们发现，研究现代中国，无论从哪个角度起手，沾哪门学科，最终都超越不了这座大山。虽然大家都很敏锐，并富有思想和激情，但一旦展开论证就立即被缺乏第一手资料所困扰。为着研究工作能够勉强地进行下去，不得不拉关系，走后门，挖墙角。他们有主见和独立意识，但没有机会和权利。面对世界，他们感到内疚，面对现实，他们却无能为力。他们遇到的是智慧所超越不了的困难。这使我不能不想起帕斯卡尔的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sup>①</sup>。我们所拥有的只有期待，然而这种期待确是一种“超我”的意愿和信念，它一头联着“自我”，另一头联着民族。

其次，我想，“毛泽东研究”应当超越那种单调乏味，“固若金汤”式的思维模式。用一个统一的思路和方法去“套”毛泽东，本身就与真实的毛泽东大相径庭。苏联著名学者库兹涅佐夫说：“在科学上，*mors immortalis*（不死之死）和字面意思相反，决不意味着

---

<sup>①</sup> 《思想录》第158页。

科学进化的每个阶段的简单终结。这不是死的不朽，这是生的不朽。科学理论活着，就是说它是不朽的，而不是它的消灭。……科学上不朽的东西就是它的问题因素，即没解决的留待未来去解决的问题，推动科学进一步改造的矛盾，把科学引向前进的悖论”<sup>①</sup>。这是他评价爱因斯坦时的精彩表述。在我看来，一方面它可以启迪我们研究毛泽东；另一方面它也具有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含义。

应当说，这本文集大致可以反映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及实践的总体水平。人们论证的角度，涉及的广度以及方法论上的尝试，与若干年前的情况相比，确实是向前迈了一步。但依我看来，这只是晚年毛泽东研究的现实基础，理论仍需深化。而对毛泽东进行文化透视，显然是一个突破口。在文化学的意义上说，毛泽东是超越个体的人物。“毛泽东”这一姓名称谓，早已内涵着比具体历史人物更为远大，更为宽泛的精神意义。也就是说，应当把毛泽东的思维与行为的历史过程，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他实际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社会文化群体结构。这样，代表具体个人的毛泽东，在我们的学术视野中就变成了超越个体的“毛泽东”。对于这个加引导的“毛泽东”，或曰“毛泽东现象”，我曾作过如下最简要、最粗略的理解：“有时，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开始并不十分清晰，但大致可以从几个方面把握。其一，毛泽东是特定历史环境中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身，他体现了整体中国人的‘大我’。在这一环境中，《毛主席语录》成为人们思考和行为的座右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以‘最高指示’为衡量标准。甚至一个人握过毛泽东的手，顿时他的手也变得伟大起来。人们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献给了毛泽东。因此，今天要寻找那失落的自我，只能到

---

<sup>①</sup> 《爱因斯坦——生·死·不朽》，1988年版第298页。黑体字为引者标出。

毛泽东那儿去再发现。其二，毛泽东是典籍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有机契合点。人们知道，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典籍理解甚深，儒、道、墨、佛均有体察。尤其是他的诗词，更是气势磅礴，功力非凡。同时，他又一生未脱农民本色。据说，他喜欢在花园里种菜，主张城市绿化时最好栽果树。《三国》、《水浒》、《西游记》极为熟悉，民谣民歌出口成章。‘夫子’与‘农夫’两种角色，在他身上发生了重叠。其三，毛泽东是近代以来批判情感思潮的巅峰，又是被这一思潮吞食的巨人。在中西不同生产方式和异质文化相撞击的年代里，中国人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批判’情绪，为了生存就只有‘斗争’。毛泽东是这种批判情感的集大成者”<sup>①</sup>。

当然，上述看法充其量不过是某种“猜想”、“假设”性的思路，命题本身是否成立还将受到史实的严格检验以及相当严密的理论论证。但我自信地认为，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如今人们常引用由韦伯提出，经希尔斯发展的Charisma理论（据我理解它应解释为“人格化的合理性社会权威”）。那么与此联系密切的“毛泽东现象”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又何在呢？假如否定其历史合理性，我们又怎样看待和理解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民族呢？显然，毛泽东超越时空的理想主义气质与中国典籍文化系统的“内在超越”精神有关；而他务实求实，神机妙算的本领又与中国民俗文化系统的“避劫求稳”心态有关；他晚年想用“阶级斗争”的冲突理论来实现其“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和谐目的，与上述双重文化人格的矛盾有关；“文革”中他手臂一挥，几亿人“万马奔腾”，又与上述双重人格的融合有关。……总之，研究方式应当是多元化的，思想自由的人性原则，也是“毛泽东研究”所不能违背的神圣公理。

---

<sup>①</sup> 《萧延中谈“毛泽东现象”》，1983年9月27日《北京青年报》。

再次,在本质的意义上讲,“毛泽东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追究毛泽东个人的历史责任,也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做简单的选择和划分。因为在文化透视的含义上,我们既可以说毛泽东支配了整个民族,但也可以说是整个民族塑造和养育了毛泽东。在我看来,后一个角度更为重要。记得一位著名作家曾打了一个著名的比喻:菩萨的脸变黑了,是信徒们烧香给熏的。因而,“毛泽东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应当是超越混沌的文化圈,反思那个长期支撑着蒙昧的“自我”。梁晓声说:“我曾经是个红卫兵,但我不忏悔!”因为那时极少正常人。对失去主体性的“自我”,只有反思的利权,但无忏悔的义务。真正的强者应当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理应向后人做个坦白的交代,而不是一股脑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难道在你的深层心理结构中,真的没有过寻觅庇护的要求,没有过追求解放的期望,而只有高扬独立的自由意识吗?!这里似乎还得说到韦伯那句老话:“权威使人信服的能力是来自人本身的力量”。当然,这里的“人”具有双重含义。这样,我们不能仅仅强调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里,人们失去了“外在的自由”,而更应当时刻牢记我们也曾主动奉献了以“依据生命自觉及对生命资源自知”为内容的“内在自由”<sup>①</sup>。因之,研究毛泽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反思“自我”,就象鲁迅当年将锋利的解剖刀无情地对准“自我”的要害关节一样,“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更不留情面”。在这种含义上,我们应把毛泽东这位超凡的巨人看成和我们一样的人,也就是说,不能在“毛泽东”与“我们”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我想,这种超越个体又回归个体的整体文化探究,或许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来说,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

我们期待着;我们思考着;我们自省着。

---

① 参阅:林毓生《论自由与权威的关系》,《思想与人物》1983年版,第98页。

这里特别应当感谢的是李锐先生。对于这个名字我素有敬意，还在读大学本科时我就拜读了他的几部著作，尤其是他具有国际影响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更是给了我不少启迪。后来又读到他在讨论《决议》草案时的长篇发言，更是感慨万千。正如黎澍先生对我所言：“李锐对毛泽东思想素有研究，成果卓著，世所共知”，因此编辑此书，我怀着期望请李锐先生作序。他没有推辞，百忙之中还审阅了一部分稿件，而且与我反复商榷编辑方针和选题要旨，逐一对稿件的质量、数量及全书的总体设计等等，提出了许多宝贵见解。例如他说，“历史有一个发展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成熟过程，认识将永远包含着历史性”，因而编辑选题一定要坚持体现学术文明的“双百方针”，反映出各种主要观点。他建议，对少数明显不妥当的观点，除作简要的技术性处理之外，应采取宽容态度，保留一家之言，以此反映国内晚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整体水平。对若干明显的史实错误，如“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指毛泽东——引者）写了《实践论》等光辉著作”等等，他都亲自一一予以校正。在他身上，我看到老一辈理论和思想工作者那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那严肃扎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坚持真理的人格精神，以及对后学青年鼎力相助、无私奉献的大家风范。这些都是青年一代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在我看来，李锐先生的学术思想仍在发展，本书序文比起发表在今年3月28日《人民日报》上的重要文章，论证的幅度更高，涉及的范围更广，又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本书能得到这样的序文，编者自然感到欣慰和兴奋。在此，谨对李锐先生及其他的指导与支持表示真诚的谢意和敬意。

我还要特别感谢除拙作外本书其他各篇文章的作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构架，为这部专题文集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另外，我的老师林茂生教授，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汪澍

白教授，曾对本书的编辑给予了指导和关注；张琦和武市红等朋友也曾对编辑本书予以无私的帮助，对他们，我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

编 者

1988年11月18日

于北京海淀稻香园

白教授，曾对本书的编辑给予了指导和关注；张琦和武市红等朋友也曾对编辑本书予以无私的帮助，对他们，我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

编 者

1988年11月18日

于北京海淀稻香园